

对于有兴趣了解共产主义是如何、为何在欧洲崩溃的人来说，这是一本不可缺少的读物。一流的撰稿人对于以和平、谈判和急剧的方式进行的变革所赖以发生的机制，给出了清晰明了的分析；关于东德和中国的生动而与其他国家反差鲜明的讨论，给了读者一个特别的额外收获。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其他对二十世纪最不同寻常的事件之一感兴趣的人，可以从这本书中学到大量的东西。

—— 凯斯·R·森斯坦 (CASS·R·SUNSTEIN)
芝加哥大学凯尔·R·乐微林杰出贡献教授

定价：30US\$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出版

01
转型译库

圆桌谈判与民主转型
1989年的东欧和中国

热奈·艾斯特 (Jon Elster) 主编
张小山 杨子立 译
王天成 审校

转型译库 01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圆桌谈判与民主转型
1989年的东欧和中国

热奈·艾斯特 (Jon Elster) 主编
张小山 杨子立 译
王天成 审校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圆桌谈判与民主转型

1989 年的东欧和中国

热奈·艾斯特 (Jon Elster) 主编

张小山、杨子立 译

王天成 审校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感谢热奈·艾斯特（Jon Elster）教授授权我们出版本书中文版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Jon Elster (ed.)

圆桌谈判与民主转型：1989 年的东欧中国

原著：热奈·艾斯特等

翻译：张小山、杨子立

审校：王天成

2017 年 4 月第一版

出版：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地址：PO Box 615, 26 S White Horse Pike, Somerdale

NJ08083-9998

网址：<http://chinademocrat.org/>

电邮：chinatransition2017@gmail.com

印刷：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国际书号：ISBN-13: 978-1545119723

编辑推荐

选择这本书作为“转型译库”的开场锣鼓，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民主是以民主的方式建立的。过去数十年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几乎所有民主转型中，政府与反对派之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沟通与谈判。这本书重点研究的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前共产主义国家 1989 年的圆桌谈判，分析探讨了这些国家圆桌谈判的发生条件、谈判的预备、代表的产生、谈判的过程、争议的焦点、各方的战略战术、化解僵局达成妥协的机制、谈判的结果和深远影响。它最后辟专章探讨了 1989 年发生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为什么走向了悲剧性结局。无论是反对派还是政府方面，都可以从这本书所讲述的经验教训中学到许多东西。它的价值不仅仅是历史的，更多的是关乎今天和未来的。

转型译库

总策划：王天成

近期书目

圆桌谈判与民主转型：1989 年的东欧和中国（已出）

总统制民主的失败（上）：从比较的角度看

总统制民主的失败（下）：拉丁美洲的案例

民主转型：与领袖人物谈话

建构国族：联邦制在多民族国家

西班牙民主的胜利

匈牙利的圆桌谈判：分析与文件

制宪：理论视角与案例分析

“转型译库” 出版说明

未来必将证明，在历史所赋予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种种使命中，第一重要的莫过于争取和建设民主的努力。100 多年前，当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全世界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不超过 20 个。今天，在我们策划、出版这套丛书的时候，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已经达到 120 多个，占独立国家总数的五分之三强，民主自由真正成了一种普世价值、一种世界潮流、一种全球性现象。

在争取、建构民主自由的过程中，许多国家取得了成功，建立并保有着自由政府制度，也有很多国家遭受过失败，经历了民主的崩溃甚至一再崩溃，人们不得不一再重新出发。就我国而言，辛亥革命所建立的半民主政体未能巩固、深化，在 10 多年后最终崩溃，它遗留的政治果实到 1949 年则彻底灰飞烟灭。此后，在经历了数十年极权统治后，我们不得不重新出发，今天依然停留在呼喊民主的阶段。

要改变一个国家，必先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人的思想，必先增益人的知识。1899 年，严复在给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的信中说，“译书为当今第一要务”。从清朝末年年开始，翻译西方学术名著成为影响、改变中国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19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再

次兴起译书潮，大量西方学术著作——包括政治学、法学、伦理学著作——得以翻译出版，它们对于传播普世价值贡献卓著。

然而，已翻译出版的书虽然种类颇多，甚或可以说琳琅满目，却以古典名著或其他年代较久远的作品为主，普遍偏重抽象理论。尤其是，由于政治环境、知识人自身局限等原因，鲜见在丰富的案例基础上研究民主转型、制度设计、民主成功与失败的当代著作。

这导致了一种极其重要的知识供应短缺，与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使命——争取民主自由——形成了鲜明反差。我们策划出版“转型译库”就是要填补这一供应短缺。我们相信，无论是当下关于中国如何实现民主的思考，还是未来建构和巩固民主，都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政治转型并不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要完成的唯一大转型。我们同时还面临着向全面而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的任务。所以，“转型译库”还会视情况推出一定数量的关于经济转型、市场经济建构的著作。

感谢有识之士对本研究所“转型译库”项目的支持、资助。在此，我们希望能有更多认同本所该项目或其他项目的人向我们伸出支持之手，包括推荐书目、给予资助或做义工。民主是我们共同的事业，让我们共同努力。

2017年4月1日

目 录

1	导 言	热奈·艾斯特
28	第一章 波兰的圆桌谈判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92	第二章 匈牙利的圆桌谈判	安德拉斯·赛约
131	第三章 民主德国的圆桌谈判	乌尔里希·K·普罗伊斯
172	第四章 捷克斯洛伐克的圆桌谈判	莫里斯·卡尔达
233	第五章 保加利亚的圆桌谈判	罗姆亚娜·科勒拉瓦、迪米特·迪米特洛夫
285	第六章 天安门的悲剧	邹 谥
319	作者简介	

导 言

热奈·艾斯特 (Jon Elster)

现在这本书是研究 1989 年后东欧和前苏联宪政发展的系列出版物之一。因此，合乎逻辑的出发点就是从头开始——发生在 1989 和 1990 年间的圆桌谈判，它发生在政权和反对派团体之间，导致了谈判后共产主义的被废弃。发生在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波兰的这些谈判分别在每一章里进行了阐释。本书也包括一章是关于当局和反对派之间谈判失败的，也就是 1989 年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和改革者被挫败的自由化努力。在这个导言中，我查考了本书各位撰稿人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并试图给出一个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的通用框架。

共产主义的溃败

从 1917 到 1989，我们看到了一种独特政治制度的出现、扩散、侵略性扩张、巩固、停滞、衰落和崩溃。共产主义的兴衰，与亚非殖民地国家的独立一道，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政治故事。这个故事现在正走向终点：这本书则聚焦于这个终点的开始。

共产主义是独一无二的：奠基于构想出来的世俗意识形态之上，然而却有很多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特征；因崇高的理想而产生凝聚力，但这个理想面对明显的失败却由于恐惧而变形为普遍的伪善和自我欺骗。它的溃败被庆祝为解放，几乎与它出现时一样。很容易得出这样的总结性推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疗法，比疾病本身还要糟糕。例如，通过阅读《鸿》，我们不可能声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恐怖比军阀统治下的恐怖更可怕。巴蒂斯塔统治的哈瓦那比起今天失去苏联援助的卡斯特罗治下的哈瓦那也不是个更好的地方。那些反对中国和古巴的共产主义的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今天有共产主义之外的多种选择，而不必再回到封建主义或野蛮资本主义中去。共产主义相对于它之前的社会是否进步已经完全不重要了。共产主义今天必须要被拿来与将可能代替它的制度比较，而不是与它先前所取代的制度比较。在这两种比较中，不用说，尤其在古巴，领导人努力使后者相对于前者更引人注目。同时，尤其是在中国，他们允许进行经济改革，他们设想这可以克服计划经济的低效率。无论有没有价值，我猜测，从现在起 10 年以后，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个政权还会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

对于东欧那些国家，更难争辩说曾经存在过某种疾病，导致共产主义被发现并作为其治疗方法而受到欢迎。尽管不平等、贫穷和腐败在这个地区普遍存在，但它们并没有造成一个带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猛烈的本地革命运动。共产主义实则是二战末期由苏联的武力外部强加的。发生在 1953、1956、1970 和 1981 年的事件说明，这些政权能够带来工作、健康服务、基础教育等好处的少许能

力并不足以保证它们的合法性。它们极不受欢迎，不仅因为它们无视基本人权，而且因为它们对苏联俯首帖耳。只有在保加利亚，苏联的形象才略显友好，因为俄国被视为将保加利亚人从“土耳其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正面角色。

苏联的共产主义政权再次显示出另类性质。虽然我没有能力断言在 1989 年苏联的心理和社会状况的细节究竟怎样，但是两个流传广泛的判断看似有道理。首先，政权的起源和先前的政权性质既没有增强它的合法性（如同中国或古巴）也没有减弱它的合法性（如同东欧）。一方面，自从 1917 以来，时间已经过去的太久，沙皇俄国的魔影已经不再那么可怕。另一方面，苏维埃共产主义毫无争议是一次本地运动，而不是外来强加的。其次，要变革的冲动来自上层，缺乏底层运动需要的社会环境。并不存在像东欧或中国（在那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仍然很深刻）那样的主观憎恨，也不存在有组织反对派的客观潜在势力——这种势力存在于部分东欧地区，尤其是波兰。

要试图理解共产主义的溃败，会产生一个困难的问题，它与三个集团的发展有关系：第三世界共产主义，东欧，以及苏联共产主义。下面，我仅仅引述第一个集团和第三个集团能够影响第二个集团的方面。更广泛的研究将会不得不追问东欧的星星之火是否可能将加速或减弱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变化。一个更加全面的分析将必须看到共产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之间的互相影响。能够举出的干预例子很多：卡特总统的人权政策，一位波兰籍教皇的当选和他随后的行为，里根总统将苏联引入其负担不起的军备竞赛从而毁掉苏联的策略，以及对进行改革的共产主义国家给予

有条件经济支持的行动。除了最后一条，其他这些外部影响在下面都不会给予详细考虑。这本书，包括这个导言，从总体上没有宣称要对共产主义的溃败给出一个综合性全面分析。本书试图把几个拼图块归位，并找出它们和其他拼图块之间的关系，但是仍然有许多工作留待将来做。

圆桌谈判的性质

圆桌谈判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就像我们一会儿将要看到的，尽管它们并不是完全史无前例，但是在有些方面是很特别的。更令人惊诧的是，它们体现出一种“政府和社会之间讨价还价”的模式，这与这两个实体之间的通常关系没有任何相似之处¹。在民主政治体制下，社会约束政府靠的是选举机制。在非民主体制下，这种约束是间接的和不明朗的，靠的是政府仔细衡量在不引起社会骚动、考虑了其代价和风险的情况下，它究竟能走多远。像其他专制国家一样，共产主义国家惯用的是后一种机制。然而圆桌谈判中清清楚楚的讨价还价带来一种截然不同的机制。通过接受公开的分庭抗礼，当局承认了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它不再能宣称它代表了所统治的社会的利益。伪善面具的摘除产生了重要的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后果。

圆桌谈判由很多非正式会议构成，双方是共产主义当局领导人以及异议人士和反对派团体的发言人，具有前制宪或准制宪的性质。除了东德的圆桌谈判，其他圆桌谈判的参加者基本上没有讨论制宪的实质内容，不过反对派通常会要求取消强调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共产党的领导角色的宪法条款，并且往往会成功。谈判的主要焦点则是讨论什么情况下应该制定一部新宪法。因为代表团根本不是

多数人口选举出来的代表，所以反对派团体很小心地不去要求得到做出约束性决定的授权或合法性。尽管如此，决定还是要做出——许多决定对后来的事态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民主血统的可疑，许多决定和抉择后来被批评为和魔鬼做交易。此外，尤其在波兰，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是否给魔鬼——共产党——的许诺在它的权力比任何人的预期都更脆弱的情况下还要兑现。

如果有人寻找类比或先例，有些例子还是值得一提的。也许最有启示性的先例是 1789 年发生在巴黎的一场争论，那是关于表决参加三级会议的代表资格的²。表面上看，争论的主题是，应该由三个等级各自表决他们的代表的资格，还是应该在一个联合会议上一起做表决。然而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联合表决将建立一个先例，也就是将一起投票而不是各等级分开投票。实质上，这场争论成为第三等级和统治集团——国王和贵族——之间就制宪大会组成问题的讨价还价。后来的发展证实了跟圆桌谈判的相似性。法国的君主势力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把自己的角色从一种“政府形式”转变为宪政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从而维持自身存在。类似的，当共产党感觉到他们不能再保有垄断性的权力，他们试图把自己从统治者转变成西方类型的政党——但是比路易十六要成功得多。

另一个有部分相似的先例可以在自我任命的、为选举 1848 年法兰克福制宪会做准备的预备国民议会中找到³。跟当代更近的，可以举出的例子是西德占领军长官和州部长主席之间在 1949 年波恩宪法制定中的关系。在占领军长官们试图垄断宪政进程的程序，并遭到部长们的强烈而明显的抵制之后，“在法兰克福举行的部长主席和占领军长官之间的会谈，以及在吕德斯海姆举行的部长主席们之间

的一系列会谈，互相妥协导致几个实质分歧的消弭。”⁴ 更近的，西班牙 1976 年的改革法案设立了制定 1978 年宪法的基本原则，那个法案“是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在几个月期间进行广泛政治磋商的产物。”⁵ 然而这些先例没有哪个像 1789 年和 1989 年那种戏剧性的、对抗的风格。

五个国家的圆桌谈判有许多不同之处。波兰的谈判一开始没有包括修订宪法或引入政治民主的内容。相反，最初的意图是官方承认团结工会以换取西方援助以及团结工会对政府认为很必要的经济改革的支持。专设一个圆桌讨论政治改革的主意是后来才出现的。在匈牙利，政治改革从一开始就是议程的一部分，但并不是以彻底改写宪法的形式进行。至少在某段时期，政府相信可控的和有限的向多党制转型能够换来经济责任的分担以及西方的援助。对比之下，发生在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谈判几乎从一开始就被导向大规模的改变。在保加利亚，从一开始，迅速选举出制宪会议就是谈判主题。在民主德国，讨论焦点迅速从改革转移到统一。在捷克斯洛伐克，谈判的主要内容则是关于人事变动，而不是机构的改革。

事件时序简史

波兰和匈牙利的圆桌谈判大体上是同时发生（分别是 1989 年的 2-4 月和 3-9 月）但又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两者发生的背后原因都是当局糟糕的经济表现以及引入少量民主的必要性以换取社会不满的平息和国外的援助。不过谈判的步调和细节各不相同。匈牙利的谈判稍晚，其反对派得以从波兰的事件中接受经验教训。因此匈

匈牙利反对派比团结工会获得更好的协议的原因之一就是，匈牙利反对派的讨价还价能力由于团结工会令人惊诧的胜利而得到增强。⁶相反，波兰则可能遭受了“枪打出头鸟”的对待。因为波兰人是第一个跟共产党政权达成妥协的，他们在圆桌谈判之后的政治体系中承担了更强更持久的共产主义因素。

中国反对派的出现和随后被镇压，发生在4月中旬到6月初。我不清楚这些发展是否受到同时期波兰事件的影响，或者它们仅仅是同一股范围广泛的洪流中的一个独立支流。就此可能产生的反向影响是，对中国的学生运动的镇压本来可以对几个月后的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给出“中国选项”的概念。这个选项——野蛮镇压——很可能在任何情况下对它们都是本能反应。

到了秋天，运动扩散到其他国家。在9月和10月，莱比锡和其他城市的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集会，一直持续到11月9日东德政权垮台。那里的圆桌谈判在12月7日开始。11月17日发生在布拉格的游行——受到东德事件的鼓舞——于一个星期后使捷克斯洛伐克政权倒台。在这里，圆桌谈判几乎立即于11月26日开始举行。在保加利亚，柏林墙的开放引起政治局于11月9日解除了总书记日夫科夫的职务。他的辞职引发了一连串事件，最终导致1990年1月3日圆桌会议的召开。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的突然崩溃也发生了。这里根本就没有当局和反对派之间设定制宪过程议程的圆桌谈判。取而代之的是，共产党的继承者，民族拯救阵线，单方面设定了制宪会议选举的程序。然而，在民族拯救阵线和刚成型的反对派之间发生了一些争论，主要是关于选举的时间，以及竞选期间的电视宣传问题。

苏联因素

苏联的态度——更确切说，是东欧对苏联态度的尊崇——在圆桌谈判开展时是个既关键又琢磨不定的因素。我们知道苏联没有干涉。尽管我们知道，一些反对派领导人，尤其是在波兰，以及——更小程度上——在匈牙利，认为存在着这种干涉的重大风险，但是我们不清楚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风险。我猜测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干涉。不过那并不是说，他不曾希望给人印象或鼓励某种印象他考虑过干涉。在 1981 年，雅鲁泽尔斯基想当然认为苏联会派兵到波兰，除非他宣布军管。从近些年得到的资料看，似乎是他们在军管前就已经决定不干涉⁷。

这个报告如果是真的，就完美地印证了这样的设想：苏联领导人可能告诉雅鲁泽尔斯基如果不得不进行干涉，他们会做的，因而诱导他选择对他来说是次优的选择，也就是宣布戒严，但对苏联领导领导人来说则是最优选择。在这个假设下，苏联领导人对可能的结果按优劣排序如下：（1）戒严，（2）维持现状，以及（3）干涉。雅鲁泽尔斯基自己的排序则是（1）维持现状，（2）戒严，以及（3）干涉。为了使选择戒严，苏联一定要使他相信他们的排序是（1）戒严，（2）干涉，以及（3）维持现状。考虑到他们过去对不服从的卫星国的干涉纪录，诱导他相信这一点并不困难。

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看待 1989 年事件，尤其是考虑波兰，因为波兰对苏联干涉的恐惧是最厉害的。干涉的可能性可能以两种方式介入了圆桌谈判：一种是威胁，一种是警告。⁸一方面，我们可以设想波兰政府的谈判代表威胁说，除非反对派降低要求否则他们会把

苏联人招来。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设想他们警告反对派，除非他们采取更温和的立场，否则苏联会入侵波兰。根据看似更合理的后一种假想⁹，波兰政府可能强烈反对苏联干涉，并且实际上把干涉看成比接受反对派要求更不可接受。由于他们和苏联领导人更密切的接触，他们可能会有可信性地强调苏联干涉的重大风险，并且为了每个人的利益要求对手克制。要注意这里两头欺骗的可能性。苏联领导人可能会掩盖真实意图，而努力向波兰领导人传达他们要着手干涉的印象。类似的，波兰政府领导人可能隐藏他们的真实判断，而使得团结工会相信苏联即将干涉。不用说，团结工会一定会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每个阶段政府谈判代表发出的任何警告可能都是在使用诈术。

还有更复杂的情况¹⁰。政府谈判代表实际上面临数个选择。首先，他们要确定是否威胁要请求苏联人干预。如上所述，他们明显发现这个威胁不可信，因为反对派知道在苏联干涉的情况下政府宁可做出更大的让步。政府不得不估测这样的可能性，即苏联进行违背他们意愿的干涉，并且把他们的估测转达给反对派（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也不管能否做到），但是他们不可能做到使入侵看起来是根据他们的意愿进行的。其次，他们不得不确定是否要采取一种镇压的政策，类似于1981年宣布戒严的声明，或者一种有限让步的策略，而苏联的反应可能是要么接受要么会要求更多的让步。在后一种情况，他们还不得不确定对苏联进一步的要求的反应是镇压还是默认。在这一系列判断的每一步，可以察觉到苏联入侵是双方算计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入侵看似很可能发生，“两害相权取其轻”法则将引导团结工会领导人向镇压性政策妥协；类似的，“不要把最

好的事变成好事的敌人”法则会阻止他们将要求逐步升级。

如果沿着这个假设追问，也就是政府领导人宁可选择更大让步也不愿苏联入侵，还可以继续分析下去，但是我宁愿在此止步。我相信，关于第一个圆桌谈判蒙上的不确定色彩，就此术语在技术层面上已经讲的足够多了¹¹。虽然政府谈判代表或许认为苏联*也许*会干涉，但很难催逼他们说出一个此事发生的概率数字，因为任何有关苏联的信号都可能有纯粹的策略性目的。团结工会的谈判代表或许对政府警告苏联干涉有一些相信，但是前述的两头欺骗的可能性则阻碍了他们形成精确的估计。在这样一种形势下，理性选择理论或者博弈理论没有任何判断或预测能力。也许，我们不得不效法凯恩斯（Keynes）回到政党的“兽性”以及个人之间的互相影响。假如真有苏联干涉可能性，那么苏联因素随着舞台中心的转换也随之而变，先是到匈牙利，然后到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在保加利亚局势中，苏联入侵从来就不是考虑的因素）。当苏联没能入侵波兰，甚至在6月选举令人震惊的结果发生后也没有的时候，苏联入侵的观念在匈牙利看起来不那么可信了。再后来，人们的观念彻底改变了。在波兰，在某种程度上包括匈牙利，问题在于苏联是会支持强硬派还是仅仅作壁上观。关键的事件是10月7日民主德国40周年国庆期间戈尔巴乔夫发表的讲话，他说：“拖延者将受到生活本身的惩罚，无论他是谁。”要不是这次讲话，导致东德当局倒台的群众游行很可能不会发生。东德的垮台在该地区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亚罗米·塞得拉舍科（Jaromir Sedlacek）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政党顾问，他说布拉格发生的事是受到东德事件的影响：“来自莱比锡，德

累斯顿，柏林——而不是华沙。”¹² 尽管波兰的圆桌谈判对匈牙利起了样板和催化剂的作用，但是很可能还需要来自强硬派掌权的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给予额外的助推才能引发变革。这种助推来自戈尔巴乔夫。在布拉格，1989年11月的报告“说领导人中的强硬派被米切尔·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支持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大约85000名士兵打垮了”¹³——对几个月前的形式来说完全反了过来。

战术和程序

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有“圆桌”，至少没有在其比喻意义上的、意味着连续的观点阶梯的“圆桌”¹⁴。相反，在每一个国家，都是政权和反对派两方迎面对阵，没有给含糊不清或者细微差异留下余地。尽管当局通常试图把各种阵线组织和跟随它们的党派都包罗进来作为“第三方”，但是他们仅仅在匈牙利取得成功。在其他国家这样的团体是作为政府代表团的一部分参与到谈判中来。大体而言，共产党让他们参加谈判的策略似乎产生了反作用。他们费尽心思要和共产党划清界限——也许是出于他们对圆桌谈判后将采取的立场的考虑。

在捷克斯洛伐克，就像第四章里卡尔达（Caldá）所解释的那样，共产党人试图利用这些隐形独立团体来赢得时间，争辩说在做出任何决定前都有需要和这些组织协商。类似的，他解释了政府代表如何宣称不能代表国会或者共产党发言。总的来说，谈判代表需要回头和他们所代表的组织协商是个有用的讨价还价工具。然而在本例中，虚构的分权说辞并没有太被当回事。在其他国家，人们想当然

认为政府谈判人员将能够进行投票、表达的就是其所代表的正式组织机构的意见。

如何从反对派中挑选代表在各个国家都不一样。只有在波兰，他们来自一个团结的、组织良好的、此前已经存在的组织。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圆桌谈判的反对派一边是一些政治或公民社团的伞状联盟组织或者“论坛党”。由于共产党政权一般不给这样的社团在党外以生存空间，他们基本都处于萌芽时期、没有多少大众支持。德国的新论坛和捷克的公民论坛（及其斯洛伐克的伙伴组织反暴力公众论坛）是在1989年10月和11月事件后马上成立的。由于“党外无解决”原则在这两个国家得到更加严格的贯彻执行，这里的反对派组织甚至更加松散。另一方面，他们所对抗的政权基本上丧失了士气并且被认为不仅缺乏合法性、也缺乏主要盟友的支持。团结工会面对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基础，而对新论坛及公民论坛来说，他们压倒性的道德优势已经足够。

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勾画了一个“民主转型”通用模型，包括四个分立集团之间的战略性互动，那四个集团是：体制内的强硬派和改革派，以及反对派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¹⁵。改革派和温和派为了阻止走得太远或还不足的提议，可以提到他们的极端主义盟友以发出威胁和警告。这个模型非常符合波兰的情况，但是对其他国家却并不适合。尽管当政者确实有分裂，但是反对派却没有演进到沿着温和-激进的维度发展到内部分裂的地步。也许更精确的说法是，即便在发生了这样的分裂时（比如在匈牙利），也没有起到过讨价还价工具的作用。中国似乎可以提供一个反例。如同邹

说所说（第六章），所有这四个集团在中国场景中确实都存在着。改革派和温和派都知道要小心不对激进派的挑衅让步，否则强硬派就会坚持他们的主导权。然而，温和派根本无法对激进派有任何抑制作用，本来这可以交换到当局最小程度的让步。事实上，任何让步都可能刺激激进派要求更多。顽固的强硬派和同样不懂退让的激进派结合起来没有给战略性的妥协留下任何中间余地。

所有这些国家的反对派都坚持要求谈判的公开性，许多会谈通过广播电视进行了直播。这种要求很可能既是一种原则，也是一种战略。一方面，反对派想要传递一个有象征意义的信息：秘密决定和秘密交易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另一方面，使谈判处于公开状态支持了“促使伪善文明化的力量”：威胁和蛮力的作用变得次于辩论和理性¹⁶。虽然如此，还是有对公开性的限制。在第二章，安德拉斯·赛约（Andras Sajo）观察到在匈牙利各党派达成并遵守了一项协议：各自的声明将不会在谈判期间发表，只有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才能各自发表声明，因此就减少了因集体工资谈判而闻名的那种困境——预先的承诺将导致难以回头的境地。在保加利亚的圆桌谈判罗姆亚娜·科勒拉瓦（Rumyana Kolarova）和迪米特·迪米特洛夫（Dimitr Dimitrov）的备忘录中，记载了各党派在讨论敏感的土耳其族穆斯林少数群体运动时要退居秘密状态。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有双方领导人私下达成幕后交易的传言。

有一个例外，圆桌谈判比起国会议程或制宪进程更像集体工资谈判之处在于，其决策过程是个讨价还价的妥协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投票。通过投票进行决策只有在被挑选的代表团成员代表人口的大多数时才合理。所以人们惊诧地看到，尽管反对派明确否认宣称其

代表性，但民主德国的圆桌谈判还是采用了多数决定的投票方式。在第三章，乌尔里希·普罗伊斯（Ulrich Preuss）争辩说，多数人投票决定很大程度上为了象征意义——采用的目的仅仅为了清楚地表面谈判并不是讨价还价的模式。

关于议会的讨价还价：战略和结果

在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圆桌谈判的妥协方案都包含了整体或部分的自由选举协议。波兰的协议是，下院 65%的席位不经竞争留给共产党，35%的剩余席位以及新组建的参议院的所有席位都由竞争性自由选举产生。如上所述，波兰的谈判一开始并没有确定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甚至将新创立的参议院纳入到自由选举的成功谈判也没有被认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下面是一位深刻了解局势的观察家的评论，很有代表性：

在谈判的最后日子里，政府出色姆（SEJM）（波兰国民议会，也就是下院——译者注）推翻参议院决议所要求的人数是五分之三，而团结工会一方成功地把要求的人数扩展到三分之二。由于共产党和它的盟友已经稳占色姆里 65%的席位，所以这个条款将要求当局要在官方阵营之外再争取少量代表的支持才能推翻参议院决议。这可能只是在原则上而不是实践上显得重要，因为当局已经表明他们打算要派人参加竞选色姆里剩余 35%的席位。¹⁷

无论是参与者还是观察者，没有人会预料到团结工会将赢得色姆里每一个竞争性席位以及参议院里除了一席之外的所有席位。波

兰共产党的选举失败所造成的迅速而全面的士气低落，是激励和加速其他地方圆桌谈判的两个决定性事件之一，另一事件是10月7日戈尔巴乔夫讲话。

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自由选举原则本身没有受到挑战。相反，辩论的焦点变成是采用比例代表制还是多数决定制。共产党相信采用多数代表制它的赢面更更大，因为它有更多高知名度的候选人。相反，反对派认为使用政党名单列表更符合他们的利益。这两个国家的结果都是折中方案：大概一半代表由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而另一半由多数代表制的方法产生¹⁸。保加利亚的选举显示共产党的计算是对的。然而在匈牙利，共产党由于其对手坚持的比例代表制而被救了。假如像他们最初提议那样，75%的席位由单人选区选举产生，他们将受到严重打击¹⁹。在这里跟波兰一样，共产党和反对派都严重低估了当局缺乏支持的程度。

捷克斯洛伐克的圆桌谈判聚焦于两个主要问题：联合政府的形成和国会的更新，更新办法是召回最不受欢迎的共产党议员，并代之以共同选择的反对派成员。对比其他的圆桌谈判，在这里选举法和宪法的更改没有被讨论。根据莫里斯·卡尔达（Moliš Calda）的说法，反对派低估了当局的虚弱性，并做出了几项不必要的但有长远影响的让步。并且，国会的更新远不彻底，导致共产党人实际上有能力阻碍采用一部新宪法的努力。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制宪的主要障碍结果是两个共和邦之间的冲突。先是斯洛伐克人，后来是捷克人，采取了否决、冒险和逐步升级的策略，这最终导致国家的分裂。

就总统职位的讨价还价：战略和结果

在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兰，就总统职位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反复出现。一个涉及总统在一个分权制衡的制度里的恰当角色，围绕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宪法上的辩论所起的作用不大。相反，总统一职的设计是为了适合某个预计将担任这一职位的候选人。另一个发现是，总统职位的设计是一个更大的讨价还价过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总统职位的权力被拿来与其他政治要求做交易。最后我们发现，这些在讨价还价和来回拉锯中的算计和期望，几乎总是被日后发生的事证明是错误的。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为共产党候选人设计的总统职位最终都被反对派成员占据了。

有两个历史先例可以被用来说明，总统职位能够被设计成“适合”某个特定人物的两个主要意义。1921年波兰宪法有个很弱势的总统职位，原因是大家都预期这个职务由当时的波兰强人约瑟夫·皮苏德斯基（Jozef Pilsudski）元帅来担任。然而，宪法制定者想要遏制其权势的企图产生了反作用。皮苏德斯基拒绝担任这样一个被阉割的职位。五年后，他发动了一场政变。有争论说，假如总统职位被赋予实权，很可能引导他以合法方式追求权力，从而避免这次政变。在这种情况下，宪法被写得不利于某个最可能就任总统职位的候选人。相反的情况，也就是宪法专为强势竞争者拟定，可以由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建立得到见证。在那个例子中，战时的英雄完全控制了制宪过程，并对其获取想要的权力成竹在胸²⁰。然而这两个例子没有一个显示出对总统职位进行讨价还价的观念。皮苏德斯基的地位在制宪大会中太弱，而戴高乐又太强。在这方面，前共产

党国家则呈现出一幅不同的画面。

波兰引入总统一职，是作为1989年春圆桌谈判交易的一部分。政府谈判代表答应色姆（下院）的一些席位可以进行自由选举。作为交换，他们要求设立总统来代替国务院，后者是1952年宪法创立的一种集体主席机构。从一开始大家都明白，总统将会是共产党机关里的核心人物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他将由色姆以及其他被认为会投票支持共产党的团体选举出来并被赋予巨大的权力。这样，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新色姆将来发起的民主程序在必要时都可以被挫败。当来自反对派的谈判代表拒绝这个提议时，谈判陷入僵局。当时，布罗尼斯洛·葛莱米克（Bronislaw Geremek），这个团结工会的首席谈判代表说，他可以容忍看到民主被强奸一次，但不能容忍第二次。如同Wiktor Osiatynski在第一章里所述，僵局被一位政府谈判代表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所打破，他提出一个新主意：“由色姆和参议院选举出总统如何？作为回报，参议院由自由选举产生。”“这值得考虑，”葛莱米克说。

尽管已经注定要当选为总统，雅鲁泽尔斯基正确地察觉到他并没有行使其职位巨大权力的合法性。那些权力在1990年12月瓦文萨当选总统后变得更加重要了。那个时候才清楚地发现总统权力不仅范围广泛，而且定义模糊。据一个评论家说，它们“在1989年早期被故意搞得很模糊，以便一个共产党总统可以使用他认为合适的任何专断权力，因为他可以依赖军队、安全部队以及他的苏联后台。”²¹ 而根据另一个评论家，则是另一回事：“反对派谈判代表一直承认故意把圆桌谈判协议里的‘总统条款’弄得尽量费解，为的是减少雅鲁泽尔斯基的操纵空间”²²。然而，根据一位持中立立场的圆

桌谈判参与者说，总统权力另有其来源。据报道，斯丹利斯洛·科奥萨克（Stanislaw Ciosek）（政治局委员，两个主要的波共谈判代表之一，现在是波兰驻俄国大使）说过“政治局绝不会接受缺乏专为亚鲁泽尔斯基设计的强势总统职位的任何安排。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总统，后来也就没有可能毁掉这个党了。”

1989年的夏秋，匈牙利的圆桌谈判也包括了关于总统职位的讨价还价。实际上有两个关注于此的讨价还价过程，一个是在反对派内部，另一个是在反对派和共产党之间。表面上，要谈的有三个问题：总统选举的方式（直接或间接）、总统选举的时间（在新国会选举前还是之后），以及总统的权力大小。实际上，主要问题是反对派是否接受伊姆雷·波日高伊（Imre Pozsgay），一位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作为总统。由于政治局势过于变幻无常，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明确提出来，而且结果也跟大多数圆桌谈判参加者的预期不同。

从共产党人的角度看，可选择的方案权衡如下。如果总统由仍然运转的驯服的国会选举出来，他们的候选人当然会赢——但是他的合法性却大打折扣。如果总统由新议会选举之前的全民公决产生，波日高伊的知名度和受欢迎度使得他很可能会赢。尽管有一点风险，这个选择却提供了有更大合法性的好处。在国会选举之后进行全民选举总统比起由新国会选举总统可能是个更有吸引力的方法。但是两者都有很大风险。从反对派角度看，第一选择是要求将总统选举延迟到选举出一个新国会之后。第二选择则是基于波日高伊实际上很可能当选，所以要求对总统权力加以严格限制。

在谈判过程中，共产党人做了几次让步，目的是换取对波日高

伊的一致同意。在8月，他们提出，为了换取他的候选人资格，他们将解散共产党的准军事力量工人自卫队。9月，他们还同意了新总统由全民公决产生。这是作为一个让步提了出来，同时他们可以在新国会运作之前就把总统很容易选举出来。不过，如前所述，这个办法也带来了更大合法性的优势。面对这些提议，反对派无法达成内部协调一致。至少有三个反对派团体赞成在国会选举前进行总统全民选举，也就是实际上接受波日高伊作为总统。其他人，尤其是热内·基斯（Janos Kis）领导下的自由民主党人则坚持如果要把总统职位给予共产党人，一定要在国会选举之后，以便这一点能够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尽管前者执意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但后者通过拒绝在9月18日最后协议上签字尽量保持其选项的可能性。

那时普遍的预期是，将会有一场对波日高伊的早期选举。这些算计被一个多数人都没有料到的事件打乱了。当共产党自行消亡，并且创建出一个新社会党来代替它时，多数党员没有能加入到新党里面。甚至国会议员（他们由于愚忠才被选中）的多数也没有加入。并且，预期中将波日高伊选为这个新党的主席也没有实现。这些事件严重打击了当局的士气。在随后的权力真空时期，政府令人惊讶地成为活跃力量，并且在国会遭遇了非常小的阻力就推进了几项宪法修正案。自由民主党人和他们的盟友呼吁对总统选举问题举行一次全民公决，并且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总统在新国会之后进行选举的决议。当后来全民直接选举总统的提案（由前共产党人提出）没有获得必要的票数而失败后，最终的结果和圆桌谈判所达成协议的预期正好相反。不是在新国会选举前经过直接选举让共产党候选人上台，而是经过新国会选举从反对派政治家里选出了总统。

总统职位在 1990 年冬天保加利亚圆桌谈判时，也是一个争来夺去的筹码，当时谈判发生于共产党和民主力量联盟（UDF）之间，后者是一个反对派团体的“论坛组织”。这些谈判跟波兰及匈牙利有个重要的不同：在谈判前共产党已经开始自身改革，表现是将其长期领导人日夫科夫赶出了权力中心。由于它主动占据了先机，而不是被动让步，因此保共比东欧其他那些共产党有了更大的合法性。并且，保加利亚并不像大部分其他国家那样存在强烈的反苏情绪，因此保共领导人从来没有被看成是卖国者。

共产党最初要求修订宪法引入总统一职，总统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五年或六年，并掌握巨大的权力。双方都知道，共产党候选人，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元首彼得·穆拉德诺夫（Peter Mladenov），如果进行直选将会被选举为总统。他是把日夫科夫驱逐出权力中心的领袖人物，并且民意调查显示，他具有压倒性的大众支持。民主力量联盟坚持总统应该由临时国民议会选出，任期一年，并且总统职位仅仅具有有限的职能。这种要求同样是基于一个假设，也就是穆拉德诺夫将会是新总统。最后，民主力量联盟的方案被选中，部分原因是由于农民党的压力，该党本来是共产党的盟友，但现在转而反对它。

穆拉德诺夫如期被国民议会选为总统，这是一揽子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其他部分还包括一份选举产生制宪会议的协议。然而，后一个机构成立后第一个议案就是弹劾穆拉德诺夫。在 1989 年 12 月 16 日，索菲亚发生了游行示威，他在镜头面前说，“把坦克开过来。”同时，民众抗议以“真理之镇”的方式扩展开来——在 20 个较大的城

镇中心搭起帐篷。就在越来越多的民众和平抗议期间，国会进行总统选举投票。一天接一天，国民大会的大楼受到要求从反对派里选举总统的人群的围攻。在四轮失败的投票后（每一方都没能获得当选新总统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反对派领导人哲里奥·哲勒夫（Zheljo Zhelev），被选为了总统。

双方都失算了。反对派要求一个弱势总统，因为他们假定总统职务将属于共产党候选人。后来，多少有些偶然，反对派经过坚持，同意总统职位要去掉强势权力。而共产党人本来坚持强势总统职位，因为他们担心在新的国会里可能会变成少数。但结果却是他们在制宪会议里赢得了多数席位。

“洛坎假设”的延伸

阿伦特·里杰法特（Arendt Lijphart）辩称，东欧的政治动态可以由延伸的“洛坎假设”（Rokkan Hypothesis）来解释。洛坎(Rokkan)称，向民主转型的国家将“通过来自下面和上面的双重压力”接受比例代表制，“崛起的工人阶级想要降低代表的门槛以便可以参与到立法机关去，而受威胁最大的那些老牌政党要求‘比例代表制’则是为了在普选带来的新投票者浪潮冲击下保住他们的地位。”²³里杰法特将此推理做了延伸，认为圆桌谈判中出现的三个协议意图是保住共产党官僚权贵以及新出现的反对派的政治存在。首先，如我们所见，在选举制度上进行了妥协。第二，因为共产党人害怕他们在国会中处于少数，他们要求其候选人得到总统职位。第三，两院制可以被设计出来达到如下效果：旧政权的领袖人物可以在其中一院的选举中占优，而新势力则在另一院的选举中有利。

这个判断至今来看还是对的。但它没有包括，也没有打算包括进去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事情很少按照预想那样进行。当匈牙利共产党人认为他们未来的代表权取决于单选区的多数代表制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反而因为选举制度妥协中的比例代表制因素得救了。当波兰共产党人认为色姆中稳操在手的席位可以让他们左右议会时，他们前盟友的离弃打破了他们的如意算盘。这三个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认为努力争取共产党人占据总统职位将会确保他们在新政权中至少维持一个最小程度的存在，事件的发展却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士气，以至于他们要么不得不放弃总统职位，要么根本不能利用总统职位做什么事。

结论

未来的历史学家有可能会关注发生在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圆桌谈判。围绕这些谈判产生了真正的不确定性，即共产党人在何种程度上将会幸存下来。做出的判断并非是唯一可能发生的事情。相反，民主德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在开始圆桌谈判时，当局已经处于崩溃之中。谈判只不过相当于明确他们失败的期限。人们可以辩称，捷克反对派没能做出更果断的行动，这对后来的事态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像莫里斯·卡尔达（Moliš Calda）所说，人们甚至可以把这个国家的分裂上溯到圆桌谈判中缺乏勇气。然而，引用“不存在的事件”作为历史解释的原因往往都是空谈而已。当我们考虑圆桌谈判创造的制度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时，我们更能站得住脚。

很难避免回顾时产生的假象。今天看来很明显的是，到了 1989

年 10 月和 11 月，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已经注定。然而，那时很多观察家太沉浸于兴奋状态并被事态发展迷惑，没能自信地得出这个结论。也许我们走向了己愿望的反面——不敢相信梦魇就此结束。今天也能很明显看出，到了 1989 年，东欧的多数人民已经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以及共产党统治者持敌视态度。尽管如此，事实却是在波兰和匈牙利，当政的和反对派的领导人都过高估计了共产主义受大众欢迎的程度和在选举中的机会。如果有人想要辩称，当政的领导人怀有一厢情愿的想法，并且反对派领导人怀着相反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们一定推断出那些表面现象不过是一种误导。表面上看并没有多大的分歧，而且还有很多理由相信共产主义 40 年的统治已经使得大部分人被动地接受了这个制度。一旦给予选择机会，许多人宁可选择熟悉的也不选不熟悉的。

1989 年的波兰选举显示，这些假定都是错误的。皇帝其实什么也没有穿。但是后来许多人另有看法。也许波兰的反对派由于那些年军事统治下的经历而更加强大？也许苏联可能会干涉？也许统治者会不择一切手段来保住权力？随后的 6 个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不断更新民众与统治者之间彼此看法的过程。在缺乏民意调查的情况下，当局对手能够从大街上的游行示威看到他们并不孤单。在民主德国，选择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一个明显的机会主义者——来接替昂纳克是这个政权失去自信的一个信号。同样，禁止苏联杂志在报摊上销售也是因为当局担心这些杂志太自由了。在匈牙利，一小部分党员在选择重新加入更名后的共产党时，肯定已经清楚表达了他们在国家的立场是什么。每过一天苏联没有干涉，这样做的人可能就越少。圆桌谈判对这样的信念转变起到了催化剂

作用。这些谈判中的提议或达成的协议无论是有反应还是没有反应，都可以据此进行推断或者更新推断。

可以肯定，表面现象有误导性。在中国，许多人相信执政党面对日益增长的游行被动应付是一个它即将崩溃的信号，然而实际上，它正在进行军事准备，一旦改革派没能说服学生退出天安门广场，就要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有谁知道民主德国或者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对于采取“中国式解决”有多接近？当未来的历史学家翻看档案时，他们可能会发现东德政治局命令警察向莱比锡的示威者开枪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离我们的世界很近。但是他们也可能发现中国的强硬派向改革派屈服的另一个世界。无论他们得出什么结论，他们都不会撼动这样一个普遍性信条：事件改变信念，而信念又促成事件。

注释

我很感谢斯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罗姆亚娜·科勒拉瓦（Rumyana Kolarava）、乌尔里希·K·普罗伊斯（Ulrich K. Preuss）、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Wiktor Osiatynski）、安德拉斯·赛约（Andras Sajo）、邹说，以及两位匿名的审阅者，他们给这个介绍的草稿提出了意见。

¹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Wiktor Osiatynski）提到了一个“传统，既强烈又非常有波兰特色的传统，只在少数几个国家才有——宪法是作为政治当局和政治民族之间的……一份契约：政治当局有事实上的权力，而政治民族则认

为它在道义上和社会上有责任来分享权力”。见伊莉娜·格鲁辛斯卡—格劳
斯编 《东中欧的立宪主义》 (In Irena Grudzinska-Gross, ed.,
Constitutionalism in East Central Europe [Bratislava, Slovakia:
Czechoslovak Committee of the European Cultural Foundation,
1994], 20).

² *Proces-verbal des conferences sur la verification des
pouvoirs*(Paris, 1789).

³ J. J. 西昂 《德国史, 1770-1866》(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674 ff.

⁴ P. 迈克尔 《西德共和国的起源》(P. Merkl, *The Origin of the West German
Republ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56)。

⁵ 安德烈·博尼姆-布兰克 《西班牙民主转型：制宪的政治》(Andrea
Bonime-Blanc, *Spain'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Making*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7), 5)。

⁶ 但是可能还有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见 L. 布鲁斯特 (L. Bruszt) 和 D. 斯
达克 (D. Stark) 《匈牙利政治场域的再造》(“*Remaking the Political
Field in Hungary,*” working paper, Cornell University, 1991, 34 ff)。

⁷ J. 霍尔泽 (J. Holzer) 《戒严：为了波兰还是社会主义》(“*Martial Law:
For Poland or for socialism?*” *Gazeta Wyborcza*, June 7, 1994, 19-21)。

⁸ 对于此种区分，请看我的《东欧的制宪》(“*constitution-Making in
Eastern Europe,*” *Public Administration* 71 (1993):169-217)。

⁹ 这个论断是雅努茨·雷克斯基 (Janusz Reykowski) 所作，见第一章维克
托·欧塞梯恩斯基 (Wiktor Osiatynski) 的报告。

¹⁰ 以下是依据 J. 泽林斯基 (J. Zielinski) 的著作《波兰的民主转型：一种博

弈论分析》 (“ The Polish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 Game-Theoretic Analysis,” *Archives Europeennes de Sociologie* 36(1995))。

¹¹ R. D. 鲁斯 (R. D. Luce) 和 H. 哈发 (H. Raiffa) 《博弈与决定》 (*Games and Decisions* (New York: Wiley, 1957), chapter 13)。

¹² 《自由欧洲电台研究》 (*Radio Free Europe Research*, Dec 8, 1989, 31)。

¹³ 同上, 30。

¹⁴ 严格意义的“圆桌会议”, 是所有相关方而不是两方坐到一起平等洽谈。东欧国家的圆桌谈判实际上是政权方与反对派两方对阵而谈, 因而可以说这些国家没有“圆桌”, 而是方桌。本书第一章 (波兰的圆桌谈判) 对此有所涉及, 区分了“圆桌”与“方桌”——译者。

¹⁵ A. 普热沃斯基《民主与市场》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¹⁶ 甚至即便参加者仅仅是在口头上要遵从理想辩论的理念, 文明的力量也会增长。见我写的《论辩的战略性运用》 (“Strategic Uses of Argument,” in K. Arrow et al. eds., *Barriers to the Negotiated Resolution of Conflict* (New York: W. W. Norton, forthcoming))。

¹⁷ 鲁伊萨·温顿 (Louisa Winton) (in *Radio Free Europe Research*, April 7, 1989)。

¹⁸ 保加利亚选择了一个简单的制度: 每个投票人投两票, 一票投给政党名单列表, 另一票投给单一选区候选人。匈牙利采取了更复杂的制度, 如 J. R. Hibbing 和 S. Patterson 的书中所描述, 见《形成中的民主立法机构: 匈牙利 1990 年的历史性选举》 (“ A Democratic Legislature in the Making: The Historic Hungarian Election of 1990,” *Yearbook of the Hungar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0): 128-49)。

¹⁹ A. 里杰法特《民主化与宪法选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1989-1991》(A. Lijphart, “Democratization and Constitutional Choices in Czechoslovakia, Hungary, and Poland, 1989-1991,”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4(1992):215)。

²⁰在这本书中显著可见，*L’histoire de l’elaboration de la constitution du 4 octobre 1958*, vols. 1-3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caise, 1987, 1988, 1991)。

²¹ A. 萨巴-斯韦德莉卡 (A. Sabbat-Swidlicka) 《波兰》 (“Poland,” *RFE/RL Research Report*, special issue on the rule of law in Eastern Europe, 1992, 26)。

²²马钦·克罗 (Marcin Krol) 《Tygodnik Powszechny 访谈》 (interview in *Tygodnik Powszechny*, May 10, 1992, cited in L. Winton, “Poland’s ‘Little Constitution’ Clarifies Walesa’s Powers,” *RFE/RL Research Report* 1, no. 35, 19)。

²³洛坎 (Rokkan), 引自里杰法特《民主化与宪法选择》(Democratization and Constitutional Choices,” 208)。

第一章 波兰的圆桌谈判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Wiktor Osiatynski)

引言

这一章呈现的是 1989 年间发生在波兰的圆桌谈判的动态过程。反对派和政府达成的圆桌谈判协议，为 50 年来东欧第一次自由的党派选举以及最终实现共产政权的和平转型，铺平了道路。因此，圆桌谈判在启动东欧接下来的改变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另一方面，紧随圆桌谈判之后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得那些谈判变得模糊不清，很快将对那些谈判的重要性的认识一扫而空。对波兰人来说，一旦反对派获得权力，共产党不再存在，共产党政府和反对派签署的合约也就变成一个过去的遗物。后共产政权建立后很快发生的团结工会运动的内部分裂、胜利者之间的权力斗争、新政党的涌现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问题，更把那些谈判结果推入阴影之中。对一些人来说，签署的协议已变得可疑：它被认为是共产政权和新的后共产

政府的一个秘密交易。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变成了新宪法需要克服的一个负担。今天，波兰政治中只有极少数大人物看起来相信协议对将来具有约束力。

不过，由圆桌谈判创设的机制在转型中保存下来了，并且获得了它们自己的生命。权力的分割、强总统、上议院，是圆桌谈判的持久遗产的最明显例子。国会引入的大量立法也与圆桌谈判期间团结工会所要求的一致。而且，对许多波兰人来说，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机制和“圆桌精神”继续清楚地被视为政治行为的价值观和路标。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圆桌谈判成为让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或者说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着迷的学术主题。在团结工会的领导们和 8 年前用坦克镇压他们的势力之间——即在最近的囚徒和他们的狱警之间达成共识的机制——是值得研究的。

本章从宪法的角度分析圆桌谈判。它聚焦于三次谈判其中的一次，即处理政治变革的那次。它检视了政府和反对派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的机制，并且把双方最初的目标和最后的结果做比较。

这个报告部分基于我自己的回忆和印象，也基于我当时作为记者参加一些会议所做的笔记。¹ 更大程度上，它基于在波兰出版的有关圆桌会议的文献。² 文献的主体内容包括在谈判结束时签署的所有协议的文本，一本对参与过所有谈判的各反对派代表团领导人的访谈，还包括一个详尽的依会议次序对政治谈判的分析。³

尤其，对这章最有价值的资源是我在 1990 年春天对一些参与圆桌谈判的主要谈判者所做的个人访谈。⁴ 他们中的两个——亚历山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和亚努兹·拉科夫斯基（Janusz Reykowski）代表政府一方。四个——日比格涅夫·布扎克（Zbigniew Bujak），布罗尼斯洛·葛莱米克（Bronislaw Geremek），亚罗斯洛·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斯特凡·布拉特克瓦斯基（Stefan Bratkowski）代表反对派。总统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同样没有参与谈判，但是他在谈判的前后做出了关键的决定。正是他最初把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带到谈判桌。除一人以外（亚努兹·雷科夫斯基已经返回心理学学术职业），所有的访谈者现在继续在波兰政治舞台扮演重要角色。布扎克、卡克兹恩斯基、克瓦希涅夫斯基是主要政党或运动的领导人；葛莱米克是国会自由联盟（Freedom Union）派别的领导人，在 1989 至 1991 年间领导波兰国会的宪法委员会。当他们接受访谈时，他们关于圆桌谈判的观点清晰地反映了他们在 1990 年波兰政治中的立场。同时，他们对未来的计划界定了他们可能受到圆桌谈判及其所签协议的约束的程度。

通向谈判之路

圆桌谈判的前提条件

至 1989 年春，波兰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以及道德的。由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于 1981 年 12 月引进的、镇压团结工会（Solidarity Trade Union）的戒严法，并没有解决波兰的众多问题。波兰社会——组织在地下团结工会运动周围——依然在坚持抵抗。军管政府的计划是把某种版本的匈牙利“卡达尔主义（Kadarism）”引入波兰，即运用非同寻常的权力来改善经济、赢得

大众的支持。⁵ 然而，很快就发现，没有激进的经济改革，经济改善是不可能取得的。而激进改革将带来急剧的价格上涨和牺牲，若没有人民优先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 1982 年和 1987 年间，政府交替使用“胡萝卜和大棒”竭力赢得合法性。1985 年，波兰国会在刑法典上做了非常大的改变。结果是，大量戒严法条款被引入“普通”法律之中。同时，政府的政治变得更加“自由”，好像这个国家想要随意利用法律武器对付社会却无需求助于社会。1987 年，政府尝试推行一项经济改革，此改革涉及到大幅提高消费商品的价格。为获得合法性，政府提交了一个方案让人民公投，公投结果是否决了这个方案。在 1988 年 5 月，团结工会的诞生地格但斯克（Gdansk）造船厂爆发了罢工，在克拉科夫附近的诺瓦胡塔炼钢厂也爆发了罢工。9 月，更多的工厂爆发一波新的罢工。

罢工的参与者大部分是在 1980-1981 年还没有上班的年轻工人。他们没有体验过戒严法的肉体打击，不害怕为他们的权利抗争。“新一代正在走向前台，这一代带着革命的潜能，”雷克夫斯基说。虽然这些因素显然超越了党的控制，但是仍不清楚，他们是否受到了团结工会老一代领袖的控制。

“老”团结工会以及知识分子反对派的坚持抗争是铺平谈判道路的另一个因素。在 1981 年后，被宣布为不合法的团结工会受到了天主教会的主持，产生了一个公民社会的地下网络，这帮助团结工会的精神存续了下来。波兰公民社会最显著的元素是一个“不可击溃的出版帝国”（Geremek），它非法出版和发行着一千三百份期刊，来对抗国有媒体对大众的宣传运动。1987 年，与这种抵抗力量相结合，团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总工会的领导们给政府提出了一个谈判的方案。

此前，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已学到了惨痛的教训，关于他们的力量的局限性的教训。1980-81 年间，他们在大众支持领域以及在象征性的和情绪性的领域收获了不可思议的成功，然而，他们的成功并没有对波兰的决策机构制度产生同等的、有意义的影响力。1981 年 12 月，他们意识到，象征性的和情绪性的支持并不能战胜纯粹的权势。当然，社会反抗的延续性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迫使政府逐渐认识到反对派是社会中的一个真实的力量、可信的谈判对手。

根据政府谈判代表的观察，1981 年的教训促使反对派意识到自己“对国内权力平衡和国际大环境缺乏现实的估计。”⁶ 这也促使反对派的一些领导人撇开他们的“全赢或全输”战略。接下来的几年有助于修复戒严法带来的伤痛，在反对派的眼中，共产党员们的关注点从“外国势力和死敌的代理人转移到某些可能谈判的人身上”（雷克夫斯基，Reykowski）。

一个类似的演化也在波兰统一工人党（PUWP）和政府内部发生了。对一些领导人而言，他们目前处理危机的方式方法是无效的，这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非常关键的是，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认识到了这一点。⁷ 同时，雅鲁泽尔斯基也从 1981 年的教训学到了不少，排除了使用武力镇压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⁸ 据基什恰克说，党的领导层逐渐重新评价以下四条信念，这个改变把他们带向谈判桌：⁹

1. 在 1981 年 12 月后，领导层克服了胜利以及蔑视被镇压的对手的态度。

2. 领导层承认，反对派并不是一个可以用高压的、行政性的以及意识形态手段处理的短暂现象。

3. 领导层认识到，提防、不信任那些没有权利参与决策过程的人，同时要求他们负责任，这种态度是不合情理的。

4. 在意识到所有上面提及的事之后，领导层同意结束一党垄断权力。

雅鲁泽尔斯基及其一些其他领导人采取这种立场，提升了一小部分在戒严法下幸存的党内改革者的地位。然而，赞同改革的依然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中的少数派。大部分职业的党机关团体反对改革、谈判和权力分享。¹⁰

有利于改革的关键改变来自于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改革。到1987年，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保守派丧失了莫斯科的支持，不再能够利用苏联干涉的威胁反对改革派。波兰改革派的调和姿态受到莫斯科的欢迎和支持，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同时，波兰的反对派强调，既然戈尔巴乔夫承诺的急剧改变对苏联很好，为何这些措施不能用于波兰。

另一方面，苏联可能干涉的威胁仍多次被用在谈判中。最频繁的，它以下述问题的形式出现：苏联将会接受如此深远的改变吗？非常有趣的是，还不止是共产党员问这个问题。有时，团结工会的谈判者同样问这个问题。过于激进的改变的要求无论在何时提出来，总会有人用苏联对稳健和逐步改变的要求来回应。

总的来说，苏联改革对波兰的影响是双面的。首先，改革派和社会主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太把苏联可能干涉当作严重的威胁。其次，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和苏联改革一道，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内的权力天平现在急剧倒向有利于改革派。再次，党内改革派可能更多感受到来自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而非批评。接受本研究项目采访的党内高层改革派没有提及任何来自莫斯科的压力，要求他们停止波兰的谈判进程。

改革不是唯一有利于改革和谈判的外部因素。西方领袖对波兰政府施加了持续的压力。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表达了对团结工会和反对派的支持。¹¹ 波兰政府意识到，需要保证外国援助的安全和信用以拯救波兰经济。西方政府非常清楚地表达道，除非共产政府实施真正的改革，否则西方将不会紧急援助他们。因此，波兰领导人清楚“他们需要团结工会的帮助来赢得信用，或获得西方的援助”（布扎克，葛莱米克）。

据美国驻波兰大使乔治·戴维斯的解释，西方所要求的最低度改革包括：（1）政府和反对派进行严肃的谈判；（2）引进“政治多元主义”；（3）重新合法化团结工会；（4）反对派在政府中有足够数量的职位；（5）自由选举。前三个要求是不可谈判的，后面两个要求是“弹性的”。反对派领导人和戴维斯大使保持着朋友关系，知道所有这些要求。对团结工会而言，西方对援助波兰设定的前置条件建立了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团结工会能够增加他们自己的要求。为了给这些要求以合理性，团结工会指出，需要根本改变波兰的内部环境，需要把深度改革当作反对派能够控制工人抗议的前置条件。

在波兰内部，天主教会持续呼吁政府启动与反对派的谈判。另一个内部因素是，根据波兰宪法，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将在 1989 年开始。反对派暗示抵制这些选举，政府害怕选举无法达到 50% 的合格选

民的要求，它因此将会在表面上也丧失合法性。同时，抵制选举也将从根本上在国内和国际上破坏政府声称的合法性。唯一的解决方法是让抵制选举不发生，而这需要承认反对派、与他们的代表谈判。因此，反对派提出的谈判建议也符合政府的利益。

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指出了另一个导致谈判的因素。他是政府一边最积极的谈判者，是后来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该党的前身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克瓦希涅夫斯基说，党错误地相信了党还足够强大，足以继续保持权力以及落实谈判可能做出的让步。“这个幻想救了我们，避免了罗马尼亚的结果。如果党意识到它有多虚弱，将不会有任何圆桌谈判与和平转型，”克瓦希涅夫斯基说。

初步接触：圆桌谈判的准备工作

政府准备寻求某种和反对派重组的信号，首先在 1984 年（当时大赦政治犯正在谈判）和 1985 年切斯瓦夫·基什恰克（Czesław Kiszczak）将军与天主教大主教布罗尼斯洛·达布洛斯基（Bronisław Dabrowski）和神父阿罗亚扎·奥斯祖力克（Alojzy Orszulik）透露出来。然而，那个时候，政府“相信经济改革会加强现体制和政权、削弱反对派，因为经济改革可以使反对派利用社会不满提出的大多数主张不再有市场。”¹² 只有到这个幻想破裂并随之在 1988 年 5 月发生罢工之后，政府才准备与反对派谈判。

表明反对派有意寻求与政府达成协议的信号，首先由团结工会顶层顾问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Bronisław Geremek）教授发出，他在 1988 年年初提出了“反危机协议”（anticrisis pact）的设想。这个倡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议以月刊《对抗》(Konfrontacje)上的一篇文章的形式出现,文章表达了1987年秋团结工会地下领导层的立场。这个概念是新的,它与继续抵抗、不想和共产政权妥协的团结工会普通成员的立场是相反的。团结工会的主要“武器”是道义正当性;与政府协议和谈判将破坏这个正当性,解除团结工会联盟的“武装”。然而,至1987年底,团结工会的领导层明白,波兰经济正在走向崩溃,只有通过公共生活的急剧重组,毁灭性的进程才可能被阻止。

总结一下,冲突的双方此前都从1981年12月学到了教训。团结工会学到了:如果不冒对公共生活产生严重威胁的风险,有些局限性是不可能跨过去的。政府学到了:不可能用高压击溃波兰的公民社会。在已经学到这些教训后,两边才可能坐下来谈判。接下来,会谈的唯一前提条件是认识到有一个共同的国家利益,它不同于冲突双方任何一方的特殊利益。

用更实用的话说,葛莱米克的反危机协议已经假定共产政权承认了团结工会的存在,暗示需要一个实施系列经济改革的合约。虽然最初的倡议没有公开一一列出政治改革,但团结工会假定政府承认工会就意味着要进行政治改革。大规模的劳工运动引入一个威权体系后,不和极权政府发生正面冲突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对团结工会的领导层来说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团结工会的领导们设想,一旦当局理解了这种危险,他们自己应该也承认在政治体制内进行结构改革的必要性。

政府非正式的反应,是提议创造一个广泛的“改革联盟”(coalition for reforms),“建设性的反对派”(constructive opposition)可以参加这个联盟。团结工会不能让它的成员无条件加入这个空洞含糊的联盟;

相反，他们坚持需要一个由两个不同的阵营（parties）签署的协议。

葛莱米克的倡议鼓励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一些领导人去讨论接受反对派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准备谈判的可能性。在此之前，改革派早已经将这些问题提出来，作为 1987 年夏末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一个特别的“意识形态”全会的主要议题。然而，那个时候，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拒绝考虑这种提议，他们反对政治改革，而聚焦于化妆性的经济改革。随着共产党具有改革意识的领导们者面对中央委员会内部攀升的反对，裂痕因而发展开来变得更宽。如果不与中央委员会的愿望交锋，领导层就只能在中央委员会不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启动变革。。在 1988 年春的罢工后，领导层比之前更加确信需要谈判，分歧进一步扩大了。

1988 年早春，基什恰克以一个独立律师伍拉迪斯罗·斯拉洛维奇（Wladyslaw Sila-Nowicki）为中介，问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他是否准备谈判。瓦文萨在 1988 年 7 月 21 日的回信中同意谈判。在 1988 年 8 月 22 日的第二波罢工期间，基什恰克在一个电视讲话里警告公众，如果罢工继续失去控制将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后果，并且提出和反对派谈判只要取消罢工。四天后，在政治局会议上，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提出进行圆桌谈判，并建议宣布和实施谈判应该是内政部长基什恰克将军的责任。

1988 年 8 月 31 日是格但斯克协议纪念日，1980 年的这一天，格但斯克协议承认团结工会而结束了罢工。基什恰克在政治局另一位改革者斯丹利斯洛·科奥萨克（Stanislaw Ciosek）的陪伴下，在阿切比少普·达布洛斯基见证下，在华沙会晤了瓦文萨。基什恰克提出可以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进行谈判，如果瓦文萨和达布洛斯基帮助结束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和其他工厂的罢工。瓦文萨要求给他一些时间与地下工会领导者和顾问们商议。在反对派中有一个协议——会谈的前提条件是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

这个条件被瓦文萨在9月16日的一次有20个谈判者参与的会议上提出。这次会议在靠近华沙的马格达莱卡（Magdalenka）的内政部长的豪华别墅里召开。¹³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代表和亲政府的劳工联盟（OPZZ）争辩说，他们没有得到授权同意这个要求。相反，他们所代表的两个组织的决策层明确禁止他们承认团结工会。这导致了僵局，因而不可能发布联合公报。在四个小时的讨价还价后，基什恰克请瓦文萨和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私下协商，在这次会以及和反对派的其他领导人会见后，所有出席的谈判者接受了一个公报，那个公报把“工会多元主义”（union pluralism）的讨论作为即将到来的圆桌谈判的首要议题。

接下来的几个月充满了不确定性。党的机构开始逆向而动。51个地方党委中的39个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反对基什恰克和瓦文萨最初的会谈。9月27日，总理日比格涅夫·梅斯内尔（Zbigniew Messner）被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取代。拉科夫斯基在党内被视为危险的改革派，同时又因为他傲慢自负以及在1980-81年戒严法实施头一年的负面角色而不被团结工会信任。新总理最初一批决策之一是关闭格但斯克造船厂，据称是依经济理由。造船厂是团结工会的诞生地之一，团结工会把这个举动视为一个对抗性的含有个人敌意的行动。¹⁴ 在一封10月5日给基什恰克的信中，瓦

文萨强烈要求拉科夫斯基收回他的决定，并要求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和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被允许参与已安排好的谈判。这两人有“职业反对共产主义”的声誉，被党的机构痛恨与害怕，所以，在他们是否能够参与谈判这个问题上的讨价还价差不多花了三个月。这期间，最初会谈的承诺看起来已经被背弃了，拉科夫斯基政府将努力实施反对反对派而非同反对派一道的经济改革。

此时一个重要的事件是在团结工会领袖莱赫·瓦文萨和劳工联盟（OPZZ）主席阿尔弗雷德·米奥多维奇（Alfred Miodowicz）的电视辩论。劳工联盟这个亲政府的工会在团结工会被取缔后的1982年成立。从那以后，米奥多维奇的权力和影响力看涨。他控制着五到七百万工人，早已变成执政的政治局委员。为阻止团结工会重新浮出，米奥多维奇提议和瓦文萨辩论。虽然瓦文萨继续领导团结工会和反对派，但是大部分波兰人对他的地下活动缺乏了解。米奥多维奇确信他将压倒性地胜过这个简单的电工，证明政府声称“瓦文萨仅仅是一个普通公民”、已经属于过去时是正确的。然而，结果瓦文萨赢得了辩论，他立即以一个大众领袖和未来希望的代表而成为全国性人物。

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联系在教会的努力下被恢复，基什恰克和科奥萨克为一方，瓦文萨和马佐维耶茨基为另一方的有一场会谈，于1988年11月18日在靠近华沙的维拉努夫宫召开。格但斯克的主教塔德乌什·高科洛夫斯基（Tadeusz Goclowski）后来也加入到大主教达布洛斯基和神父奥斯祖力克两人中。据基什恰克说，高科洛夫斯基的协调拯救了这次以及后来的会谈。瓦文萨的让步是，团结工会的合法性将作为一个结果而非谈判的前提条件。有关未来会谈条件的细节谈判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由科奥萨克、奥斯祖力克和马佐维耶茨基继续进行。就这样，未来的总理（指马佐维耶茨基—译者）成了那个对圆桌谈判的准备细节进行谈判的人。¹⁵

从此以后，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党内。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一群改革者最终赢得获得批准承认将团结工会。中央委员会开了两次会。第一次会在12月份召开，雅鲁泽尔斯基设法在政治局做出人事改变以有利于赞同改革和谈判的人加入政治局。在政治局新委员中，有斯丹利斯洛·科奥萨克，他曾经于1980-81年间与团结工会谈判；还有拉科夫斯基，他后来在政治和宪法改革上成为政府一方的主要谈判者。1989年1月，中央委员会拒绝接受团结工会的合法化，雅鲁泽尔斯基、基什恰克、拉科夫斯基和国防部长弗洛里安·斯维茨基威胁辞职，甚至离开了会议。在政治局缺乏强硬领导的保守派恐慌了，失去了他们的优势机会。¹⁶ 雅鲁泽尔斯基和一群改革派获胜了，为圆桌谈判铺平了道路。而且，雅鲁泽尔斯基获得了中央委员会的模糊授权与反对派谈判。因为授权并不具体，改革派后来能够在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解释它。¹⁷

1989年1月27日，第二次会议在马格达莱卡举行。¹⁸ 谈判的意愿再次得到确认，谈判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定下来了。

谈判的形式方面

圆桌谈判，三个主谈判桌，几个副谈判桌，以及马格达莱卡

圆桌谈判仅有两次正式会议——1982年2月6日，谈判开始时的一次，以及1989年4月5日，谈判结束时的一次。在这两个会议上，

55 个代表（29 个来自党、政府，26 个来自反对派）加上来自天主教会的三个观察员，坐在了圆形的桌子边。¹⁹ 参与圆桌的所有党派的领导人发表了纲领性的声明。谈判完全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出席者包括正式代表和相关领域专家。

三个主要的谈判领域已确定好了，谈判参与者同意设置更小的谈判桌讨论专门问题。三个主谈判桌是：

（1） “关于工会多元主义”：这个谈判桌的目标是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36 个谈判者——14 个为团结工会一方、22 个为政府一方参与这桌谈判，并辅以 17 个专家参与的更小的工作组）；

（2） “关于政治改革”：这个谈判桌起初的目标是谈判团结工会能够参加选举的条件（18 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 22 个政府谈判者，并辅以 10 个专家）；

（3） “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体制改革”：这桌的目标是致力于制定出“反危机协定”的细节，最初由团结工会提议设定这桌（24 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 22 个政府谈判者）。

经济政策和政治改革桌设立了以下一些副谈判桌和工作组（在这些副谈判桌上，团结工会的代表有权引入他们自己的专家；他们包含在团结工会谈判者的总数之内）：

1. 关于立法和司法改革（16 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 20 个政府谈判者）；
2. 关于媒体政策（24 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 23 个政府谈判者）；
3. 关于地方政府（一个含有 14 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 17 个政府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谈判者的工作组)；

4. 关于社团(一个含有 18 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 11 个政府谈判者的工作组)；

5. 关于教育、研究和发展(22 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 31 个政府谈判者)；

6. 关于青年一代问题(20 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 17 个政府谈判者)；

7. 关于住房政策(10 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 20 个政府谈判者)；

8. 关于农业和偏远地区社会政策(16 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 18 个政府谈判者)；

9. 关于矿业(28 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 25 个政府谈判者)；

10. 关于医疗保障(14 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 20 个政府谈判者)；

11. 关于环境(25 个团结工会谈判者和 17 个政府谈判者)。

此外,还有一些组织色彩不太明显的专家参加了副谈判桌和更小的工作组。总的来说,大量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工会领导人参加了圆桌谈判。事后看,这些谈判成了一所学校培养、造就了一群在 1989 年 6 月国会选举后崛起在波兰的新政治精英的学校,为非共产党政府的组成输送了人才。

正是团结工会要求建立大量专题小组。葛莱米克如此解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小组:“政府加入谈判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合法化团结工会以换得我们对选举的承认。我们不想把谈判限制在如此简单的一个交易上。我们努力通过引入专题组而扩大谈判的规模。”

安杰伊·塞林斯基（Andrzej Celinski）是团结工会在青年议题副谈判桌的主谈判代表，他说，引入更小一点的专题组的另外一个理由，是“瓦文萨和马佐维耶茨基担心如果次要的议题都被拿到主谈判桌讨论，它们将毁掉谈判的整体构想。因此他们决定把它们放到一边。”

20

设置这么多谈判小组，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对反对派而言，圆桌谈判首次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平等接触媒体的机会。以前媒体操纵和一边倒的宣传是党和政府控制社会最重要的手段，现在日报和电视对两方的代表报道给了团结工会一个机会向公众展示它的要求和观点。赛林斯基承认，他有意把诸次会谈砍短，延长在青年一代议题副谈判桌的谈判期限，使得会议次数尽可能多，因为每次会议产生了一个特别的机会让团结工会的立场呈现在电视上。

这些会谈的详尽和时长还产生了一些其他效应。它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育经历：参与者学会了怎样去谈判，学会了所谈判领域的许多专业的细节。因此，团结工会-反对派专家团队形成了，他们一起工作；在未来的新国家行政系统，他们再次创立了与目前类似的某些非正式结构。

会谈时长的另一个重要的副产品是，随着时间流逝和不断的会面，恐惧、愤怒、憎恨的情绪逐渐消退，怨恨融化了。在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形成后，这一点起了重要作用。²¹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新的分歧和障碍也逐渐浮现出来危及整个谈判进程。1989年3月3日，基什恰克邀请瓦文萨（基什恰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克和瓦文萨都没有正式参与谈判)和一小部分顶层的团结工会谈判者,到马格达莱卡的别墅和党内的顶层改革派进行一次非正式会谈(两个教会代表也在场)。在那次会谈中,一些基本的冲突得以和解,并由此设定了一个先例。在圆桌谈判结束之前,进行了11场类似的会谈,谈判的重担逐渐转到马格达莱卡。²²

虽然马格达莱卡的角色后来在团结工会阵营里变成一个激烈的争议,但在这些会谈期间达成的决定和妥协并没有产生了一个精英间的“秘密协定”。相反的,它们提升了相互妥协的程度,界定了各个专题小组未来会谈的方向。²³ 据葛莱米克回忆,马格达莱卡达成的协议不能在任何专门的谈判桌上达成。²⁴ 总得来说,马格达莱卡是一个论坛,在谈判中对权贵阶层的抵制情绪在这里得以克服。²⁵ 据参与者回忆,马格达莱卡的会议并没有侵犯专题小组的主权。

一些没有参与马格达莱卡会谈的参与者似乎也赞同这一点。据斯特凡·布拉特可夫斯基(Stefan Bratkowski)说——他当时在社团副谈判桌,马格达莱卡的角色被夸大了。没有参与马格达莱卡会谈的谈判者立即收到了这些谈判细节的简报,并没有形成有秘密交易的印象。在这个社团小组,他们并没有感受到马格达莱卡的暗示。“也许因为我们的对手也没有参加马格达莱卡的会谈,”布拉特可夫斯基评论道,“然而,非常清楚的是,他们的谈判是边缘性的谈判,在政治和工会谈判桌上的谈判才是真正重要的谈判。”

主要人物

圆桌谈判仅在外形上是圆形的,因两边分得很清楚。团结工会一边或多或少是统一的,而政府代表一边则分为几个不同的派系。

团结工会

上面已经提及，从预备性的会谈开始，团结工会努力想要把“圆桌”变成“方桌”。团结工会想要被当做政府唯一的反对者，而非更广泛的谈判团队或联合体中的一员。团结工会希望政府承认自己，重新和它签署一个双边协议。这个方案被党拒绝了，党担心权贵阶层以及亲政府的劳工联（OPZZ）的反对。劳工联盟（OPZZ）不希望自己作为政府的一部分而坐在谈判桌上，而试图在谈判时寻求某种程度上的独立。因此，两边同意一个代表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两个劳工工会（团结工会和劳工联盟（OPZZ））将有 8-9 个代表。（“如果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人代表团结工会，劳工联盟（OPZZ）将可以这样说，谈判将仅在两个工会之间进行，”葛莱米克说。）除了“工会分子”在反对者派一边外，还有独立职业和艺术家协会，以及一些反对派代表顾问。（因此在谈判期间，此方的正式名字叫“团结工会和反对派边”。）

这两个群体的分野在谈判之初是不明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家和工会分子的分歧变得越来越清晰。政治家们和顾问们看起来更愿意寻求妥协和同意，而工会分子觉得受到他们所代表的工人的期望束缚，不能轻易妥协。这一点在处理经济问题的谈判时非常明显，尤其在处理采矿业问题时。

政治家和工会分子的差异在圆桌谈判和选举之后加剧了。团结工会从来没有重新获得 1980-1981 年间的力量，一部分团结工会的知识分子顾问在国会、政府和新的行政机构里而不是在工会里变得更加积极。正是在此时，“知识分子顾问”在政治进程中的控制力变得明显，种下了知识界和工人、工会分子之间未来冲突的种子。然而，据葛莱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米克说，这些分裂不是在圆桌谈判之前而是源于圆桌谈判。²⁶

团结工会-反对派代表中的一个特别群体是“独立学生协会”（Independent Student' Association, NZS）。NZS 比老一代领导层激进得多。类似的，参与圆桌谈判的 1988 年罢工的年轻领导们比 1980-81 经历过谈判和戒严法的团结工会老一代领导人们和顾问们更少妥协。

然而，虽然伴随着这些分裂和未来冲突的种子，团结工会-反对派一方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极其有凝聚力和团结。谈判的另一方可不是这样。

政府

至少在形式上，波兰统一工人党是和两个小党联合执政的，那两个小党是农民联合协会（United Peasants Association, ZSL）和民主党（Democratic, SD），以及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小的亲共产政权的天主教组织。它们必须在谈判中得到代表。在第十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最后的召集会议之前，雅鲁泽尔斯基会见了它们的领导人，后来在 1989 年 2 月 3 日，圆桌谈判召开前三天，再次会见了农民联合协会和民主党的领导人。因此，政府这边的官方名称为“政府-同盟方”。

这些党派成员之中有几个矛盾的倾向。它们的领导意识到，他们的权力来自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授权。他们分享了党的权贵阶层的一些特权，担心改革将会使得他们丧失特权地位。此外，农民联合协会和民主党的领导层害怕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反对派联合起来，因为在这样一个联合体里面没有他们的位置。另一方面，许多代表农民联合协

会和民主党的谈判者认识到，他们的党本身没有多少合法性，他们经常试图使用会谈提高他们的公共形象。因此，有些令人惊奇，在许多争论中，农民联合会和民主党经常与波兰统一工人党有分歧，反而支持团结工会-反对派这一边的声明。

共产党自己内部的分裂甚至更大。有一条重要的线区分改革派和大多数党官僚、权贵阶层。改革派领导着谈判团队，而党官僚经常代表党政内更保守的因素。当改革派寻求妥协时，这些顽固的官僚保卫自己的利益。在有关经济、矿产、农业、健康服务等等领域的更细节性的谈判时，这一点尤其明显。²⁷

在这些会谈中，官僚们努力反对改变，尤其反对党政官僚中层水平上的裁减。他们喜欢的论点是“我们需要改进这个体制，而非摧毁它。”还有，中层机构的裁减必须是“民主化的”，也就是说，裁减不能自上而下强加给他们，而必须经过直接相关机构的同意。虽然对必须改革的口号沉默或者总体同意，但官僚们能够立即感受到所有的改革将从根本上侵蚀他们的权力垄断，因而他们努力抵制那些改革。

在党内改革派和政府、国会成员之间有类似的分裂。圆桌谈判期间，政府自己做了一系列和谈判精神相反的保守决定。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一揽子农业法律提案，那个提案强烈批评反对派。国会依次批准了团结工会所拒绝的政府经济措施。在谈判结束之前，国会的代表提交了一份反对圆桌协议的正式抗议。他们声称，重要的决策是以一种违反宪法的方式在国会之外做出的。甚至在最终协议签署之后，国会委员会单方面在由圆桌谈判决定的预算里加入了一些改变；所有那些改变都是为了保护权贵阶层的利益。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党政权贵阶层尤其坚持他们对一些改革的反对立场，那些改革意在建立地方自治政府（这些措施意味着国务院将失去对 10 万雇员的控制）以及打破党政新干部来源——共产党青年组织的垄断。

类似的政策被政府独立的部门采用。一些经济压力团体足够强大以至于能够破坏谈判所签的协议。矿业游说团体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它的能量阻止了在圆桌谈判上达成关于矿业的协议。²⁸

总的来说，在党的谈判者中，我们能够区分那些尝试给团结工会最小的让步以换的团结工会放弃抵制选举的计划，和那些真正的改革者——后者准备更多让步以换取反对派在国会中的代表。

所有这些分裂在政府内部导致一些严酷的冲突，并影响了这边的决策进程。²⁹ 通常，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寻求和外部联盟（农民联合会，民主党和劳工联盟（OPZZ））的妥协，努力策略性地胜过党内的反对者，或者当必要时在政治局强加他的意图。团结工会显然知道，“党的决策是在圆桌谈判之外的，圆桌谈判是仅仅贯彻党的指导。”³⁰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政府内部的学术专家们时不时发表一些和党的领导人不一致的观点。有很多次我们有这个印象：总的来说，他们正努力赢得反对派和公众的信任。专家们的这个自由空间对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妥协和新的解决方案非常重要。

亲政府的工会

劳工联盟（OPZZ）尽可能与团结工会和政府都保持距离。劳工联盟（OPZZ）作为比团结工会顺从的替代物，由党在戒严法下成立，它聚焦于经济利益和增长稳定，至 1989 年赢得了超过 5 百万工人的

拥护。它的领导人阿尔弗雷德·米奥多维奇（Alfred Miodowicz），已经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局委员，也许是唯一一个让“雅鲁泽尔斯基害怕”的人（据卡瓦斯涅夫斯基）。

劳工联盟（OPZZ）全神贯注地反对圆桌谈判，因为他担心反危机的前置条件——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破坏劳工联盟（OPZZ）的垄断和权力。因此在第一次圆桌谈判会议上，米奥多维奇坚持，他的联盟不接受“以工人为代价的精英协议”，将努力在谈判桌上维护工人的利益。在整个谈判期间，劳工联盟（OPZZ）反对马上和全部合法化团结工会（它建议这是一个需要几年的缓慢过程），在谈判快要结束的时候，它还试图使所有的会谈毁掉。

在圆桌谈判的过程中，劳工联盟（OPZZ）为党和保守官僚说话。当谈判结束后，劳工联盟（OPZZ）变成反对派的主要对手，反对任何涉及关闭无效工厂、引进其他激烈手段的改革。

天主教会

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天主教会没有参与谈判，但它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迫使政府和团结工会协商，帮助把双方凑到一起。它帮助界定了谈判的前提条件，以及它们最终的结果。后者最重要的是一个协议——在圆桌谈判前——举行一个结果预先决定的、半自由的国会选举。候选者名单以某种方式准备好，将确保共产党支配的联盟在国会是多数。因此，选举给了个人候选人一个机会，无需改变有利于共产党代理人的平衡。

两个天主教会的代表也参与了圆桌谈判期间在马格达莱卡举办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的高层谈判者会议。他们的角色是在关键时刻做协调、见证谈判。³¹

据党的谈判代表回忆，教会代表不是完全不偏不倚的。“他们是中立的，无疑偏向团结工会，寻求教会的利益，”拉科夫斯基说。卡瓦斯涅夫斯基说，教会明显寻求自己的利益，尤其在立法改革、结社以及审查制度上。³² 然而，在那时，天主教会的这些利益和团结工会的利益是一致的。

谈判者的选择

团结工会

在基什恰克将军和瓦文萨首次接触之后，团结工会领导层建立了自己的代表团，它代表（团结）工会和正在罢工的工人说话。与此同时，一个瓦文萨的顾问团，被称为“公民委员会”，也同其他各类专题委员会一样在华沙建立。实际上，这些委员会的成员是由葛莱米克和他的亲密助手亨瑞克·武耶茨（Henryk Wujec）挑选的。

在 1989 年 1 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十届全会召开，它打开了通向圆桌谈判之路，此后，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在格但斯克修道院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团结工会参与谈判的准备团队。领导层包括莱赫·瓦文萨，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安杰伊·斯特尔马车夫斯基（Andrzej Stelmachowski），日比格涅夫·布扎克（Zbigniew Bujak），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Wladyslaw Frasyniuk），米奇斯瓦夫·基尔（Mieczyslaw Gil），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莱赫·卡钦斯基（Lech Kaczynski），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

三个谈判桌的主要谈判者由瓦文萨指定。最重要的是“工会多元主义桌（Union Plurlism Table）”的谈判负责人，因为每个人都预测就团结工会重新合法化的谈判将是最为困难的。因此这一桌需要最好的谈判者。马佐维耶茨基拥有这个声誉，他本人也想在工会多元主义桌谈判。葛莱米克是“政治改革桌”（Political Reform Table）谈判最显然的人选，实际也是这么决定的。当这一桌后来成为所有谈判桌中最重要和最富争议的一桌时，他的这个职位变得更加有影响。维托德·切恰科夫斯基（Witold Trzeciakowski）被瓦文萨选为经济代表团的领导人，主要是因为他的全国和全球声誉。

首席谈判者可以自由挑选人员组建他们自己的团队。³³ 挑选的过程很快，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彼此的资格和地位。一些人在地下很积极；另一些人在1980-81年的团结工会工作过。因此一些选择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亚当·斯特勒波兹（Adam Strzembosz）被挑选为立法改革谈判团队的领导，安杰伊·瓦罗维耶斯基（Andrzej Wielowieyski）被挑选为社会福利专题的谈判领导，参与一些副谈判桌和工作组的谈判。

专家的选择没有那么多商议。他们经常由被同僚称为“圆桌人事官员”的亨瑞克·武耶茨任命。³⁴ 他挑选时以专家和代表的兴趣与履历为依据，或者有时他只是没有可信任的人放在某个谈判桌上，便找一个人。³⁵

代表团成员身份在谈判期间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举例来说，矿业桌有许多工人和工会领导人，只有很少的政治家。矿业反对派知道，他们必须向工人报告；因而，他们像矿业权贵阶层一样不妥协。在这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种情况下，不奇怪的是，一个超越他们之上的妥协在马格达莱卡达成了。

有些谈判者被选中是为了能够赢得追随者对谈判的支持。青年一代问题的副谈判桌就是这种情况。面对波兰青年人的激进主义，团结工会领导们任命了一些“独立学生协会”（NYS）的成员做谈判代表，以此希望赢得学生们对协议的支持。³⁶

团结工会不同谈判桌的谈判者在整个谈判期间定期举行会晤。他们互相通告谈判的进程，制定共同的战略。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满足支持者的期望，因而享有合法性。

政府

重要的谈判者由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约瑟夫·奇雷克（Jozef Czyrek）、斯丹利斯洛·科奥萨克（Stanislaw Ciosek）来挑选。克瓦希涅夫斯基说，他本人因为“太年轻所以和 1981 年镇压团结工会没有什么关系”而被选为负责工会多元主义谈判桌的代表。亚努兹·拉科夫斯基被任命负责政治改革谈判桌，是因为雅鲁泽尔斯基信任他尊重他，而且作为教授他是葛莱米克的好对手。经济和社会政策桌由两个人共同负责，因为政府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副总理伊雷纽什·赛酷拉（Ireneusz Sekula），党的谈判代表是掌管经济的书记弗拉迪斯沃夫·巴卡（Wladyslaw Baka），他们存在冲突。

有两个任命是出于对官僚造反反对改革的担心。内政部长切斯瓦夫·基什恰克将军作为整个谈判过程的领导人，确保控制军队和安全

机构。为确保谈判合法性及与党中央一致，中央修正委员会主席卡齐米日·斯普雷尼亚克(Kazimierz cypryński)被说服参与政治改革的谈判。

在一定的限制下，这三组领导挑选他们自己团队的成员。首先，党是执政联盟的一部分，农民联合会、民主党和劳工联盟(OPZZ)派他们自己的代表参与专门小组。但即使在党政内部，有一个由党的书记处认可的人员名单；主席仅能在此名单内做出挑选。结果是，政府-联合一方比反对派在内部出现更明显的分裂。改革派与国家和党的权贵阶层坐在一起，农民联合会、民主党和劳工联盟(OPZZ)的代表们各怀自己的利益计算。政府阵营的分歧和冲突有利于团结工会达到目的，有助于达成可行的妥协。³⁷

对各方合法性的看法

团结工会

反对派的领导人没有怀疑过他们自己的合法性。据葛莱米克说，他们代表波兰社会。布扎克对合法性的看法有所不同。就他而言，莱赫·瓦文萨自己拥有一个广泛的社会授权，并把这个权威转移到他任命和接受的谈判者身上。葛莱米克和布扎克相信，反对派的授权是广泛的，意味着深远的改变，包括新的政治体制。亚罗斯洛·卡钦斯基对反对派所得到的授权的理解更狭窄一些；他相信，反对派所得到的授限于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打破政治体制、实施转型。

在团结工会的领导者们看来，合法性依赖于谈判的公开化，依赖于让公众知晓谈判的过程。合法性会因为工会的重建，谈判者与工人、学生及工会积极分子的会谈而同时得以加强。反对派领袖们在华沙一家电影院，每周，举办两到三次公开的会议，任何关心的人都可以参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加。团结工会的谈判者在这些会议上说明他们的立场以及寻求反馈。“这些会议提高了我们的合法性和信任感，”布扎克说，“因为我们正在变成一个真实的有形的力量。我们知道政府仔细分析了公众对两边发表在媒体上的观点的支持情况。他们意识到我们的支持度正在增长。这也反过来进一步松动了党在能接受什么妥协上所受的的限制。在圆桌谈判开始之初对政府来说是不可以想象的妥协，在谈判结束之时却变成了可以接受的、必需的。”最好的例子是参议院完全自由的选举。

由 1989 年国会选举的结果，以及 1990 年地方选举的结果，布扎克、葛莱米克和其他领导人事后也看到了团结工会领导的反对派的合法性的证据。在这两次选举中，没有加入谈判的激进团体没有获可观的支持，胜利者是受到圆桌谈判之前由团结工会领导的反对派成立的公民委员会支持的那些候选人。

对与搭档——另一方的领导们的合法性，虽然反对派没有接受波兰统一工人党统治波兰的合法性，但他们接受圆桌谈判的合法性。

政府

对政府的代表而言，参与谈判的权利是基于掌握了国家权力。共产政权已经统治了 45 年，没有理由质疑他们的合法性。

另一个问题是党内改革派的合法性问题。由于党代会反对改革规划、第十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给出了一个对改革不清晰的授权，对于整个圆桌谈判进程的合法性在党内有越来越多的质疑。因此，在谈及他们的授权时，克瓦希涅夫斯基和拉科夫斯基强调了改革者的道义合法性。

对党的领导者们来说，反对派的合法性出于“波兰社会一个重要部分”的支持（拉科夫斯基）。

对克瓦希涅夫斯基来说，还有一个因素存在于谈判的合法性中，他称这个因素为“超自然”。“两位主教坐在谈判桌前，祝福我们，为我们祈祷，在我们中间协调，和我们谈判。”他以这句话解释他所谓的“超自然”。

简而言之，双方都不怀疑自己的合法性或加入到自己一方的谈判者的合法性。然而，双方都担心圆桌谈判被社会解读为“一个精英的协议”，因为那将破坏双方以及整个协议的合法性。

谈判的实质方面

谈判的最初目的

据拉科夫斯基说，在于谈判桌的两边，都广泛存在两个不同的谈判观念，一个是“对抗性的”，另一个是“调停性的”。对抗性的观点可以被描述为“用团结工会的合法登记换得体制的合法化”。对党来说，它仅仅意味着统治阵营的扩大以提升其合法性，并使政府没有实质的改革也能继续它的政策。拉科夫斯基把这个战略称为对抗性的，因其相当于在不可避免地反对派对抗之前为党“购买”一些时间。对反对派而言，“对抗性的战略”意味着确保团结工会的合法化以及能够不受限制地开展活动，而那将导向另一个危机，最终导向全面的胜利。

从谈判的调和视角看，民主体制在波兰是必需的。民主体制不能仅以政府宣称民主的方式而建立，也不能仅以反对派通过斗争而建立。因此，双方以及整个国家的最大利益在于寻求启动民主化进程的解决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方案。这样的谈判视角不限于交易（允许团结工会合法登记换得体制的合法化），也包括寻求最好的可行方案的共识。

拉科夫斯基的解读似乎经过一些改进而得到了其他谈判者的认可。两边都在谈判期间改变了立场。然而，这些演化没有循着相同的方向。政府的立场从对抗性的方式过渡到接受调和性的方式（至少在顶层谈判者中是如此）；而在反对派一边，最初谈判的成功，以及政府的让步导致了拉科夫斯基所称的对抗性立场，也就是说，为全面胜利铺平道路而非只限于与共产政权签署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

对葛莱米克和布扎克而言，谈判最初的目标是以团结工会合法化，换得一个政治协议以及一个经济领域的反危机协定。“谈判的目标是改变我们为了团结工会合法化所要付出的代价。”³⁸ 最初，团结工会和反对派要付的代价是赋予共产主义体系合法性。团结工会想要改变这个交易，提前在波兰实施民主化。

亚罗斯洛·卡钦斯基在早期看起来采用了“对抗的”方式。对他来说，谈判达成的协议包括从破坏协议的最初可能性，到形成一个团结工会的政府，到快速转向全面的民主和完全自由的选举。³⁹

对党来说，谈判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妥协，给反对派一些发言权，确保党大体上能够控制波兰的发展。就党而言，理想的状况是区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党的精英倾向于优先解决经济问题，然后转向政治改革，这样也能够确保一个更有利的起初地位。据克瓦希涅夫斯基说，上述目标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改革需要很多年，而政治改革更快、更容易实施。”

对党来说，限制改革和谈判的是控制权问题。即使对党的改革派而言，民主的含义限于党在其中不会丢掉执政地位的民主。“对已经习惯了掌权超过 40 年的这一代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跨越的坎，”一个年轻的谈判者、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说。“他们简直无法接受，在民主制下他们可能丢掉选举。”

葛莱米克也同意对政府意图的这个解读。他相信，共产领导者们成了它自己历史的人质：“他们相信他们现在能够让历史倒转，返回到 1945-46 年的出发点，从那里再一次开始，这次他们不会再犯第一次他们犯过的错误。因此他们给我们开出的价码是他们过去曾开给非共产主义者的、或多或少相同的东西。这次，它是真诚的。当问到为何我们应该相信它是真诚的，他们回答说他们已经从错误中学会了很多。这是我们不想接受的答案。”

葛莱米克认为，党的立场的另一个特征，是以新经济政策的方式来思考问题（NEP，列宁 1920 年代实施的政策）。在经济大环境出现危机的时候，限制被搁置了，然而党仍旧保留着控制；而当经济环境变好时，整个开放进程又可能被中止。

保留控制的渴望在政府代表们的最初声明中是清晰可见的。党想要反对者作为一个年轻的同伴加入到这个由党支配的体制当中来，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反对者。

谈判的开始

预备谈判确定了一些解决方案。首先，达成了国会选举的协议：选举是半自由的，预先确定的结果是党和它的联盟必须在国会里占多数席位。其次，团结工会将被合法化而非重新合法化，因为前者意味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者不承认戒严法是一个错误。双方都同意避免谈论过去，因为过去太容易引起争议。

圆桌谈判开始于 1989 年 2 月 6 日的全体会议。基什恰克、瓦文萨、米奥多维奇(劳工联盟(OPZZ))、杰基·图洛维奇(Jerzy Tulowicz, 知识界反对派的代表)以及傀儡党派同盟的领导们发表了一个总声明。几天以后，分组形式的真正谈判开始了。

与团结工会预期不同的是，最困难的谈判发生在政治改革谈判桌；从宪法的角度看，那些谈判也被证实是最重要的。这个谈判桌由两位教授领导——亚努兹·拉科夫斯基为政府代表，而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Bronislaw Geremek)为反对派的代表。在这个谈判桌的第一次会议上(2月10日)，拉科夫斯基提交了一个政府起草的改革方案。⁴⁰ 他承认了现体制的专制特征，建议“党不应该是政治生活的唯一主体，”以及开放自由选举的前景。

然而，这些选举也不应该是完全自由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多元主义应该创造一个机制以解决冲突但同时“不破坏社会主义架构的基础。”因此，改革的限制是“一些重要社会团体的利益不应该由投票来决定。”实际操作上，它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代表将不会赢得国会多数席位(但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它的同盟党派一起构成多数党)，有“相当数量”的反对派代表将被选入国会。这将导致政府承认反对派接触媒体的需求、地方自治的民众倾向以及许多其他改革。

据拉科夫斯基说，这些改革，一方面不应破坏“重要团体”的利益

(比方说, 共产当局), 另一方面, 也应该避免只顾“以牺牲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代价而实现短期的私人利益(比如说, 反对派的各种目标)。”因此对整个体制需要有一个保障, 拉科夫斯基建议, 这个保障功能应该由新设立的总统职位承当。拉科夫斯基认为, 最紧迫的改革是引入总统职位, 找到一个方法准许反对派进入国会、接触运用媒体。最后, 拉科夫斯基建议, 圆桌谈判的协议应该采用“社会契约”的形式, 创建一个新的名为“国家谅解委员会”的机构 (a Council of National Understanding), 它将作为一个论坛以“创建波兰的新政治规则”。

在他的公开声明里, 拉科夫斯基没有提到反对派最关切的两个问题, 即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和法律制度的改革。这些问题在葛莱米克的公开回应中提了出来。葛莱米克强调的其他迫切问题包括打破党对媒体的垄断、保障结社自由、地方政府自治。另外, 葛莱米克还要求一个关于改革和“保障双方”的时间表。拉科夫斯基提出的总统职位将确保当局的利益, 却对社会没有任何保障, 而“社会的主权意志应该得到遵从”。

最后, 葛莱米克不同意基什恰克这一建议, 即圆桌谈判的成果应该采用一个联合宣言的形式“概括将波兰人联结在一起的所有议题”。葛莱米克称, 这样一个宣言将剥夺谈判参与各方的身份特点, 他提议签署一“转型的社会公约”。⁴¹ 在拉科夫斯基和葛莱米克的公开声明发表之后, 路径上的分歧变得很明显: 政府在体制内寻求社会对有限改革的支持, 而团结工会想要获取能够转变体制的条件。

接下来进行的谈判的细节, 在今天主要是历史学家的一个课题。这篇论文基本上聚焦于主要的公开辩论、观点和谈判者所使用的威胁,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以及他们所达成的协议。

主要议题和争议

政治改革谈判桌的讨论有一个自身的动力机制。关键的议题和次要的议题纠缠在一起。后者有时仅被用为谈判的筹码以获得更重要的妥协。其他一些讨论源于反对阵营内部两种不同的谈判观念。一些谈判者把圆桌谈判视为一个一次性的机会，一个提出和解决波兰社会和政治生活每个领域的所有重要问题的论坛。另一些谈判者谈判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解决问题的民主机制，在这个机制下，团结工会参与解决问题的权利可以得到保障。前一种谈判观念看起来支配着副谈判桌，而后者支配着三个主谈判桌。更宽泛的视角对团结工会阵营的领导层也是更有吸引力的。

因此谈判的主要议题，涉及的是确保权力分享和民主化改革的机构、制度设置。最重要的问题如下：

1. “自由但不争议”、预定结果的选举如何安排？争议点是反对派在何种程度上进入国会？团结工会坚持认为政府同盟不应该控制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席（因此反对派在宪法改革和其他重要决策上可以有否定性的发言权）。

反对派愿意接受预定选举结果以换取完全自由的竞选以及在竞选期间平等接触媒体的机会。团结工会也要求选举法应该讲清楚，它的条款是圆桌谈判上政治协议的结果，它的有效性仅限于即将到来的选举。在关于选举监督和其他次要的问题上也存在激烈的争议。

2. 在首个政府方案里，总统职位的设置是为了保障权力分享尤其

是权贵阶层利益。因此政府对这一职位权能的界定非常宽泛。团结工会毫不含糊地拒绝这种帝王式的总统制。主要的讨论与总统的权力相关，包括：（1）总统颁布法令的权力，（2）总统对立法的否决权，（3）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4）在国家和国际关系事物上，总统有限的权力。总统和总理的关系也是争议点。

另一个议题是总统应该如何被选举出来。既然总统职位的本意是保护共产政权创立者的利益，政府方案不得不确保选出它们自己的候选人。因此他们建议总统候选人通过国会与既存的顾问机构共同选举总统，那些顾问机构包括国家协议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National Agreement），国务委员会主席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the State），波兰大主教顾问团（Advisory to the Primate of Poland）等等。这个方案受到反对派的断然拒绝，谈判进入了僵局。在马格达莱卡达成了妥协，根据这个妥协，由一个完全自由选举出来的参议院来平衡总统的权力。总统由国会两院的多数选出来（这个解决方案依然让政府同盟在国会中保持微弱多数）。

3. 设立一个自由选举出来的参议院是对强总统的交易结果。由此立刻出现了这个新议院的权力赋予问题。政府主张给这个新议院一些不重要的顾问职能。虽然团结工会主要受到自由选举参议院这个想法吸引，但它还想要给这个新机构一些重要的权力。最激烈的争议是有关参议院的否决权；团结工会希望下院三分之二多数才可以推翻参议院的否决。这将给反对派否决立法的权力。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选举参议员。关于自由选举有一个协议。团结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工会偏向比例代表制，然而，政府建议采用“美国模式”——：波兰 49 个省每个省两个参议员（两个最大的城市分配 3 个参议员名额，总共 100 个）。政府期待基础在工业城市的团结工会，在小的、农村省失去参议员名额。还有些小的争议涉及到候选人的提名和程序上的细节。

4. 政治改革谈判桌的大量讨论涉及次小组关于改革操作的冲突。最具争议性的议题是立法改革、媒体、青年组织地位（青年团）、地方自治政策。⁴² 有时候，能达成协议；在许多议题上，团结工会仅仅通过在谈判协议里加入特殊的“不同意条款”而展示自己的立场。

5. 反对派想要恢复种种工会和协会以及获得对戒严法带来的伤害的赔偿。尽管同意“不去追究过去”，在一些谈判桌上，过去依然被展示出来。团结工会要求让与团结工会一同被戒严法禁止的其他社团重新合法化。当波兰记者协会、波兰演员协会以及其他一些专业协会的成员积极反对戒严法时，他们分担了团结工会的许多遭遇。联盟也要求让所有因积极活动和抗议在 1981 年后被开除的工人复职，赔偿他们的损失和监禁。虽然社团都被恢复了，但政府不同意赔偿，因为那将导致承认戒严法的错误和基本的失败。

6. 还有一个激烈的争论涉及最终协议的措辞，以及监督协议实施的委员会的性质。正如以前提到过的，团结工会反对政府提出的创建一个广泛的国家谅解委员会的提案，而提议建立一个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谈判双方能够有明确的代表。从未来发展的视角看，这一争论主要只对历史学家有吸引力。

利益冲突和危机时刻

上面列举的种种争议源于基本的、根基性的利益冲突。然而，冲

突不仅限于党欲确保控制波兰的政治生活。冲突也源于直接的、更有形的权贵阶层的利益。在副谈判桌讨论操作性的议题时，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司法改革、打破媒体垄断、自治政府，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团结工会的要求威胁着官僚机构的权力，招致了强烈的反对。

在一些“经济”副谈判桌上的讨论中，情况也如此。比如，这桌上关于环境议题的讨论一直进行得相对顺利，但是，当环保部权贵阶层们的任职资格被讨论和挑战时，情况就变化了。健康保障讨论没有遇到多少问题，直到团结工会要求废除冗余的健康体系的中层机构。在经济谈判桌，权贵们受到直接的威胁。相关人都显然知道，不结束党对人事任命的控制——基于忠诚和服从的任命——经济企业不可能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

权贵阶层日益顽强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导致了谈判期间冲突的一个关键转移。党政一边的内部裂痕也逐渐增长起来。党的改革派意识到，权贵阶层是他们的权力来源之一，但是他们希望在尝试处理团结工会领导的反对派问题时，能够获得这部分官僚的合作。然而，官僚们没有意愿放弃太多。因此，当谈判，尤其在马格达莱卡的谈判，总的来说缩小了双方顶层谈判者的分歧时，冲突的中心却转移了。现在两边的改革者都反对来自政府阵营的官僚。保守的、反对谈判的中心逐渐转移到劳工联盟（OPZZ）代表团，它倾其所能试图断送所有的谈判。虽然社会对圆桌谈判进程的兴趣在减弱，一部分工人开始表达对正在恶化的经济条件的不满，团结工会领导层和团结工会一般群众的分歧仍然并不明显。

然而，双方谈判者之间出现的联合也导致了团结工会-反对派阵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营内部的一些冲突。团结工会的一些领导人，包括亚罗斯洛·卡钦斯基，他反感马格达莱卡的会议及其据说发生在这些会议期间的友善。在更多的具体事物上，卡钦斯基还有不少不同的观点，比如，他是第一个接受总统职位的概念的，依他的观念，总统将取代不合宪法的党的权能。他也主张完全自由的选举。他的方案被葛莱米克以对苏联过于激烈为由而拒绝。⁴³ 无论如何，团结工会内部的这些观点分歧没有对谈判的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它们仅在大选及马佐维耶茨基的政府组建后才变得重要。

尽管存在这些冲突，必须找到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这一认知一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至少在顶层谈判者那里是如此。因此，谈判参与者们回忆不出有很多危机的时刻他们怀疑整个谈判会最后成功。当两边的立场互斥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刻就来了。当政府提议帝王式的总统而遭到团结工会断然拒绝时，这种情况发生了。谈判陷入了僵局，直到政府在马格达莱卡提出参议院和自由选举的方案。后来还有一个僵局是关于下院推翻参议院的否决需要多大程度的多数票：政府联盟要求百分之六十五的多数，而团结工会坚持百分之六十七的多数。最后，团结工会胜出，但交换条件是同意对总统否决权也有相同条款。

尽管有这些冲突，参与者没有丧失信心相信谈判将会成功。“我从来没有过我们站在最后破裂的边缘的感觉，”克瓦希涅夫斯基说。“很明显，我们一直将努力达成折中。”

唯一的例外出现在谈判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劳工联盟（OPZZ）代表团尝试破坏整个项目。首先，他们决定不签署有关工人工资指数化的一个有争议性的条款。其次，在圆桌谈判最后一次会议上，那次

会议是全国电视直播的，阿尔弗雷德·米奥多维奇以程序性理由打断了谈判。他坚持在卡钦斯基和瓦文萨之后，在其他参与者之前做一个总结性发言。团结工会不能接受。僵局（在中断期间，电视台播放音乐）持续了超过四个小时，最后由于团结工会和政府顶层谈判者安排的一个小把戏而结束了这个僵局（见后面，“妥协的机制”）。

争论与可信的威胁

双方都知道彼此需要对方，有基础性的妥协愿望。因此除了在关键时刻，双方很少使用真正的威胁。不过，某些特定的讨价还价因素每天谈判中都在用。双方都使用这个相同的论点：“这个我们必须获得支持者的同意，”或者，“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支持者是否同意这个。”根据所讨论的议题的需要，每一方都会使用一些更具体的论点。

团结工会

在圆桌谈判中，反对派有两个论点。第一个很少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与政府弱化了了的地位有关。正是政府需要团结工会来提高它的合法性，而非相反。因此政府的虚弱、莫斯科的改革，以及匈牙利改革加速，都增加了反对派在谈判桌上的力量。如前面提及的，这个论点是暗示性的而没有明说。

那个说出来的论点强调社会期望。团结工会的谈判者经常争辩道，妥协有个限制，超过这个限制，社会将会反对整个协议。“如果我们同意这样一个妥协，它对你也没有用，”布扎克在某个谈判点时说道，“因为如果社会不接受这个交易，那么你可能是在和一个已不再存续的谈判伙伴签署一个契约。”举例说，当政府提出一部分参议员应该由总统任命，团结工会争辩说，即使总统哪怕只任命百分之十的参议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员，整个参议院将受到连累而失去信誉。这一论点的力量也在圆桌谈判的公开性上显示出来，圆桌谈判的公开性本身就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议题。团结工会认为如果社会不了解细节，社会将拒绝谈判以及他们的谈判结果。对于团结工会，这个问题有一个先例，是它的公开性传统：1980年，格但斯克造船厂的谈判向所有罢工工人的直播。

团结工会多数谈判者同意，他们没有必要太频繁争吵和威胁；争吵和威胁是含蓄的，另一方也是理解的。葛莱米克所使用的最明显的威胁，发生在谈判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僵局时，即关于参议院和总统职能问题，更确切的说，是总统对国会决定的否决权和解散国会的权力。葛莱米克反对政府的提议，威胁要鼓动团结工会收回最初对创立总统一职的支持。“如果我们不能达成一个协议而且你还不能做出让步，那么，我们可能不得不回到另一个方式来思考政治改革，”葛莱米克说。“我们可能需要由一个有关国会席位分配的契约来开始国家的改革，先把其他两个因素即总统制和参议院放到一边，留待1991年会进行的宪法修改处理。”⁴⁴

这一招奏效了。拉科夫斯基提议把这个争议推后，以便双方都能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接下来在马格达莱卡的一次会议上，协议达成了。

政府

党的谈判者使用了在整个1980年代一直使用的三个论点。首先是实际权力的论点（“我们有权力并且不会把它拱手送人”）。第二个论点涉及到波兰作为苏维埃帝国一部分的身份，宣称过于雄心勃勃的改革将会招致莫斯科干涉的威胁。不过，随着苏联改革的推进，以及

在苏维埃内部增长的冲突，这个论点变得越来越弱。当然，苏联容忍度的不确定性仍是存在的。有时政府还暗示受到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共产党的压力。

第三个论点强调波兰内部反改革力量的强大。这个论点屡屡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即经提及一些对改革进程难以理解的危险。在另一些场合，“重要社会团体的利益”被提起。这个招数类似于团结工会的招数——团结工会的谈判者经常提及失去工人支持的危险。

“你们经常说你们有你们必须对其负责的社会基础，”在一次争议中，卡齐米日·斯普雷尼亚克说。“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社会基础，它不仅仅是这个党。我不需要提醒你们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你们需要考虑我们的立场。我们不得不让步，否则，不会有协议。”⁴⁵

斯普雷尼亚克所隐晦提到的是政府官僚、安全警察和议会对圆桌谈判性质的广泛不满。一些政府谈判者直接点出了议会造反的威胁；尤为经常提到的是党的机器不可控制的势力。⁴⁶

政府使用的另一个招数，是把团结工会的提议诠释为图谋攫取权力。在讨论民主选举、地方政府和结社时，这一招屡屡被用到。

亚努兹·拉科夫斯基是政治改革谈判桌的政府联合主席，他没有回忆起他自己使用威胁的手段，除了两、三个非常情况下的例外：威胁暗示政府不得不中断谈判。不过，他最严厉的论点，是警告而非威胁。他的那个论点强调利益的共同性：“如果我们不达成一个协议，那么我们所有参与圆桌谈判的将是失败者。其他人将会过来，他们将使用武力解决波兰的问题。他们是否成功并不重要，因为他们成功也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好失败也好，波兰将是失败的，我们这些圆桌谈判者将是失败的。这不仅关乎谈判桌我们这边，因为你们也会被更激进的力量给扫除。”

我对团结工会谈判者的采访表明，这个警告和政府说要退出谈判的威胁一样，只有很有限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团结工会感觉他们自己的威胁和论点对手来说是更可信的。

一个谈判实例

社团副谈判桌的谈判给出了谈判机制的一个好案例。根据记录，协议的初稿是在党和教会的预备谈判中通过的。团结工会的谈判者觉得，政府一边认为这个议题的谈判已经结束，没有再集中精力于这个特别的副谈判桌。然而，团结工会被教会方面参与这桌谈判的人的鼓舞，要求政府做出更多让步。团结工会的谈判者如此做了，得到了不少额外的收获，除了没有获得接触内务部有关社团的内部材料的权利。

这个谈判桌一个关键的议题，是 1981 年 12 月引入戒严法之后被禁止的社团的重新合法化。这个问题由被禁止的波兰记者协会主席斯特凡·布拉特可夫斯基提出。⁴⁷ 他说，如果政府想要结束它与知识界、作家、艺术家和专业人士之间的战争，那么，第一步一定是合法化那些社团。政府谈判者一方回应道，他们没有获得授权走出这一步。于是，布拉特可夫斯基使用了如下论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已经在国家之外创建了整个组织网络，并且运行得非常好，他们不需要政府。现在正是政府需要决定，政府想要对本质上是他们本身的问题做些什么。很快，一个为撰写联合公报的小工作组成立了。没有更多的讨价还价，政府同意了反对派的合法化社团的要求。“好像他们在一开始就准备如此做，但是他们想要为讨价还价保留这个议题。” 布拉特可夫斯基

说。这是在谈判期间副谈判桌水平上达成的第一个妥协。

因而，总的来说，虽然谈判的过程是艰苦的，它并没有涉及太多的威胁、吵架或者情绪。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代表团结工会和教会一方与政府谈判的安杰伊·斯特尔马车夫斯基的一个观点。“教会和国家之间的谈判经常是非常容易、愉快的，因为双方都保持了正式礼仪。就团结工会和政府的谈判来说，它们与1980-81年间的谈判有不同的性质，那时焦虑和情绪化盛行。在这次圆桌谈判，情绪化有时也会显现，但从来不会占主导。这些是‘可管理的’的争论。”⁴⁸ 争论的“可管理的”特征，是许多有利于达成妥协的因素之一。⁴⁹

妥协的机制

有利于妥协的最重要因素，是顶层谈判者有找到解决方案的渴望。刚开始时，这个渴望并不存在。它是谈判过程的结果。据克瓦希涅夫斯基说，谈判有三个显著的阶段。在初始阶段，敌意和不确定性混杂着。后来，各方视对方为对手而非敌人；这伴随着寻求妥协的尝试。（依他的说法，马格达莱卡的会谈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最后，双方回到他们的支持者中寻求对谈判所达成的妥协的支持。

据拉科夫斯基说，妥协最好的机会存在于力量相对平衡之时。⁵⁰ 妥协也“尤其与双方团队中温和者和强硬者的相对数量相关。”这些条件存在于圆桌谈判之中。妥协的重要先决条件，是对另一方的观念的改变，以及同时对谈判本身态度的改变——从讨价还价到合作解决问题。这条路的第一步是改变谈判的语言。在刚开始时，反对派采用了一个历史的、道德的立场，而政府使用实用主义的措辞。“当我们问‘对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解决问题，我们能够做什么’，他们回答说，40年的共产主义统治把这个国家导向毁灭，”克瓦希涅夫斯基回忆说。“这是一种对抗性的语言，需要用一种普通的语言替换它。”

从对抗性的语言跳出来的一步，是拉科夫斯基在政治改革谈判桌第二次会议上建议双方同意“不要打开关于过去的冲突。”这个提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团结工会要求政府采取的许多行动，都涉及推翻戒严期间的种种决定以及过去所造成的伤害。与此相对立，政府代表不想让人们得出印象他们在否定戒严、追究责任。

对这个问题一个妥协解决方案是由弗拉迪斯沃夫·斯拉·诺维奇（Wladyslaw Sila-Nowichi）提出的，他曾为许多团结工会和反对派活动分子辩护。“我想我们关于戒严法有一个共识，”诺维奇说。“我们都接受它曾是一个罪恶。分歧在于谈判桌的另一方认为那个罪恶是必要的，而我们不如此认为。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废除戒严法的残留物，那些已不再被认为犯罪行为的案件已经销案了，对戒严法的残留物也应以相同方式处理。”⁵¹ 将对戒严的评价和戒严的结果区分开来，有助于助政府一方在不丢脸的情况下妥协。

有些妥协只是政府的让步。在媒体副谈判桌的争论里能找到一个例子。主要的争议在于纸张的获取。纸张在波兰受到补贴，政府根据自己的主次安排分配纸张。纸张分配模式的改革涉及到传统受益者的损失。团结工会坚持要获得纸张，政府谈判者辩称波兰没有足够多的纸。这个争论由政府团队里有影响力的克瓦希涅夫斯基终结。“向政治生活里新的参与者供应纸张的必要性无可争辩。为此需要提高纸张的进口量，我们应该搞清楚团结工会的需求是什么，”他打断他的同

僚们的争辩说。

另一些妥协采用交易的形式。例如，在马格达莱卡最后一次会谈中，政府放弃了安全警察提出的有关结社法律的所有保留，以换取团结工会同意官方青年组织垄断性的延续。

谈判中最关键的妥协也发生在马格达莱卡，它与整个圆桌谈判最困难的危机（前面已描述过）有关，即政府关于总统选举的提案。总统的设置是为了保障党的利益，因此党不能冒大众选举的风险。基什恰克提议，国会与其他机构组成的联合体一起选举总统。葛莱米克的回答是，他们可以接受民主被强奸一次，但不会接受被强奸两次和更多次。

沉默的僵持被克瓦希涅夫斯基的即席提议打破，“通过国会和参议院选举总统怎么样？参议院由自由选举产生。”

“这个值得考虑一下，”葛莱米克说。反对派并不关心参议院，吸引他们的是自由选举的观点。党顺着克瓦希涅夫斯基的建议向下走了，因为它从中看到了一条路可以让他们自己的候选人当选，而且有一定的合法性。因此，通过相互满足，一个妥协达成了，这是圆桌谈判最有意义的决定之一——参议院的自由选举。

另一个值得提及的妥协发生在谈判的最后阶段。劳工联盟（OPZZ）的阿尔弗雷德·米奥多维奇想要破坏即将签署的协议。他坚持要成为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三位发言者，那次会议是全国电视直播的。团结工会不同意他的要求。他们提议，基什恰克和瓦文萨首先发言，然后其他代表按字母顺序发言。团结工会不希望让劳工联盟（OPZZ）看起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来是协议的重要参与者。按字母顺序被团结工会和党认为是公平的。然而，米奥多维奇不同意，威胁说如果葛莱米克（他是按字母顺序名单里的第一个）在基什恰克和瓦文萨之后发言，劳工联盟（OPZZ）代表团将离开。基什恰克被唬住了，要求“形式上中断”。于是和劳工联盟（OPZZ）谈判，然而失败了。党的谈判者打电话给雅鲁泽尔斯基，雅鲁泽尔斯基决定同意米奥多维奇的要求。团结工会拒绝了这个决定。僵局于是继续，中断继续。看电视直播的观众开始确信谈判破裂了，许多“普通”谈判者也如此认为。

一个包括团结工会领导者和党的改革派的非正式的高层会议，为这个问题争议着。大约三个小时以后，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伊雷纽什·赛酷拉说，他想起伊曼努尔·康德的一个故事，康德有一次在珂诺尼伯格沿着一条非常狭窄的街道行走，被迎面而来的一个陌生人给堵住了。他们中的一个必须给另一个让路。“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那个陌生人说。“我总是给傻瓜让路，”康德回答说，走到一边让那个陌生人通过。

“为何我们现在不试一下？”当赛酷拉讲完这个故事，克瓦希涅夫斯基建议。“为何不呢？”葛莱米克说。他们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计划，基什恰克打电话给雅鲁泽尔斯基报告说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当他们重新集合时，基什恰克说，葛莱米克想要说一个程序问题。葛莱米克说，如果他们按照字母顺序的话，轮到他发言了，但他邀请米奥多维奇先生在他之前发言。米奥多维奇接受了，圆桌谈判继续下去到结束。

52

机智和幽默，据一些谈判参与者说，是寻求妥协过程的重要因素。

72

有时候，中断是因为争论太激烈了，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离开这个领域而采用另外一个视角”是拉科夫斯基偏好的战略。作为心理学教授，政治改革谈判桌的主席，经常选择“处理论点的理性部分而忽略它的情绪性的隐含意味。”⁵³

许多马格达莱卡会议的参与者强调作为谈判者和协调者的基什恰克将军的个人技巧。他直觉地知道何时停止讨论，宣布休息，回到一个主题，或者给所有人思考的时间，而不污辱或谴责任何人。

所有这些因素对于达成协议、形成双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都是重要的。事实上，大部分在圆桌谈判中提出的议题都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妥协而结束。然而，妥协对团结工会来说有一些明确的界限。就马佐维耶茨基而言，不能妥协的事情是：团结工会的合法化；没有秘密交易，即谈判必须敞开由社会评论；协议里要清楚地声明，这个政治协议只限于这一次选举；依法赔偿戒严期间造成的伤害。⁵⁴ 在政府这边，除了保存共产党影响力外，没有类似的、精确的妥协限度。

这一差异对整个谈判进程看起来是有意义的。团结工会想要改变既存的制度，向前或推动对手向前。它坚持对大幅改革现体制是重要的一些谈判细节。⁵⁵ 其他一些细节仅作为讨价还价的因素是重要的。

政府这边不是这样的。它是防御性的，后撤性的。政府的谈判者不知道在他们后面的墙有多远；因此每一个让步都是太多了，每一个细节可能被证实是至关重要的：越来越如此是因为大量公开争议的细节直接与统治官僚体系中具体个人的可见利益相关联。任何妥协，就它的本意来说，都限制了权力、特权以及根深蒂固的共产主义当权派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的地位。

结果

达成协议的解决方案

谈判的最终成果远远超出了团结工会最初的意图和期望。在开始时，团结工会的领导者们期望付出代价：给这个体制合法性以换取团结工会的合法化。在结束之时，团结工会获得了合法性，附加了一个制度上的改变，那个改变达到了权力分享，为权力的转移铺平了道路。

56

团结工会被一个法令合法化了，没有附加任何前提条件或约束。类似的，个体农民的团结工会（Solidarity of Individual Farmer），独立学生协会（Independent Student' Association）也合法化了。其他在戒严法下被取缔的社团也重新建立起来。

达成的政治协议规定国会选举在 1989 年 6 月举行。议员席位的分配也设定好了：60%分配给三个政党的联合（波兰统一工人党、农民联合会和民主党）；5%分配给三个小的亲共产主义的基督教运动（一共 65%给前当权派）；35%分配给“不属于这 6 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候选人。”65%联合体中的 45 个代表从所谓的全国名单中由无竞争性投票选举产生（规定他们必须获得 50%的选票）。

参议院诞生了，由 100 个自由选举出来的参议员构成。参议院被赋予立法动议权，它有权“控制国家行为”，尤其在社会、经济政策以及法律领域。参议院有对下院（Sejm）立法的否决权。参议院核准下院选择的一位公民权利督察员（Ombudsman）和一位高级监督院主席。

总统职位设立了，被授予强行政权和重要的控制国会的权力。首位总统任期6年，由全国代表会议（下院和参议院集合到一起）绝对多数选举产生。总统依职权也是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军队总司令。总统被授权在国际关系中代表波兰，并有权要求下院通过一个由总统提名的总理，或者撤换一个在职的总理。

总统召集国会选举，并被授予和参议院同样的否决权（总统的否决也能被下院三分之二的多数推翻）。重要的总统法令需要总理的连署，但不包括那些涉及保留给行政的事务的法令，即外交政策、国防和国家安全。

在下列情况下，总统有权解散国会：（1）当它不能够在3个月期限内组成一个政府，（2）它不能通过预算，（3）它侵犯上面提及的三个总统的专属权力。在解散国会之后，总统必须召开新的选举。

总统也有权宣布长至三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它仅能延长一个额外的三个月，但必须经过下院和参议院的同意。在紧急状态期间，总统无权解散国会，也不能修改宪法和选举法。

为了评估协议的实施和协调未来的冲突，一个协议委员会创建了，委员会成员包括圆桌谈判的成员以及“其他相关团体”的代表。

一系列经济和社会解决方案达成了协议，尤其在农业、教育、环境、健康保障以及住房领域。审查制度终结了，出版自由显著扩大，《团结周刊》（Solidarity Weekly）重新出版，一份日报《选举新闻报》被交给了反对派。司法独立原则和一部有关结社的新法律获得同意。

协议内容所要求的立法改革和宪法修正案在1989年4月7日——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在圆桌谈判最后一次会议的两天后，在下院通过。

最重要的成果，对团结工会而言，与协议的保障措施有关。协议委员会是一个保障，它基于一致同意的原则而工作的。反对派在下院和参议院对立法进程的控制是另一个保障。最后，在一些副谈判桌，实质性的保障措施被接受了。例如，环境组提议，波兰应该和外国债权人谈判让部分国家外债能够被指定用于波兰的环境保护。为确保这些资源的恰当利用，谈判者们决定所有从国外为此目标获得的资金不应该转移到国家财政部而应该转到私人基金。

总的来说，团结工会的谈判者特别强调保障措施安排的必要，因为，正如斯特凡·布拉特可夫斯基所说，“巨大变革的宣言本身并不会诱发热情，伙伴们已经被欺骗过如此多次，以至于对于社会来说，只有变成事实才算数。”⁵⁷

没有达成协议的问题

足够意外的是，圆桌谈判在看起来最没有问题的领域——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取得成功。值得记住的是，经济问题是 1988 年葛莱米克代表团结工会最初提出的反危机协定的中心问题。然而，圆桌谈判关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成果却非常少。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个谈判桌，触动的是最可见的国家利益、党的利益以及经济官僚利益。对这些利益，政府没有妥协。结果是，一个关于市场经济愿景的温和声明，对于政府而言也是不能接受的。

在其他一些谈判桌，情况也如此。谈判结果表明，不可能允许自由工会进入国防部和内务部，也不能进入国家办公室和法院。团结工会也不能废止在健康保健领域的中层机构和矿业领域的垄断。不能打

破党的出版机构对波兰 90%的报纸和杂志的垄断。电台和电视国家委员会对广播媒体的垄断也受到的党的保护。

在法律改革、对内务部和检察官办公室的监督方面，只达成了很少的协议。在青年问题上的谈判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青年组织的多元化上没有任何协议。团结工会提出的一个有关公共集会的新法律草案被政府拒绝了。在戒严法下被解散的社团的财产也没有归还给重新合法化的社团。最后，政府拒绝了重新创建地方自治政府的要求，拒绝了让地方行政从属于新选举出来的自治机构的要求。

虽然团结工会的谈判者们在所有这些点上艰苦地奋争，但他们没有坚持每一个要求。依布扎克的说法，他们把谈判和寻求协议视为“仅仅是一个动态过程的开端，在那个过程中，一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后来变成了可能。政治改革谈判的过程给了我们理由相信我们正非常接近一条界线，也就是仅仅改进现存体制与真正改革之间的界线，如果我们跨过那条界线，真正的改革就会雪崩一般地到来。”圆桌谈判的最终协议创造了在未来跨过这条线的可能性。

然而，在 1989 年 4 月 5 日，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条线在圆桌谈判结束以后几乎立即就被跨过了。⁵⁸

总结

我这个研究的结论是简单的，虽然让人惊奇。

1. 圆桌谈判的发生只是因为党和团结工会的领导层由 1980-81 年直接对抗的差不多同一批人构成。双方都从他们不同的经历中认识

到，谈判达成妥协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

2. 在圆桌谈判期间，一个关键的变化发生了，这个改变使得共产体制的和平转型成为可能。这个改变是党政内部日益增长的分裂：顶层党政谈判者为一边，除他们之外其他人以及权贵阶层为另外一方。谈判的逻辑要求党的领导者们不断推进。他们不得不接受更多的不合法正统的妥协和解决方案。官僚们没有给他们支持，相反，拖他们的后腿，指责他们，在谈判期间公开削弱他们的地位。结果是，领导层把权贵阶层晾到一边。这个分裂在整个谈判期间逐渐扩大。在圆桌谈判结束之时，顶层党的谈判者把这些官僚视为“他们”，把参与谈判的对手视为“我们”。这个认知的变化，以及权贵阶层越来越孤立，有利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遵守契约，即使团结工会在 1989 年 6 月选举之后突破了那个契约之后，也是如此。

3. 整个过程例如，圆桌谈判和权力转移，其关键因素是圆桌谈判之前政府当权派对力量平衡的误判。如果政府此前意识到他们的社会支持是多么脆弱，它将永远不会同意一个谈判的解决方案，前面第 2 点所描述的进程将不会开始。

主要人物简介

日比格涅夫·布扎克 (Zbigniew Bujak)：协会和地方自治政府副谈判桌的主席；政治改革谈判桌、经济和社会政策谈判桌的参与者。技术专家。1980-81 年，团结工会的顶层领导之一；马佐夫舍地区 (Mazowsze) 团结工会主席。在戒严令颁布之后，转入地下。1989-90 年，斯特凡·巴特利基金会理事会 (the Board of the Stefan Batory

Foundation)主席。1990, 拉切·奥比瓦特尔斯基-阿卡 民主党(the Ruch Obywatelski-Akcja Demokratyczna Party, ROAD)的联合创始人。1992年起,一个起源于团结工会的社会民主党,劳工联盟(the Labour Union)的主要领导之一。

卡齐米日·斯普雷尼亚克(Kazimierz cypryniak): 政治局委员,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修正委员会主席。政治改革谈判桌的主要谈判者之一。

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Bronislaw Geremek): 政治改革谈判桌的联合主席。中世纪历史学教授。1980-81年,团结工会顶层顾问之一。在戒严期间被拘禁和逮捕。下院代表。从1989年9月到1990年11月,公民议会核心会议(Citizen'Parliamentary Caucus)的主席。1989-91年,下院宪法委员会主席。

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 在1981年引入戒严。1981-90年,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1981-84年,波兰总理。同意圆桌谈判,虽然他没有参与谈判但批准了关键的决定。自1989年到7月到1990年12月,波兰总统。

亚罗斯洛·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 政治改革谈判桌|立法和司法改革谈判桌的参与者。律师。1982-89,波兰赫尔辛基委员会成员。团结工会执行委员会成员。1989-91年,参议员。1991-93,下院代表。自1990年,中央联盟(the Center Alliance),目前议会外的一个右翼党的主席。

切斯瓦夫·基什恰克(Czeslaw Kiszczak): 圆桌谈判的联合主席。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圆桌谈判想法的共同提出者，首席政府谈判者。将军。1981-90，内政部长。部长会议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纪律委员会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

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政治改革桌、选举法律副工作组的谈判者。历史学家，作家。1960 年，共产波兰的首批异议者之一。1976 年工人保卫委员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1980-81 年团结工会的顶层顾问。在戒严法下被逮捕。1989 年被选为下院代表。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和汉娜·撒切卡（Hanna Suchocka）政府的劳工部长。1995 年，被自由联盟提名为候选人参与 1995 年的总统选举。

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工会多元主义谈判桌的联合主席。最后一届共产政府的部长，部长会议社会和政治委员会主席。自 1990 年 1 月，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自 1993 年，国民大会宪法委员会主席。

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工会多元主义谈判桌的联合主席。记者，天主教月刊《Wież》的编辑。1980-81，团结工会顶层顾问之一。在戒严法下被拘禁。自 1989 年 8 月到 1990 年 12 月，波兰首位后共产政府的总理。在 1990 竞选总统失败后，成为一个新成立的政党民主联盟主席至 1995 年 4 月，此后是自由联盟（融合了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的主席。

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政治改革谈判桌和媒体副谈判桌的谈判者。历史学家，作家。1960 年代，共产波兰的首批异议者之一。1976 年工人保卫委员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1980-81 年团结工

会的顶层顾问。在戒严法下被逮捕。1989年被选为下院代表。自1989年4月后，选举新闻报的总编。

阿尔弗雷德·米奥多维奇(Alfred Miodowicz): 劳工联盟(OPZZ)的主席。下院代表。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

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 党的改革派; 没有参与圆桌谈判。1980-81年, 副总理, 负责与团结工会联系。自1988年9月至1989年8月, 波兰最后一届共产政府的总理, 政治局委员。1989年8月-1990年2月, 最后一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总书记。

亚努兹·拉科夫斯基(Janusz Reykowski): 政治改革谈判桌的联合主席。心理学教授。自1988年12月, 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

伊雷纽什·赛酷拉(Ireneusz Sekula): 经济和社会政策谈判桌的谈判者。政治学博士。拉科夫斯基政府的副总理。部长会议经济委员会主席。1993-1995年, 作为海关办公室主任重返公共服务。

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 圆桌谈判的联合主席。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电工。自1980, 团结工会主席。在戒严法下被拘禁。198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1990年12月, 被选为波兰总统。

亨瑞克·武耶茨(Henryk Wujec): 工会多元主义谈判桌的谈判者。负责挑选团结工会的专家加入谈判团队。物理学家。1970年代, 工人保卫委员会成员。马佐夫舍地区(Mazowsze)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之一。在戒严法下多次被拘禁和逮捕。自1988年11月-1990年4月, 公民委员会的秘书长。自1989年, 下院代表。

注释

我想表达对迈克尔·瓦孔 (Michael Vachon) 的感激, 他是 1990-91 年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的研究生。他帮助编辑了这篇论文的英文版本。

¹ 我不是谈判的参与者, 也不是谈判中任何一边的专家。我被华沙的一份知识分子月刊《文学》(Literatura) 以通讯记者的身份派遣入圆桌谈判。

² 我可以有限制地接触圆桌谈判的官方记录。没人知道共产党一方的备份记录放在哪里。至 1990 年 7 月初, 反对派一方的备份是可获得的, 它们在位于华沙的公民委员会的总部里。然而, 当华沙清理受雇于这个委员会的一些知识分子时, 这些人把这个备份带在身边。结果, 这些备份记录无序地散布保留在这个城市的一些私人公寓里。我被允许查阅这些对本文来说是必要的记录。

³ Porozumienia Okraglego Stolu: Warszawa 6 luty-5 kwetnia 1989. (圆桌谈判的协议: 华沙, 2 月 6 日-4 月 5 日, 1989) (Niezalezny Samorzadny Zwiazek Zawodowy “Solidarnasc” Region Warmingsko-Mazurski, 1989); Pawel Smolenski Szymierze Okraglego Stolu (圆桌谈判的篱笆工匠们) (Paris: Editions-Spotkania; Warsaw: MOST, 1989); Konstany Gebert, Mebel (圆桌谈判) (London: Aneks, 1990)。

⁴ 采访过的政治家有: 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 谈判期间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 1989 年到 1990 年的波兰总统; 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 (反对派) 和亚努兹·拉科夫斯基, 他们两个是政治改革谈判桌的联合主席; 两个社团谈判桌的联合主席, 日比格涅夫·布扎克 (反对派) 和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 亚罗斯洛·卡钦斯基 (反对派) 和特凡·布拉特可夫斯基 (反对派, 波兰记者协会的前领导人, 参与社团副谈判桌)。除非另有注释, 在这章里这些人的评论和信息都来自于我的采访。

⁵ 在1990年9月的一次采访中，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承认，在引入戒严之后，他几乎立即要热内·卡达尔（Janos Kadar）请一队专家来波兰和波兰的领导层分享他们在达成国家和解方面的经验。“我想知道，匈牙利如何在经历了比我们更激烈的事件后仅仅在几年内就设法达到了一个高水平的经济和政治稳定，”雅鲁泽尔斯基说。事实上，一群重要的匈牙利政治局委员在1982年1月初访问了波兰。

⁶ 切斯瓦夫·基什恰克，《马格达莱卡的秘密》（Tajemnice Magdalenki），对基什恰克的访谈，《政治》（Polityka），9月8日，1990。

⁷ 准备本文的采访期间，雅鲁泽尔斯基说，“1987-89年的经济失败让我确信，我们的方法是无效的。不让所谓建设性的反对派进入权力体系，我们不能克服社会抗拒，而这对经济改革而言是必须的。认识到这一点，一个激进的进程启动了，并把我们将导向圆桌谈判。”在另外一次访谈中，雅鲁泽尔斯基描述了更多的细节，它们促使他承认这个事实“只有在在一个民主议会体制下，必要的社会支持才能够得到保障”。这么一个体制“帮助创造一个联合政府，它能够承担不受欢迎的决策带来的负担。”（“Przeszliśmy przez czyszciec, aby uniknac piekla”）（《我们为避免地狱而走过地狱之路》，Henryk Kurta 的采访。（我从雅鲁泽尔斯基那接触到了手稿），10）。

⁸ “一个曾经使用过武力和用武力统治的人比其他人更明白，武力不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它是一个不会达到目标的短期工具。认识到这个事实导向了改革、圆桌谈判以及后来发生的每件事情，”雅鲁泽尔斯基说。在一次接受Henryk Kurta 采访时，雅鲁泽尔斯基说：“没有那个经历（戒严），改革可能被武力中止。在走过炼狱之后，一个人不应该重走向地狱之路，这个认识对波兰冲突的双方都是极端重要的。”（“Przeszliśmy przez czyszciec, aby uniknac piekla, ” 17-18）。

⁹ 基什恰克，《Tajemnice Magdalenki》。

¹⁰ 据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说，“1980-81年的事件摧毁了党，从那刻起，党不再能够公开的、创新性地行动。在1986年第十届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最后一击来临，当时尽管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实施了改革，波兰

的这个共产党拒绝了所有的改革并宣布戒严的胜利。”

¹¹ 撒切尔夫人的立场尤其重要。1988年，波兰政府邀请她来波兰，基于她在英国奋力反对工会的记录，波兰政府相信，她将支持波兰政府反对团结工会的措施。她热情支持瓦文萨，造船厂工人，以及波兰的劳工联盟，这令雅鲁泽尔斯基和他的同僚非常惊奇，促使他们重新评估波兰的局势。

¹² 这一小节基于基什恰克，《Tajemnice Magdaleny》；Smolenski, *Szermierz Okraglego Stolu*；以及我的采访。

¹³ 在这次会议上，政府的代表有切斯瓦夫·基什恰克，斯丹利斯洛·科奥萨克，以及一群顾问。在戒严期间为取代团结工会而成立的官方的亲政府工会（劳工联盟（OPZZ））的代表，还有两位主教（布罗尼斯洛·达布洛斯基，阿罗亚扎·奥斯祖力克）也出席了此次会议。团结工会的领导层由莱赫·瓦文萨、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阿罗亚扎·皮耶特查克（Alojzy Pietrzyk）、亚奇克·默克尔（Jacek Merkel）、亨瑞克·萨科维奇（Henryk Sienkiewicz）、安杰伊·斯特尔马车夫斯基（Andrzej Stelmachowski）代表。在顶层成员中，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的是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亚当·米奇尼克，雅采克·库隆。

¹⁴ 这一关于拉科夫斯基的看法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党内圆桌谈判的所有建筑师们（雅鲁泽尔斯基，克瓦希涅夫斯基，基什恰克，拉科夫斯基）强调，拉科夫斯基是对协议和承认团结工会最坚持的倡导者之一。

¹⁵ 这些会谈的细节还没被揭开。Smolenski 询问过这些细节，马佐维耶茨基回答说：“让我们把它留给我的回忆录…… 预备谈判是漫长而艰苦的。它们跨过几个阶段，不同的事情发生了，气氛也大不一样。我让莱赫·瓦文萨和团结工会的领导层知晓这个谈判的所有细节…… 最后，我们的努力导致了导言性的协议和声明，在辞职后，我们将能继续讨论这些细节。过程非常困难，但它让我们能够制定出重要的协议——为团结工会以及个人农场主的团结工会的合法化铺平了道路。”（Smolenski, *Szermierz Okraglego Stolu*, 9）。据克瓦希涅夫斯基和布扎克说，在这些最初的谈判中，在教会在

场的情况下，大家同意部分自由选举（将给亲共产主义联合体多数席位）的主意。也是在教会-党谈判中（参与谈判的安杰伊·斯特尔马车夫斯基是团结工会的顶层顾问，也是教会代表团成员之一），有关结社的初步协议文本得以通过。

¹⁶ 据拉科夫斯基说，这一妥协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雅鲁泽尔斯基的人事政策，那个政策在党的顶层剥夺了所有强硬派的地位。

¹⁷ 基什恰克如此回忆这次争论：“在全体大会的粗略讨论和会议室的气氛让人以为改革派是少数派，当决定提交投票的时候，改革派将会失败。在这个情形下，在休会期间，雅鲁泽尔斯基（党的总书记）将军邀请我和斯维茨基将军去隔壁房间，向我们宣布，鉴于目前的讨论的性质和方向，他打算提交辞职。我建议，我们都辞职。他们同意。接着，雅鲁泽尔斯基和拉科夫斯基谈，拉科夫斯基赞同我们的观点。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经过我们几个的授权，把我们的辞职提交给大会投票。我们四个离开了会议大厅，以便于中央委员会能够自由做决策。这次会议由资深的委员亨瑞克·雅布隆斯基（Henryk Jablonski）教授主持。投票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决定保留我们在党的领导层。在这次大会的这部分结束之时，在戏剧性的争论后，对工会的解决方案应该改革的观念被接受了，因而挡在通向圆桌谈判道路上的最大的障碍被移除了。”（《Tajemnice Magdalenki》）。

¹⁸ 在这次会议上，陪同莱赫·瓦文萨一起参与的有比格涅夫·布扎克、弗拉迪斯沃夫·弗拉泽尼乌克、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米奇斯瓦夫·基尔、莱赫·卡钦斯基，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安杰伊·斯特尔马车夫斯基。和基什恰克一同来的有斯丹利斯洛·科奥萨克、安杰伊·格杜拉（Andrzej Gdula）、亚努兹·拉科夫斯基，以及两个亲政府的联合党派的代表，亚恩·亚诺夫斯基（Jan Janowski），博丹·可诺莱夫斯基（Bohdan Krolewski）。

¹⁹ 每个谈判桌的谈判者和专家的数量和细节统计，请看 Porozumienia (passim) and Wojciech Adamiecki, Marianna Domanska, Maria Mogielnicka, and Ludwika Wujec, eds., Okragly stol: Kto jest kim: Solidarnosc, opozycja: Biogramy, Wypowiedzi (Who is who at the round

table: Solidarity, Opposition: Biographical

notes, statements) (Warsaw: Wydawnictwo Mysl, 1989), 305-24.

²⁰ Smolenski, *Szermierze Okraglego Stolu*, 83.

²¹ 大量我采访过的圆桌谈判的谈判者表达了他们对他们的怨恨消解速度的惊奇。后来，这变成参与过圆桌谈判的新政府成员和没有参与过谈判的反对派领导者之间的一个显著的不同。后者（大众总的来说也是）保留了更多的怨恨，要求共产党的领导为他们的遭遇负责。

²² 马格达莱卡会议的参与者各式各样。基本团队是团结工会一方的瓦文萨，马佐维耶茨基，葛莱米克，布扎克，弗拉泽尼乌克，米奇尼克，斯特尔马车夫斯基和莱赫·卡钦斯基，政府一方有基什恰克，约瑟夫·奇雷克，科奥萨克，瓦希涅夫斯基，拉科夫斯基，格杜拉，卡齐米日·斯普雷尼亚克，伊雷纽什·赛酷拉。

²³ 据拉科夫斯基说，“马格达莱卡达成的解决方案不是最终的方案。它们必须带回谈判桌由双方的团队重新谈判。这个程序给了协议合法性。这是因为，双方，尤其是团结工会，害怕秘密交易的指控。”见《大型政治冲突的解决：波兰的圆桌谈判案例》(Resolving of the Large-Scale Political Conflict: The Case of Round Table Negotiations in Polan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Group Dynamics Conflict within and among Groups, Texas A and M University, April 1990, 15)。

²⁴ 专门而非普遍决定的仅有的例子是关于独立学生协会（NZS）的合法化决定，这个决定在一次马格达莱卡会议上做出，此外，还有一个关于采矿业的妥协。后面这个例子中，由于副谈判桌上采矿业游说团体的抵制和不妥协的劳工联盟领导者的立场正面冲突，谈判陷入了僵局。

²⁵ 一些马格达莱卡会议的参与者强调他们人际上的意义。“人们坐在一起，一起讨论，一起吃饭，一起喝酒，这个事实本身是通往妥协的路上极其重要

的一步，”瓦希涅夫斯基说。另一方面，对亚罗斯洛·卡钦斯基来说，这些同样的人际互动是在团结工会的参与者（尤其是葛莱米克和米奇尼克）和顶层共产党员之间的不能接受的“友善”的案例。

²⁶ 这是葛莱米克在 1990 年的主要观点，但在中央联盟参议员亚罗斯洛·卡钦斯基看来不同，他强调，在谈判之前和谈判期间，团结工会分裂是明显的。他声称，在谈判中反对派寻求的大量解决方案源于葛莱米克团队想要在一部分共产党当权派的联盟那里获得权力。

²⁷ “显然，在经济中，有一个对通向协议的唯一障碍——官僚们。当和政府专家们谈话，没有分歧和幻想，每个人都想走向市场经济，”日比格涅夫·布扎克说。

²⁸ “我变得确信，和我们一起坐在谈判桌前的政府成员仅仅害怕煤矿游说团体和矿业的中间机关。他们害怕，如果和那些人斗，他们一定会失败，”阿罗亚扎·皮耶特查克说。他是一位工人，领导了矿业副谈判桌的团结工会反对派代表团。

²⁹ 据克瓦希涅夫斯基说，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党的办公室和政府之间。他回忆到，他曾看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绝望，猛地关上门，在和保守派的争执中发大脾气。克瓦希涅夫斯基确信，雅鲁泽尔斯基“与其说说服了党官僚不如说哄骗了他们进行改革。”

³⁰ 葛莱米克，引用自 Smolenski, Szermierze Okraglelo Stolu, 34.

³¹ 对葛莱米克来说，教会在马格达莱卡的出席最重要的意义是，争议有一个客观的见证人。(Smolenski, Szermierze Okraglelo Stolu, 36.)。据布扎克说，他们的角色是更积极的：“在马格达莱卡没有草案也没有记录，”他在媒体招待会上说。“因此，当一方声称对方没有遵守协议时，他们请教会观察者回忆，之前同意的是哪些内容。他们已经做了一些这样的裁决，有些有利于这方，还有一些有利于另一方。”（布扎克，引自 Gebert, Mebel,

58)

³² “第一个被提供额外的打印纸张供应的是教会。在这些事情上，教会观察者无论如何没有限制，就像美国公司的经理们一样行事，”克瓦希涅夫斯基说。他也认为，在圆桌谈判之前及其间，教会在塑造瓦文萨、葛莱米克和马佐维耶茨基之间的关系上也起到了帮助。

³³ 媒体团队的领导克日什托夫·科兹洛夫斯基 (Krzysztof Kozłowski) 不同意。他的团队由瓦文萨任命，他没有多少可说的，虽然他相信瓦文萨的选择是优秀的。(见 Smolenski, *Szemmierze Okraglelo Stolu*, 62.)

³⁴ 亨瑞克·武耶茨的角色是斯特凡·布拉特可夫斯基在 1989 年 2 月份透露给我的，从来没有受到武耶茨本人的质疑。

³⁵ 在 1989 年 2 月上旬，我跑到扬·里提斯基 (Jan Litynski) 那里，他告诉我，他有两天时间学习矿业知识，因他刚被任命为副谈判桌的谈判代表，但从来没有在采矿业待过。后来，里提斯基成为劳工和社会福利部的一名主任，专门负责采矿问题。

³⁶ 安杰伊·塞林斯基报道：“在圆桌谈判之前的这些会议期间，有一个经常性的权力争夺。独立学生协会 (NYS) 的人想要强行加入我们的团队……我不了解我自己的谈判者：他们被一些如瓦文萨一样的关键人物任命。他们意在维护他们各自社会群体的利益。”(见 Smolenski, *Szemmierze Okraglelo Stolu*, 89.)

³⁷ 经常，当反对派拒绝了政府的强硬立场，在他们的联合体内部就会出来一个人 (农民联合协会或民主党的代表或专家) 提出一个之前没有和他们团队领导协商过的妥协。团结工会经常不会错过这种利用政府内部缺乏统一的机会。

³⁸ 葛莱米克，引自 Smolenski, *Szemmierze Okraglelo Stolu*, 33。

³⁹ 1990年8月，卡钦斯基说，葛莱米克和米奇尼克（那时他的主要反对者）拒绝了圆桌谈判的概念，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知识界的团队不可能赢得选举；据卡钦斯基说，他们更倾向于更慢一点的转型——首先和共产党分享权力，然后在为他们确保这个分权。

⁴⁰ 这些谈判由 Gebert 报道 (Mebel)。除非有特别指出，本节的所有引言都翻译自他的书。

⁴¹ 在对他的访谈中，葛莱米克强调，从一开始，反对派就试图把圆桌变成方桌，明确的说，只有界限分明的两方参与谈判，即政府一方和社会一方（由团结工会代表）。因这相同的理由，葛莱米克和其他谈判者持续反对政府在圆桌谈判之后建立一个监督协议实施的国民和解委员会的方案。相反，他们偏向于建立一个由界限分明、相互对立的双方组成的委员会。

⁴² 关于刑法典的两个条款争议尤其激烈，那两个条款允许把“意图引起公众骚乱”（第 282A 条）和“公开污辱、嘲弄或诋毁波兰国家、体制或它的中央办公室”（第 270 条）的人最高判刑三年。因而，一个异议者可能基于法庭对他的意图的解释而被判刑，即使他没有实际上引起公众骚乱。对国家官员的正常批评也可能被惩罚。团结工会要求这些条款被废止。政府坚持不废止。事实上，这些条款的起草者也在政府谈判团队之中，这对条款的废止并没有什么帮助。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妥协。

⁴³ 在 1990 年 8 月，卡钦斯基暗示，葛莱米克因为担心若举行完全自由的选举，公民委员会的知识分子将丢掉选举而有意在苏联的干涉问题上撒谎。然而，在对卡钦斯基的整个访谈中，我不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他把这些圆桌谈判中的事件视为他和葛莱米克团队的公开分歧。

⁴⁴ 葛莱米克，引自 Gebert, Mebel, 91.

⁴⁵ 斯普雷尼亚克，引自 *ibid*, 95.

⁴⁶ 一个政府的谈判者卡罗尔·新恩泽尔洛兹 (Karol Szyndzielorz)，曾说：“此时国会就权利争议起来，它感觉自己的权利和职能被剥夺了。因此，我

们改革波兰人民共和国重要法律的意图被抵制了，因为这些代表被冒犯的情绪。”（ibid, 97）。

⁴⁷ 1990年9月，布拉特可夫斯基在一次私下访谈中给了我这些细节。

⁴⁸ 斯特尔马车夫斯基，引自 Smolenski, Szemmierze Okraglelo Stolu, 43。

⁴⁹ 在1989，这些谈判的外部观察者几乎没有察觉到朝向妥协的趋势。大部分媒体和记者招待会上的公开声明强调了冲突和分歧。这些扭曲是有意为之的。首先，激进的声明不得不确保双方的合法性。其次，据布扎克说，“关注这些谈判和公开声明的媒体本身是讨价还价的重要因素。”

⁵⁰ 拉科夫斯基，“大规模政治冲突的解决”（Resolving of the Large-Scale Political Conflict）。

⁵¹ 诺维茨基（Nowicki），引自 Gebert, Mebel, 55。

⁵² 这个故事是基于克瓦希涅夫斯基和布扎克分别给我的信息而重建的。

⁵³ 拉科夫斯基，《大规模政治冲突的解决》（Resolving of the Large-Scale Political Conflict, 19-20.）。

⁵⁴ Smolenski, Szemmierze Okraglelo Stolu, 15-16。

⁵⁵ 这个观点看，在下议院压倒参议院否决权的多数票是65%（党如此建议），还是三分之二，即67%（这将给团结工会否决权），是很重要的。然而，就拉科夫斯基而言，这个争论是“对一个无意义细节”的争论。

⁵⁶ 这篇文章所有访谈的团结工会的谈判者都同意，反对派在圆桌谈判上收获了比预期更多的东西。对反对派来说，最没有预期到的结果是参议院的自由选举以及允许出版一份独立的日报。

⁵⁷ 布拉特可夫斯基，引自 Smolenski, Szemmierze Okraglelo Stolu, 154。对所有谈判者来说，保障措施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议题。团结工会住房组的一个联合主席，顶级经济谈判者之一的亚历山大·帕钦斯基说：“在经济谈判

桌，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这些协议如何得到制度性的保证。政府强烈反对这个，因为这些协议对他们来说是最危险的。我想，如果没有保障措施，他们将准备签署任何协议，至少在经济议题上，以往一直是这样的。”（136）⁵⁸ 所知唯一的例外是亚当·米奇尼克。然而，除了最亲密的朋友外，他也不敢对任何人说他确信共产政权将很快在波兰结束。

第二章 匈牙利的圆桌谈判

安德拉斯·赛约 (Andras Sajo)

事件

谈判前的形势

到了 1988 年，匈牙利的经济困境已经恶化到了甚至共产党人都不得不承认的地步。由于和经济危机有关的原因，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在 1988 年的党代会上取得控制权。在 1988 年的夏天，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HSWP——共产党人）新形成的领导班子表现出对寻求一种新的合法性基础和新的权力安排感兴趣。以卡罗伊·格罗兹（Karoly Grosz）为首的领导集团的新政策取向可以由几个方面的因素做出解释。

这个领导集团想要从老卫道士的铁腕中保护自己，老卫道士以年

迈的亚诺什·卡达尔（Janos Kadar）为代表，他在匈共的党代会上当选为荣誉主席。¹

这个国家正面临日益加深的经济困难，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前也导致对共产党政权的公开支持受到削弱。跟之前预期的观点相反，在匈共倒台后，对它的支持反倒相当可观。

为了解决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危机，格罗兹集团试图获得西方在经济上和道义（外交）上的支持。为了得到这种支持，他们不得不满足西方设置的人权标准。

苏联由于推行改革与公开性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尽管在 1988 年中期以下事实还不甚明朗：勃烈日涅夫教条即将完蛋，而苏联的领导层将既没有维持苏联在匈牙利存在的实力、也没有那样做的兴趣。

匈牙利反对派那时相当孤立，而且人数很少。然而，1988 年由更激进的异见群体组织的壮观的游行——3 月 15 日的游行和 6 月 16 日的街头示威以纪念被暗杀的伊姆雷·纳吉（Imre Nagi），以及青年民主党人（FIDESZ）的静坐——还是给了匈共一个明确的警告。在某种程度上匈共不得不把反对派力量加以考虑，反对派依赖西方的媒体宣传来表达他们的要求。不过，公众只在一个方面对反对派有支持。环保主义者努力动员了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多瑙河大坝工程，这个工程在生态上和商业上都被认为是灾难性的。

在这种情况下，修改宪法对匈共很有吸引力。匈共领导人认为，修改后的宪法将会导致有法治保障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会尊重基本人权但是仍会维持共产党人对社会各领域的统治，包括政治统治。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建立起来，领导者是新的司法部长卡尔曼·库沙（Kalman Kulcsar）。此人强调司法的独立性，他同时建议成立宪法法

院。²

新的领导班子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绩（包括由格罗兹领队的对美国的访问），似乎给温和的改革议程加分不少。法律体系的变化使得私有产权更广泛存在，并且支持外国投资。然而，格罗兹集团却无法控制整个局势。共产党内部的争斗加剧了，并且匈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伊姆雷·波日高伊（Imre Pozsgay）领导下的改革派要求更激进的宪法改革。他们也试图在普通党员、大众媒体甚至反对派中寻求外部支持，特别青睐民族主义味道更浓的“软”民粹运动。有人试图促成真正的“人民阵线”类型的会谈，在温和左翼基础上协商国家政权。但这种努力失败了。匈共内部的局面更加紧张。党内一些派别跟核心越来越疏远。在1956年革命期间产生了分裂——那是一场赋予匈共统治合法性的历史运动³。在官方眼中，1956年事件被定性为一场反革命运动，并且伊姆雷·纳吉和他的伙伴被以共谋者的罪名处死。尽管给那件事平反日益具有政治紧迫性，但格罗兹并不想改变党对此事的定性。基于来自反对派运动的努力和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对1956年事件的再解读变得重要起来。而格罗兹倚重的西方则认为，平反1956年事件上的斗争比格罗兹三心二意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更重要。（那时，格罗兹反复把自己和“布尔什维克”群体和主流官僚集团绑在一起）这起标志性的事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事。1989年1月，在格罗兹对外访问期间，波日高伊，党的1956年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头，宣布那次事件是一次民众起义。公共舆论迅速对此观点表示赞同。作为结果，1989年的2月10-11日，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那些仍然认为1956年事件是反革命性质的顽固派被孤立起来，多数人投票赞成通过自由选举向议会民主和平转型。为了这个目标，党的领导层

希望创造出在选举期间和选举后对他们最有利的条件。匈共试图使用的策略之一是与正在日渐成型的各个反对派力量分别进行谈判。这么做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被分隔孤立起来的反对派团体很明显不是共产党人的对手。匈共邀请了不同的独立团体进行双边对谈。有些会谈发生在3月3日和14日之间。3月15日的游行将如何进行在会谈中也非正式讨论过。

根据新的集会自由法律，3月15日的游行是合法的。这次游行显示，民众对反对派给予了更多的支持⁴。3月29日的会议上，匈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份文件（起草于3月21日），决定授权中央委员会组建一个工作小组“为合作”进行正式谈判。文件中没有特别指明合作的对象是哪些党派或团体。所计划的谈判的目的是协调关于新宪法和选举制度的立场。⁵

尽管反对派团体之间早期有冲突，但他们很容易懂得，成立一个反对匈共的联合阵线⁶是非常重要的。在约茨塞夫·安泰尔（Jozsef Antal）的安排下，1988年的秋天在塞默维斯（Simmelweis）博物馆进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谈。（安泰尔是正式的非政治性注册组织巴耶塞协会（Bajsy Society, BZSBT）的成员）。在安泰尔的会议上露面的大部分人也是后来圆桌会谈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人。然而，那时并没有就圆桌谈判做出联合行动的决定。发起者最终来自，独立法律人论坛（Fuggetlen Jogasz Forum, FJF），这是个主要由律师于1988年11月5日成立的组织，主要目的是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促进立法上的变化。在3月15日游行之后，独立法律人论坛的领导人伊姆雷·孔亚（Imre Konya）建议反对派力量应该讨论选举法以及对修建多瑙河大坝的禁令。他同时建议独立法律人论坛应该充当会议的组织者。独立法律人

安德拉斯·赛约

论坛支持孔亚的提议，一个三人小组（伊姆雷·孔亚（Imre Konya），帕尔·巴特费（Pal Bartfay），吉奥吉·桑多菲（Gyorgy Sandorfy））建立起来，有两个律师自愿操持会议的行政部分。⁷ 孔亚与匈牙利民主论坛（MDF）的执行主席佐坦·柏洛（Zoltan Biro）进行协商。柏洛跟波日高伊走的很近，并且对合作建议持坚定的反对立场。但最终他同意将找个人代行，他任命的人是吉奥吉·斯查巴德（Gyorgy Szabad）教授。

自由民主党人联盟（SZDSZ，坚定的反对派⁸）准备了“对匈牙利同胞呼吁书”（Magyarországi Baratainkhoz），在3月19日于大影剧院（Corvin）进行的公开会议中提交上来。孔亚的提议得到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的赞同。热诺斯·凯斯（Janos Kis），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的一位领导人，在会上宣布，他的团体现在准备好就独立法律人论坛建议的议题开始谈判。

反对派圆桌会议（简称EKA）于3月22日在布达佩斯法学院（ELTE）开始了。⁹

反对派圆桌会议的参加者

由于匈共对政治自由化做出越来越多的承诺以及警察势力的退缩，造成越来越多的政治小团体在1988年下半年涌现出来。他们的法律地位即便在1989年出台结社自由法案之后也不清楚。89年的法案给予结社以可能性，不需要再取得预先批准，并且仅仅服从法院的注册。还不清楚政治性结社（也就是说政党）是否也适用该法案，也不清楚他们是否还要等待专门为政党制定的法规。看起来他们将不得不接受当时的宪法，而那时的宪法确立了匈共的领导地位。格罗兹似

乎倾向于对该法给予限制性解释，而司法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暗示他支持自由化的解释。

到了 1989 年 3 月，一些政治性组织已经准备像准政党那样活动了。一些活动家企图复兴先前的政党，他们在许多场合宣称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存在。这包括独立小农党（Kisgazda），该党在 1947 年举行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获得过 57% 的选票。这些“复兴”的党常常被指称为“历史上的”政党（由于它们的前身在被共产党人摧毁之前使用同样的名字）用以区别新成立的党。而新的党一般都是从异议民主反对派中出现的。这些新的党包括自由民主党人联盟，青年民主党——一个跟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紧密合作的激进青年团体，还有半非法的匈牙利民主论坛（MDF）运动，他们是受波日高伊支持的民粹主义者。¹⁰

参加第一次 EKA 会议的其他团体还有巴耶茨—兹林斯基（Bajacsy-Zsilinszky）之友社（BZSBT），此团体以一位非常有争议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英雄的名字来命名，此人作为匈牙利人反纳粹运动领袖之一遭到杀害。这个团体尤其对特兰西瓦尼亚事务感兴趣，它的一些成员跟波日高伊走的比较近（见下面）。BZSBT 从来没能得到大规模的拥护，并且逐渐转向支持匈牙利民主论坛。

出席的团体还有匈牙利人民党（Magyar Neppart），这个党倡导战前的人民阵线理念并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味道。它跟匈牙利民主论坛有密切联系，匈牙利民主论坛后来给了匈牙利人民党“一个暂借的主席”（它在选举中得到了大约 1% 的选票）。¹¹

自由工会联盟（Liga）是一个工会运动，其成员和支持者中有一些是知识分子；它的立场和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相近。¹²科学工作者民

安德拉斯·赛约

主联盟（TDDSZ）是自由工会联盟的前身，该团体自发形成，受到了警方和企业主们以及后来支持共产党的官方工会的打压。自由工会联盟以及会谈后期基督教民主人民党（KDNP）都受到邀请参加 EKA 会谈，而社会民主党的出席资格则因为内部党争的原因被搁置。¹³

发出邀请的是独立法律人论坛，它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标准决定邀请谁（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在第一次 EKA 会谈中坚持主张任何一个党如果不能证明有大批拥护者就不应被接受）。基本上，基于布达佩斯并且一定程度上公布了独立宗旨的团体都受到了邀请。人们互相认识，并且邀请很大程度上靠熟人之间传播。是否经过法庭注册并不在受邀的标准里。反对派团体代表由他们自己的组织派出。至今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那些组织选择参会代表的标准是什么；代表团成员构成一直在变化，部分是因为不同党派的内部变化，部分是因为一些参会人员有其他诉求并且不能再参会。代表团成员变化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会议的政治规格的升级。

最初参会的人有：

- 巴耶茨—兹林斯基之友社（BZSBT）：卡洛里·微艾（Karoly Vigh，历史学家，生于 1918 年），该协会的主席。
- 青年民主党：卡洛里·克瓦（Karoly Kover，律师，生于 1959 年）和维克多·奥班（Viktor Orban，律师，生于 1963 年），都是青年民主党主席团成员。
- 独立小业主党（FGKP）：伊姆雷·波拉斯（Imre Boross，律师，生于 1926 年），该党的临时执行委员会成员。
- 匈牙利民主论坛：安德拉斯·格果里（Andras Gergely，

历史学家)；吉奥吉·斯查巴德 (Gyorgy Szabad, 历史学家, 生于 1924 年), 匈牙利民主论坛的主席团成员。

- 匈牙利人民党：查巴·瓦嘉 (Csaba Varga, 作家), 匈牙利人民党的总书记。
- 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巴林特·马格亚 (Balint Magyar, 社会学家, 生于 1952 年), 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的主席团成员。
- 社会民主党：塔马斯·热微思 (Tamas Revesz, 律师, 生于 1946 年), 党主席的儿子。
- 自由工会联盟：拉斯洛·布鲁斯特 (Laszlo Bruszt, 社会学家, 副大使, 生于 1953 年); 拉斯洛·维特泽 (Laszlo Vitezy, 电影导演, 生于 1940 年)

这些党派都承认所有反对派联合行动的重要性。他们同意所有 EKA 的决定都要经过一致同意, 并且他们的行动范围仅限于直接跟和平转型相关的事务。在 3 月 30 日, 他们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 (在给匈共中央委员会发送了一封信之后)。这个声明拒绝匈共对一些 EKA 成员发出单独的和经过选择的邀请。他们坚持要求在 EKA 和匈共之间举行双边谈判。

预备性会谈

EKA 和匈共之间的预备性会谈达成的最重要协议是关于程序问题的。

一旦 EKA 清楚的表示为会谈做好了准备, 匈共就原则上接受了将 EKA 作为一个单独实体对待。然而在国家圆桌会议的预备性会谈中,

安德拉斯·赛约

匈共仅仅邀请了反对派团体中的一部分。巴耶茨—兹林斯基之友社、青年民主党、还有自由工会联盟都没有邀请。在预定会谈日的前一天，EKA 参与者之间发生了一场实实在在的争论。多数意见认为，尽管某些参与者被排除是令人不快的，但那些受到邀请的党派还是应该参加会谈。但是青年民主党坚持认为匈共已经违背了承诺，并且 EKA 现在被它所作的决定已经绑在一起。EKA 试图向匈共阐明这一点，但是负责这次会谈的秘书长吉奥吉·费替（Gyorgy Fejti）却没能使对方收回成命。匈牙利民主论坛最初没有在此问题上采取明确立场，但是最终却使天平倾向于不参加。¹⁴

有两个星期似乎出现僵局。没有证据显示究竟是什么促使匈共最终决定他们应该接纳 EKA 作为一个单独的复合体。从他们的总体策略来看，人们会想当然认为他们仍然希望能够分裂 EKA。同时对匈共来说，要想谴责反对派为延期负责也变得日益困难。匈共已经承诺将和反对派合作来准备民主转型，很明显的是它没有打算履行承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匈共总算开始了和 EKA 代表们的预备性会谈；不过，这次匈共保持了低姿态。

拉斯罗·斯来奥姆（Laszlo Slyom）和彼得·托尔盖塞（Peter Tolgyessy）是参加预备性会谈的 EKA 代表，这次会谈开始于 4 月 22 日。据斯来奥姆所说，他有兴趣作为观察员参加了 EKA 的第一次会议并且也是因为那次会议在他当教授的法学院召开。他和托尔盖塞被选中不仅因为他们是律师，也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党内（分别是匈牙利民主论坛和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的法律专家。他们的党是参加会谈的最重要的团体。托尔盖塞和斯来奥姆定期向 EKA 汇报预备性会谈的情况，会谈的具体情况成功地对外界观察者进行了保密。第二

期预备性会谈在5月2日举行；在这次会谈后，显示匈共将要拒绝做进一步的让步。它同意在5月8日同时举行一个多党派会谈，但是仍然拒绝接受EKA作为一个单独实体。在5月13日，报纸报道EKA强烈要求匈共在48小时内恢复谈判。

EKA和匈共之间谈判的主要争议之点是：

1. 匈共，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总书记，拒绝作出一个礼仪性的联合公开声明。
2. EKA最初的立场是应该保证媒体全面报道这些会谈。不过明显的是，很早就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专家团体应该在秘密状态下工作，只有全体会议应该向媒体公开。（在圆桌谈判的第一个星期，当一轮中层谈判后来被接受时，曾辩论过究竟对公众开放应该适用什么规则）。
3. 对参加圆桌谈判的参加者的人数存在不同意见。
4. EKA代表试图避开扩展可能的议题；而匈共似乎乐于把治理责任共享，尽管还没有进行授权的决定。

据托尔盖塞所说，匈共代表对他们想达成什么结果并没有清楚的概念，但是在他看来很明显的是匈共想要把EKA分裂成8个成员党派。

EKA的代表在预备性会谈中试图构建一份精心的妥协方案，宣称他们准备接受圆桌谈判中的共产党同路人，但是仍然坚持由他们自己决定EKA的组成。

对如何评价匈共的意图，EKA似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巴耶茨—兹林斯基之友社跟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波日高伊有密切接触，坚持把谈判向改革运动开放，那时的改革运动正在全国组织动员但尚未掌握党的决定权。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和独立法律人论坛都公开声明，他

安德拉斯·赛约

们乐于和改革集团谈判。这被匈共代表团在预备性会谈中批评为“干涉内部事务”。

在整个预备性会谈期间（也就是贯穿整个 5 月），跟共产党改革派的关系仍然既是 EKA 内部的话题，也是在讨论哪些组织跟匈共进行预备性会谈的前期谈判中的议题。匈牙利人民党，独立小农党以及巴耶茨—兹林斯基之友社坚持对波日高伊和独立的地方改革团体的主动性表示欢迎。但这没有被 EKA 接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清晰的立场，然而在 1989 年的 9 月对波日高伊的接纳变得具有决定性。1989 年 5 月，党内的分裂刚刚开始变得有点更明显，奥班（青年民主党）的观点“让他们打起来”变得流行一时。¹⁵

EKA 建议，匈共中央委员会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命令国会内的共产党员不要在 EKA 认为应该在谈判中解决的问题上推进立法活动。此时，只有一些刑法和选举法议题被认为是相关的。如其先前在声明中所说，EKA 认为由国会通过法律没有合法性。在适合立法的领域从来没有一份严格的核查清单，但有一个例外：圆桌谈判的管辖权仅限于为向选举民主和平转型做准备。

EKA 代表们接受了预备性会谈中说好的关于媒体问题的妥协性建议。特别的，他们赞同最高层次的会谈几乎都把媒体排除在外。他们决定当达成协议时就发布联合声明，只有当达成协议时，各党才保有各自发布声明的权利——但是这样的各自声明不能在谈判期间发布。

EKA 特别关注共产党控制下的国会。有些人，尤其是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的人，认为政府将继续立法进程并将在圆桌谈判期间由国会通过不公平的法律草案。大概是在 5 月底，匈共代表团公开威胁说，如

果 EKA 再不合作，就要在下个月通过新立法。为了对付匈共的手段，EKA 讨论了不同的策略进行抵抗：（1）应该预先宣布，这些法律的通过将会自动触发退出谈判。（2）如果通过了新的法律，将会诉诸全民公决。（3）进一步使用“美国人的反应”作为应对（也就是说，美国人将会谴责特定的行为；布什总统的访问预订在 7 月）。

逐渐地，EKA 开始明白，谈判不是对抗，而是应该理解成“技术性”问题，并且最好交给专家处理。奥班（Orban）建议，实质性的工作应该在圆桌谈判的大框架下交给专家委员会来做。这对于企图将 EKA 刻画成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变革的障碍的图谋来说，很清楚是个反击。EKA 逐渐赞同在议程内把更多议题包括进来（土地改革，国企转型成私有企业等）。

EKA 会议上有一种总体上的感觉是，这场运动仅仅是某种神秘较量的傀儡，并且最终决定将会由其他势力做出——尽管还不清楚是什么势力。波兰是个引用的例子，在那里所有重要决定都是在圆桌谈判之前已经做出，决策者是秘密的共产党政治局几巨头和天主教会。

由于几家参与者的担心，匈牙利民主论坛建议把政府纳入到会谈中来，作为一种手段制约共产党人的操控能力。这个建议没有被接受：如奥班（青年民主党）所说，决策权力属于匈共¹⁶，人民应该被允许看到这一点，这样的话，匈共将会为它自己的统治的错误受到谴责。

奥班在即将到来的圆桌谈判中坚持 EKA 的激进立场。根据他的观点，EKA 没有能力像团结工会所做的那样动员大批群众去游行示威。“团结工会的力量使得他们足够强大到收回协议。”他的意思可能是说激进的要求将会更有效，因为这使得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有更大的操控机会。那些将会自动保证共产党人在政府中的位置的妥协性协议

安德拉斯·赛约

必须要避免，因为 EKA 一旦同意了条件，将没有力量——意思是他们缺乏必要的公众支持——再去修订。因此，成立一个过渡性的由共产党人和反对派部长们组成的民族拯救联合内阁的想法就变得难以接受。

不过，一件即将发生的事将至少是临时性地展示了公众对 EKA 的坚定支持。到 5 月底，在经过了长达三周的僵持之后，很明显的是将有一场群众游行来纪念伊姆雷·纳吉和其他 1956 年遇难的烈士，他们在被处死后被埋葬在无名公墓中，现在则要重新安葬，并且国际媒体对这次纪念仪式非常关注。EKA 也明白匈共内部对不能控制群众游行的担心变得越来越强烈。在 5 月 31 日，EKA 认识到 6 月 16 日的重新安葬仪式对他们是个至关重要的机会。在移葬前，EKA 的势力必定会增强，可一旦这一天平静的过去，匈共将重新变得强硬起来。¹⁷

争议最大问题仍然是那个非常正式的议题：谁将被授权参加圆桌谈判？选项之一是，对自由工会联盟和共产党同路人（比如共产党的工会以及爱国阵线）都授予观察员地位，另外的选项是把跟共产党一路的都纳入到匈共代表团。在 EKA 内部产生了激烈争执，有些出席者强调 6 月 16 日的重要性（凯任尼（Kerenyi），自由工会联盟）。EKA 内支持波日高伊的势力坚持在这一点上必须要对共产党人做一些让步。他们辩论道：“你不得不考虑此时他们行事的方式，”还有“民族团结先于一切”。另一方面，奥班坚持更激进的版本。他的论点建立在所谓的青年民主党和美国使馆的关系上：“我们听到一个谣传，布什不想要不惜任何代价的谈判。”

在青年民主党拒绝了以遏制其参加圆桌谈判的需求为代价换取极端布尔什维克化的费伦克慕尼黑协会（Ferenc Munich Society）

被排除在外的方案之后，斯查巴德提出了一个温和让步的建议：进行三方会谈而以众议院发言人玛塔亚斯·苏洛斯（Matyas Szuros，一个共产党改革派领袖，当时就职为临时总统）为主席。

这些方案中 EKA 和匈共双方代表之间讨论了三天（6月1日-3日）。匈共代表一开始敌意很浓，但第二天则变得非常“友好”并且要求修订前一场会谈的备忘录，而在最初的备忘录里，匈共无条件地“拒绝”了这些提议。他们还要去对备忘录进行第二次修正，改为下文：“已经提及第三方的主张。”看来此时在更高层次上，这个主张已经变得有吸引力，并且匈共希望避免让人认为这个主张来自 EKA。EKA 代表对此变化表示欣赏。在第三天，匈共提出一个宣言，宣言中说第三方参与的主意是它自己提出的。EKA 代表再次表示接受但附有一个警告：圆桌谈判的第三方对 EKA 和匈共达成的协议没有否决权。

时间对双方都很紧迫。¹⁸在 6 月 10 日，一份见证谈判开始的协议由所有相关党派进行了签署。他们同意，自由工会联盟将作为观察员和 EKA 在一起，而匈共要求出席的共同路人的参与方式则是作为谈判桌的第三方就座（包括工会的民族联合会，爱国阵线，以及慕尼黑协会）。三方都有相同的参与权，都有一个发言人做代表。议程中的主题包括如何确定民主转型期间的原则和规则以及怎样克服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战略对话。要通过谈判决定更具体的要讨论的问题。

谈判要在三个层次上展开：1，全体会议，每一方都可以在全体会议上发出公开声明；2，“政治性”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将会根据议程安排就通过的主题准备相关协议；3，专家分委员会，由工作团队组建，用来处理特殊议题上错综复杂的具体问题。

立法草案要在政府的专家介入下进行准备。符合总体协议的草案

安德拉斯·赛约

——并经由表示同意的谈判各方签署——将要提交给全体会议。在谈判有了结果后，所有会议上讨论的协议文本可以被出版。做出决议的基础是“共同利益”和一致同意。如果有细节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且持有不同意见的党派并不认为是根本性的分歧，那就在将来再寻求一致。

只有全体会议向公众开放。不时地，党派们会发布联合通报。只有谈判破裂的情况下，才能发各自的通报。

公开的全会于6月13日召开。¹⁹ 伊姆雷·孔亚（Imre Konya）代表EKA发表讲话。他强调了共产党的罪行以及1956年革命的重要，并且谴责苏联人和共产党人为镇压这次革命和当前的国家危机负责。他也强调和平地重新安葬国家的烈士们及谈判的开始代表了国家和解的起点。他指出，EKA将要就自由选举原则的基础进行谈判，并且谈判必定要保证和平转型。还有，匈共不应该被允许继续控制武装力量或者保有一只私人军队。

总书记格罗兹代表匈共指出，是匈共决定应该允许多党制。匈共已经为建立这样一个制度迈出了第一步。他强调跟“正在成型的政党”维持一致努力方向的重要性。他承认匈共对目前的匈牙利危机负有责任。

一周之后，关于重新安葬仪式上的公众游行已经清楚的显示民众对反对派势力支持的程度，此时圆桌谈判的第二轮全会召开了。利用支持EKA的力量，斯查巴德提出了更细致的要求。他坚持强调法律的首要任务是保卫自由选举。他宣称，宪法法院的建立以及总统职位的制度化应该纳入到谈判内容中。他宣布说EKA仔细拟定增强未来国会立法活动、不能侵占国会立法范围的通用原则。并且他要求关于政党

的立法要在圆桌谈判中决定，以保证各政党在选举进行前至少有三个月的独立且完全合法的存在。其他跟当前国会的立法权有关的问题也需要谈判：（1）改革刑法中涉及政治犯罪的条款；（2）制定新的信息法案，保证在选举中新出现的政党对媒体有平等的受访问权；（3）禁止使用暴力（包括对特工行为的法律限制²⁰；武装力量的去政治化，也就是说从军队和警察中取消党员身份；以及解散共产党控制的工人自卫队，这支准私人军队）。

EKA 在经济问题上的立场由伊凡·陪托（Ivan Peto，自由民主党人联盟）来代表阐述（也是他掌握）。他解释了为什么 EKA 反对把经济问题纳入议程：相信没有什么能保证经济改革成果，除非有了政治保障。他说 EKA 将不会从政府那里接手日常经济决策的责任，除非它被允许成为政府的一部分。只有在一种情况下 EKA 会赞同把经济事务纳入到议程中，那就是有清楚的迹象表明匈共及其政府正在推动的国会法案即将造成选举后经济上的既定事实。他特别提到《转型法案》，该法案对选举后的产权结构造成了显著改变。在强调阻止不可逆的立法决议的重要性之外，EKA 觉得它自己有责任缓解由于政府政策带给民众的不幸遭遇。

国家圆桌谈判

尽管对 EKA 在圆桌谈判中的角色有基本的了解，但仍然不清楚什么样的策略将最大程度使 EKA 在谈判中受益。6 月 26 日 EKA 召开一次会议专门研究工作团队和分委员会上的代表问题。尚不清楚的是，究竟应该 EKA 内每个党派都派一个代表参加分委员会还是 EKA 应该派一个总代表以便维持一个整体。从以上角度来说，托尔盖塞在 EKA

安德拉斯·赛约

会议上的行为是代表自由民主党人联盟，而不是作为 EKA 的代表。他引用了 1945-47 年的联合政府的例子，那时各联合政党都在不同的下属委员会中享有理论上平等的代表权。这样的代表权不依赖于国会中各党派控制的席位个数。这种安排使得保证进程的效率相当困难。大家都同意绝大多数党派都没有能力提供足够数目的专家服务。于是联合代表权的传统得到了拥护。

把 EKA 分开的问题很快变得明朗起来。6 月 6 日的 EKA 会议致力于解决总统制问题。尽管对此问题形成了正式解决方案（见下面），但每个 EKA 会程都在持续不休的争论中进入下一章节的讨论²¹。

支持波日高伊的党派从各种角度去努力说服其他党派接受半总统制。大家都认为大众参与的总统选举中的胜利者当是波日高伊无疑，那时他正被大众媒体高效的宣传。支持波日高伊当总统的观点一个常用论据是关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在 1989 年夏天，对反改革暗流的担心与日俱增。在苏联内部产生了严重混乱（比如矿工的罢工），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领导层都转趋强硬。未经证实的传言暗示，国会中的共产党多数人计划解散这届议会并要求提前进行自由选举，这样的选举将会证明对正在形成中的反对派非常不利。

青年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坚持认为界定总统权力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不能由现在的国会来决定。托尔盖耶斯（Tolgyessy）指控支持波日高伊的基督教民主人民党根本就不能算作一个反对党。他后来公开道歉以避免成为丑闻。

7 月中旬的两个新来者左右着 EKA。热诺斯·凯斯（Janos Kis）来自美国并成为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的领导人。几周前，安泰尔加入了匈牙利民主论坛并且立即被选进其主席团中。他也被要求参加匈牙

利民主论坛的代表团，而之前代表团由斯查巴德统领。安泰尔于 6 月 13 日加入了 EKA。他也积极参加圆桌谈判的制宪分委员会（那里讨论总统权力问题）。在一次采访中，他叙述了自己的参加情况²²：

圆桌的开放性似乎给某些实质性的东西提供了可能性。6 月之后，EKA 的角色有了改变，需要有更多的活力。对我来说，定位自己的角色挺困难的。由于我搞政治的经历和我的人际关系，也许对我来说，跟反对党派的代表建立联系比接触我们自己的代表更容易些。我更熟悉的人际圈子明显会导致跟小农党、基督教民主党人和巴耶茨协会更紧密的合作。后来造成了政治冲突，因为很明显这是造成常被人批评的国家中心主义的源头。然而我不得不强调，我没有意图对抗自由民主党人联盟或者青年民主党。我跟孔斯（Goncz）保有长期的友谊。²³

安泰尔在 EKA 的会议坚称，在国会选举前不应该举行总统选举，因为这会给共产党人带来影响力。他承认匈牙利民主论坛内部对这个职位有争议，但最终这成为多数人的意见。²⁴

关于总统选举的日期产生了无穷无尽的争论。巴耶茨—兹林斯基之友社（由薇艾（Vigh）做代表）最急切希望提前举行选举，它强调如同波日高伊和他的代表在圆桌谈判中所做的，总统角色的重要性在于转型过程中能提供急需的对稳定的保障。波洛斯（Boross，独立小农党）争辩说，只有在选举后，总统职位才能给予共产党人，这应该作为谈判筹码。他强调波兰反对派的策略应该被颠倒过来。7 月 14 日，进行了一次正式投票，这是 EKA 内部一次影响深远的事件。匈牙利民主论坛的动议被接受了，但有两处被去掉。安泰尔的提议是，总

安德拉斯·赛约

统职位的规定应该立即制定出来，但是总统应该在国会选举之后再选举产生。众议院议长应该以有限的权力出任临时总统。安泰尔在圆桌谈判中强调了“准连续”的概念（托尔盖塞借用了这一概念，他作为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的专家，在8月10日完全接受了这个概念作为“匈牙利人优秀老传统”）。安泰尔相信，1946年的共和国总统的有限权力模式应该得到恢复，并且应该尽快用以支持塑造宪政体系。这和他早先的立场相反：安泰尔在起草一份早期（1989年春）的匈牙利民主论坛建议书时起了不少作用，该建议书倡议提前进行制宪大会选举。

到了8月，匈共给出了一份非正式的提议：为了交换对波日高伊的总统职位的接受，匈共将解散工人自卫队。然而应该说明的是，很可能是通过波日高伊的影响，圆桌谈判的议程才拓宽到把解散工人自卫队包括进来，把这作为保障和平转型的措施之一。（工人自卫队是旧话语体系中的精髓并因此是格罗兹的天然盟友。）

尽管对总统问题上有了正式立场，但这个问题还是讨论来讨论去。有些人否认正式决议已经做出，并且认为对“各党对EKA决定需一致同意的承诺”的含义总体上并没有达成协议。自由民主党人联盟马格亚（Magyar，受斯查巴德支持）拿出签署的一致同意的协议文本，并且在某些场合甚至拿出录像带来试图澄清谁说了什么话。巴耶茨—兹林斯基之友社和匈牙利人民党则争辩说，各党保有接受党的领导人发布新命令的权利，并且新的情况很可能出现（也许确实如此），因此“我们不能成为一纸协议的囚徒”。

由于在总统问题上的紧张度持续升温，EKA在其他重要的议题上出台其政策相当缓慢。在国会选举分委员会要举行预定会议前五天，EKA成员们还没有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代表匈共的政府专家在圆桌

谈判中一再指责 EKA 阻碍议事和不做准备。后来由安泰尔提议或梳理出一个对 EKA 各党派以及匈共都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尽管这个方案在其他场合已经提起过。他建议国会选举制度应该由市镇选举的个人和党派名单指定的代表混合而成，两个程序各产生一半的选举席位。

“历史上的”诸政党支持名单指定制度，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党派名称的吸引力。结果是，他们想要在名单基础上决定的席位至少占三分之二。共产党人则倾向于个人的市镇选举，因为他们党的名称看似没有吸引力，但他们拥有曝光率很高的人。自由民主党人联盟，部分是受到青年民主党支持，赞同市镇选举的个人席位占多数，但这将给地方上的共产党反对派联盟以更多机会。他们也反对那时设置 5%得票率的议会席位分配门槛线。后来在 1989 年 10 月 30 日出台的选举法中（第 34 号法案），也就是说在许久之后的阶段，4%的门槛被接受，并且大约一半的席位被分配给市镇选举的个人。

EKA 于 6 月 24 日再一次进行了正式投票。这次投票结果很勉强（最后计票：一票[独立小农党]反对个人的市镇选举，另有三票弃权）。匈共的态度转向安泰尔建议的五五划分；然后这问题到 8 月 10 日再次被提出。尽管一些 EKA 党派互相谴责对方利用大众媒体，总的倾向还是接受安泰尔的国会选举妥协方案。²⁵然而在 EKA 内部，关于总统选举的争议并没有平息。EKA 党派强调他们所作的所有承诺都是有条件的，并且依赖于他们各自的党内领导人。安泰尔在 EKA 会议上坚持的主张如同在圆桌谈判的分委员会上一样，只有一个自由选举的国会才能决定新的总统如何选举产生——尽管这个方案将需要全民公决通过才能生效。EKA 的参与者关于这个问题使用的论据集中于“顽固”的后果。论据在于，EKA 持续的抵制总统选举将会导致圆桌谈判的崩

安德拉斯·赛约

溃。问题是，谁将为此崩溃负责？凯斯（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再三辩论道，必须要给共产党一些东西，但只能在选举后。另外，他使用国际关系（苏联的反应，波兰的进程，美国的利益）来进一步论证他的立场。

尽管在选举问题上，EKA 内部和圆桌谈判都陷入了僵局（EKA 代表在圆桌谈判中继续寻求一种不妥协的立场），但其他的分委员会却取得了可观的进步。这尤其体现在对重新起草刑法条款（政治犯罪）负责的分委员会上。这个分委员会成员来自于同一个专家团体，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内务刑事法典起草委员会”上成功合作过。他们接受了邀请，作为需要专家的不同组织的代表参加圆桌谈判；他们的参与没有对邀请方的强烈感情忠诚。关于经济问题的分委员会没有取得进展。虽然 EKA 没有在经济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它的各党派都认为所提议的政府政策是不可接受的。要不然，EKA 的背书将已经成为反对派的妥协方案。官方的工会代表正在寻求独立自主的形象，他们对政府尤其挑剔，最后他们离开了谈判桌。

整个进程让人感觉太缓慢了。高层次的决议尚未做出，有些人开始想要休暑假了。一直到 9 月 4 日，全会才得以继续。全会一开始就受到共同的批评，因为“不公平的”使用了媒体。EKA 强烈反对总书记格罗兹承认极左的慕尼黑协会，那个团体似乎接受了民众投票的原则，但是仍然坚持工人武装自卫的权利。波日高伊代表匈共批评了 EKA 的反共论调。（9 月 8 日的全会上，再一次开始就由波日高伊表达了对反对派不公平使用媒体的担忧。）

争论一上来就集中对匈牙利作为一个国家的价值中立的宪法定义。匈共一再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应该在文本中提及，

并且“对社会主义和市民 [小资产阶级] 价值的宪法支持”应该被写进去。托尔盖塞希望两个引用都被略掉。波日高伊讲到群众对不在宪法提社会主义会有的担心；奥班反驳说社会主义吓坏了数百万匈牙利人。波日高伊提供一个妥协版本，而斯查巴德给出了另一个。斯查巴德的版本是“国会宣布匈牙利是个自由独立的法治国家，并且匈牙利和欧洲文化价值、市民民主价值以及民主社会主义价值同时有效，以非排他形式并存。”波日高伊发现斯查巴德的版本是可接受的，并且提议这个议题由专家们的分委员会进行专业性起草工作。专家组成的分委员会接受了波日高伊的提议，这个提议来自司法部煞费苦心拟定的宪法草案²⁶。应该另外说明的是，每次当 EKA 认为某个问题在政治上不重要的时候（也就是说，对于将来的政治权力并不关键），EKA 通常会接受来自司法部的宪法性建议。这种接受部分原因是没多少利益关系，部分原因在于缺乏起草必需的知识，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其最初的立场，这个立场把 EKA 的责任限定在几个特定议题中。

9月6日的全会讨论的主题是关于政党。在这个问题上，EKA 有一个紧密团结的平台。匈共希望通过允许所有政党在工作场所建立地方分部来体现政党平等。匈共倾向于一个无所不包的网路。EKA 的立场是使工作场所都非政治化，包括军队和警察。匈共代表费替辩论道：许多西方国家没有禁止政党活动的规则，而 EKA 则反复强调匈共已经承诺要放弃它自己的事实上的垄断地位。EKA 警告说所有维持现存垄断的努力都将减少达成协议的机会。波日高伊采取了令人惊讶的鲜明立场，他说匈共从工作场所的退缩是根本不可能的²⁷。应该加以说明的是，政治局在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准备的材料中，反复申明它自己致力于维持工作场所的组织。在这个时刻，仅仅在党代会召开前几周，

安德拉斯·赛约

地方组织以及和政治控制相关的体系仍然看似代表了共产党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尽管这时民众已经离弃匈共。

进一步的辩论是关于匈共的财产。玛塔亚斯·扎萨卡利亚 (Matyas Bdzsaklia) 是匈共代表团的另一个成员，他反复告诉 EKA，党将要在其代表大会上通告党的财务状况。党准备好了拿出一些财产（建筑物）给政府，这是为了给新的政党提供办公空间²⁸。波日高伊指出，匈共财产问题不是需要经过协商同意的谈判议题，并且费替补充说，反对党应该有必要的进行活动的钱。匈共从分配的补贴预算中拿出了五千五百万匈牙利福林。EKA 对此的反应令人沮丧。EKA 发言人裴托 (Peto) 称，没有必要在此刻同意这一点，因为协议在不少其他问题上也都含糊不清。这就再次反应了 EKA 的战术：它计划在最后做出让步，作为回报得到关键问题上的同意。

这个手段得到 EKA 内所有党派的赞同。然而在某个特定问题上，他们不得不先就什么是最终可接受的让步达成内部一致。现在这个关键问题就是总统选举的时机。安泰尔继续在专家分委员会倡议他的“国会选举总统”主张，该主张多少在 EKA 内得到一些赞同。一些反对派团体把这个主张理解成一个战术性解决方案。匈共则坚持总统选举应该尽早举行。这个问题在中层谈判中提了出来。EKA 不得不做出一个政治决策，这就重启了争论。至少三个反对派团体支持在国会选举前全民选总统（实际上，他们接受波日高伊作为总统）。9月9日那天，KEA 再一次避免做出决定：它同意这个问题作为谈判筹码的一部分保留其开放性。尚不清楚 EKA 是否将接受匈共的提议以换取进一步的让步²⁹。

9月11日全会的结果再一次导致匈共和 EKA 的对抗。匈共坚持

提前进行全面投票的总统选举。他们的让步是（1）放弃主席团制以及（2）举行全民投票选举一位新总统（他们本可以通过听话的国会的程序选举出总统的）。

托尔盖塞，引用卡尔·马克思的话辩论说，按照匈共程序选举的总统将会受到“波拿巴主义”的诱惑。不过波日高伊和安泰尔迅速同意总统职位的权力将像 1946 年宪法中的总统一样受到限制。

这次，安泰尔的匈牙利民主论坛和支持波日高伊的 EKA 党派明显地至少某种程度上跟波日高伊达成了事实上的妥协。波日高伊和安泰尔承认他们在定期会晤。在波日高伊看来，他们俩关系非常好，并且安泰尔给了他关于 EKA 内部争论的相当细节化的情报。安泰尔则否认了他给过这样的情报。³⁰跟 6 月一样，时间再次紧迫起来，但是这次是两方都感到了压力。匈共的党代会只有三周就要召开，还不清楚格罗兹和他的保守派核心是否能拉拢到多数。

9 月 15 日，安泰尔在 EKA 会上宣布，已经没有时间可供拖延了。类似的，在匈共党代会召开前三周，匈牙利民主论坛和它的支持者如果想加强波日高伊在党代会上的地位，也没有更多时间可以浪费了。同样清楚的是，匈牙利民主论坛准备接受波日高伊的程序，而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和其他党派则不然。这节骨眼上没有谁努力去说服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匈牙利民主论坛代表们的精力集中在寻找一种能够导致和匈共签署协议的程序。斯查巴德建议少数派应该签署，同时附上详细说明了保留条款。奥班继续警告匈牙利民主论坛和它的合作伙伴不要做让步，因为匈共将会立即理解成 KEA 的虚弱。提卜·巴兰亚（Tibor Baranyai，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提前的总统选举是在重复波兰的错误。自由民主党人联盟，青年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人同意他

安德拉斯·赛约

们不会否决协议，然而他们也不会签署它，并且他们还会公开阐述他们的不同意见³¹。少数派（自由民主党人联盟，青年民主党，自由工会联盟，社会民主党）同意其他党派可以代表 EKA 签署协议以保存圆桌谈判的成果。³²

尽管圆桌谈判在 9 月 18 日的协议之后仍在继续，EKA 却永远失去了团结。³³ 在签署协议时，斯查巴德强调 EKA 内部原则上的团结仍然存在，但是这话的意图仅仅是给公众做个姿态。协议里根本没有提到总统选举的问题。协议中说，宪法修正案，如所同意的，应该由国会通过，并且其它草案（关于宪法法院，政党的职能和财政安排，选举法，以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应该由政府提交给国会。圆桌协议中还说，对新政党的资助将来自政府，政府将根据公正报道的原则和“国家媒体”³⁴中的信息，允许财政上提供覆盖他们竞选用的经费。另外 9 个待起草的法律列表也被添加进来，但是只有其中少数领域是受协议规范的，这些规则总的来说要由新的立法过程来决定。值得一提的是，工人自卫队的解散是协议签署 20 天后匈共崩溃的后果。

余波

协议签署不久，匈共的党代会产生了一个未预料到的重大变化：匈共被宣布停止活动，而社会党则脱颖而出。然而波日高伊并没有当选为新党的主席。就像结果表明那样，该党没有能力维持其前身匈共党员们的成员身份。权力真空产生了，尽管这一点还没有立即引人注目。人们期待几周内前匈共的大部分党员会加入有改革思维的社会党

——尽管它由于内部领导权斗争仍处于瘫痪中。甚至国会中议员，最初都是被挑选的极其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其大部分也没有加入新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成为令人惊讶的活跃力量。出于对即将到来的1956年革命（引自那时的叫法）纪念日的民众游行和秩序失控的担忧，政府推动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国会对有关选举法的问题表现了些许抵制，因为议员们希望有更多的市镇个人选举以便增加他们再次当选的机会。他们取得一个小小的胜利（结果是个人席位增加了15个）。宪法修正案几乎没有经过讨论，一个小时内就被接受了。

宪法修正案改变了整个宪法文本（大概95%的词语是新的³⁵），但是还有些问题悬而未决。甚至国家的名称也改变了。10月23日，为了平息示威者，匈牙利共和国的名称公布了。因为没有什么代表共产党的势力进行抵抗，政府在争取民众支持的努力下，匆忙满足了更多激进反对派的愿望。工人自卫队被解散，军队和警察被宣布非政治化。甚至匈共财产也宣布接受公共审查。然而，最初的协议并没有被履行。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和青年民主党成功的发起了一次反对直接总统选举的民间倡议。结果关于总统选举的法律没有通过并且宪法修正案不得不把这个选举问题留给视“关于公决的全民公决”的结果再决定。在社会民主党和独立小农党的支持下，新的“反即刻选举力量”于11月26日取得勉强的胜利³⁶。

国会的自由选举于1990年的3月25日举行。匈牙利民主论坛作为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以及独立小农党的联盟的一部分，组建了以安泰尔为总理的政府。³⁷然而为了修订宪法，所有关系到基本权利的情况都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本来是为了保护反对派及其价值，因为EKA那时不相信它会在选举后占有多数。这样的比例如果没有自由

安德拉斯·赛约

民主党人联盟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1990年5月，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的领导人同意了安泰尔的许多宪法修正条款。由于除了有个法定人数（三分之二多数）限制外，没有修订宪法必需的特别程序，宪法在11个月当中至少修订了12次，并且1989年文本的大约25%已经被修改或者在没有任何希望整合进宪法体系的情况下被废除。

评估

选择参与者（EKA）

EKA会议上的EKA代表通常由他们自己的党派挑选。所有参与组织3月15日独立游行的团体都被允许加入EKA。选代表的标准是：党派内的高层，能出席，以及职业技能。代表团的组成人员由于其党内的剧烈变化经常跟着变动。一直以来这种情况影响着所有党派的地位的改变。

匈共的代表则是由匈共政治局提名，选择结果依赖于格罗兹集团（保守派）和波日高伊集团（改革派）之间的竞争。中层的和技术性的预备性会谈留给匈共统治集团的官僚体系，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专家。

可信的威胁（EKA对阵匈共）

在圆桌进程的开始，匈共似乎掌握着大部分行政管理权（警察），信息和专家资源。反对派的资源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他们宣称要成为1956年革命的继承人并且要表现出反对共产党政权的坚定立场，这个政权已经被判定为对国家的经济和道德混乱负责。因为内部倾轧

以及引入更多的法律限制，匈共在圆桌谈判期间丧失了一些权力；然而就技术能力和经济资源来说，它在谈判期间一直占优势。由于来自改革者的批评日益增多，匈共丧失了更多的合法性，它的弱点越来越明显可见，而大众媒体对党的忠诚度越来越低。

两方都威胁要退出谈判并且/或者要公开指责对方阻碍谈判。EKA在预备性会谈阶段成功地使用了匈牙利媒体和国际压力³⁸。它成功地发出了5月12日的最后通牒，它在通牒中坚称谈判应该在48小时内得到恢复。来自EKA的压力导致了一份关于政党的草案被撤回。当时间慢慢流逝，很明显什么也没有发生，匈共的地位和声誉降低了，因为它是设置谈判条件的一方。当波兰的圆桌谈判有了成功结果后，这里的缺乏谈判变得更加令人不安。

对民众游行从来没有提及，尽管谁都明白6月16日和10月23日的游行中，反对派将会处在指挥民众的位置上。自由民主党人联盟代表EKA，至少在另一次至关重要的场合成功运用了媒体。匈共对其财产问题的不灵活态度造成的僵局至少被自由民主党人联盟传出的耸人听闻的匈共操作私有化的故事缓解了³⁹。

最近的有效（非象征性）威胁或压力是召回国会成员，而国会主要是青年民主党在操持。匈牙利议会制度那时是根植于直接民主的某些因素。国会议员通过选民的召回投票可以被召回。为了能够召回，必须要在特别的请愿书上收集签名以便发起召回议员的地方投票。青年民主党活动家挨门挨户的做动员，并且成功做到了五次召回。国会发言人也被召回了。共产党议员对此行动感到特别不舒服。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这个行动被停止。

没有证据表明匈共曾经提到使用武力，尽管在某些场合格罗兹在

安德拉斯·赛约

谈判之外发表过可能被解读成威胁的公开讲话(提到对慕尼黑协会的支持,该团体据称如果必要就支持工人自卫队的利益)。根据从格罗兹身边的高参传出的话,戈尔巴乔夫可能已经早在1989年2月在莫斯科就告诉过格罗兹,苏联将不会进行武装干涉。这能够解释共产党强硬派的垮台。在1989年5月,匈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大家都知道了苏联对匈牙利离开华沙条约组织并不反对。当然,匈共常用的一个论调是“我们不应该挑衅”苏联⁴⁰。在对东德难民开放边界后,显而易见的是苏联保持了克制。尽管外长吉乌拉·洪恩(Gyula Horn)不承认,米克罗斯·奈麦斯(Miklos Nemeth,总理)暗示了事先问过苏联关于开放边界的事,而他们没有反对,这就清楚的向匈共领导层说明了苏联的立场⁴¹。

最可信的匈共威胁是关于国会的活动。在圆桌谈判的预备性会谈的不同阶段,加速立法进程的危险数次被提及。⁴²“独立的”国会行为可能会导致并不激进地走向宪政。它可能会更好的维持匈共的地位和现有的政府官僚体系,并且它可能会减少转型过程中反对派的重要性。要是事态那么发展的话,就会对反对派的受欢迎度以及合法性给以沉重打击。一个类似的威胁来自匈牙利民主青年团(Demokratikus Ifjusagi Szovetseg),这是个继承共青团运动的组织,而共青团想塑造一个改革形象。在8月中旬,它发起了一个运动,想动员民众支持举行总统选举。这个行动被EKA宣布为是对原有协议的破坏。这样的民粹决定可能会造成在圆桌会谈之外的决策机制。波日高伊迅速取消了这次行动。

匈共的其他战术武器集中在分裂EKA。这种战法在预备性会谈时期一直使用着;当情况改变时,这导致了EKA的温和派和匈共改革派

之间达成妥协。

可信的威胁（EKA 内部）

在 EKA 内部，博弈围绕团结问题展开。团结被理解为运动合法性的重要源泉以及 EKA 的主要武器，因为它受到的大众支持很少。公共调查问卷显示，反对派的形成几乎不为人知，尽管就像在伊姆雷·纳吉的葬礼上的游行所显示的，他们有能力动员相当多的群众。更重要的是，在报纸和电子媒体节目对反对派成员的访问与日俱增的那一年，反对派的知名度提高了。反对党的典型威胁是退出圆桌谈判，这可能自动终结谈判。很难相信，一些更有影响力或更有信誉度的团体将会以它们自己的名义进行谈判。团结被看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民族利益”这个便利伞和简单正确口号下，它体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全国一致。也许他们更想塑造出独立的反对温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潮流的形象，这个潮流受到安泰尔⁴³以及波日高伊的民粹主义的支持。通过让匈牙利民主论坛参与和共产党人的协议，激进派继续保持他们强硬的不合作传统。

圆桌谈判妥协方案对宪法的影响

因为协议没有得到所有反对派力量的赞同，妥协方案中的某些内容没有被接受并且在决定总统选举方法的全民公决中被修改。整个协议是出于如下坚定信念：协议必须致力于在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之间维持精心的平衡。在选举之后，这个预想证明是错误的，圆桌谈判精心制定且整合进宪法的保障体制变得陈旧过时。

圆桌谈判采纳的措施中排除了起草一份有持久性的宪法：这把宪法降级成一系列临时性举措。圆桌进程排斥制宪大会的选择，那时制

安德拉斯·赛约

宪大会对反对派似乎显得过于冒险。结果是，修正案丧失了合法性，因为这些修正案明显是由非选举产生的“代表”团体制定的。甚至如果一个人承认 1989 年的修正案由于圆桌谈判协议获得了一些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又因为全民投票和轻易改变而受到了损害。除了法定人数之外，对宪法修正案没有其他专门的限定规则，这就把整个问题转化为一个数量问题。宪法因此很容易被错误理解成一个多数人意志问题。一时的政治妥协可能升级成宪法“原则”这个传统保存了下来，尽管这个传统并不是圆桌谈判产生的政治教训的后果。这个传统产生的部分原因可归于这个国家总体上缺乏宪政文化。在谈判桌上充满了对历史连续性和国家所受苦难的辩词，同时也伴有对公共暴力的实际恐惧。经典的宪法辩论或原则很难产生什么影响力，就算有也仅仅是用来作为政治修辞。在宪法法院的角色和重要性上，曾经达成了一致，但是几乎没有进行什么努力来把法院放置在权力制衡安排的这个背景下。几乎没有人把注意力放到宪法的措词等问题上。

圆桌谈判的遗产也许在宪法问题之外。对新的政治精英它起到了预科学校的作用，并且对参加圆桌谈判的现在这些政治人物提供了某些合法性。在那这种意义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暗中自诩国父的角色，但是他们的遗产几乎没有什么能够保留下来。

圆桌谈判中 EKA 采用的程序

对于圆桌谈判前建立程序规则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人懂得，然而大部分会谈却是集中于程序问题⁴⁴。一直就没有如何决定派出代表到 EKA 或者到圆桌谈判的标准。根据经验证据，在匈共决定其代表团组成时，使用了反应实际权力平衡的特别方法。选派代表的程序上的选

择并不让人感到很重要，因为代表团并不是经过民主选举的选民代表。普遍性的看法正好相反，名义上，那些代表都不是选举产生的。

有个共同理解是，圆桌谈判的决议是各方共同同意的。理论上，EKA 内部决定是全体一致同意的。但另一方面，匈共内部是多数决定的原则。对于一个甚至更重要的决策问题我没有可靠的数据：匈共决议的参加者符合什么标准？正式情况下，大多数决议都必须要有政治局做出，但仍然不清楚的是，什么样的决定要交付政治局，什么样的决定要留给谈判团队。

由于代表团感觉他们不是人民代表，他们（特别是 EKA）拒绝为将来的立法设置程序，除非是决定立法机关选举的方式和方法。

最后评论

政治形势和圆桌谈判的目的都使人觉得这些谈判非常接近于所描述的“无知面纱背景下的讨价还价”模型。当时有着无尽的不确定性，有种感觉是，当局者还没有准备好把无知之幕作为博弈的条件来接受。匈共和 EKA 的一部分党派都把一种特定结果接受下来，那就是波日高伊一定会当选为总统。另一方面，总体上存在一种设置程序规则的不情愿，这种规则本可以提供公平的解决方案而不管谁将赢得选举。结果是，反对派坚持要求一定要有超级多数(qualified majority)才能有立法权。一旦反对派团体赢得了选举，这反倒成了他们赞同要改变的第一个规则。就涉及的党派来说，对政治角色的理解并不是要制定宪法。相反，他们对自己角色的理解是对短期决策的延续。圆桌会议的参与者对于社会接受性并不感兴趣，从这个意义来说，圆桌谈

判并不是一个实际的制宪大会。

很长时期以来，EKA 明明白白的相信，要想让反对派团体被社会接受，需要一个长期的社会学习的过程。选举被认为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反对派取得迅速胜利的必要手段。关于选举法（除了保障自由选举意志之外）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要建立形式上不是偏向于某个党派的制度。其他许多问题上没有什么兴趣，包括关于选举多数的技术问题。这种缺乏兴趣，像其他许多领域的未解问题一样（从人身保护令到旅外匈牙利人的投票权），导致了法律的无原则性的且持续不断的变化，并且是造成任何宪法的合法性都受到损害的原因之一。

注释

¹起初，还不清楚总统将没有实权。卡达尔自己那时最终病倒，身体状况不允许再积极参与。他的健康恶化是对党的领导能力的重要冲击。

²匈共中央委员会在 1988 年 7 月 13 日到 14 召开的会议上组建了一个宪法准备委员会。库尔沙（Kulcsar）有力地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宪法法院被设计成在新的法律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匈共中央委员会的官方职责是创建“社会主义”法治。1987 年波兰组建了一个宪法法庭，这被看成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人们的总体看法是这样的尝试不过是共产党人找回面子的举动。

³在一次杂志采访中（Kurir, 1990 年 8 月 11 日），波日高伊宣称，他原来没有意识到 1956 年后镇压的残酷性，一旦他看到了关于 1956 年事件的文件（也

就是 1989 年 1 月) 他就立即说出了真相。

⁴3 月 15 日是传统的纪念 1848 年反奥地利革命的国庆日。共产党人长期以来操纵庆祝仪式，而年轻人——尤其是布达佩斯大学的学生从 1972 年开始——传统上一直试图把庆祝仪式变成一个进行支持独立的示威游行机会。在 1989 年，匈共试图把庆祝仪式变成演示国家团结的大会。反对派力量（除了社会民主党人）拒绝了此提议并组织了他们自己的集会。尽管在游行中有反对派力量的竞争势力，但是媒体（电视）转播清楚的表明反对派能够比共产党动员更多的人。

⁵卡尔曼·库尔沙 (Kalman Kulcsar) 是实用主义者格罗兹和改革主义者奈麦斯领导下的两届政府的司法部长。据他说，反对派过高估计了匈共的力量。由于这个错误，他们接受了匈共作为谈判的伙伴，而不是以政府为谈判对象 (Magyar Nemzet, 1993 年 10 月 16 日, 15)。库尔沙在 1988 年就已经开始了宪法改革。

⁶反对派的主要分裂和匈牙利政治文化中的一次历史性分裂有关。早在三十年代就有“都市精英”和“底层大众”两个相反的运动 (nepi 翻译成德语最贴切的是 volkisch, 民意)。前者是亲西方的并且是由犹太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产文化人士组成。后者强调“第三条道路”，并且对国家的普通百姓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价值观感兴趣。

1987 年一些反对派知识分子在拉基泰勒克组织了一次半秘密会议。组织者拒绝邀请那些更为激进的异议人士，这些人被匈共政治局成员波日高伊认为是麻烦制造者。1987 年底那些日子波日高伊支持拉基泰勒克会议以及整个民粹主义运动，或许这是他向党中央施加压力的努力的一部分。

⁷安娜·里希特 (Anna Richter) 作为律师之一，已经编辑了一本关于圆桌反对派的书。该书有一部分是访谈集。

⁸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在 1988 年建立，是一个反对派联盟，包括了地下刊物出版社。准备于 1989 年 1 月的自由民主党人联盟政治纲领抵制了转型前先制宪的主张，也反对在制定法律以利于和平转型的期间限制立法机关的任务。

⁹此法学院举办了许多类似会议，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部分是由于卡特琳·孔亚（Katalin Konya）女士的缘故，她是独立法律人论坛的另一个创始人，也是这个学院的副教授。其他会议在一间属于拉萨罗·扫里穆（Laszlo Solyom）教授所在系的学术讨论室举行，他是 EKA 新涌现出来的发言人之一。

¹⁰匈牙利民主论坛于 1988 年宣布它自己是个独立的组织，既不支持政府，也不支持反对派。它不情愿的把自己的性质定位于社会运动，并且努力确保沉默的大多数的支持。在 1988 年底，它的成员有一万两千人。只有到了 1989 年 3 月，它才把自己刻画成一个反对派政党。

¹¹匈牙利人民党受到青年民主党主席维克多·奥班的指责，说它被匈共赋予通过抵制普通职位以打击 EKA 的任务（马盖亚·黑莱普（Magyar Hirlap），1990 年 9 月 27 日，5）。

¹²自由工会联盟建立于 1988 年 5 月 14 日，是第一个公开的独立组织，因此享有盛誉。

¹³当不同团体都宣称是社会民主党的合法代表时，EKA 宣布除非他们之间达成协议，否则就不会接受他们的代表。5 月底，基督教民主人民党被承认。独立党是另一个历史性政党，它没有被承认，这是因为它不能证明有支持自己的人群。基督教民主人民党成员（由前国家检查员提卜·福泽斯（Tibor Fuzessy）来代表）赞同波日高伊当总统作为稳定的保障。不过，他们忠于安泰尔，安泰尔跟他们有很强的个人关系。

¹⁴报纸报道说，一个支持改革的秘密共产党员组织新征途阵线（Uj Mariusi Front）在政治局委员热斯索·奈耶思（Rezso Nyers）的领导下，拒绝了参

加圆桌谈判预备性会谈。这被解读成一个可以效仿的模式，并且作为不参加会议的借口。

¹⁵在一个场合，奥班提醒斯查巴德说“但是， Gyuri 大叔[斯查巴德]，我们不能告诉他们什么能使我们更高兴。”

¹⁶匈共的控制得到政府承认，尽管到了6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况不再如此。那时政府公开宣布，它对国会负责而不是对党负责。

¹⁷斯查巴德。

¹⁸6月16日前达成妥协的需求如此急迫，以至于EKA6月4日在一间私人公寓开会而不是在大学里。

¹⁹ EKA 成员倾向于6月14日，因为和美国大使的会见安排在6月13日。

²⁰在谈判期间，对特工的限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1989年12月，自由民主党人联盟拿到的证据显示内政部仍然在进行非法窃听。在这起丑闻后，在没有引入正式法律制度进行控制的情况下，绝大部分授权特工活动的规定都被宣布为非法。

²¹我对有关总统职位争论的叙述是基于6月13日，21日和25日，还有9月4日，8日和15日的KEA会议。圆桌谈判的全体会议在9月6日，8日，11日和18日召开。

²²安娜·里希特(Anna Richter), *Ellenzeki Kerekasztal* (布达佩斯: Otlet Kft., 1990) 158。

²³阿帕德·孔斯(Arpad Goncz) 是自由民主党人联盟的杰出成员。在1990年，取得胜利的匈牙利民主论坛(43%的选票)和自由民主党人联盟达成一项妥协：作为接受宪法修正案的交换，安泰尔作为总理，接受Goncz成为权力有限的总统。

²⁴在安泰尔获得对匈牙利民主论坛的控制权之前，该党有一股很强的支持波

日高伊的势力，包括匈牙利民主论坛前主席柏洛（Biro）。

²⁵安泰尔和波日高伊都似乎在为他们的联盟工作。

²⁶在9月1日，宪法草案提交给了匈共中央委员会。宪法修正案的第二节第一款（如同1989年10月那版）声明说“匈牙利共和国是个独立的民主宪政国家，中产（西方类型）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就都占主体。”在选举后，多数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少数派都赞同取消所有条款里的“社会主义”。第二节第一款在1990年6月19日修改后如下：“匈牙利共和国是个独立民主的法治（宪政）国家。”

²⁷波日高伊宣称，进行谈判这个事实就相当于履行匈共的诺言：“谈判意味着和平转型。”

²⁸起初，匈共代表看似在这个问题更灵活。然而在6月26日，他们改变了态度并且宣称，匈共在过去的45年中合法的获得了它的财产，并且这方面只对它的党员负责。这种变化导致了僵局。一个分委员会8月21日召开的会议无果而终。8月26日，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向公众通报了匈共在财产问题上耍的花招。党产被变形为党拥有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被委托给匈共成员。这样的公司不对公众开放其资产经营情况。为尽量减少这种反公有化带来的信誉损失——或者采取反对这种趋势的立场——波日高伊马上许诺匈共将在年底前解散其在各个工作单位的党组织。他在政治局遭到驳斥，政治局拒绝就此重大问题作出承诺，暗示说这样的决策职能要通过党代会才能做出。

²⁹总的来说，并不总是能搞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决定：除了技术问题，EKA代表通常得不到明确的指示。

³⁰马盖亚·黑莱普，1990年9月27日，5。

³¹在签署9月18日协议的时候，托尔盖斯（Tolgyessy）作为非签署者发言人，再一次控告匈共试图操控权力。波日高伊则在令人困惑的讲话中，表达了对

其被指控误导人民的惊讶。他说因为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已经利用了“舆论胁迫”，人民将会感觉到统治秩序的混乱。他宣称，是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和青年民主党不受人民信任。波日高伊的言辞总是基于民粹主义。应该加以说明的是，其他党派也一样，对由于联合行动而使他们的形象暗淡下去很不满。参看伊斯塔凡·普利朴（IstavanPrepe，独立小农党）在 Richter 的演说 *Ellenzeki Kerekasztal*, 191。

³²出于要努力表现独立立场，先前的秘密共产党人控制下的工会退出了谈判，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上的谈判没有反应工人利益。

³³谈判在分委员会层次还在继续进行，但没有产生重大结果。

³⁴独立且公正媒体（电视和广播）委员会在选举期间一直在匈共（后来是社会党）控制下，但是它很难影响媒体作为个体对反对派的同情。这种宪法解决方式的不足反应了协议签订的仓促性。

³⁵这些变化被打包进一项修正案里，原因是 1989 年全民公决法规定，宪法必须经全民公决才能通过，而当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进行一次全民公决。国会本可以修改法律来要求一次全民公决，但是 EKA 和政府方面的专家都认为制宪过程已经完毕。

³⁶匈牙利民主论坛没有明确的立场，这是因为它担心仍旧跟共产党有联系会受到损害，而共产党人仍然希望波日高伊直接当选。最终，匈牙利民主论坛号召它的支持者们投弃权票。这个决定给了自由民主党人联盟方的势力一个胜利的机会。

³⁷一些原来支持匈牙利民主论坛和支持波日高伊的力量（特别是匈牙利人民党和巴耶茨—兹林斯基之友社）得到了不到 1% 的选票。

³⁸自由工会联盟在波兰圆桌谈判期间直接联系过团结工会并要求得到正式建议。建议是依靠媒体。波兰电视台每天晚上播放一个关于谈判的特别节目，

这就给了公众熟悉团结工会的观点和代表的机会。在圆桌谈判的第一周，EKA 提议每个星期进行一次电视讨论。这个主张立即被波日高伊否定，他说匈牙利人民的政治文化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小时的纯政治事务。出版社得到一项许可，包括新闻记者被允许参与中等层次的谈判，但是大多数记者发现参与的会谈没有新闻价值。

³⁹见注释 28。

⁴⁰波日高伊后来说，罗马尼亚和东德的共产党领导层给匈共发送了威胁信息以及“苏联的敌意性沉默具有瘫痪性效果”（很可能是对匈共）（Magyar Hirlap, 1990 年 9 月 27 日，5）。据库尔沙所说，没有就开放边界征询苏联意见，但是政府那时已经不再害怕苏联会干涉（马盖亚·尼姆茨特（Magyar Nemzet），1993 年 10 月 16 日，15）。

⁴¹库尔沙（马盖亚·尼姆茨特，1993 年 10 月 16 日，15）说唯一的恐惧时刻是在天安门屠杀时。

⁴²晚至 1989 年 8 月，作为匈共专家出席了宪法分委员会的司法部副部长以其副部长身份发表了一个演讲，把草案提交给国会“刻不容缓的立法行动”。这可以被视为一个威胁。

⁴³安泰尔创造了一个概念：温和的国家政治塑造，而且赢到了最后。有了上面这个立场决定之后，更激进的团体就被置于极端的立场上。

⁴⁴这一节的评论受到热耐·埃尔斯特（Jon Elster）的启发，“生而不朽：制宪进程”，Cooley Lectures 出版社，密歇根大学法学院，1991 年 4 月 15-17。

第三章 民主德国的圆桌谈判

乌尔里希·K·普罗伊斯 (Ulrich K. Preuss)

引言

政治制度史专家将可能找到许多和 1988、1989 年间东中欧的圆桌谈判非常像甚至完全一样的先例——它们在共产政权向宪政转型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初看起来，圆桌谈判似乎没有什么，仅是相互竞争的精英之间权力分配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集体讨价还价的过程可以被视为一个圆桌谈判。与此不同，我在本文认为，1989 年 12 月决定进行的民主德国的圆桌谈判，一方面是一个特别的、虽然不是独一无二的“权力精英”安排，另一方面也是我所称的“道义精英”的安排。¹ 目标不是分享权力而是把权力文明化；不是为政治目标和社会利益而使用权力，而是首先把它转变为一个

合法的政治资源；不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而是让权力服从于规范的原则。这个相当新奇的经历挑战了传统的政治行为方式（尤其在革命时期）。我在本文对民主德国圆桌谈判的发生和运作的叙述，聚焦于这个建制的宪法方面。它是我们熟悉的宪法技术集成库的一个创新性的扩张吗？它是一个前后一致的制度性设计吗？它是仅在革命转型期间起作用，还是一个能够处理日常政治问题的合适工具？下面的叙述不会给出这些问题的明确答案，而更倾向于提供一些给更深入分析探讨留下空间的信息。²

民主德国“和平”或“温和”革命的关键特征之一，是倡导者对宪政的强烈信仰。宪政国家（西方意义上的）是他们的基本政治目标。虽然宪政的最终实现意味着政治的甚至社会的革命，但是他们不想把宪政推迟到“革命以后”。他们希望使用宪政的或者至少与宪政国家相容的政治手段实现它。他们没有设计一个新社会的蓝图，而宁愿尝试提升社会达到西欧或美国的宪法或法治标准。那些在旧政权下遭受极端政治隔离的人，其最显著的情绪是他们对遭遇“不公正”的感受。对“旧政权”的反叛是基于这样一个确信，即这个国家系统性违背了宪法规定的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最大的示威活动发生在1989年11月4日的东柏林，超过50万人参与了示威，被许多参与者（以及观察家）视为这个政权崩溃的转折点。这次示威活动呼吁实现宪法中的两个条款：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那次抗争没有反对宪法，仅仅反对政权对宪法一贯的和恒久的违背。1989年10月至1990年3月间的政治事件的许多参与者不太情愿地使用“革命”一次来描述已经发生的巨变。考虑到他们对宪政的强烈信仰，我们对此并不奇怪。传统上，“革命”一词和少数先锋人物获得权力相关，和一个时期的法律空挡相关，和最彻底的主张法律和宪法问题应该被

约化为权力问题相关。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参与者倾向于把那个旧政权的被颠覆称为一个“演化”或一个“转型”。

民主德国圆桌谈判的短暂历史反映了反对派领导者不情愿把他们的行动视为上述意义的革命。下面将看到，圆桌谈判没有声称要行使任何国家权力——无论立法还是行政上的权力。另一方面，在它存在的一个不长时期内，圆桌谈判是唯一看起来能够避免混乱、填补所有政治建制都彻底丧失合法性所造成的权力真空的政治实体。实际局势把它推向了一个从纯粹宪法角度看完全不可接受的角色——它是一个真正革命性的角色。在呈现更多的细节事实之前，让我强调一下，我所指的仅是所谓的“中央圆桌谈判”（Central Round Table）。毫无疑问，它是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但不是唯一的圆桌谈判。存在两种其他类型的圆桌谈判，它们中的有些比“中央圆桌谈判”持续的时间长一些。首先，许多圆桌谈判是地方上的公民团体建立的，经常取代了地方上官方的权威，在1990年5月中旬前行使了一部分地方当局的权力（在5月6日的地方选举后）。其次，一些圆桌谈判为了特定的政治领域而建立（部分由中央圆桌谈判发起），比如绿色圆桌谈判（Green Round Table），青年圆桌谈判（Round Table Youth），³ 科学界圆桌谈判（Round Table Sciences）。但是这些“功能性”的圆桌谈判在导致旧政权结束的事件进程中从来没有扮演关键角色。因而，以宪政和民主化理论的视角看，民主德国的中央圆桌谈判的结构和行动是最重要的和最有趣味的。只有中央圆桌谈判（下面将简单的被称为圆桌谈判）有资格成为一个包含全国的政治角色。

政治框架

民主德国崩坍的历史以及对它多方原因的分析不是本文的主题。

乌尔里希·K·普罗伊斯

然而，为了解 1989 年秋天浮现出来的局势，给出一些关于那些事件和 1989 年 12 月 7 日第一次圆桌会谈的前置性信息是有帮助的——那些事件刚好在圆桌会议成形之前。⁴

政权危机的转折点是 1989 年 9 月 11 日，当时匈牙利政府公开宣布它不再遵守与民主德国的一个国际条约，那个条约要求匈牙利政府阻止民主德国的公民离开匈牙利前往西欧国家。这一变化导致大量的民主德国公民经过匈牙利和奥地利前往西德。民主德国政府不敢关闭通往匈牙利的边境，那是民主德国公民少数几个不需要签证就能旅行的边境之一。同时，最重要的国内事件是，一个公民团体“新论坛”（New Forum）正式申请法律承认它为一个自愿性的政治社团。这在民主德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申请在 9 月 21 日被内政部拒绝了。内政部给出的理由是：这个团体敌视国家，与宪法不相容。

10 月 7 日是民主德国的 40 周年纪念日，政治精英们大张旗鼓地加入庆典之中，最著名的客人是戈尔巴乔夫。虽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公开化被领导干部们蔑视，但受到了民主德国公民的欢迎，不邀请他参与庆典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特别的和即兴的对街头人群的演讲里——那次演讲向全世界直播，戈尔巴乔夫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拖延者将受到生活本身的惩罚，无论他是谁。”尽管柏林有严厉和令人恐惧的安全措施，但是几千公民聚集起来了，抗议那个政权，结果，大约一千人被逮捕、被虐待。10 月 9 日，大约 7 千人在莱比锡游行示威，要求民主化改革。无论是警察，还是特别有侵犯性的安全部队都没有干涉这次示威。相反的，莱比锡党分部宣布，它准备和相关的公民进行对话。这天也许是那个秋天最具决定意义的一天。这天，这个政权差点诉诸一个“中国式解决方式”，许多人认为那是可能的；现在仍不清楚，政权有多大的意愿和能力采用“中国式

134

解决方式”，那种解决方式（“中国式的解决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被严肃考虑过，那种方式是如何以及被谁最终避免了。后来的情况表明，10月9日是一系列被称为“星期一示威”的第一个示威，那一系列示威一直持续到圣诞节，参与者经常超过几万人。

10月18日和24日，共产党（SED）总书记、国家元首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被中央委员会和国会（人民议会）分别解除了职务。他的这两个职务由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填上。10月26日，“新论坛”的两名代表谈判要求获得承认。11月8日，在它的代表们确认他们在行动上将遵从宪法（规定了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共产党的领导）后，“新论坛”获得了正式认可。11月8日，9日，10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全体会议。它宣布举行自由选举。由于领导干部的一个误解，在11月9日柏林墙宣告开放。

11月13日和11月18日，人民议会选举了新政府，汉斯·莫得罗（Hans Modrow）当选新总理；他的28名内阁成员中有17个是共产党员，其他属于民主党派联盟（Democratic Bloc）的一些党，那些党在民主德国建立以后就一直依附于共产党。12月1日，人民议会废止了赋予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宪法条款。12月6日，在几天前失掉了党的总书记职位后，埃贡·克伦茨从国家元首以及军队最高统帅的职位上辞职。在12月份的最初几天里，之前依附于共产党的民主党派切断了他们同民主党派联盟的关系，宣布了政治上的独立性。值得指出的是，12月1日，最大和最重要的民主党派，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CDU-GDR）呼吁修改宪法，要求不折不扣地去掉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从1989年10月到1990年4月，有不只一次的呼吁要求废除民主德国的宪法，通过革命的进程宣布它的彻底湮灭。所有的政治参与者，包括圆桌谈判的参与者在内，认为他们受到那部宪法的约

束——名义上旧政权基于那部宪法而建立。

对于以上进展的评估，并不意味着对这一点可以得出简单结论，即关于 10 月 9 日和 12 月 7 日这 7 周、也就是圆桌谈判期间的实际力量（对比）关系。一方面，共产党看起来士气低落，不能重新获得政治主动权，尤其在 11 月 9 日柏林墙开放后——那一天，民主德国的公民获得了一个相对有吸引力的退出权。这种情况让人以为 11 月处于权力真空，政治权力实际上是在街头。另一方面，构成共产党统制大众的堡垒性资源，主要是国家安全机关；虽然它在 10 月 9 日没有干涉，它并没有被解除武装，也没有显示任何倾向将要服从新宪法，接受共产党不可逆转的丢掉政权的现实。直到 11 月底，没有人宣布革命性地废除宪法，因而，直到 12 月 1 日，共产党，它的大部分组织，以及它的权力机关，仍有宪法上的权力镇压反对派。这个不明朗的、未定的局势是拟议中的圆桌谈判的政治背景。

圆桌会议的产生

虽然圆桌会议的计划是在民主德国 40 周年庆典之前政治气氛极端紧张的那些日子中发起的，但倡导圆桌谈判的构想几个月之前就出现了。在 2 月 24-26 日由抗议学术协会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呼吁创立一个“全国协商会议”，在那样一个协商会议上，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将讨论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在后来的几个月里，这一提议以及类似的提议由教会内部或与教会关系紧密的几个其他团体提出来了。10 月 4 日，7 个公民团体的代表形成了一个地下网络，秘密开会。那些团体包括新论坛（New Forum），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10 月 7 日在一个郊区的新教徒家里经密谋成立），绿党（the Green Party），立即民主（Democracy Now），和平与人权动议（the Initiative for Peace and Human Rights）。⁵ 他们打

算就国家的困境和严重局势发起一个与人民议会官方党派的对话；由于大批熟练工人持续逃离到西德，局势变得越来越让人焦虑。他们的主要诉求是实现联合国人权宣言、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赫尔辛基宣言所声明的人权，以及达到自由和秘密选举所需要的最低限度条件。同时，这些团体宣告，他们打算成立一个选举联盟，他们希望那个联盟将足够强大以便在自由选举中能够挑战官方党派的权力，而这也是他们主要的目标之一。在 10 月 27 日由公民团体“立即民主”组织的会议上，参会者呼吁修改宪法，废止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希望由全民公决来决定。他们提议通过圆桌会议来为关于宪法修改的辩论和公决做准备；圆桌谈判的主要任务是起草新的宪法。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当时对圆桌会议的构成的设想与后来圆桌会议的实际构成是不同。⁶ 他们不打算建立一个代表性的机构作为一个应急议会发挥作用，而仅仅建立一个权威机构的联盟——那个联盟能够重建合法的国家政权。因此，按他们的设想，圆桌谈判应该聚集议会的、政府的、工人的、教会的、议会外反对派，以及知识界的代表。

第一步是需要让旧政权的政治精英确信政治对话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这一点在柏林比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更困难，因为刚刚在 10 月 9 日之后，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地方当局已经准备开始和不同的公民团体对话。在柏林，地方党领导、市长为一方，公民团体为另一方，就建立圆桌谈判的会谈由新教教会代表作为中间人。虽然最初的接触失败了，公民团体在再次是密谋性的 11 月 10 日的一次会议上，继续冒险推进圆桌谈判的想法，那次会议上，他们决定请求大主教的协助。最终，在过去几年政治争议中很低调的罗马天主教会参与到推动圆桌谈判的提议当中来了。11 月 22 日，新教教会公开宣布了一次圆桌谈判会议消息，并提供它的设施（房间和服务）

乌尔里希·K·普罗伊斯

供会议使用；11月30日，圆桌谈判向人民议会中的5个“老”党派以及构成反对派的7个公民团队，发出了正式邀请。1989年12月7日，圆桌谈判第一次会议召开；圆桌谈判的最后一次会议，即第16次会议在1990年3月12日举行，6天以后新国会选举启动。

最初，圆桌谈判有30个成员。老的和新的团体都同意数量对等原则：5个老党中的每一个党有3票（尽管共产党当时仍是最大和当然最有权势的党）；反对派中的7个公民团体每一个有两票，新论坛多分得一张票——它被认为比其他团体多不少的成员。新教、卫理公会、天主教会的三个代表做会议主持，他们没有投票权。虽然没有按比例分配政府与反对派两方的票数，参与者的绝对数量在12月18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有了改变，⁷他们要求允许四个团体加入进来：两个团体属于反对派——绿色联盟（Green League）和独立妇女协会（Independent Association of Women）；另外两个和旧政权紧密相关——官方的工会和农民协会。这四个团体每个分得两张票，因此，12月8日的圆桌谈判共有38张票。为避免新增的票受到共产党的控制，新进团体仅被允许代表无党派从属关系的个人。会议成员的扩张是由于一个产生了重要后果的失误：反对团体之一，独立妇女协会没有被邀请参与第一次会议，理直气壮地要求其（毋庸置疑的）参会资格。在独立妇女协会的资格被确认后，其他两个所谓的群众组织——官方的妇女组织和工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也钻了这个模糊态势的空子，最终也被允许加入进来。结果，指引圆桌谈判成员构成的原则变得模糊起来。几乎无意的，圆桌谈判采用了代表制原则。因此，在第二次会议上，圆桌谈判创建了一个新的团体类别即拥有“观察者地位”的团体，这个类别主要为所谓的共产党群众组织——民主妇女协会（Democratic Women's Association）、自由德国青年（Free German Youth）、文化同盟（Cultural Federation）

而量身定做。在 12 月 27 日的会议上，处理要求加入圆桌谈判的工作被托付给一个分委员会“要务组”，它由圆桌谈判中每个团体中的一个成员组成。不过，直到 2 月 5 日，几个团体、政治党派、组织，新的和旧的，申请圆桌谈判的完全成员资格，没有一个获得了允许；所有的申请者仅获得了“观察者”的资格。几乎到圆桌谈判结束时，它的准许政策依然是不清晰的，导致了大量被拒绝的团体和党派的不满。关闭成员资格的政策理由之一是考虑到需要维护对等原则。但是，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是，拒绝一些公民团体申请者，或多或少是因为认为它们没有对旧政权的垮台做出贡献。此外，在他们看来，那些申请者或多或少从属于西德团体或党派，因此不代表民主德国的真正政治力量。一些圆桌谈判的参与者把那些人视为革命的搭便车者，在道义上他们也不应该享有完全成员资格。考虑到圆桌谈判给自己设定的艰巨任务，圆桌谈判里合法成员身份的模糊性导致了一个相当脆弱的代表基础。

虽然，就社会利益、政治信仰、道德价值观、宗教信仰等方面，圆桌谈判肯定比人民议会更具有民主德国的公民代表性，它的代表性依然是相当缺乏容量的。政治谱系中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构成成分实际上没有被包括进来，专业人士、小商业、技工没有包括进来，更不用说大商业也没有包括进来——那时他们被视为执政党的经济精英（巨大的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在柏林墙开放以后，后者中的很多马上开始把国营企业转型为私有公司（部分和西德公司以及国外公司合作），因此，他们实际上不太可能在圆桌谈判里代表共产党（后来的社民党）。最后，但并非不重要，所有没有被认可资格的人都或多或少不太情愿地在旧政权服务过，对旧政权的运行做出过贡献；从公民团体宣布的痛苦的道义原则看，这些人现在避开了对他们过往行为的判断。

公开的目标和程序规则

在处理圆桌谈判的“宪法”结构和它的政治行为之前，有必要考虑它的目标，既然它反映了圆桌谈判参与者的动机和意图。圆桌谈判的宪法地位主要依赖于它的职能和管辖范围，无论他们是法律上授权或是自封的，这一点是显然的。在12月7日第一次会议上，圆桌谈判通过了下列动议，它以圆桌谈判的“自我说明”为标题：

1. 参与圆桌会议的成员深深关切我们这个正在经历严重危机的国家，关注它的独立性和持续发展。
2. 他们要求公开我们国家的生态、经济和金融状况。
3. 虽然圆桌会议不能行使任何法律或行政的功能，它仍将向公众提交有关如何渡过这次危机的提议。
4. 在立法、经济和财政政策的重要决策决定之前，人民议会和政府应该及时通知并与圆桌会议协商。
5. 圆桌会议视自己为公众监督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因子。它将继续这一使命，直到自由的、民主的、秘密的选举真正实现。

有几点在此需要给予特别注意。首先，在反对派和旧政权势力的所有深刻的政治分歧之外，双方都同意保持这个国家独立性这个目标。其时，这个共识可能在街头已经成为少数派观点，尤其在莱比锡，与联邦德国统一的呼声很高。其次，圆桌会议不被视为一个行使法律权威的机构；更多的，它的成员把他们自己视为没有组织化的“公民社会”的代表：他们要求“公开”，承诺制定“提案”，以及行使“公共监督”和要求“知情”公共决策。另一方面，他们也要求在人民议会和政府的决策出台之前“及时与他们协商”——这是一个相当含糊和模棱两可的表述，在某种意义上它与圆桌圆桌谈判不应该承

担政府的责任的说法不一致。再次，圆桌谈判的具体职责边界存在类似的模糊性。如果它们被设定为在自由、民主、秘密选举开始之日就中止，这就意味着在这天后，圆桌谈判将不再是必不可少的，在这天之前，它作为某种代理国会的角色而发挥作用。但为实施这个临时功能，看起来需要某种合法的权力，以及某种承诺——它将根据义务责任标准以民主的品格运行。下面我将表明，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际上满足了这些条件，是非常成问题的。

以这些自封的职责和圆桌会议的政治异质性的视角看，你不会奇怪，在那份“自我说明”的声明刚发布之后，圆桌会议马上通过了程序规则。那些程序规则实质上是圆桌谈判的内部宪法。让人惊讶的是，它们非常简单。在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最初版本里，它们只有如下9条：

1. 程序优先于实体动议。

2. 程序是：议程的确认；讲话时间的限制；讲话者名单的关闭；辩论的关闭；以及投票方式动议。

3. 实体动议包括：主动议，补充性动议和修正性动议。

4. 更具综合性的实体动议总是得到首先投票。类似的程序适用于补充性和修正性动议。

提交投票的问题必须允许回答同意或反对。

5. 依据动议的时间顺序，对动议进行讨论和投票。

如果有人要求，主席有权依第3点把动议推迟到会议的末尾。

6. 如果获得简单多数的票数，动议得以通过。

乌尔里希·K·普罗伊斯

程序和有关程序的动议必须获得三分之二多数才能通过。少数意见应该被记录在案。

7. 允许新参与者加入到会议中的决定必须获得圆桌会议简单多数的通过。

8. 关于会议主席将在下次会议上决定。

9. 由一个主席和每个代表团中一位成员所组成的委员会非公开地解决有关程序规则的冲突。

最重要的规则无疑是多数原则的设置。它意味着圆桌谈判的自我定位不仅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体系，也是一个想要做出集体决策的合作实体。依这个事实，初看起来有点奇怪的是，公民团体没有更仔细地考虑多数原则适用的形式。这些都不清楚：“多数”是圆桌谈判所有成员的多数，还是出席会议的多数；投票所需的最小参与者人数是多少；规则也没有说是否应该计入弃权票。此外，你可以料到，相对小的几乎没有组织化的公民团体会要求一个更高的多数出席人数，或者甚至一种否决权，这是为了保护他们这些政治新手免于高度组织化的、有纪律的、经验丰富的党政政客以及他们的隐实力的剥削。也不奇怪的是，圆桌谈判解决方案的记录没有显示议题通过所需的任何精确的投票数。

所有这些揭示了圆桌会议有一个非常独特之处。它和前面提及的对等原则以及对这些团体和党派的力量和组织一致性的可观差异的忽视紧密相关。对于公民团体而言，这不是一个缺陷，而是在社会的革命转型期间，他们政治观念的一个真实表达。圆桌会议的基本理由是发起旧政权统治精英和代表道义的、反专制的公民团体之间的对话。这些团体中最大的一个自称为“新论坛”不是偶然的——这个名称表明圆桌会谈是一个建制化（institutionalised）对话项目，

在其中所发生的观点交换是宪法性的，而非只是处理权力关系。其潜在的含义是把决策转变为一个自由选取话题的沟通过程——就获得权力和以权力分配的产品所依据的规则合法性（*normative legitimacy*）进行沟通。在参与圆桌会谈的公民团体的话语里，在圆桌会谈建立之时，“政治合法性就是道义合法性”。

道义的论证和原则不能被多数票决定，它们也不能由权力来确认或否定。以权力代替道德原则的错误做法，正是参与圆桌会议的公民团体过去一次又一次遭遇的。因而，他们最基本的关心是重建政治的道德品质，而那意味着发明某些机制，在这些机制下，道义的权威优先于权力的权威。公民团体没有把圆桌会议仅理解为一个处理权力关系的建制，因为他们总体的政治概念与权力的占有无关。用他们一位领导成员的话说，他们找寻的是创建一个“广泛的责任共同体”，因此，他们把圆桌会议视为一个“为了实现社会转型的多元责任”的场所。由于他们长期遭受国家安全机关对所有社会领域的猖獗渗透，他们最强调的是对话的建制化。作为渗透的结果，自治公共空间以及公认的私域没有成形。虽然公民团体对未来的社会结构没有清晰的想法，他们确信，主要的政治任务是创造一个不受损害的公开讨论和对话的国度。在他们看来，圆桌谈判是这个想法最适合的制度性表达，也是一个奋争的工具以纠正对他们来说完全滥用的权力。这解释了对等的原则，以及它对权力关系的隐含的忽视。它揭示了多数原则是一个伪装的共识原则，目的在于证明对话的结果；它不是一个让政治机构行使权力的工具。

这一点也被圆桌会谈所形成的决定的措辞的特殊性证实。除了极少的例外，它们不是以“圆桌会议的……”而是以“圆桌会议成员们的……”提议、要求、建议这样的措辞表达。这种表达方式与圆桌会谈作为一个由多数票形成意志的社团实体的构造发生冲突。但是这

种方式和之前提到的它对圆桌谈判是一个超越个人的集体性组织（个人责任藏在集体后面）的否认相一致。个体被认为是圆桌谈判决定的产生者，它的权威源于他们作为成员的质量，而非源于作为一个机构的特质（无论如何它的合法性非常弱）。

作为一个隐含的共识原则，多数决原则的性质没有排除将不同意见经常记录在案；几乎所有的团体和党派，不管它们属于两方的哪方，不时会使用这个权利。表明这一令人惊讶的事实的又一个地方，是两边在对他们很重要的议题上，都没有保留针对多数决的否决权。然而有两次（1月3日和1月8日），圆桌会谈两部分的分裂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既没有多数决也没有权利把不同意见记录在案能够让这个合作共同体继续。在那两个例子中，一种“信念议案”（*itio in partes*）发生了——公民团体形成了它们自己的共同体，发表了一些被称为“圆桌谈判中反对派成员”的声明。不让人惊奇的是，每次这些引起异常状况的议题都属于解决国家安全机构（斯塔西）的问题。1月8日，公民团体在这个议题上和政府的冲突几乎达到了顶点，采用了他们所使用过的最激烈的行动，即一起短暂地离开圆桌会议。反对派——如他们所自称的——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不参加谈判，发出了一个最后通牒要求总理在两个小时内出面。这是整个圆桌会谈中最危机的时刻，危机由圆桌谈判多数投票悬置这个议题、重新设定下一次会议的时间（1月15日）而暂时得到解决。总理出面了，屈服于反对派的实质性要求，邀请公民团体加入政府（见下面“与建制政治领域的关系”）。令人惊叹的是，在这种情形中，当它的整合力量因一方威胁退出而受到限制时，多数原则也没有完全失效。如果政府没有顺应了反对派的这个要求，局势将变成对公民团体在圆桌会议制度性框架外的抵抗能力或者压倒旧政权能

力的一次决定性的检测。既然这个检测被避免了，他们的最后通牒作为一个有效的手段而结束了一个政治僵局。

尽管公民团体对对其政治文化自我认知的共识至关重要，但不可忽视的是，他们无所不谈而波澜不惊的行为也是由于非常实际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圆桌会谈是电视直播的（从早上9点到下午7点），所有的参与者都渴望表现自己，表现那些谈判是一次公民化的努力：一群公民正在关心他们的国家。正如一个会谈参与者在回顾中观察到的，沟通的共识取向的风格深深影响了所有参与者行为的政治内容。

第二个或许更重要的与旧政权寻求共识的理由是，公民团体的代表们担心，（如果没有共识）他们可能被迫要推翻这个政府。公民团体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感受——自己不能统治这个国家，所以，他们不得不避免所有可能导致他们必须上台统治的情形。对他们来说，圆桌谈判是双方都依赖彼此的一个安排：虽然他们代表这个国家道义的一面，但是旧政权的代表具有统治运营能力以及或多或少发展经济的能力。这个观点由一个格言简洁地表达了出来，“自己造的床，自己躺”；意思是说，“共产主义把这个国家搞得乱七八糟的，他们必须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⁸ 显然，对于反对派而言，一种理性的态度（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就是完全反对（感觉自己没有能力）自己统治这个国家。

在这种态势下，反对派或多或少感觉被迫需要采用一种无条件达成共识的战略。除了上面提及的1月15日事件这个例外，公民团体没有对旧政权对手使用以威胁为基础的讨价还价工具，虽然在反对派内部偶尔会讨论发动街头示威或发起一场罢工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反对派没有意愿接管政权，它不能将它的资源转化成任何一种持续的、创造性的政治结果。不同意这个结论的人可能会争辩说，

其实是苏联可能干预的威胁使得所有政治力量都极端谨慎。这是一种可能的假设，但是它看起来没有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对许多重要反对派人物的访谈，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他们相信苏联不会干涉。此外，他们中的许多（虽然不是所有人）直觉上认为，这个政权在道义上不能够抵抗革命，不能够动员它的暴力潜力（警察，军队，民兵组织，斯塔西）对付反对派。换句话说，放弃威胁性的讨价还价绝非他们对预期的威胁的反应。

考虑到圆桌谈判的自组织和它的程序规则的模式，还有最后一点是值得指出的。除了少数例外，圆桌会议每两周举行一次，但是，根据对当时的政治要务的认知，圆桌会议像一个议会那样在逐渐建立起来的各委员会准备种种决定。第一次会议建立了四个委员会：选举法，与党派和结社相关的法律，新宪法，以及经济。后来的会议又建立了7个委员会：教育和青年，大众媒体；刑事法和程序，判决执行和平反；与驱逐相关的法律；生态重建；女性政治；社会安全与保障。12月27日，解散斯塔西（国家安全机关）的问题开始升级，于是增加了法律和安全委员会。仅仅38个成员的圆桌谈判却有这么多分化型的内部组织，主要是为了对应政府的相关组织。这显示，圆桌谈判没有打算把自己限定为一个观察者和政治过程的控制者角色，也仅非一个危机管理中心，而是一种类似于不得不行使最重要的官方功能的国会，可以控制政府通过法律的国会。下面将显示，事实上，圆桌谈判抓住了这些权力。

权力

圆桌会议自己宣称的意图是把自己限定在“公共监督”——这意味着，在一个从来不曾容忍任何形式独立的公共空间的国家履行真正的政治任务。因此，圆桌谈判没法回避如何处理权力的问题。在

此，所谓“权力”，我指的是这个词的相当广泛的意义，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的“权力”：个体或个体的集合强加他们的意愿给另一些人，并能克服那些人潜在的反抗。这涉及到他们为所讨论的问题发布有约束力的规则和命令，以及有效实施它们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才是制度化的权力，即根据约束权力掌握者自身的宪法，发布有约束力的规则和命令的权威被赋予个人或集体性机构。

圆桌会议是否有任何权力？如果有，它的基础是什么？若依常规的、制度化的国家权力的定义，圆桌会议是没有权力的，因为没有宪法规则赋权它处理公民秩序和法则问题。除此之外，它没有控制主要工具和强力资源如官僚体系、警察、军队，或者国家预算。但是事件的进程证明，这些资源是相当虚弱的。它们可能对“中国式的解决方式”是足够的，也就是说，仅对军事镇压反抗旧政权的人是足够的。许多情况表明，东德统治精英自己或者说相当一部分国家机器的成员情绪太低落，已经无意使用武力来解决危机。自10月以来，唯一能够表达权力的是街头大众的道德愤慨。这个纯粹消极性的否决权被证明足以瘫痪国家机器，当然，它没有制度上的一致性。

此外，大众的道德愤慨塑造了一个反对旧政权的否定性的人民联合体，虽然它对未来政治的积极观念缺乏统一性。公民团体发起圆桌会议是为了把大众的愤怒锻造成某种制度化的设置。但是，既然公民团体已经估计（可能是准确的）他们太弱小以至于不能夺取权力，这个设置也只有监督旧政权的强力，消解它们的消极功能。鉴于旧政权已经道义上破产，这一事实无疑赋予了圆桌会议实质性的道义合法性，使圆桌会议能够防止暴力滥甚至内战的发生。对话已经被创建这个事实还对旧政权精英施加了更进一步的限制，并由此传递给大众一个信息：一些建制化的进程已经启动了。圆桌谈判把整个体制转型为民主社会的权力，取决于公民团体迫使旧政党在

这个方向前行的能力；从相反的一个方面说，这个能力也主要依赖于他们动员街头大众的能力。同样重要的是政府机构——人民议会和政府——没有把它们宪法责任转让给圆桌会议。

圆桌谈判这种脆弱的权力结构，完全基于公民团体瓦解旧政权士气的可信能力，即撤销旧政权的合法性，树立道义障碍以阻止它的强力部门反对公民。这个能力没有牢固的制度基础，因为它依赖于它的大众动员能力。这种权力分配的方式，在圆桌谈判自 12 月 7 日到 1 月中旬开始的几周里是非常成功的，其时旧政权处于守势，而新政党，专门从事权力分配和竞争的西方模式的新政党，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当时，政治权力资源主要由公民团体的“道义资本”构成，它的落脚点就是圆桌谈判。如圆桌会议参与者所说，“没有人敢于做出违背公民团体意志的决策”，因为它们（公民团体）被接受为人民要求根本改变社会的、唯一合法的代表。这种看法被街头持续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所证实，也被旧政权精英无所不在的腐败被持续公开报道出来这个事实所证实。同样重要的，是大众媒体的角色，尤其是电视台的角色。因为圆桌谈判已经把自己定义为“公众监督”的一个因素，至少从最初发起它的那些意图看，它主要是一个道德法庭，代表了政治过程必须满足的规范标准。圆桌谈判的所有会议向公众公开（除了 1 月 28 日公民团体决定加入政府的那次），头几周甚至由民主德国国家电视台做现场全程实时直播。和持续的街头示威一样，电视台是公民团体最重要的同盟，但它的支持不如街头示威那么稳定。作为一个伴随效应，电视媒体也让公民团体的领导者从模糊的形象提升为知名的政治人物。

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够理解，对等原则和多数决原则不仅作为一种隐含的共识原则，也作为公民团体在 1 月底加入政府前所要求的权力优势的制度化反映。从道义上解除旧政权党派武装，迫使

它们服从公民团体意志的，正是它们权力来源的规范性品质：对人权和人民自决权利的诉求。旧政权曾声称是已经把个人自由融入其中的“人民民主”，那个声称作为它的权力的道德基础发挥过作用。当群众在街头吼道，“我们是人民”、“我们想要自由”时，这个政权显然失去了它自我声称的合法性，而只剩下纯粹的权力机器。由此，我们在圆桌谈判的“宪制”里发现了一个相当不对称的结构：所有制度化的政治权力都在旧政权党派团体的一边，尤其是共产党，它控制着政府和国家机器，包括最强力的国家安全机构。但是，既然它们缺乏道义和政治合法性，这种权力变得只能是“自我印证”：它仅能用来自保。道义的丧失导致了它的无能。另一方面，公民团体代表了人民对一个新政治秩序的要求，但是这只是一个规范性的主张，它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把他们的道义资源转换为制度性的权力。它只能解除旧政权的“道义武装”，创造在既有的宪法框架下和平转型的前提条件。一方面，圆桌会议拥有所有有形的权力手段，但它不能在道义缺陷的基础上使用权力；另一方面，道义资产不能，也没有被设计用来具象化为新权力结构的资源。公民团体没有掌握权力这个事实，是它们能够解除旧政权道义武装的主要原因，使得圆桌会议能够履行它的主要功能：制约甚或瘫痪旧政权，直到合法的权威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建立起来。因此，不让人惊讶的是，当公民团体同意加入过渡政府时，圆桌谈判的政治重要性走向了衰退，因为它的“道义资产”转化成了政治权力资源。这必然导致提出民主合法性的问题。

民主的合法性

尽管人民议会已经选举了一个新的政府和总理（属于共产党的改革派一翼），但没有人做出努力敦促这个假国会解散自己（依据宪

法这是有可能的)、立刻开启真正的民主自由选举。没有这么做首先并不是因为人民议会的代表们没有意愿从立法职位上辞职。相反的,主要原因是公民团体太弱了。他们缺乏必要的资源建立全国性的政治组织,而那是他们能够赢得选票的前提条件。他们正确地预测到,如果选举时间设得过近,将促使人民重回共产党的怀抱,因共产党可以声称自己是公共秩序和安全唯一可靠的守护者(而获得足够多大的选票)。虽然最初考虑选举将在一年以内举行,但很快发现,这个日程安排看起来是不明智的,因这个时间和联邦德国的选举时间重合了。有理由担心,这将对民主德国的政治自治进程带来消极后果。⁹因此,圆桌会议选择1990年5月6日作为新国会的选举日。这一天有一个直接的和普遍的符号意义,因为它是1989年地方假选举的一周年纪念日。如上面引用的自我说明所暗示的,这天也宣告了圆桌谈判的结束。(在第十次会议上,1月29日的选举被重新设定为3月18日)。在此期间,圆桌会议与人民议会及其行政部门的关系是继续含糊不清的。

既然公民团体没有挑战宪法的有效性和它的法律效力,他们不得不承认人民议会的立法权威,虽然它缺乏民主合法性这一点绝没有被忽略。另一个选项——攫取权力,从来没有被严肃考虑过,它完全和他们的政治观念不相容;此外,公民团体的领导者也知道,他们依然很弱,没有能力如此操作。这导致了一种不一致(可能是不能避免的):公民团体希望在既有的宪法框架下继续保持人民议会的运行,但是同时,它们否认它的民主合法性,因为那些代表们不是合法选举出来的。当他们提出圆桌会议的机制时,他们并没有想要建立另外一套立法体系。他们仅想开创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他们能够作为反对派和这个政权的代理人开始对话。

虽然圆桌谈判被视为一个政治对话的制度化场所,但是,如上

面已经提及的，它也不仅是一个常设的、交换不同政治主张或进行政治谈判的场所。作为一个被指望依照多数原则做出集体决定的社团组织，它预设了一个实体的存在，那个实体的利益是圆桌会议作为一个整体所代表的。在一个普通的民主国会里，参照系是“人民”，即从社会经济条件方面说，在经济、文化、宗教利益和价值上呈现多元性和差异性的人民。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由各个选区的选民选出的代表或多或少才能够代表人民。相反的，圆桌会议没有也不能代表“人民”，因为它的成员不是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所以，圆桌会议在自我说明里，宣称自己代表“这个国家”，这意味着它没有宣称代表各种不同的人民的利益和价值，仅代表人民作为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利益的共性部分。这种代表模式是典型的应急性政府模式，它发生在这样的时刻，即内部裂痕和利益分化的政治处理过程暂时性地被推迟，统治机构的代表性没有通过体现多样性的代表制得以表达，仅能通过一个据信能够超越社会的多样化分裂和特殊利益、整合共同利益的实体得以表达。这解释了为何圆桌谈判在除多数决以外，也没有花精力关注有关代表与选民关系这类制度性问题。实际上，圆桌会议的参与者没有特定的选民——告知他们有关选民的利益和政治意愿，或给他们授权。他们的选区是“我们的国家”，因此，他们行动的基础是他们个人的确信。

虽然圆桌谈判成员为“这个国家”而行动，他们没有现代议会制意义上的代议机构地位。他们仅是各个团体的代表，仅获得了团体成员的授权。可以想象，既代表本团体，与代表“这个国家”可能会冲突，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发生。对于各党派、团体与它们各自的代表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清晰的规定，尤其，对于代表们是受到它们的指令的约束还是自行其是，没有正式的规定。不过，在隐含的意义上，圆桌会议被设想为一个由各组织派遣的“使节”组

成的大会，因为那些组织可以自由派遣它们认为合适的代表。对于各个组织的代表提名程序没有任何规则限制，圆桌会议也没有确立严格意义上的成员制度。这些代表性的党派和组织可以随时交换它们的代表，它们确实非常频繁地这么做（就我所知，发生这种现象不是因为政治异议而是因为即将到来的选举；自 1 月份以来，各团体和党派的领导人们开始在全国举行竞选活动，不总是能参加圆桌会议）。在 12 月 27 日的决定里，圆桌会议甚至允许代表们把他们的授权转给他们的顾问。甚至很难说，这些圆桌会议的代表们是否接到过他们各自组织的指示。就一些组织或一些议题而言，代表们也许接到过指示；这是一个我不能够回答的经验问题。毫无疑问，有权对他们作出指示，这是代表制度的“使节原则”的应有含义。但是同样清楚的是，圆桌谈判中对话的道义合法性和自许的促进整个国家共同利益的目标，与任何代表派出团体所做的有约束力的授权是不同的。从宪法的角度看，圆桌谈判成员在这样一个领域行动：在这个领域，追随他们个人的确信或依他们的代表团的指示而行为，对他们而言是同样正当的。

圆桌会议成员地位宪法上的含糊性，主要可以圆桌会议总体上不牢固的民主合法性来解释。我前面说过，圆桌会议的一方累积了道义上不合法的权力，另一方却拥有没有权力的道义合法性。但是，在正常的民主意义上，任何一方都不能声称自己具有合法的政治权威。只有在自由民主选举中，人民才能授权给他们政治权力。这是圆桌谈判明确把自己限定为行使“公共监督”的原因——无论“公共监督”意味着什么。然而，在这里，合法权威的“正常”标准是否适用是可疑的。街头游行示威已经瘫痪了旧政权，公民大规模外逃的威胁把整个社会推向崩溃的边缘。旧秩序的基础已经被摧毁了，但是人民能够表达政治意愿的新制度依然没有到位。任何通向民主政治秩

序建构的创造只有被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这个创造不可能符合本身从创造的结果中涌现的秩序的标准。在这种情形下，公民团队不可能像在已经实现自由选举的社会里那样代表大量的多样化的公民，但是他们真正的代表了“人民精神”——它的否定意义类似某种共同意志的东西：废除共产党统治的意愿。在政治的这个否定性维度里，如同反对派一样，公民团体包含了人民的这个意愿，确实能够声称自己具有民主合法性。但是当圆桌谈判不仅代表人民对旧政权的否定意志时，而是更积极地卷入到塑造公共决策新方向的进程中去的时候，这个民主合法性就变得越来越成问题。

事实上，圆桌会议，特别是赋予了圆桌会议合法性和准革命角色的公民团体，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境中。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证据表明统治精英在这种困境中会拼命寻找合法性，却很少见被相信有合法性的道义精英拒绝将他们的合法性转化为权力。不过，这恰恰就是圆桌谈判的情形。当它的成员宣布，它“不能行使立法或行政的功能”时，他们肯定不是想收回在事件进程中的任何政治影响力。但是他们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公共监督的因子”的声明清楚地显示，他们不打算在政策形成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而是扮演一个公共批评意义上的消极政治角色。这个限制性的角色非常符合政治的道义色彩和它的公民团体个人良心性质的基础。良心的内在强度在于对加添职责说不能的抵制能力，但是当被要求设计积极性的行动进程时，它远非清晰明了和有力量了。对旧党派而言，公民团体把自己限定于政治的否定性维度，对他们（旧党派）是在战略上有利：它承诺让政府既定的法律权威不受损害。然而，圆桌谈判的这个自我限制被证明是无法操作的。国家危机，特别是出人意料的公民大规模外逃到西德，迫使圆桌会议不情愿地接受并行使一些政治权力。我在后面叙述人民议会和政府冲突时将展示，这个过程

内在逻辑使得把圆桌谈判的意志强加给政府的法律权威成为必需。但是，既不是吸收成员的方式也不是圆桌谈判的内部建构，导致了这个原本不想要的、从外面施加的需求，即在行使政治权力的过程中扮演一个政治角色，虽然并非不可预料。公民团体的民主合法性足够代表人民反对旧政权的立场，同时，它们有一个压倒一切的意图，就是与旧政权建立对话以避免一场内战，这为分配 50% 的投票权给政府方面及其附庸组织提供了理由。但是对人民行使权力需要信任和责任，以及恰当的比例代表制来体现公民和利益的多样性。以这个标准看，公民团体和旧党派都不能声称自己得到了民主的授权。换句话说，圆桌会议的构成相当好地切合了公民团体这一目标，即重建政治的道德基础、通过公开对话找到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它不适宜实际行使权力，因为它没有提供保障权责一致的制度性设计。（我想强调，这是一个纯粹的分析性论述，并不是要谴责任何圆桌会议参与者。在我看来，基于 1989 年秋和 1989/90 年冬的局势，圆桌谈判这种结构性的不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与建制政治领域的关系

圆桌谈判作为公共监督的一个因子，这种自我诠释并不意味着它打算避免参与任何制度化政治行为。这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直到 1990 年 3 月末，圆桌谈判是反对旧政权的抵抗力量能够发声的唯一建制。然而，它与政府立法和行政两个主要部门是很难完全划清界限的。虽然在这个时期内，这个建制被修正过几次，但没有人尝试过正式批准圆桌会议的角色，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在他们 3 月 12 日最后一次声明里（40 多年来第一次民主选举的 6 天前），圆桌谈判的成员们确认，他们坚持第一次会议的声明，不准备承担任何

政府的功能。同时，他们感谢“圆桌谈判、人民议会、过渡内阁的合作”，宣称它“对政治稳定和国家外交独立做出了贡献”。这个有点模糊的声明隐约地承认了——他们事实上和政府的多个正式部门一同参与了对这个国家的某种共管统治。这种模糊性也反映了圆桌会议含糊不清的宪法性地位：它是公民社会一方实施公共监督的一个工具，但是同时由于其自身具有成为公共机构的能力，它也已经成为公共监督的适当目标。这一双重性，在紧接着其自我说明和前述程序规则后做出的两个决定中，清楚地表达了出来。

在第一个决定里，圆桌会议成员们责成圆桌会议立即开始起草一部新宪法，在 1990 年的选举后提交全民投票批准。一方面，这个决定无异意味着通过圆桌会议行使制宪会议权力，尽管当时民主德国的宪法依然存在。它的有效性并没有被圆桌会议成员们全部否定，因在同一个决定里，他们指令立即通过举行新选举所必需的宪法修正案。虽然这个决定所说的仅是“起草”宪法，但那绝非一个次要的工作。不得不在一次公决中通过草案的人民，仅能对提请他们批准的选项做出反应，因此，这些有权提交草案的人实际上行使了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只有他们能够诉诸主权者。他们有权提出“问题”，而这又划定了大众“回答”问题的潜在范围。因此，没有明确说出来的是，圆桌会议成员们主张将国家最高权力的基本部分给予他们自己。

另一方面，圆桌谈判的主要关注是一部新宪法，这不是偶然的。这个目标，在公民团体政治观念的理论框架里，有一个重要的符号意义。一部宪法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的政治权力服从法律限制。它把权力转换为法律权威。当公民团体谈及宪法的时候，他们头脑中的这个词正是这个含义，它和西方宪政国家的含义大体上是一样的。如果成功的革命首先关注的是一部宪法，以及他们的革命权力相应

转换成宪法权威，公民团体证实了他们的自我说明，即不想接管、行使权力。在直觉上，他们或多或少认识到，他们实际的权力是极其脆弱的，只有在人民投票批准的一部宪法里，他们的权力才可能持续。

第二个决定涉及选举日期的确定。像会议后来发表的大部分其他决定一样，它以建议性的语气表达出来。尽管这里的语气谦逊甚至有些卑微，随后的事件清楚表明，圆桌会议事实上把它的“建议”视为有约束力的裁定。圆桌会议不打算用自己的意志取代宪法权威，如果那样将意味着直接、超越宪法接管政府的职责。但是它期望当局依据圆桌会议的政治指示行使职权。这等于圆桌会议间接进行统治。结果是一种管辖权分配的混乱，因而导致了一些严重的冲突，尤其是圆桌会议和内阁的冲突。但在新选举问题上，冲突并没有发生。当然，圆桌会议没有权力命令举行新选举和确定选举日期。根据依然有效的宪法，人民议会（通过它的自行解散）和国务会议（行使国家元首功能的集体行政机构）才有资格这么做。但人民议会和国务会议并没有挑战圆桌会议的这个“训令”，为此，它们还通过了一些必要的决定，并发表在官方公报上。遵从圆桌会议的决议是期待缓和街头民众的反叛，降低公民团体在群众中的影响力。

并不奇怪，最困难最紧张的关系是圆桌会议和政府的关系。联合政府包含了旧政权的所有党派；虽然它们已经经历了或多或少可信的政治改革，但它们依然与旧政权的官僚权力机构紧密相连，依附于它。虽然，在形式上，人民议会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但是它的功能曾堕落为仅仅鼓掌通过政治局的决定，当党政权力转移到联合政府时，人民议会的卑微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人民议会依然是政府的附属品，因此，它遵从圆桌会议决定的程度依赖于政府与圆桌会议的合作程度。在新选举和选举日期的决定上，

正是这种情况。人民议会行使立法功能时也是如此。圆桌会议的各委员会主要聚焦于各类法律的起草，尽管它们尽量克制行使立法权力。有几次，圆桌会议指示人民议会应该依据其决定、在广泛的公开讨论后才通过法律。那些决定或多或少被勉强遵从了。但是圆桌会议不得不发出这些训示，清楚地显示被政府和圆桌会议这两个权威撕裂的人民议会，更多是前者而非后者的工具。有一次，人民议会公开拒绝了圆桌会议的要求：圆桌谈判的一些成员要求被允许在议会讲话、质询政府。圆桌会议用一个正式的谴责（对人民议会的拒绝）做出回应，但是无济于事。

人民议会这一藐视被证明对圆桌会议的政治影响力只有轻微的影响，因为早先圆桌会议已经成功获得了人民议会所有相关的权力。在 1989 年 12 月末至 1990 年 1 月末这段最紧张的期间，圆桌会议把它自称的公众监督转变为采用一般议会制政府手段的一种控制性权力：圆桌会议命令部长委员会的几位成员，包括总理，到圆桌会议接受质询。总理三次出席圆桌会议以就内阁的政策做出正式说明。在第一次正式说明中，他承诺他的政府成员和高级官员将参与圆桌会议，向圆桌会议成员通报所有与政府政策相关的问题。有几次，政府因为没有遵从圆桌会议的命令而受到谴责，比如，在 1 月 18 日，因为政府在提交宪法修正案草案到人民议会之前没有先提交给圆桌谈判，圆桌会议训斥了政府。

圆桌会议不仅成功获得了政府应该向其通告政治措施的权利，有一次甚至通过了对一位国务秘书的不信任动议，那位国务秘书是负责解散国家安全机构的政府委员会的领导人。以宪法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纯粹的象征性行动，因为政府并不对圆桌谈判负责。即便是在议会制中，也不是对高级公务员而是对内阁成员投不信任票。然而，这个动议导致了那个政府委员会的改革，它吸收了一些圆桌

乌尔里希·K·普罗伊斯

会议成员进去工作，更换了主席。这是圆桌会议直接干预政府事务的第一步。它并不仅仅意味着从“公众监督”转变为正式的议会监督，也是从监督政府到参与政府的过渡。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政治紧张逐渐加剧的情况下，紧张状态主要由国家安全机构问题引起的。

政府曾宣布将建立两个新的情报部门，它认为那样的机构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运行都是必需的，不过人们普遍怀疑，那个计划实际上是为旧的国家安全机构提供新的合法性。秘密安全部门的迟迟没有被解散，以及某些神秘事件——一些被共产党作为借口来发起一场反“法西斯倾向”运动的神秘事件——更加深了这一怀疑。1月15日，总理第一次出现圆桌会议上，他不得不承诺撤销这个计划。同一天，数千名市民闯入并占领了国家安全机关（斯塔西）总部，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少量的暴力行为，这一事件是一系列事件的高潮，它使得政府维持秩序和行使法律权威的能力遭到了严重质疑。此外，在开放柏林墙之后，经济状况变得更加糟糕，因为老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越来越瘫痪了，但是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立法、货币、行政和司法框架等方面的缺失，是国外私人投资——尤其是来自西德的投资——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这种情形下，政府看不到其他选择，只能请求圆桌会议（更准确地说，圆桌会议中的公民团体）承担政治责任，加入一个“国民责任政府”。公民团体在内部和彼此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痛苦的讨论后，1月28日同意了总理的请求；它们提名了8个成员由人民议会在2月5日选为部长。这个决定并不意味着反对派认为它能有效影响政治行动的进程。他们只是感觉到他们不得不加入这个政府，以免被指责为不负责任、不愿践行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因此，加入莫得罗政府只有纯粹的象征意义。

然而，这个决定是一个最明显的信号，表明圆桌会议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机构，承担起了一个普通国会所有相关的功能，包括提名（虽然不是选举）部长的功能——无论如何，它没有止步于让自己仅作为一个完全的非官方政治机构。

议题

圆桌会议各委员会的名单表明，它处理了 1989 年 12 月至 1990 年 3 月间几乎所有政治日程上的问题。当然，建立法治，解散国家安全机构，创立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框架，被放在了第一位，这些任务耗费了圆桌会议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这几项主要任务的角度看，圆桌会议和它的委员会介入如此多的额外议题是让人惊讶的。除起草了选举法、社团和政党法、大众媒体法，它处理过和决定过的一系列议题——以法案的形式或经常以详尽的陈述的形式——还包括经济、农业、生态、教育、青年和儿童、性别关系、科学、艺术，以及文化、健康、外国人、就业、社会保障、住房、军队等各个领域的政策指示。同样重要的，是关于当下的政治局势——当然主要是德国统一问题的文件；对于这个问题，圆桌会议提出了一套关于两个德国逐渐相互融合的、大大扩展了的复杂程序，连西德政府最后都难于做到按那个程序办。

如此广泛的议事日程表明，圆桌会议主张对整个政治领域拥有实质上全面的管辖权。虽然圆桌会议成功地在所有这些议题上都产生了多数票通过的决定，必须指出的是，在许多议题上，少数票被记录在案了，那些在具体政策领域具有特殊利益的团体要求记录在案。举例来说，劳工联盟关心失业的社会状况，（新改名了的）共产党关注老干部们的命运，绿党非常关注生态问题。这些少数派立场可以视为一种展示，表明圆桌会议像通常的议会一样，只要常规的

乌尔里希·K·普罗伊斯

政策问题出现在它的议程中，它就难免不像一个“利益代表”机构那样运行。体系的制度化基础已经建立、正常的政治阶段来临之后，圆桌会议自我声称的、仅仅为权力提供道义基础的使命，就注定会褪色。正常的政治生活需要一个更具广泛代表性的议会。为满足这个要求，势必要抹去政治的道德色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圆桌会议的声明和决定只包括道德原则。真实情况正好相反；它们体现了高水平的专家知识——专业委员会广泛使用了那些些知识（也包括了西德专家的协助）。检视一下民主德国官方公报就能清楚发现，圆桌会议相当多的决定在人民议会获得了通过、变成了法律。选举法、政党和社团法、大众媒体法，以及人民议会关于所谓公民委员会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的决定，主要是由圆桌会议和它的委员会起草的。而且，建立托管公司的法律也主要是由圆桌会议动议和设计的，那个公司负责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是，清楚的是同样，承担全面的政治责任是与圆桌会议的创立方式、它的合法性和权力不相称的。圆桌会议持续了五周的历史为这个判断提供了丰富证据。

权力的衰落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就对国家政权主要资源的法定控制权而言，圆桌会议并没有正式的权力。它的主要资源是公民团体的道义资产，那种资产成为权力的来源，只取决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动员公民参与游行示威。动员是困难的，因为那些公民团体是一些相当小的社团，据估计在整个民主德国总共不到 1 千个成员。唯一的例外是（现在依然是）新论坛（New Forum），它成功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组织，在 1989 年 12 月和 1990 年 5 月的（地方）选举中，获得了很多地方政府职位——那些地方政府是在旧政权崩塌后重建的。然而，

相较于旧政党和旧群众组织的组织化强度和一致性，这对于行使权力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基础。圆桌会议不仅缺乏几乎任何制度化的基础，也受制于相对狭窄的社会基础。确实，官方的工会和农会组织声称自己代表这两个群体（工人和农民），但是由于它们和旧政权走得太近，没有多少人准备接受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表。公民团体主要由以下几类人构成：知识分子、神学家、牧师、专业人士和科学家。因此，他们既不是社会阶层的代表，也不是大众某种政治价值观的代表。换句话说，公民团体的合法性没有制度化的、社会的或者经济的牢固基础，其合法性整个依赖于人民不稳定的道德愤怒。

圆桌会议最有力量的时候，或许是围绕解散国家安全机构、政府试图重建一个替代性机构而与政府公开对抗的那些日子。在那场冲突里，圆桌会议得以树立起这样一种形象，即它成了最有活力捍卫革命成果的机构。昂纳克和他的派系倒台后选举出来的政府，对于 1989 年秋末以后政治局势的缓和做出相当大的贡献，但是它只由共产党成员和它的附属党派成员组成。它代表的是旧政权的改革派一翼，仅此而已——他们太少了也太迟了，不能被多数公民视为一种新政治制度的化身。因此，能为圆桌会议提供道义合法性的公民团体，主要从它们反对政府的立场得到了其影响力。也因此，当他们急剧改变立场、遵从总理的请求加入他的内阁时，这个资本就逐渐消散了。这个决定是紧张而痛苦讨论的结果，在那个过程中，社会民主党尤其不容易被说服接受走出这一步的必要性。公民团体不得不考虑两个同样棘手的选项：如果他们加入政府，他们有变成一个根植于旧政权、现在依然由共产政府占主导的同盟的危险。他们担心被这个同盟同化，丧失自己作为旧政权的真正反对派的清晰面貌。另一方面，政府越来越不能处理全国混乱的局势。政府急需西德的财政帮助，它更容易获得那种帮助，如果因为反对派加入改革

乌尔里希·K·普罗伊斯

派（无论公正与否，革命的成功至少可部分归功于他们）而提高了政府的合法性。自相矛盾的是，在政府的共产党改革派和大多数公民团体成员之间，甚至存在一个内部的共识：双方都更倾向于保持这个国家及其内部改革的独立性，而不是倾向于和西德统一。在这个方面，公民团体的大部分成员与他们的同道即公民的大多数——民主德国真正的爱国者——是相对立的。

加入政府的决定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误算。虽然，圆桌会议方面的新部长加入内阁几天后，他们陪伴总理去了波恩，但这并没有什么用。西德政府拒绝给予任何财政帮助，因此给民主德国的公民们传递了一个明确信息，西德政府不打算对政府从反对派那里获得的道义支持给予特殊礼遇。不清楚的是，西德政府的拒绝是否导致了公民团体以至于整个圆桌会议声誉的下降，或者相反的，西德政府是否已经意识到，公民团体在他们加入政府、因而放弃了他们作为反对派的清晰角色后，已经丧失了相当多的信用。无论哪种情况，不容置疑的是，自2月份公民团体急剧的政治转变开始，公众对圆桌会议工作的尊敬明显减少了。大众媒体开始不再像以前那样广泛、友好地报道它，圆桌会议中一些最重要的、还没加入内阁的成员，宁愿投入到选举运动中去，而不愿出席其会议。同样，圆桌会议出去的部长们，尽管是不管部部长，精力主要被内阁事物占去了，不再经常出席、甚至根本就不出席圆桌会议。现在不是圆桌会议而主要是西德的来访者们，为他们在民主德国的关联党派竞选、设定政治议程。民主德国的公民已经厌倦了他们国家的一切，而欢呼来自“西方的”几乎任何人和任何事情。现在，圆桌谈判已经变成“他们国家的”一部分，大部分公民不再愿意把他们（圆桌会议的参与者）视为自己人。

虽然圆桌谈判影响力下降的这些环境因素主要与其在德国的独

特性有关（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它们也揭示了一个普遍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提到的是，公民团体在国家安全机构问题上成功反击了政府后，发生了一个分裂。严格的说，“公民团体”这个词是不准确的。这个团体组合包括一个政党，即社会民主党（SDP，后来的 SPD）。这个党和革命前根植于新教的“反对派文化”（opposition culture）紧密相联，但是它的创始人们有意识地把它作为一个政党成立，从而能够与其他政党竞争权力。正如我在开头指出的，在 10 月，社会民主党同意和公民团体形成一个选举联盟，那些公民团体有意识不让它们转化为一个或几个政党。在圆桌谈判中，它们把自己视为“反对派”的一个共同体。

到 1 月底，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公民团体的分歧变得明显了。社会民主党最不愿加入政府，而准备通过选举获得权力，突出自己作为一个政党的形象。圆桌谈判的制度设计——它的主要功能是将旧政权的各主要道义性反对派组织起来——对于制定和执行（积极的）政治政策这样一种任务没有充分空间。这种任务意味着要有通过和其他政党竞争而获得政治权力的能力，也就是在常规政治游戏中成功运用战略和战术的能力。因此，受到西方更大“母党”支持的社会民主党，切断了它 1989 年 10 月与其他公民团体建立的联盟关系。它对政治的理解越来越与那些公民团体相容，后者坚持他们的草根政治、公民性和道义精神的概念。并不奇怪，那些新成立的、被圆桌会议在其蜜月期所拒绝而限定为观察者角色的政党，现在也聚焦于它们作为权力竞争者的角色，越来越没有兴趣参与圆桌会议了（他们原本以观察者的角色属于圆桌会议）。

这样，3 月 18 日的选举结果，终结了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开始于圆桌会议从道义上作为反对旧政权的中心向参与到一个政府中去的蜕变，那个政府被广泛认为不过是旧政权的一个可恶程度略低的

版本。事实上，圆桌会议在它 3 月 12 日正式结束工作前，也就是选举前一周，已经凋谢了。

遗产

在未来的德国历史教科书里，圆桌会议最多将只会在一个简短的脚注中被提及。两德的统一及其对欧洲新时代与世界政治的意义，使公民团体和圆桌谈判——作为共产政权政治转型的制度性工具的圆桌会议——的最初角色黯然失色。几乎同样重要的，还有这样一个经常被人所用的理据，即推翻一个极权政权的能力，并不必然包含重建一个其经济和生态环境遭受了几乎不可思议的摧残的国家的的能力。这个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严格来说，旧政权并非被推翻的；也就是说，它并非被传统的权力手段及其最终方式即暴力所推翻的。它的崩坍主要是它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权和普遍的道德标准的结果；它垮台主要因为它缺乏道义可信性。正是公民团体的成员，不仅一直顽强地坚持实现人权，而且在 1989 年决定性的那几周有勇气声称“皇帝没穿衣服”。因此，他们积累了道义资源——这能够让他们推翻一个已经丧失了关键的内部和外部支持的政权。然而，这仅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这个缺陷的后果已经在上面描述过了。

只有一个圆桌会谈的工作结果可能会对德国的政治事务有长远的影响，那就是它的宪法草案。这并不是偶然的，圆桌谈判的第一个实质性决定就是起草一部新宪法。虽然，如我已经指出的，这意味着夺取一部分最高国家权力，同时它也是一个承诺：采用法律标准，限制个人的实际权力，为了未来而约束自己。一部宪法是一种现代的、道德上必需的社会契约。它要求所有的参与者与他们的短期利益保持距离，避免纯粹投机性战略考虑，坚持中立和公平原则。

虽然这些标准肯定意味着是对宪法实际制定过程的一种理想化，但毫无疑问，在革命的大局势下，在旧政权的道义破产很明显的情形下，懂得进行这种道德努力的可能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比在常规政治时期更大。因此，圆桌会议看起来最有资格做这样一件事，因为它代表了革命的道德原则与旧政权背离道德的权力之间的对立。

政治环境，特别是选举日从5月6日调整到3月18日（圆桌会议工作结束日）产生的时间压力，相当不利于在程序上处理宪法的制定过程。圆桌谈判建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在那个委员会下又建立了几个分委员会处理不同问题，它们都受到民主德国和西德专家的支持（每个团体或政党可以提名两名专家）。分委员会积累了相当多的文件和提案，起草委员会对它们的讨论主要由这个问题所冲淡了：西德基本法（Basic Law）是否应该几乎原封不动地被引入到民主德国，或者说，是否应该致力于制定一部同样自由和民主但却是一个不同、改进版的德国宪法。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得到清楚回答，因为公民团体掌管起草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在2月8日变成了政府内阁成员之一，整个进程越来越变成分委员会的责任，而那些分委员会中，最后只有编辑委员会持续运行。编辑委员会由圆桌会议中代表各团体和党派的大约12个人组成，但那些人并非都一直在使用他们的权利。最后的版本是在这些分委员会中敲定的，因为分委员会凭借优势地位而获得了相当大的独立性。分委员会的参加者很想把圆桌会议里各个团体和党派的不同立场考虑进去、做出权衡，尽管它们明显加入自己的争辩和期望。在草稿各部分文字定稿之前，他们召集起草委员会开会，提请起草委员会对分委员会归纳的一系列选项作出决定。他们把包括最终草案主要部分的文件，提交给3月12日召开的圆桌会议最后一次会议，请求将给他们的授权延长到4月初——那个时候，新选举的人民议会将召开会议。由于时间压

力，不可能对宪法具体规定或条款进行实质性讨论。

编辑委员会的请求获得了准许。这与圆桌会议对新人民议会的一个建议相关，即新人民议会在未来审议新宪法时将这个草案包括进去，并把终稿提交给6月17日的全民公投（是1953年反对现政权的失败起义的周年纪念日）。4月4日人民议会召开会议时，草案最终完成稿分发到了新的议员手上。此前的选举结果已经证实，公民团体只代表了东德一小部分公民（约6%）。自1月底以后就已经下降的圆桌会议的声音，还遭遇了一个事实的进一步打击，那个事实就是，无论错误还是正确，现在圆桌会议看起来已经成为所有倾向于保持民主德国存在和独立、反对与西德统一的政治势力的建制代表。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前“国民责任联合政府”成员之一、共产党在前民主党派中的一个主要盟友——的成为选举的胜利者，它曾参与圆桌谈判，但没有损害它的政治姿态，因为它把自己的政治形象同圆桌谈判的政治文化做了切割。因此，并不让人意外的是，人民议会甚至拒绝讨论圆桌会议的宪法草稿，或把它提交给相关委员会审议。

尽管遭受这一失败，这一最终因民主德国的湮灭而被锁定的失败，圆桌会议的宪法草案正在对当前德国的宪法争议产生显著影响。虽然，形式上民主德国加入了联邦德国，接受了基本法，但这个问题，即统一德国是否应该启动制定一部新宪法的程序，而不是仅仅把基本法扩展到前民主德国的领土和人民身上，已经冒了出来。有观点认为，前民主德国的公民应该参与到制定新宪法的过程之中，应该给予主要基于《基本法》的新宪法坚实又毋庸置疑的程序合法性（西德宪法叫“基本法”——译者）。这个观点受到基本法最后一条即146条的支持，它规定“当一部由德国人民的自由决定所制定的宪法付诸实施之时，本基本法将失效。”此外，倡导制定统一德国新宪

法的人认为，这将是一个改进基本法的合适机会。目前仍不知道这是否会发生，但是大部分呼吁实质性改进基本法的人指出，可以把圆桌会议的宪法草案作为新德国宪法的一个模板。那个宪法草案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比 40 年前的基本法更能对当代工业社会的政治问题做出反应。它更明确地关注技术变迁对个人权利带来的新威胁；它包括所谓的社会权利（工作的、住房的、教育的权利）同时又没有被广为人知的、这类积极个人权利的不一致性所损害；它规定了环境保护的操作规范；它比基本法更少家长制特征；它能克服一些纯粹的竞争性政党体系的缺点；它尝试鼓励和保护新形式的“公民政治”。然而，圆桌会议宪法草案之所以重要，主要理由在于它似乎是 1989 年革命少数几个真正持久的果实之一。在德国历史上，有一个例子与目前的局势有些相似。1848 年（失败的）德国革命的一个结果是选举国民议会。它起草了一部代表当时自由和民主运动理想的宪法。那部宪法从来没有被批准，因为普鲁士君主拒绝承认宪法所宣布的原则，即他的权力来自于宪法。尽管失败了，这部“保罗教会”宪法草案在德国宪法思想方面却变得非常有影响，因为它确实体现了宪政国家的思想和理想，对它那个时代的政治需求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音。甚至直至今日，德国宪法的所有教科书都包含了这一草案。在圆桌会议的支持和精神下起草的这部最近的宪法，也有可能比它的作者和它的起源环境都存活得长，因为它包含了第一次成功的德国革命的许多思想和理想。

附录：给前民主德国总理汉斯·莫得罗的问题

关于与圆桌会议相关的、总的政治局势

乌尔里希·K·普罗伊斯

1. 苏联干涉于 1989 年 10 月开始的发展进程的可能性，对你任职期间的国务审议、动议、行动方面有什么影响？

2. 是否有任何一方明确使用了这个涉及到政府和圆桌会议关系的论辩依据？

3. 就你所知，这样一个论据对其他相关的方面，尤其参与了圆桌会议的团体组织，有什么影响？

4. 国家内部安全机构（或它的一部分）干涉 1989 年 10 月开始的进程的可能性，对你任职期间的国务审议、动议、行动有什么影响？

5. 这个涉及到政府和圆桌会议关系的论辩依据被实际使用了吗？

6. 就你所知，这样一个论据对其他相关的方面，尤其参与了圆桌会议的团体组织，有什么影响？

7. 在政府和圆桌会议（或圆桌会议的一部分）之间是否做出过一些安排，以便在新选举之前的转型时期，某些著名的前政权代表可以不用为其过去所做的担责，可以被免除对其惩罚或报复？

8. 在你被提名为部长会议主席这个职位前夕，是否和旧/前政党的领导层代表讨论过这样一些安排？

民主德国政府和圆桌会议的关系

1. 你的政府（1989 年 11 月 18 日被选举出来的）有无通过某些方式（通过动议、劝告，或影响它的构成或其他类似的方式）影响

圆桌会议的形成？

2. 如果没有，你的政府知道有关圆桌会议形成计划的一些事情吗？如果知道，它持什么立场？

3. 政府是否把圆桌会议视为一个代表了民主德国社会（也包括政府）的政治统一组织，或把它视为一种谈判安排，反对派代表和前政权主张改革的代表以一种对过去否定和反对的态度，就转型到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进行谈判的安排？

4. 政府是否与圆桌会议的成员中前政权、党的代表保持了特殊的联系（比如，通过共同的共产党员身份的方式）？

5. 从政府的角度看，圆桌会议扮演了哪种角色：一个非正式的协商组织，一个正式政府或人民议会的协商组织，一个准立法组织，一个对政府或人民议会进行监督的组织？

6. 政府如何看待圆桌会议和人民议会的关系？哪个对政府更为重要？

7. 政府把圆桌会议视为一个处理国家当前问题的一个合法同盟，还是把它视为一个政府自认不得不依赖其合作的对手？

8. 从政府的角度看，圆桌会议所承担的角色合法性基础是什么？圆桌会议含有权力因子吗，如果有，它的权力基础是什么？

9. 在圆桌会议存在的过程中，政府对其评估、看法发生过改变吗（比如，在诺曼大街事件之后）？

10. 你为什么要求圆桌会议加入政府（作为政府更广的合法性基础，提高获得波恩援助的机会，加强/额外支持/增加民主德国作为

乌尔里希·K·普罗伊斯

独立国家的份量)？

11. 在你看来，圆桌会议是否——积极或消极地——无论以任何方式影响了 1990 年 3 月 18 日之前民主德国的政治事件进程？如果是，通过哪些决定或行动？

12. 在你看来，圆桌会议能否或是否应该以其他一些方式影响政治事件？如果是，以何方式？

注释

¹ 这一章主要处理民主德国中央圆桌会议在宪法上的一些问题。所谓“宪法上的”，我指的不是一个法律框架，而是圆桌会议及其行动的制度性品质和制度上的相关性。当然，圆桌会议可以从其他角度来描述和分析：比如，它特定的政策，以及它对 1989 年末至 1990 年 3 月选举始之前德国政治发展的涉入。从这个角度对圆桌会议进行全面、详细记述的作品，见 U. Thaysen, *Der Runde Tisch*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0)。

² 显然，这章某种程度上偏向于前反对派，不总是反映旧政权的想法和目标。这主要是因为缺乏民主德国最后一届共产政府其意图和行动的相关信息。与最后一任总理汉斯·莫得罗的访谈没有实现。虽然他之前答应我对在 1990 年 10 月发给他的问卷做出答复，最后他拒绝回答我的问题。我把问卷作为一个附录贴在这章后面。

³ Cf. U. Thaysen, *Der Runde Tisch; oder, Wer war da volk?* *Zeitschrift Fur Parlamentsfragen* (1990): 71 ff. 257 ff.

⁴ Cf. Neues Forum Leipzig, “Jetzt oder nie——Democratie: Leipziger Herbst ‘89’ ” (Munche: Bertelsmann, 1990).

⁵ Cf. Thaysen, 78 f. ; W. Ullmann, *Vorschule der Demokratie: Kirche und Runder Tisch* (Berlin: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1990), 9-10.

⁶ Cf. Ullmann, *Vorschule der Demokratie*, 11.

⁷ 接下来关于圆桌会议的程序和决定的事实，主要来自我得没有发表过的记录，以及对参与者和观察者的访谈。

⁸ 德语说法是：“Sie haben die Suppe eingebrockt, sie sollen sie auch auslöffeln. ”

⁹ Thaysen, 91 f.

第四章 捷克斯洛伐克的圆桌会议

莫里斯·卡尔达 (Moliš Calda)

捷克斯洛伐克多轮圆桌谈判导致了马利安·恰尔法 (Marián Čalfa) 政府于 1989 年 12 月 10 日建立及同一天前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 (Gustáv Husák) 辞职, 关于这些谈判有非常详尽的书面记载。1991 年秋天出版的会议记录记载了发生在 1991 年 11 月 26 和 12 月 9 日期间的九轮圆桌会议。¹ 记录的编撰者弗拉基米尔·哈泽尔 (Vladimír Hanzel) 自 1991 年 9 月起任瓦茨拉夫·哈维尔 (Vaclav Havel) 的私人秘书。哈泽尔仅付与出版了 9 次主要的圆桌会谈的记录, 实际上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会谈未被记录, 这一事实已经被曾在 1990 至 1992 年期间担任总理的彼得·皮特哈尔特 (Petr Pichart) 证实。这些重要会谈没有被记录显然是出于保密原因, 就是哈泽尔也仅仅是暗示了其存在。发表的会议记录非常戏剧性和尖锐, 不禁让人猜想是否有剧作家总统的“看不见的手”作用其中。

这一章的第一部分包括 9 次圆桌会议和总结会议的加注概要，第二部分我试图突出捷克斯洛伐克圆桌会谈的特点并与其他可参照国家做对比。四个附件包括以下列表：(1) 谈判的轮次，(2) 参会者，(3) 11 月事件后首届政府的部长们，(4) 恰尔法的全民谅解政府的部长们。

十次圆桌会谈

第一轮 (1989 年 11 月 26 日, 星期日)

第一轮会谈召开的时间离值得纪念的发生在 11 月 17 日的布拉格事件不足 10 天，在此次事件中，防暴警察们对于一个纪念反对 1939 年纳粹关闭所有捷克大学事件的学生集会的粗暴镇压，迅速激起了自 1948 年共产党政变上台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前所未有的一波民众公开抗议浪潮。每个人都越来越明显意识到这些示威游行不会消减，除非当权者做出重大让步，甚至发生更深远的社会变革。与此同时，反对派的“公民论坛”(OF) 运动于 11 月 19 日形成，它由知名的不同政见者领导。其中最知名的领导人是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 (生于 1936 年)，他曾于 1979 年至 83 年在狱中度过四年。他也是最知名的捷克反对派成员。另一个知名的公民论坛领导者伊日·丁斯特比尔 (Jiří Dienstbier) (生于 1937 年) 曾是个电台记者，也曾因其离经叛道的政治活动于 1979 年至 1982 年入狱三年。公民论坛的领导层还包括彼得·皮特哈尔特 (Petr Pichart) (生于 1941 年)，这个政治学家和律师在八十年代主导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共产主义制度和捷克历史的分析。为了稳定动荡局势，政府 (直到不久前还是苏维埃联盟阵营里最顽固

莫里斯·卡尔达

的成员之一)和组织日益完善的反对派决定于布拉格举行会谈。两边由中间方“莫斯特组织”(Most Group)促成走到一起,该组织成员有迈克尔·可卡(Michael Kocáb)和记者米哈尔·霍拉切克(Michal Horáček)。迈克尔·可卡(生于1954年)是个著名的滚石音乐人和电影配乐作曲;霍拉切克(生于1952年)是为一份青年周刊撰写温和的反政府的专栏文章的记者。建立于1989年夏天的莫斯特组织所发挥的作用,包括联系政府和公民论坛 两方并且组织安排他们的一次会谈。²

会议开始,在各方都强调了自己对于召开圆桌会议所起的作用后,联邦总理拉迪斯拉夫·阿达麦茨(Ladislav Adamec)首先发言。阿达麦茨(生于1926年)一生都是党内官僚,他1963年成为捷克共产党(CPC)的工业部门最高领导并随后在其他各个党内部门任职。1988年他成为联邦总理。他被认为是捷克共产党领导层中温和改革派的代表。阿达麦茨指出目前的事实是形势严峻,必须采取措施平息事态。他呼吁双方忘记过去的不快(这里显然是暗指不久前他用贬损的语言称哈维尔为“小人物”),并且呼吁双方为了公众利益寻求共识的达成。

他对筹备中的将于次日举行的罢工(罢工号召于11月17日的次日由演员和学生们发起)表示接受,但坚持罢工必须是政治性的(!),而且仅可持续几分钟,以不损害国家经济运行。同时,阿达麦茨说政府也需要时间去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实际上,整个会谈中,阿达麦茨(和其他共产党谈判者)都使用“给我们时间”这种说辞,意图推迟崩溃的到来,或者在他们的位置上苟延残喘更长时间,等待革命浪潮逐渐消退。哈维尔建议尽快启动政府和公民论坛之间真正的双边对话,

讨论各个层面的事项和行动计划。他同时邀请阿达麦茨作为发言者参加那天稍后会在布拉格最大的露天场所莱特纳举行的大型集会。阿达麦茨同意露面（不过是在近一百万民众的嘘声中受羞辱而已）。然后，哈维尔开始列举公民论坛的主张：

1. 政治变革：总统胡萨克在 1989 年底之前辞职；此外布拉格市共产党领导人米洛斯拉夫·斯蒂凡（Miroslav Štěpán）以及内政部长弗朗季谢克·金奇尔（František Kincl）也必须辞职。³ 必须修改宪法以及一定程度上重建联邦议会。

2. 在议会建立一个委员会调查 1989 年 11 月 17 日事件（以以确定是谁向防暴警察下令“屠杀”学生）。⁴

3. 政治犯和因政治原因被拘留的人必须被释放，并撤销对他们的指控。

4. 宣布新闻和信息自由，政府停止散布虚假信息。

这次博胡斯拉夫·库切拉（Bohuslav Kučera）开始回应。库切拉（生于 1923 年）曾一直是社会党的成员，而社会党就是几个傀儡组织之一，唯一的存在目的就是让捷克共产党有自称是多党制民主的口实。库切拉也要求多给一些时间，并强调所有要求都必须依法办理。阿达麦茨附和库切拉称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称胡萨克的辞职很难由阿达麦茨甚至政府决定，而必须由议会来“解决”。

阿达麦茨拒绝承诺他会在莱特纳的演讲中要求胡萨克辞职；他要求对总统职位保持足够的尊重。他声称任何的激进行为都可能会与双方的利益背道而驰。阿达麦茨肯定非常焦虑不安，否则他不会发表一

莫里斯·卡尔达

些可笑的声明，例如警告说学生们的罢课将会使得捷克堕入第三世界国家行列。

这一轮会谈的最后，参会者同意两天后、也就是全国范围的总罢工的第二天，举行下一轮会谈。

第二轮（1989年11月28日，星期二）

此次会谈的参会者名单参见附表2。联邦总理阿达麦茨做了开场白，提议讨论两个突出议题：公民论坛在第一轮会谈中提出的要求；前一天的罢工及迅速恢复生活“正常化”。

阿达麦茨列举了公民论坛提出的要求中哪些政府已经满足的：有些政治人物已经辞职；建立议会委员会调查11月17日事件的提案，也将于次日提交给联邦议会；政治犯名单已经提交给总统胡萨克；米洛斯拉夫·巴维尔（Miroslav Pavel）已经被任命为捷克电视台新的台长，他恰好是政府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巴维尔将以一个有反对派成员参加的节目委员会做工作顾问。阿达麦茨沿袭了他早先的“法治”谈判策略，声称他只能讨论联邦政府所负责的事务，而非共产党（CPC）相关事务（他仍是而且将还会是其重要成员）、国民阵线（NF）或联邦议会相关事务。让哈维尔觉得好笑的是，阿达麦茨指出他自己甚至不是议会成员，更好笑的是他邀请反对党为实现第九个五年计划举荐专家。阿达麦茨显然没有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居然说他最大的期望是尽快“解决”罢工并恢复正常生活。

当阿达麦茨和他的团队成员用坚持“合法性”来兜圈子拖延时间

的时候，哈维尔继续提出迅速变革的要求。他一再警告说民众——他提到奥斯特拉发地区的矿工——已经对进展的缓慢失去耐性。这不是激进的高压攻势，事实上哈维尔强调了公民论坛代表团的中间立场，将布拉格和其他捷克城市街头的民众描述成日益激进。他说只有尽快实行全面的变革，民众才能被安抚。很难确定反对派方面真的到底有多惧怕乌合之众的暴力，事实上，公众情绪远没有激进到足以超越或者瓦解公民论坛的地步。

哈维尔一直很注意捷克与斯洛伐克之间的礼让，他提醒阿达麦茨说公民论坛并不是反对派唯一的代表，一个来自斯洛伐克的“公民反暴力论坛”（VPN）的代表扬·察尔诺古尔斯基（Ján Čarnogurský）也到会了。察尔诺古尔斯基（生于1944年）是个公司律师，已经成为斯洛伐克天主教持不同政见者的一个领袖人物。他因为不同政见活动曾在政权最后三个月一直被警方拘押，而后他继续发表一些反对派的基本主张。哈维尔认同阿达麦茨所说的双方目标一致：稳定局势并“建立秩序”。但他明确反对阿达麦茨使用“正常化”这个词，因为显然这个词与1968年国家苏联化以后的状态密切相关。哈维尔还要求为公民论坛提供一个配备更多电话线的场所（当时公民论坛驻扎在布拉格市中心的魔幻灯剧院地下室，只有一条电话线）。

反对派提出的主要主张包括：阿达麦茨必须向总统胡萨克递交辞呈；反对派希望新政府的组建可以重新委托阿达麦茨负责。次日，联邦议会应当开会讨论删除宪法中三段相关段落（关于坚持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地位、坚持共产党在国民阵线（NF，由共产党和它的附庸党团组成的联盟——译者）的领导地位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

莫里斯·卡尔达

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接受议会议长阿洛伊斯·英德拉 (Alois Indra) 被要求的辞职，并选举一个新的没有历史污点的议会议长加速议会进程。此外，那部 1989 年 1 月匆忙通过的、给予警方法律手段对付日益频繁的反政府示威抗议活动的法律，应当废止。12 月 1 日，周五，阿达麦茨应当提出他们的新政府人员和计划；反对派将讨论新政府人选。哈维尔提出与长期的共产党做法不同，新议会应该差不多是常年开会的。兹代涅克·依琴斯凯 (Zdeněk Jičínský) 补充说联邦议会和那些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邦议会议员如果无视“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就应该被相应的立法机构撤换，代之以国民阵线 (NF) 和反对派的共同提名人。哈维尔进一步要求新政府保证集会、结社和新闻的自由。民兵组织⁵ 应当立即解散(因为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同时国家对教会的控制也应当解除。新政府应当立法保障正当反对意见并且“解决”在工作场所派驻党政机构的问题。⁶

哈维尔进一步再次强调解除总统胡萨克职务的必要，并威胁说如果政府不能在一周内做好推行反对派计划的准备，反对派就会要求组建由阿达麦茨以外的其他人领导的新政府。瓦茨拉夫·马利 (Václav Malý) 神父提出了反对派方面更多的要求，包括定期在电视台和国家电台露面。

阿达麦茨抱怨说反对派的要求就像个最后通牒，这一点哈维尔也承认并反复重申公众已经日益失去耐性，他们指望得到辞职的明确期限。他进而说如果反对派不表达 *他们的* 要求，公民论坛可能就会失去其公信力从而让公众感觉是“某个自封的家伙和政府沆瀣一气”，公众会因此抛弃公民论坛，他警告说这将会导致因为没有调停方的存在而

产生的混乱。

阿达麦茨在回应反对派的要求时承诺会重建他的领导层，吸纳其他党派⁷ 和非共产党员。但他拒绝提供一个最后期限，并且又使用了“依法”这个辩词：“先生们，我主张合法程序！...如果你们一定要冒进的话，我只能退出”。改变要由单独的立法机构自身来推行。他声称他同时还在与其他一些可以作为合作者的组织洽谈。⁸ 阿达麦茨高调地宣称他不希望用一个一党专制代之以另一种一党专制，而且他阿达麦茨心系的是国家的福祉而不是个人职位。如果要面对哈维尔这样的最后通牒，他宁可洗手不干了。

经过短暂的会间休息之后，阿达麦茨针对反对派的要求做出了一系列强硬的反驳：（1）他无法接受时间限定；（2）政府会在一周内重组，反对派应当提交他们的部长职位候选人名单；同时（3）反对派应当作为政治党派进行登记，终结作为独立公民团体的状态。独立团体目前有 18 个之多，使得政府沟通困难。

阿达麦茨拒绝立即辞去总理职务，辩称他首先必须听从那些意在维护国家利益的人的意见。他声称无权将英德拉从联邦议会议长的职位上挪走，但承诺会向其建议去职。彼得·米勒（Petr Miller）反驳说局势从第一轮以后正在加剧变化，以致工会正逐步瓦解，很可能会有新一轮的罢工。米勒（生于 1941 年）原是个工厂工人，1989 年以前一直与知识界的不同政见者保持密切联系。他说反对党坚持要求阿达麦茨当天辞职，并在次日进行修宪，同时坚持总统胡萨克在 12 月 9 日前（人权日前夕）辞职，同时无条件释放政治犯，除此之外其他期限都可以商量。哈维尔提醒阿达麦茨说他的辞职将会是个表明变革确

莫里斯·卡尔达

实在发生的象征性姿态，而这正可以给他提供缓冲时间。阿达麦茨显然在以他的方式拖延时间，回答说 he 必须首先听取其他诸如人民党（People's Party）、社会党（Socialist Party）、国民阵线（NF）及其成员组织，以及独立团体的意见。当阿达麦茨说他需要与“革命工会（Revolutionary Trade Unions）”的新领导层协商时，米勒不客气地对他说这些人根本不能代表任何人。对于让公民论坛成立政治党派的建设，依琴斯凯反驳说政治党派的建立是个耗费时间的过程，应当到自由选举之前进行进行（这是自由选举这个词首次在记录里出现）。

哈维尔要求讨论要尽可能具体，这时候谈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问阿达麦茨是否愿意向联邦议会提交修宪议案，是否可以期待英德拉辞职，是否真的有希望现任总统会在 12 月 9 日去职。阿达麦茨再一次试图辩解说他在联邦议会没有发言权，他甚至不是议会成员。但察尔诺古尔斯基（一名律师）提醒他说联邦政府有权提交新法案，并且阿达麦茨实际上第二天就可以提交宪法修正案。这时马利安·恰尔法（Marián Čalfa）开始第一次发言。恰尔法（生于 1946 年）尽管年仅 18 岁就入党，但并没有党内机构任职背景。他在联邦政府办公室担任中层官员 15 年，于 1988 年成为联邦政府负责立法的部长。恰尔法指出新宪法已经预备一段时间了，⁹ 其中完全没有提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因而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他拒绝考虑在不仅未经联邦议会也未经捷克和斯洛伐克邦议会讨论的情况下就废止国民阵线（NF）。¹⁰ 依琴斯凯反驳说没有人希望废止国民阵线（NF），只是希望它脱离共产党的控制，重要的是将提案提交给联邦议会以便让民众看到事情有进展。

这时一个很说明问题的对话发生了，阿达麦茨建议反对党提出内阁部长人员名单，而依琴斯凯和米勒说公民论坛无意于此。阿达麦茨反唇相讥说反对派根本不想承担责任。依我看来，这次交锋暴露了反对派在进入谈判的时候准备得多么不充分，他们手头根本就没有现成的候选人，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三轮谈判时捷克总理皮特拉再次提出同一建议。这种面对空门都不能临门一脚的无能为力，带来的最显著的后果就是转型过程一定程度的延缓，这些后果在随后的几个月能明显感到，甚至有人说一直到今天都能明显感到。

在第二轮的最后几分钟，哈维尔宣读了一份由反对派和阿达麦茨的顾问奥斯卡·科雷奇（Oskar Krejčí）准备的公报，内容包括：（1）公民论坛将要求总统在 12 月 10 日前辞职；（2）总理承诺 12 月 3 日周日前组建新政府；（3）联邦政府次日将提交从宪法中废止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宪法修正案；（4）总理向公民论坛代表承诺马上与布拉格市政当局商讨向公民论坛提供办公场所事宜；（5）公民论坛（OF）和公民反暴力论坛将自由接触、运用媒体。

虽然有了公报草案，第二轮谈判的结果却是分别被反对派和联邦政府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声明公之于众。

反对派的声明包括公报草稿里的五点并加入了其他几点：（1）总理已经要求总统特赦政治犯；公民论坛将要求总统最迟在 12 月 10 日前满足这一期望；公民论坛保留更新政治犯名单的权利；（2）公民论坛对联邦议会副议长的这一声明表示满意，即他将向议会提议组建特别委员会调查 11 月 17 日事件，该委员会将同时邀请宣称代表参加；（3）公民论坛要求总理发表一个政府计划，清楚说明政府政府将允

莫里斯·卡尔达

许选举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以及新闻和言论自由；停止监控教会；修改军队征兵法和其他法律。有必要解散民兵组织并审查在工作场所遗留的派驻政治团体机构。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代表已经明确向总理表示，如果公众对政府的计划和执行不满意，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将要求总理在年底辞职并要求总统重新任命一位新总理；总统如果认为必要的话可以由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运动提名新总理候选人；（4）11月29日，公民论坛将会书面促请总统胡萨克在12月10日前辞职。（5）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向总理建议由他的内阁提交修宪案，以确保遣散所有那些无视人民利益和意愿的联邦议会成员以及捷克和斯洛伐克邦议会议员（包括各地地方政府官员）。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提出补选的方式。（6）公民论坛要求政府和联邦议会立即公开谴责发生在1968年的华约五国入侵，并要求苏联和波兰、东德等国的立法机构宣布入侵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华约自己的法律；（7）公民论坛要求所有市民继续工作但同时保持随时准备罢工的状态。

联邦政府的声明指出了会谈各方的分歧，并承诺在12月3日前向总统提交一份主要由专家组成的广泛联盟基础上的新政府名单。联邦政府将会向联邦议会提交三项宪法修正案（针对共产党在政府的领导地位，解散国民阵线，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教育中的地位被科学和人道主义原则所替代）。阿达麦茨还承诺向布拉格市政当局要求为公民论坛提供办公场所。

第三轮（1989年12月1日，星期五）

第三轮会谈伊始，哈维尔强调民众已经失去耐心，必须尽快采取

下一步行动。¹¹ 他进一步提出公民论坛协调中心希望讨论的三点要求：（1）公民论坛的法律地位；（2）公民论坛的办公场所；以及（3）捷克政府需要做出的改变。捷克共和国总理弗朗季谢克·皮特拉看来比阿达麦茨容易妥协，他立即接受了前两点，会谈也因此进入对第三点的讨论：哈维尔建议皮特拉不要试图“重组”他的内阁，而应立即辞职（他指出，如果只是重新调整内阁，民众会认为其中有内幕交易，由此可能引发危机）。他建议说新内阁成员必须真正是新面孔和专家，补充说皮特拉的五个现任部长（全是共产党员）对于公民论坛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随后提出了与阿达麦茨前几次会谈时相同的意见：关于集会、结社及言论自由；关于民兵；关于工作场所党组织的问题。他仍用往常的论据来支持这些要求：公众已经失去耐心，可能恢复罢工。

和阿达麦茨一样，皮特拉表示他希望改组政府而不是辞职。他还和阿达麦茨一样强调了程序合法性，但他也表示会尊重那些已经被捷克斯洛伐克接受但尚未实施的国际规范。他也玩拖延时间游戏，辩称有必要等到联邦政府组成再看看还有哪些人“留下来”可以在捷克共和国任职。

彼得·皮特哈尔特此时毫不客气地告诉皮特拉说他与 11 月 19 日的言论已经使得他不可能像阿达麦茨一样获得公民论坛的支持继任下一任总理。¹²

皮特拉辩称，在他发表电视讲话的那一晚，他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里唯一露面的，而他当时并不知道他所评论的事件的真相。皮特拉的顾问约瑟夫·梅察（Josef Mečl）替皮特拉辩护说他曾反对过

莫里斯·卡尔达

一些像“警棍法”这样的强硬法规。警棍法于1989年1月由共产党立法机构通过，目的在于向警方提供更多对付示威者的手段。那一法案是在纪念扬·帕拉赫（Jan Palach）去世20周年的自发游行示威发生后推出的。

哈维尔反诘说如果联邦和捷克的总理人选都保持不变，民众会认为没有任何进展。按照哈维尔的说法，留给皮特拉的唯一留任机会，是提名一个会被民众自然接受的内阁。实际上公民论坛协调中心愿意不在他们的任何通告中提及皮特拉的名字，给他一个通过迅速提名一个被广泛支持的新内阁而获得民众支持的机会。像与阿达麦茨的会谈一样，哈维尔进一步阐述了公民论坛协调中心坚持用“辞职”而不是“改组”一词，以达到显著的社会“效果”。如果皮特拉递交辞呈，公众会给他两周时间；如果他试图只是改组内阁，公众的反应在两天之内就可能发展到无法预计的地步。必须指出的是，第三轮会谈在周五举行，两天后剧院团体和学生就将做出是否继续罢工罢课的决定。

当皮特拉邀请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提名部长候选人名单时，一个关键和说明问题的时刻到来了。与前两轮一样，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显然还是没有对这种情况作好准备。（后来在一次采访里，彼得·皮特哈尔特承认在为这一轮会谈进行长时间和疲惫不堪的准备的时候，他们低估了皮特拉接受这种提名的意愿，也没有意料到他会毫无斗志地放弃抵抗。事实证明阿达麦茨才是政权的最忠实的守护者。其他解释也有可能）。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不希望造成一个印象好像他们是在提议“他们的”部长 候选人。他们也不希望加入国民阵线或者成为一个政党。他们视自己的角色为一种制衡，一种保

障，确保当局落实自由选举之类的社会期望。局势会如何发展还取决于一些外部因素，特别是戈尔巴乔夫马耳他海滨的美苏高峰会上的讲话。

在第三轮会谈余下的时间里，会谈者讨论了公报草案。其中，最有趣的分歧可能是以下措辞：“这些议题将与各政党、国民阵线和其他民间自发组织讨论”。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要求删除这一段落，因为这样的措辞贬低了公民论坛的重要性。哈维尔提醒政府代表所有的民间自发组织只要不是国民阵线成员的，都在支持公民论坛。所以在第三轮公报的第一部分，两边的观点就表现出分歧。

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对于从宪法里删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表示欢迎，并列出了如下要求：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解决”工作场所中民兵和党组织这一“问题”。公民论坛协调中心同时指出最好的政府变革形式就是集体辞职。

在政府一方的公告里，皮特拉对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指出，捷克政府只能解决那些在其权限范围内的问题。他接着简要归纳了几项捷克政府已经向捷克国民议会提交的草案，它们是关于审查制度、教育、人权和环境保护的。捷克总理表达了希望国家向世界文化开放并回归自身深厚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传统的愿望。他说他的政府准备好了清除所有政治、立法和行政方面的障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捷克总理将会改组他所领导的内阁；所有会谈中提到的建议都会与各政治党派和其他国民阵线（NF）组织探讨。捷克政府强调对于公民论坛协调中心的登记、合法使用办公场所、开立银行帐号和诸如此类的事项没有任何阻碍。

莫里斯·卡尔达

在公报的最后部分，参会者共同呼吁所有市民在实现全面民主的道路上表现出负责任的态度，杜绝压迫和公开诽谤政治对手的行为。

第四轮（1989年12月5日，星期四）

这一轮戏剧性的谈判，发生在阿达麦茨从莫斯科之行返回后，他到那里去征求意见，并且据推测见了戈尔巴乔夫。¹³ 这次会谈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新联邦政府的组建。会议伊始，阿达麦茨就向公民论坛协调中心要求把他们的建议具体化。作为公民论坛协调中心发言代表，哈维尔提议政府设7位副总理。他提名了一位主管经济的反对派副总理候选人弗拉基米尔·德罗西（Vladimír Dlouhý），一个共产党员，但没有提名主管立法和安全的副总理职位，说只要是个斯洛伐克人就行，这样就能保持均衡代表。哈维尔接着提名伊日·丁斯特比尔（Jiří Dienstbier）为外交部长，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为财政部长，以及彼得·米勒（Petr Miller）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他曾在布拉格最大的工业企业索科洛夫 ČKD 当铁匠和罢工委员会领导人。关于联邦内政部长的职位，哈维尔提名巴维尔·里赫茨基（Pavel Rychetský）。有趣的是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提名公民反暴力论坛的扬·察尔诺古尔斯基（Ján Čarnogurský）取代洽尔法。

阿达麦茨提醒公民论坛协调中心说在他们所提名的政府部长名单中，代表斯洛伐克的人选不足。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接下来看到是阿达麦茨出乎意料地宣布将提名博胡米尔·乌尔班（Bohumil Urban）而不是他本人出任下任联邦总理。阿达麦茨如果要担任总理，由于以下两个因素，他有人不曾料到的强有力的讨价还价地位：他已经得到了反对派一定条件下的支持，也因此赢得了大量的政治资本；他也是

现任政府成员中第一个同意与反对派对话的代表，作为最近被任命的总理，他也许享有政府官员最广泛的支持。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显然对于阿达麦茨突然戏剧性地公开其意图措手不及，发现正当民众如他们所料嚷嚷着讨要结果的时候，他们突然猝不及防地需要另找一个谈判对手。阿达麦茨承认说他还没有向乌尔班征询提名他作为联邦总理的意见，这使人觉得他的提名比较情绪化和冲动。然而后面我们会看到，这其实是个精心筹谋的政治赌注，一旦成功就会使得他成为下一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维尔明显失望了片刻之后，提醒阿达麦茨注意社会普遍的不安情绪，暴民将公民论坛甩在后面的可能性，不受控制的罢工等等。哈维尔说他别无选择，只有拜谒总统胡萨克并提交反对方自己的总理人选。眼看哈维尔就要打电话给总统府预约与胡萨克的面谈，阿达麦茨的顾问奥斯卡·科雷奇提议哈维尔与阿达麦茨单独私下交谈一会儿。哈维尔迟疑地答应了。

（根据彼得·皮特哈尔特的说法，公开的会议记录在此处遗漏了一大段重要内容。会议暂停期间，科雷奇，这个被皮特哈尔特事后形容为“非常狡诈非常危险的人”，向目瞪口呆的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们提议推荐阿达麦茨为下一任总统。阿达麦茨显然刻意安排回避做出这项提议的时刻，可能出于一项不成文的捷克传统，须由他人推荐提名而不是自荐。）

同一天晚些时候，哈维尔知会了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他与阿达麦茨私下会谈时后者提到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情况。苏联人据说对阿达麦茨的改革表示支持，条件是他们按苏联改革模式进行。苏联人似乎是希望反对派会协助进行一个 1968 年式的斯洛伐克捷克改革进程。阿

莫里斯·卡尔达

达麦茨感觉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已经过快，因而拒绝领导一个彻底激进的转型。

在阿达麦茨和哈维尔从单独谈话回到谈判桌后，哈维尔说公民论坛协调中心将于晚上 7 点 30 宣布他们已经要求联邦总理辞职，因为他关于改组政府的建议根本不可接受。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们会立即向总统要求提名新总理候选人。然而当开始讨论到总理阿达麦茨在电视讲话里宣布辞职的问题时，政府代表们指责公民论坛协调中心将无法接受的压力强加给阿达麦茨。阿达麦茨透露说他已经与切斯米尔·凯撒（Čestmír Císař）和沃伊捷赫·门茨尔（Vijtech Mencl）同志谈过，后者被认为是成千上万的民众的代表。¹⁴ 阿达麦茨生气地提醒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说他们不应该自以为是整个国家唯一的政治力量，他同时声称没有时间建立一个新政府，因为他必须去莫斯科，他必须出席农业合作社代表大会。

这时，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阿达麦茨的助手巴维尔提议阿达麦茨作为一个受到大多数公众支持的人应该成为下一任总统。这是第一次当着阿达麦茨和哈维尔两人的面提出这样的建议。犹豫片刻之后，哈维尔提议如果阿达麦茨成为总统，则公民论坛协调中心候选人、人民党时任中央书记理查·撒彻（Richard Sacher）担任总理职务。这样就能一举解决几个问题：共产党员成为总统，一个非党员（但是国民阵线成员）成为联邦总理。但他们都是捷克人，这就意味著必须找到一位斯洛伐克人出任联邦议会主席。¹⁵ 当阿达麦茨可笑地提名比拉克（Bil'ak），一个臭名昭著的斯洛伐克共产党强硬派政客时，引起会场一阵骚动。比拉克即使在布拉格之春时也旗帜鲜明与勃烈日涅夫站

在一起。当哈维尔抛出扬·察尔诺古尔斯基作为议会议长候选人时，阿达麦茨指出察尔诺古尔斯基连联邦议会成员都不是，他很怀疑议会在现行架构下会接受他作为议长。可卡（Kocáb）说议会必须接受，正如它必须接受解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且如果阿达麦茨获得多数支持，议会对于议长也没有其他的选择，这时，联邦总理罕见地直截了当地表示了他的怀疑：“我是个经验丰富的人，我和这些人打交道多年，我太了解他们了。”当奥斯卡·克列杰（Oskar Krejčí）（估计是为了不着痕迹地重新提议阿达麦茨为总统）提议一个斯洛伐克人为总理候选人而哈维尔又一次提议察尔诺古尔斯基时，阿达麦茨闷闷不乐地说这个提名不可能为议会所接受。他甚至抱怨说他自己的党把他叫做叛徒，而他加入这些谈判仅仅是因为戈尔巴乔夫要求他这样做！阿达麦茨似乎处于游离状态，好像梦游，他说世上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可以做，比如坐在酒吧与哈维尔对坐喝啤酒。

当阿达麦茨提名共产党官员马利安·恰尔法（Marián Čalfa）作为联邦总理的时候，转机又一次来临。恰尔法在 1988 年联邦政府改组时赢得政治声望。他在分管立法的副总理任上，督导了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宪法的预备工作以确保与苏联改革保持一致。恰尔法的政治形象是新一代里色彩并不鲜明的共产党官僚，一个与“正常化”时代的压制没有什么牵连的人。在阿达麦茨的内阁，只有四个斯洛伐克人：安德烈·巴尔恰克 Andrej Barčák（只是工业主管），帕维尔·赫里夫纳克（Pavol Hrivnák，还是斯洛伐克总理），威廉·罗斯（Viliam Roth，还没有什么声望），以及恰尔法。在捷克斯洛伐克特殊阶段的平衡游戏中要求一个斯洛伐克人当联邦总理的时候，恰尔法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共产党候选人。虽然阿达麦茨仍更看好乌尔班，但恰尔法是他的第二

莫里斯·卡尔达

人选。

这时候哈维尔提议这轮谈判休会并于明日继续进行。本轮剩下的就是会议公报问题。虽然在第四轮会谈的最后几分钟气氛十分轻松，联合公报仍未能发表。

哈维尔（代表公民论坛协调中心）和米兰·克纳泽科（Milan Křňařzko）（代表公民反暴力论坛）在一次致阿达麦茨的单独私人信件中说他们从他身上看到他只想保障国家政权延续，却不愿对于急需改变的联邦政府和总统职位进行讨论。在信的末尾，他们说阿达麦茨作为总统候选人不会被大多数民众认可，而且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组织也无权在这个问题上给他支持。如果他会像他在第四轮开始时提议的那样辞职，反对派的最新人选名单将很快公布。

第五轮（1989年12月6日，星期三）

我对第五轮的描述会比前几轮简略，因为缺乏足够的材料。¹⁶ 但我们也足以由此管窥体系崩溃后党的最高领导层普遍弥漫的情绪。新的总书记卡雷尔·乌尔班内克（Karel Urbánek）表现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很显然喜欢哈维尔这样的伙伴。¹⁷ 乌尔班内克承认共产党受到人们的反对，但他向反对派信誓旦旦说新的共产党领导层通过谴责1968年非法入侵，已经努力有一个新的开端了，即使应该被打碎，捷克斯洛伐克应该坚持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社会主义特征会存在于对抗失业的“社会保障”中。乌尔班内克接着用赞赏的口吻谈到公民论坛发起的运动：“你们带来了了不起的进步，你们带动了文化先锋和年轻人。”¹⁸ 同时他也非常现实地补充说，“你们带动了前进趋

势，当然你们就完全有权设定条件，这是你们的权利。”

他接着向反对党提出次日举行一个三方会谈，让复兴（Obroda）俱乐部也加入进来。尽管让各政党参加圆桌会议的建议使反对派十分意外，哈维尔接受了建议并提议讨论规范参会者数量的规则，另外其他国民阵线党派也必须出席。参会者同意会议在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实况转播。

轮到哈维尔发言的时候，他向乌尔班内克提出了其他问题：共产党对于数以万计的国家安全机关（StB）人员的去留有何打算？乌尔班内克建议国家安全机关（StB）未来的职责包括审计企业、抓偷税漏税（！）和打击贩毒。

在谈到总统问题时，乌尔班内克呼吁要有更多耐心，说如果就这样把胡萨克赶下台不太合乎宪法，毕竟他的任期到1990年5月就届满了。他透露说他已与总统胡萨克有过一次长达四小时的会谈，胡萨克当时说他准备立即辞职。按照乌尔班内克比较个人的看法，他认为胡萨克其实是个民主主义者，他宣称自1968年以后不允许有任何政治审判。¹⁹ 胡萨克还声称稳定了1968年以后的局势（这一点在反对派的眼里可不是功绩），“让母亲和孩子免于分离”（意思是延长了产假），提高了养老金。在与乌尔班内克的谈话中，胡萨克据说宣称他已经被其他共产党政权的成员永远排斥出局，而且一直持续承受来自勃烈日涅夫的压力。胡萨克否认对政府不遵守法律负有责任，辩称他无法知晓所有的单独法规（这种说法出自一个战前法学院硕士并在担任共产党官僚前曾是一名出色的公司律师的人，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莫里斯·卡尔达

作为回应，哈维尔坚持让胡萨克辞职，并威胁说如果下周一前他还照做的话周一就会有一场总罢工。然而如果胡萨克立即辞职，就会得到一份丰厚的退休金并得到尊重。

哈维尔提请大家关注未来联邦总理职位的问题。反对派要求这个职位更保持延续性（也就是说阿达麦茨需要留任），而不是匆忙换人（意即威胁阿达麦茨辞职）。未来总理的问题也关系到总统职位：其中之一必须是斯洛伐克人。周日前必须抉择；最近删除了宪法第四条款（该条款赋予共产党在政府里的领导地位），但这一点进展让老百姓无限期满足。²⁰

乌尔班内克声称，考虑到删除宪法第四条以后的新局面，他不会干涉新政府的组建，他只有权确保进入新政府的共产党员的人格正直。

在这一轮的末尾，哈维尔强调反对派并无意惩罚全国一百七十万的共产党员。乌尔班内克做结束发言时对这一轮会谈表示满意，并呼吁团结，以给捷克斯洛伐克的未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我们终将证明一切”。第五轮会谈没有发表公报。

第六轮（1989年12月6日，星期三）

在这轮只有13分钟的、极短的会谈开始时，哈维尔告诉阿达麦茨反对派与乌尔班内克的会谈表明他们的要求既不夸张也不过分，相反非常克制。²¹阿达麦茨称他现在正尽一切可能本周末前完成政府改组。他建议共产党员在其中占到百分之五十的比例，但他拒绝直接回答杨·布达（Ján Budaj）是否这百分之五十包括国民阵线成员。阿达麦茨还要求反对派不要把他的内阁组成公之于众。这时皮特哈尔特

将话题转到与乌尔班内克的会谈，说反对派之前的要求太温和，在这方面应该有所补充。

至于总统职务问题，阿达麦茨只说他会向胡萨克转达反对派促请他辞职的要求。

关于这一轮的简要公告提到阿达麦茨收到了公民论坛对于联邦政府职位的提议。有意思的是公告并没有提到任何公民反暴力论坛参会者，而实际上第六轮会谈有好几位公民反暴力论坛参会者（察尔诺古尔斯基、弗拉迪米尔·昂德鲁斯（Vladimír Ondruš）、米洛斯拉夫·库西（Miroslav Kusý）、布达和克纳泽科）。

在致阿达麦茨的信中，公民论坛协调中心和公民反暴力论坛组织协调委员会提交了进一步的人选名单，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他。反对派不仅提名了扬·察尔诺古尔斯基为第一副总理，在捷克和斯洛伐克总理人选之外，还新增四位副总理提名：（1）一位人民党代表；（2）一位社会党代表；（3）弗拉基米尔·德罗西（Vladimír Dlouhý），一名共产党员，负责经济，以及（4）米洛斯拉夫·库西（Miroslav Kusý），一个改革派共产党员，负责处理政治制度、立法和国家强制工具问题。

至于各部部长，他们提名以下人选：伊日·丁斯特比尔（Jiří Dienstbier），一个著名的异见分子和前共产党员，担任外交部长；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担任财政部长；彼得·米勒（Petr Miller）担任劳工和社会保障部长；以及古乌拉·坡普利（Gyula Popely）担任民族政策部长。阿达麦茨的现政府人员中，反对派仅仅支持其中一位。反对派很明显也愿意不强求新的内政部长一定是非共产党员，只

莫里斯·卡尔达

要国家安全机关（STB）受一个新的、由库西领导的政府委员会管辖，库西是被提名的副总理之一。信末，反对派表示寄望阿达麦茨的新政府获得比其前一届政府更积极正面的公众反响。

第七轮（1989年12月7日，星期四）

第七轮会谈讨论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在不断变化的局势里所可能承担的角色。²² 哈维尔向国防部长瓦采克保证说反对派相信他个人，知道他的军队不会用来对付人民。

公民论坛协调中心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有传言各级士兵被切断消息来源、无法知道兵营外发生的事情。瓦采克否认高层发布过带有这种意思的命令，但也承认说在基层发生这样的事是可能的。

哈维尔向瓦采克保证公民论坛协调中心甚至并未考虑过退出华约（！），公民论坛协调中心清楚单个国家从军事联盟里退出并不能实现欧洲的团结。

瓦采克随即提出计划中的总罢工问题，要求不要影响到军队。他声称公众已经对反对派开始厌倦，不满反对派给政府的压力。²³

谈论到共产党在军队都建有组织这一事实时，瓦采克赞成要么在军队禁止所有党组织存在，要么也允许其他国民阵线党派和公民论坛进入军队。哈维尔极力主张在军队里绝对禁止政党组织，但建议允许士兵个人加入党派。他还提出了“论坛”的概念——为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以及也许还有其他党提供讨论平台；但这些论坛不会层级性地组建，以免干扰军队的指挥结构。可想而知，瓦采克没有对此做出多少热情反应。

在最后的公报里，两个代表团声明没有理由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表示不信任；文件还提到民兵的装备都已经移交给军队。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团表示他们尊重捷克斯洛伐克在华约中的成员地位，同时表示希望欧洲的两大军事联盟华约和北约能最终解散。

第八轮，第一部分（1989年12月8日，星期五）

关于第八轮谈判的议程有好几种提议。²⁴ 马丁·乌察（Martin Ulčák）建议讨论三个议题：未来政府的特性、联邦总理的人选以及新政府的建立。库切拉（也许是为了拖延时间）建议讨论几个备选宪法草案，从而产生一个单独的文件提交国民讨论。这个提议被反对派以其重要性远不如联邦政府的组建而否决了。可卡补充说总理候选人应与未来的总统人选一同考虑。乌察提议的议题经过可卡更正后被采纳了。

皮特哈尔特代表公民论坛协调中心发言说，政府应该是过渡性的，仅仅持续到大选。政府应该积极筹备新的立法机构；它的组织方式应该反映各政治力量的平衡。“内阁”²⁵ 里一半席位应该为无党派人士保留。瓦西尔·莫霍里塔（Vasil Mohorita）代表共产党发言，强调政府机构延续性的重要性。莫霍里塔在1989年前是共产党内的后起之秀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人，他比他的同志们更急于与反对派达成妥协。他认为专业技能和天赋能力才应该是最关键的选拔标准，而是否隶属于哪一个党派是次要的，尤其在目前连党员的政治忠诚度都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²⁶

莫里斯·卡尔达

社会党方面，库切拉支持政府应该反映各方势力的平衡这一观点。这应该是个全民谅解政府。²⁷ 联邦议会——库切拉是其中一个著名成员——应该迅速通过立法进行苏联式经济改革。库切拉还要求新任命的阿达麦茨内阁部长们保持原职，只是社会部长负责价格政策。

拉迪姆·巴娄希（Radim Palouš）征求大家对提名斯洛伐克共产党员马利安·恰尔法为联邦总理的意见，开始了这轮谈判的第二阶段。他的提名得到了共产党和社会党人的支持。西蒙·帕尼克（Šimon Pánek）代表学生支持恰尔法，条件是要求他的内阁包括“强而有力、卓尔不群”的成员。尤拉伊·特罗坎（Juraj Trokan）代表小的斯洛伐克复兴党（Slovak Revival Party）也赞成帕尼克所说的有条件支持恰尔法，但他说由于恰尔法前期的立法活动，²⁸ 他其实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哈维尔代表公民论坛协调中心发言时拒绝对恰尔法这个人做出评价；如果公民反暴力论坛不反对的话他愿意暂时支持他，只要满足两个条件：总统必须是个捷克人²⁹ 而且是个无党派人士，并且反对派的组阁提名必须“明显”得到满足。

所有主要的谈判者都同意哈维尔的关联条件。小的斯洛伐克自由党（Slovak Freedom Party）的代表埃米尔·库查洛维奇（Emil Kucharovic）提议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出任总统。共产党人莫霍里塔提醒他说最近 14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都是斯洛伐克人，现在轮到捷克人当总统了。

本轮谈判第三阶段讨论新的恰尔法政府的人员构成。反对派方面的提议由哈维尔代表提出，他提醒参会者说斯洛伐克公民反暴力论坛

目前还没有同意他的建议。洽尔法应该找一个既为他所知又能保持前一任政府延续性的第一副总理。他们两个人连同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两个政府总理，都应该是“政治内阁”成员；另外两个应该是社会党和人民党的代表。瓦特·克马雷克（Valtr Komárek）应该成为经济“小组”的领导。克马雷克（生于 1930 年）曾在布拉格和莫斯科学习经济，六十年代中期他担任古巴工业部顾问三年。尽管他 1970 年被“褫夺职权”，他还是继续担任联邦政府的经济顾问，并于 1984 年获准建立捷克科学院预测研究所。他的团队包括几位当今重要的政治家，如克劳斯、德罗西，以及米洛斯·泽曼（Miloš Zeman），社会民主党领袖。察尔诺古尔斯基将负责立法和国家强制工具。另外将会有两位主管经济的部长，克劳斯（未来的财政部长）和德罗西（联邦物价局主席）。反对派提名的部长人选包括丁斯特比尔（外交部），米勒（劳工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古乌拉·坡普利（少数民族事务部）。

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团提名另一个斯洛伐克部长，库西或者布达；这个提议只是个预案，因为斯洛伐克反对派代表因为不知道这一轮会谈会举行，所以还没有到场（！）。哈维尔总结说这样的话新内阁里会有大量共产党人（4 个，也就是一半）。³⁰

国民阵线，包括两个小的斯洛伐克党派，也力挺他们的候选人。有趣的是，亚历山大·恺撒其（Alexander Kysucký，代表斯洛伐克复兴党）首次提出了未来斯洛伐克联邦的特性问题：他把联邦定义为两个独立共和邦的共生并存。他还说他的党反对一部宪法用于联邦和它的两个组成部分，要求每个“民族”共和邦有单独的宪法。³¹

莫霍里塔在皮特哈尔特催他说得具体一点的时候，要求内政部长

莫里斯·卡尔达

是共产党人，另两个共产党人——国防部长瓦采克和第一副总理乌尔班留任。³²

代表们在提出以上提议的时候，斯洛伐克公民反暴力论坛代表正在布拉提斯拉瓦等待布拉格的方案出来，他们好发表意见。

讨论接下来转向总统职务问题。哈维尔建议胡萨克应当次日辞职，但可以用一种保留他职务尊严的方式辞职。库切拉要求共产党人去拜见并劝说胡萨克辞职。克劳斯此时有个重要提议：为避免宪法危机和时局动荡，新的联邦政府必须在胡萨克辞职前尽快确定以便他辞职前可以任命，这正是大家后来采用的程序。帕尼克以及哈维尔提醒参会者学生们已经越来越激进，如果他们不能得到满意结果就会自己冲到布拉格城堡（总统府）。

哈维尔也许没有领会克劳斯的意思，再次强调总统辞职应比新政府的安排更优先考虑。虽然有的观察家会将此解读为哈维尔总统野心的预兆，但会议记录明显说明哈维尔只是没注意到克劳斯的观点，因为当反对派代表团里仅有的两位律师——皮特哈尔特和里赫茨基——解释说如果总统先辞职则没有法律主体来任命合法政府，哈维尔立即收回了他的意见。

克劳斯最早概括的情景被代表们一个接一个认同了：晚上 8 点，新一轮会谈将开始（斯洛伐克公民反暴力论坛代表出席了会议），一份新的政府职务候选人名单将会提交给恰尔法，12 月 10 日星期日前提交。³³ 新政府成员将于周日早上面见总统，总统在新政府成员宣誓就职后将于下午辞职。

库切拉告知参会者他作为国民阵线的主席，已经根据公民论坛和反不公正迫害委员会（VONS）的建议，向胡萨克提议政治犯特赦。。

第八轮的第一部分在下午五点多一点结束。相关公报只说会谈相当“有建设性”，另外他们会在晚上8点继续会谈。

第八轮第二部分（1989年12月8日，星期五）

晚上的会议一开始，刚赶到的察尔诺古尔斯基就详细描述了发生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的事情。³⁴ 同一天公民反暴力论坛代表已经和斯洛伐克国民阵线党派举行过会谈，要求过斯洛伐克总理赫里夫纳克辞职，但后者拒绝了。在布拉迪斯拉法随后的会谈中，参会者同意让赫里夫纳克政府里的共产党人、司法部长米兰·齐奇（Milan Čič）担任下一届斯洛伐克总理。齐奇承诺尽快实现民主化和自由选举。公民反暴力论坛的一个成员弗拉迪米尔·昂德鲁斯（Vladimír Ondruš）将会成为副总理。³⁵ 公民反暴力论坛因而觉得没有理由在斯洛伐克召集总罢工了；只有当联邦政府和总统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斯洛伐克才会发生罢工。

有趣的是，察尔诺古尔斯基与捷克反对派主张的不同，在于他要求新的联邦政府尽可能保持其连续性，而且要一直延续到再下一届自由选举（！）。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公民反暴力论坛认为从长远来看改革派共产党人克马雷克是个“中流砥柱”。

这时，莫霍里塔向大家宣布，经过他与洽尔法沟通，后者愿意组建一个新政府，并与所有的政党和反对势力于次日举行公开会谈。总统胡萨克也决定在任命新政府同一天的晚些时候宣布辞职。莫霍里塔

莫里斯·卡尔达

说所有这些都是第八轮两次会谈之间的两小时休会时间里达成的！

接下来，是冗长的关于各党派在新政府里的代表地位和特定部长职务的谈判。谈判者们的焦点还是各方之间平衡的问题：捷克与斯洛伐克，共产党员与非党员，从属于某个政党的和无党派人士。共产党方面，莫霍里塔代表坦诚地说他预计共产党会得不到不足一半提名，建议每个参会者写下他心目中的“影子内阁”成员名单作为讨论基础。莫霍里塔还说共产党并不打算否决公民论坛当天早些时候提名的任何候选人。哈维尔代表反对派列出了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所全力支持的候选人名单。³⁶

接下来与会者们的任务就是讨论通过最后的公报。公报说会议代表取得了高度一致，并将按照同一精神与总理提名人洽尔法举行会谈。会谈将于12月9日星期六举行。他们表示希望新的全民谅解政府会于12月10日星期日由总统任命。

第九轮（1989年12月9日，星期六）

洽尔法在这一轮开始的长时间开场白里表示他希望他的政府只延续到下一次选举。³⁷

他的准备工作只面临两个问题。首先，一些被反对派提名的共产党人之前从来没有在党内被提名或被支持。其次，他相信前一届政府的环境部和少数族裔事务部长数量已经足够，新增的部可能是违宪的（他举了务部）。尽管如此，他也保证新政府的施政一定会与过去完全不同。无党派成员与有党派成员（即国民阵线，包括共产党人）的构成比例将为45比55，国民阵线占有多数。

恰尔法提出了以下时间表：他与国民阵线（NF）及复兴组织（Obroda）代表会谈结束后，晚上9点会有一轮会议——最后批准新政府。第二天上午新政府人员将会被引荐给国民阵线，然后下午一点由总统胡萨克任命，随后胡萨克总统立即辞职。

在哈维尔的回应中，他回到了有党派与无党派成员比例问题。他声称反对派不是一个政党，不会代表任何人施压。反对派为个体候选人提供四个层面的支持：推荐、支持、接受和拒绝。这种支持不分党派，重要的是某个特定的个人是旧秩序的代表，还是一个保证转型的人。哈维尔再次显示了他的克制：反对派完全愿意达成妥协，但有些领域无法妥协，因为罢工和示威游行的危险，以及威胁到公民论坛自身地位的事态发展。

帕尼克代表学生直截了当告诉恰尔法说他并没有特别的公信力，唯一能在学生团体中稳定局势的举措，就是尽快提名一个强有力的内阁以确保民主进程的继续。

反对派的谈判者中最后一个回应恰尔法的是皮特哈尔特。他提议只设两个第一副总理，克马雷克和察尔诺古尔斯基。克马雷克可以负责经济而察尔诺古尔斯基负责国家强制机器。这样就有可能将国家安全机关（STB）从内政部长的管辖范围内脱离出来。内政部长应该是个无党派人士，这样就可以平衡国防部长与其他华约国家国防部长一样是共产党员（瓦采克）这一事实。

哈维尔推荐米勒担任劳工和社会保障部部长，争辩说他会与克马雷克、德罗西和克劳斯的经济改革团队形成好搭配。作为一个工人，

莫里斯·卡尔达

米勒能用平实的语言向工人阶级解释说将没有失业，不会缺乏社会“保障”，但是改变不会一夜之间发生。³⁸ 他说这些建议并不是最后通牒（这是阿达麦茨的说法）。哈维尔此时重复说如果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反对派无法对局势发展负责：“民众会抛弃我们，那样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哈维尔说尤其重要的是丁斯特比尔的任命，这本身就给民众传达了一个清楚的信号，共产党是真的要终结其领导地位。

至于提名那些不被他们自身政党支持的党员的问题，哈维尔声称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解决：克马雷克很快就要宣布放弃他的共产党员身份。³⁹

恰尔法回应说他和公民论坛以及公民反暴力论坛的想法很合拍，他强调说“国民谅解”这个词意味着在他的政府内没有反对派，并且他还稍微抗议了一下在这种语境下使用“反对派”这个词。他说这个国家正面临不确定的时代：领导力量消失，总统要更换，议会也“没有秩序”，新政府因而将是唯一能提供一定延续性的机构。针对之前帕尼克评论他是个软弱的政治家，恰尔法呼吁在目前的混乱状态中保持忠诚。⁴⁰

限于篇幅，不太可能描述关于个别部长提名的冗长讨论的细节，我只能在此讨论促进候选人筛选的几个关键因素。

会议在许多时候都讨论到捷克和斯洛伐克在政府中的比例问题。察尔诺古尔斯基称新政府在斯洛伐克的可接受程度会大幅提高，如果斯洛伐克代表的比例能高一些。情况表明，一些斯洛伐克候选人很难

得到部长职务，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库西，他是布拉提斯拉法最著名的两个不同政见者之一（另一个是察尔诺古尔斯基）。有鉴于此，皮特哈尔特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建立督察专员机构，委任库西担此重任。洽尔法对此没有多加考虑，转而建议提名库西做未来外交部长丁斯特比尔的副手。当洽尔法建议留任阿达麦茨所任命的威廉·罗斯（Viliam Roth）为信息部长时，察尔诺古尔斯基不失时机地说：如此一来就不会有针对罗斯的街头抗议了（无人监督），但库西能提供这样的支持。结果，大家同意任命库西为联邦新闻与信息办公室（FÚTI）主席。⁴¹

公民论坛与公民反暴力论坛代表团坚持“经济团队”应该由坚定支持彻底改革的人而不是那些与早期苏联式改革相关的人构成。

两边都同意新政府里应该包括至少一位女性；经过有点艰难的讨论后，科维托斯拉娃·科润科娃（Květoslava Kořínková）被提名为联邦审计机构——人民监督委员会的部长。⁴²

在讨论少数民族事务部部长候选人名单时，哈维尔和帕尼克强调，鉴于匈牙利时不时提出领土要求，在政府里增加一位少数民族成员会增加国家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稳定性。洽尔法反对增加这样一个部长人选，直指宪法限制和以斯洛伐克文化组织（Matica Slovenska）为典型例子的、斯洛伐克日盛的民族主义情绪。克马雷克提议设立一个政府委员会来规避建立一个新部所面临的法律难题，委员会可以由来自少数族裔的匈牙利族异见分子米克罗斯·杜蕾（Miklós Duray）领导，再加上其他三个少数族裔：罗姆人、德国裔和波兰裔。但后来没有匈牙利族裔部长真的被提名，也没有建立任何民族事务委员会。

哈维尔提议新的联邦政府应该对司法系统有某些权力，理由是整个司法体系都需要发生巨变。恰尔法反对说司法机构只能服从于立法机构，并且司法机构应该监督行政机构。克马雷克提醒他说所有的权力都在*共产党官僚集团*手中。反对派的确属意库西来当总协调，但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也没有提名联邦司法部长这一职位。

当恰尔法宣布他希望吸纳一位复兴（Obroda）组织成员切斯米尔·凯撒（Čestmír Císar）进入他的新政府时，一场激烈的讨论发生了。⁴³ 恰尔法希望凯撒能准备一种新的、多元的政治和选举模式。哈维尔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凯撒叫做 1968 的象征，反驳说就算这样的人经过了 20 年以后能重新起用，也不该给他们关键职务。⁴⁴ 帕尼克代表学生发言时指责复兴（Obroda）组织没有诚信，假装追随公民论坛的同时与共产党暗中谈判。恰尔法替他的提名人辩护说凯撒能“解析 1968”。帕尼克回答说一个著名的 1968 年事件参与者很难正确评价他参与的那些事情。当其他公民反暴力论坛代表（哈维尔和亚罗斯拉夫·萨巴塔（Jaroslav Šabata））也提醒恰尔法他可能过高估计了复兴（Obroda）组织的影响力时，他让步了。⁴⁵

本环节最后一个要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内政部要解决的麻烦事，特别是国家安全机关（StB）问题。恰尔法建议部长人选更换的问题作为一个长期计划，到下一个选举的时候再解决。⁴⁶ 他还辩称如果一个非共产党员成为内政部长，部里的中层官员有可能会消极对抗甚至积极抵抗。而且他声称这样做可能会有不良的国际影响。⁴⁷ 对此，反对派进行了一连串激烈回应。哈维尔反驳说宪法第四条的删除本身就该带来“明显进步”。而且已经达成共识的是，如果国防部长由共产党员担

任的话，内政部长就必须是非共产党员。在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内政部长都是共产党员的情况下，如果联邦的内政部长一职也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公众就会视之为可耻的妥协。冯德拉警告恰尔法说议会里调查 1989 年 11 月时间的委员会肯定手握共产党牵涉其中的证据；皮特哈尔特补充说在这样的局势下提名共产党员做内政部长对恰尔法的党来说简直就是自杀式行为。察尔诺古尔斯基指出政府就是应该控制官僚腐败行为，而不是被官僚反制；对于恰尔法认为部里的中层机构会造部长的反，他这种想法简直荒谬。萨巴塔试着缓和气氛，借助他之前与非国家安全机关（StB）警察打交道的正面经验，提出了一个看似合乎逻辑的观点：如果国家安全机关（StB）机构从内政部长的管辖范围内剥离，余下的警察就不太可能反对一个非共产党员部长。恰尔法最后同意提名非党员担任内政部长一职。哈维尔强烈推荐撒彻（Sache），把他描绘成一个灵活机变、充满活力同时又平和的人，也许是未来恰尔法政府里最宝贵的资产。然而恰尔法显然对撒彻心存疑虑；与会者最后同意将包括国家安全机关（StB）在内的所有警察系统交由恰尔法和他的两个副手，克马雷克和察尔诺古尔斯基，组成的三架马车来管理。⁴⁸ 撒彻被提名为联邦政府“不管部”部长。⁴⁹

确定了内政部长人选之后，会议也就接近尾声了。恰尔法重提那些不被党内支持的提名人（也就是克马雷克和德雷西）的问题。哈维尔建议这两位候选人退党。⁵⁰ 在这轮会谈的最后阶段，部长人选席位又按照各人的党派隶属关系重新过了一遍。察尔诺古尔斯基对于斯洛伐克代表比例过低而不高兴，但哈维尔提醒说公民反暴力论坛没有提出很多候选人。

莫里斯·卡尔达

第九轮最后在愉快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恰尔法承认他对于他在会谈早期得到的过低评价感到遗憾，但哈维尔使他确信这只是由于那时还没多少人了解他。

第十轮（1989年12月9日，星期六）

这最后一轮谈判仅在第九轮会谈结束 15 分钟后就开始了。这一轮其实没有什么需要谈判的议题；第一部分非常简短，实际上是个新闻发布会，会上著名的圆桌会议与会者表达了他们对于新政府的满意。

51

首先发言的是次日即将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理的恰尔法。他说与会者已经就新的国民谅解政府达成了充分的一致，并列出了他的部长们的政治派别：10 个共产党人，两个社会党人，两个人民党成员，以及 7 个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成员。哈维尔说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组织都对结果表示满意，目前阶段这已经是所能达成的最好的折中方案了。察尔诺古尔斯基表示他相信新政府会保障国家不会重蹈 11 月以前旧政权的覆辙。莫霍里塔代表共产党员表达他希望这些“重要的政治力量”会继续会谈解决重要的政治问题。

记者离场后，恰尔法向圆桌会议与会者介绍他的新政府部长们（见附件 4）。这里只提及他发言的两个要点：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建议组成一个“内阁”的提议被接受了，联邦内政部长将受由恰尔法、克马雷克和察尔诺古尔斯基组成的三驾马车管辖。

察尔诺古尔斯基宣布说由于宪法和政治问题，少数名族事务部未能成立，但将建立一个由少数民族代表组成的委员会。⁵²

说到共产党员仍然占据政府大半江山的时候，哈维尔强调说 11 月的反政府运动并不是针对共产党员而是针对极权制度，运动的目的在于争取人的自由和尊严。与其有个抱残守缺的非共产党员，不如要一个致力于“新秩序”的共产党员。

结束时，洽尔法公布了近期的时间进度表：次日（星期日），他的新政府成立。周二，联邦议会重开，新部长露面。最后一轮会谈在一种非常和谐的气氛里结束。国民谅解政府即将就职。

捷克斯洛伐克圆桌谈判的显著特点

对于 1989 年在布拉格举行的、导致国民谅解政府成立和胡萨克总统辞职的圆桌会谈，此章这一部分讨论诸如参会者人选标准、他们的谈判地位以及圆桌会议对于捷克斯洛伐克 1989 年底以后宪法发展的影响等若干方面的问题。最后，还会讨论立法机构代表和地方政府的更换程序。

首先，这些圆桌会议的参会者是如何选出来的呢？我们得记住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尽管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形势已发生了种种变化，但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的突然崩塌，对于反对派来说还是一个意外惊喜，所以并没有立即能与政府谈判的队伍。公民论坛成立于 11 月 19 日，就在那场因为被野蛮镇压而触发了政府垮台的学生示威发生两天后。公民论坛的多数“成员”都参加过诸如 77 宪章这样的反政府活动，这给他们带来了很高的支持度（legitimacy）去担当摧毁旧制度这样的重任。而其他成员相对来说则缺乏这样的资历，只是恰逢

莫里斯·卡尔达

其时成了重要的谈判者（如克劳斯）。公民论坛很快成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负责提名谈判团队人员，每一轮名单都不同。每一轮之前，都会事先预备和讨论协调委员会谈判团队战略和人选。

以下是影响公民论坛协调委员会谈判团队人员遴选的几个因素：

1. 瓦茨拉夫·哈维尔的巨大威信使得他对于人员选择有很大影响力，但并不是独断专行。他提名的有些谈判者后来成为总统副手（撒萨·冯德拉和伊日·克里森）；

2. 有一个选择偏好，就是保证有一些特定重要群体获得代表，比如学生（马丁·梅耶斯提克、米哈尔·克利马）和工人（米兰·赫鲁什卡和彼得·米勒）；

3. 对于下一轮谈判提出建议的人，通常都被提名为下一轮谈判团队人员来提出他们的提议；

4. 为了有利于延续性，公民论坛谈判团队通常都得将部分前一轮的参加者纳入下一轮名单。⁵³

公民论坛的谈判地位当然源于一个重要事实，即布拉格街头和许多其他捷克和斯洛伐克城市里到处是他们的支持者。公民论坛的谈判者很清楚他们的谈判优势，然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是政府这边的谈判地位那么脆弱。政权集团没有人叛变告诉公民论坛他们内部的意图和情绪。尽管国际形势对公民论坛有利，但他们也害怕政府会动用武力军队或警察来镇压风潮。这种害怕也部分反映在将公民论坛协调委员会指挥部设在布拉格市中心的魔幻灯剧院阴森的地下室里。事实上，与公民论坛的估计相反，公民论坛的谈判地位比他们的参会者所意识到的要强势得多。这一点，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总理皮特拉要求公

民论坛协调委员会提名新内阁成员时就已经很明显了。经过冗长的讨论和介绍，公民论坛协调委员会的谈判者们还是没有准备好名单，因为他们不敢想象皮特拉会这么快就放弃抵抗。

公民论坛协调委员会的主要论点就是留给两边的时间都不多了，群众对于变革的缓慢越来越失去耐心，如果做出民众可能会认为是腐败堕落的妥协，甚至连公民论坛协调委员会也会被推翻。哈维尔对于这种失去耐心的感受尤其深。而在政府一边，主要的论点是要合法。在发生革命的时候，统治者坚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行事一点也不奇怪。有时，这种“律法主义”（legalism）所采取的方式，是声称目前的问题不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另外一些时候，则求助于“合宪性”

（constitutionality）或者让其他党派参与讨论的需要。政府方面不断拖延时间，正如库切拉提议展开一场关于宪法的全国性讨论，而不是对新政府的组成开始谈判。最后但决非最不重要的是，他们试图拖延时间的时候，用联邦政府的特权来对付那两个共和邦。

在讨论未来国防和内政部长人选的时候，共产党不断提到另外一个论点：华约（其实就是指苏联）永远不会接受非军方或者非共产党员的人担任这两个重要职务。与此相关，他们提到波兰的情况，波兰的圆桌谈判已经将这两个职位委任给符合华约态度的人选。从前面描述的情况可以看到，反对派并没有在国防部长问题上抓住不放，但对于内政部长的争夺已经白热化。

公民论坛协调委员会对政府谈判地位的误判，当然对谈判的结果产生了影响。因为公民论坛协调委员会没有意识到政府一边的外强中干，它接受的妥协后来让它付出了昂贵代价。在第九轮因为不能就内政部长的人选达成一致而做出的妥协的结果，是让恰尔法、克马雷克、

莫里斯·卡尔达

察尔诺古尔斯基这三驾马车共同管辖内政部，这使得国家安全机关（StB）后来得以篡改或者干脆销毁他们的特务档案。1991年通过的《清算法》从来没有被广泛接受为揭露国家安全机关（StB）协从者的可靠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本来该作为证据的国家安全机关（StB）档案根本就不是完整或者准确的。⁵⁴

公民论坛协调委员会和公民反暴力论坛的谈判者接受了比按照共产党的实力能够背书的更多的共产党员进入恰尔法的政府，注意这是比上面提到的在第八轮第二阶段公民反暴力论坛组织的提议更糟糕的结果。在21个新任命的政府官员中，有10个共产党员（即使其中两个随后不久按照公民论坛协调委员会和公民反暴力论坛建议退了党）和四个国民阵线成员，这本身就释放给公众一个信号，改变只会逐渐发生。整个部门机构，从副部长以下，都完好无损原封未动，这使得中下层权力机构存续下来、进入未来。又由于接受仅仅更换联邦议会的人选，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邦议会、地方和区域政府因而有了可能延缓对捷克斯洛伐克法律体系更激进的改造，从而帮助了共产党黑帮在地方和区域的延续。

圆桌会议与会者认同从共产主义制度到一个民主制度的转型，需要以合符法律和宪法的方式进行。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就需要对立法机关做大幅度的改变。从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的角度来看，联邦议会和共和邦议会明显有不少人如不清除出去，就会让公众确信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结果要么导致无法控制的公众骚乱，要么使民众回归对政治的冷漠。共产党这边也希望他们阵营里那些最臭名昭著的人物能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

更换立法机构成员的问题，是在 1989 年 12 月 22 日开始的一系列圆桌会议上处理的。与早些时候圆桌会议不同的是，这些圆桌会议没有任何记录文件。参加者都是“决定性的政治势力”，即公民论坛、公民反暴力论坛、国民阵线党派和社会青年团。甚至在这些会议之前，23 个共产党议会成员就已经从联邦议会辞职了（其中包括威廉·萨尔戈维奇，米洛什·雅克什，米洛斯拉夫·斯捷潘，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瓦西尔·比拉克，阿洛伊斯·英德拉以及一个人民党成员兹宾内克·察尔曼，11 月前是其领导人）。

从 1989 年 12 月 22 日开始的系列谈判的第一阶段，与会者同意提名哈维尔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提名杜布切克为联邦议会主席，并通过了选举 24 个新的议会成员填补空缺出的席位。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还大度地将 24 个席位里的两席让给共产党人。最后，21 个席位给了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联盟（16 席归公民论坛，5 席归公民反暴力论坛），1 个给了学生代表。12 月 28 日，杜布切克成为议会主席，联邦议会也按照 12 月 22 日会议议定的方式补选了空缺席位。

下一轮圆桌会议于 1990 年 1 月 5 日召开，参会者同意向联邦议会提交一份关于罢免和吸纳立法机构成员以及“重建”立法机构的草案。与会者同意于 1 月底前完成程序。共产党同意罢免 90 到 100 个代表，所有空出的席位将向无党派成员（即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候选人）开放。⁵⁵ 相应法案于 1 月 23 日在议会获得通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提案是在第二轮投票时才被议会通过的，因为第一轮未能获得斯洛伐克五分之三的足够多数票。

莫里斯·卡尔达

1990年1月30日，120位新代表进入联邦议会，其中只有8席是共产党人。在议会的350个代表中，152个是无党派成员，138个共产党员，18个社会党人，18个人民党人，5个斯洛伐克自由党成员，4个斯洛伐克民主党成员，3个社会民主党成员，6个其他小政党成员和6个空席位。经过了42年后，共产党终于再次成了一个少数党。这届联邦议会构成延续到了1990年6月大选而基本没有变化。

其后一轮圆桌会议于1990年1月31日召开，与会者宣布联邦议会重建工作结束，并鼓励建立地、市和区级别圆桌会议制度。地方官员将很快被撤换并伴随新官员的补选。

捷克共和国方面，捷克邦议会像联邦议会一样进行了改组。公民论坛高层谈判者之一皮特哈尔特于2月2日当选捷克总理，共产党在捷克邦议会也失去多数席位。然而捷克邦议会新政治势力的平衡并不如联邦议会那么明显：公民论坛有50个代表席位（占25.5%），共产党为82席（41%），其他政党67席，还有一个席位暂时空缺。

这些改变的进行尽管相对波澜不惊，但给国家未来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捷克斯洛伐克将保持其1960/68年宪法，直到其平静而苦涩（对许多人来说）的终点。通过新宪法的努力起初被那些在旧政府时期通过“选举”就任而目前残留在议会的议员阻挠（这些议员是由于圆桌会议的妥协结果而得以继续留任），因而未获得联邦议会三个组成部分所需要的五分之三多数票同意，⁵⁶ 然后就被捷克-斯洛伐克分离的纷争彻底搁置了。为极权制度设计的1960/68年宪法，除了共产党政策的红头文件以外几乎空无一物，没有设置内在的机制用来解决可能发生的政治危机，诸如议会无法就下一任总统达成一致，或者新政

府无法赢得信任票。那个独特的五分之三多数才可以修改宪法的条款，给了斯洛伐克代表不合比例的力量；即使五分之三的斯洛伐克议员愿意取消这一条款，在 1989 年后的政治局势下那样做无异于政治自杀。在最重要的一些问题上，联邦议会由于在法律上遵循的是 1960/68 年宪法而陷入僵局，这种情况到 1990 年 6 月第一次自由选举之后并没有改善，并事实上延续到 1992 年 6 月的第二次选举。如果说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也是因为 1989 年圆桌谈判的妥协，并不为过。

1990 年 1 月末，地方圆桌会议也开始建立。整个社会的氛围不再像 11 月 17 日事件后头几周时那样欢欣鼓舞；因此，共产党人较之以前的谈判，表现出更多的抵制，虽然抵制大多是短命的。

关于召回（罢免）代表机构成员以及遴选全国委员会代表的法律，于 1990 年 3 月 31 日失效。

结论

和其他类似国家的情况不同的是，催生布拉格圆桌会议的历史形势是突然不期而至的。1989 年 11 月 26 日召开第一轮圆桌会议时，每个人都清楚知道权力已经从共产党手里滑落，会谈本身已绝不是权力争夺。因而，捷克斯洛伐克圆桌会谈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管理性的。

与任何谈判一样，所达成的妥协反映了谈判双方对彼此地位和意图的判断。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一方由于对于政府极其虚弱的

莫里斯·卡尔达

谈判地位特别缺乏可靠的信息来源，因而达成的妥协不必要地给共产党人保留过多的权力。政府谈判者的律法主义拖延策略，导致了诸如解散国家安全机关（StB）和销毁警察档案等事项的延误。有的人甚至说，这种耽延所产生的后果到今天、1989年11月事件四年后的今天，仍然能感觉到。“天鹅绒”妥协让多数共产党官僚留在其职位上，而当时本可以相对容易地撤换他们；今天，由于人权立法的生效以及“革命形势”已一去不返，肃清政府中的中下级官僚已经再无可能。这些人现在即使不是在政治上显赫，在经济上成为商人和企业家（被普遍相信是利用了隐匿的资产），这一事实导致了普遍的不满。

由于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坚持转型过程要依法进行，这使得一直到1990年大选前都几乎不可能有一部新宪法。而后随着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在1990年春天的兴起，立法机构已经不可能在1992年6月大选之前就一部捷克斯洛伐克新宪法达成共识。瓦茨拉夫·哈维尔大选前在捷克斯洛伐克议会的最后一次演讲说，他将议会未能批准一部新宪法视为他总统任期内最大的失败。大选的结果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两个组成部分走上了分裂的道路：在捷克共和国，瓦茨拉夫·克劳斯领导的、主张改革的公民民主党（ODS）获得了最高票数（因而得以与其他三个中右翼政党组建联合政府）；而在斯洛伐克，弗拉基米尔·梅恰尔（Vladimír Mečiar）带领的民族主义者胜出，那些要求迅速进行经济改革的政治势力所得到的选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不仅仅是没有可能通过一部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宪法；国家自身似乎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最后的分裂。

附录 1：圆桌谈判轮次

第一轮	1989 年 11 月 26 日，星期日
政府方	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政府和国民阵线代表
反对派方	公民论坛代表
第二轮	1989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二
政府方	国民阵线和联邦政府代表
反对派方	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组织的代表
第三轮	1989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五
政府方	捷克邦政府代表
反对派方	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
第四轮	1989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二
政府方	联邦总理
反对派方	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
第五轮	1989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三
政府方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
反对派方	公民论坛代表与公民反暴力论坛代表
第六轮	1989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三
政府方	联邦总理

莫里斯·卡尔达

反对派方 公民论坛与公民反暴力论坛代表

第七轮 1989年12月7日，星期四

政府方 联邦国防部代表

反对派方 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

第八轮 1989年12月8日，星期五

第一部分

政府方 国民阵线代表

反对派方 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

第八轮 1989年12月8日，星期五

第二部分

政府方 国民阵线代表

反对派方 公民论坛代表与公民反暴力论坛
协调委员会代表

第九轮 1989年12月9日，星期六

政府方 新提名联邦政府总理

反对派方 公民论坛代表与公民反暴力论坛
协调委员会代表

第十轮 1989年12月9日，星期六

政府方 各国民阵线团体代表

反对派方 公民论坛代表与公民反暴力论坛
代表

附录 2：捷克斯洛伐克圆桌谈判参与者

参加者（所从属组织）	轮次	职务
拉迪斯拉夫·阿达麦茨 (G)	1246	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理
杨·布达 (O)	56	视觉艺术与环境艺术家
马利安·恰尔法 (G)	1269C	联邦政府部长
扬·察尔诺古尔斯基 (O)	268B9 C	律师
彼得·西皮克 (O)	1	演员
伊日·丁斯特比尔 (O)	C	被提名的外交部长
弗拉基米尔·德罗西 (O)	8BC	经济学家
鲁道夫·杜查切克 (G)	7	总参谋部副总长
迈克尔·达麦切克 (O)	8AB	布尔诺活动家
弗拉基米尔·哈泽尔 (O)	12345 678A B9C	音乐评论家
瓦茨拉夫·哈维尔 (O)	12345 678A B9C	作家
弗拉基米尔·赫尔曼 (G)	1	南摩拉维亚地区政府主席
约瑟夫·霍拉 (G)	5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闻部长
米哈尔·霍拉切克 (M)	12	记者

莫里斯·卡尔达

米兰·赫鲁什卡 (O)	1	矿工
兹代涅克·依琴斯凯 (O)	12	立法专家
杨·卡顿 (G)	3	捷克政府总理新闻秘书
拉蒂斯拉夫·坎特 (O)	8A	词作家
瓦茨拉夫·克劳斯 (O)	128A	经济学家
	BC	
米哈尔·克利马 (O)	23	学生
米兰·克纳泽科 (O)	56	演员
迈克尔·可卡 (M)	12456	摇滚音乐家
	8AB9	
	C	
瓦特·克马雷克 (O)	8B9C	捷克科学院预测研究所所长
约瑟夫·克雷伊奇 (G)	8ABC	中央委员会秘书
奥斯卡·科雷奇 (G)	1246	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理顾问
艾达·克里索娃 (O)	128B	作家
伊日·克里森 (O)	4678	编剧
	AB9C	
博胡斯拉夫·库切拉 (G)	128A	社会党主席；联邦议会副议长
	BC	
埃米尔·库查洛维奇 (G)	8ABC	斯洛伐克自由党成员
米洛斯拉夫·库西 (O)	68BC	政治学家
亚历山大·恺撒其 (G)	8ABC	斯洛伐克复兴党成员
瓦茨拉夫·马利 (O)	12	罗马天主教神父

米洛斯拉夫·马萨克 (O)	7	建筑家 查理大学法学院院长；捷克邦
约瑟夫·梅察 (G)	13	议会宪法立法委员会主席
马丁·梅耶斯提克 (O)	12	学生
米库勒博士(O)	1	法律顾问
彼得·米勒(O)	258A	铁匠
	C	
斯坦尼斯拉夫·米洛塔(O)	58A9	摄影师
瓦西尔·莫霍里塔 (G)	158A	社会主义青年团主席
	BC	
米洛斯拉娃·涅姆措娃 (G)	1	捷克斯洛伐克妇联主席
弗拉迪米尔·昂德鲁斯 (O)	6	经济学家
阿列克谢·昂撒库克 (G)	1	联邦总理首席顾问
拉迪姆·巴娄希 (O)	8AB9	天主教思想家
	C	
西蒙·帕尼克 (O)	8AB9	学生
	C	
米洛斯拉夫·巴维尔 (G)	1246C	联邦政府发言人
彼得·皮察 (O)	34568	政治学家；历史学家
	AB9C	
弗朗季谢克·皮特拉 (G)	3	捷克政府总理
斯坦尼斯拉夫·波霍诺 (G)	7	联邦国防部发言人，上校
亨德里克·波利尼克 (G)	1	捷克斯洛伐克体育 运动协会主席

莫里斯·卡尔达

布莱德勒 (G)	8AB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
伊万·布鲁萨 (G)	9	联邦总理顾问
伊万·拉赫蒙特 (O)	3	剧院领导人
巴维尔·里赫茨基 (O)	8AC	律师
亚罗斯拉夫·萨巴塔 (O)	9C	政治学家
理查·撒彻 (G)	8ABC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成员
昂德里克·塞林格 (G)	8AB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
杨·斯柯达 (G)	18AB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党总书记
	C	
瓦茨拉夫·索库夫 (G)	9	联邦总理办公室外交事务长官
米罗斯拉夫·斯潘涅 (G)	1	商会总会秘书长
伊日·斯达德勒 (G)	9	被提名的联邦总理秘书处主席
博胡米尔·斯沃博达 (G)	8ABC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成员
米罗斯拉夫·托曼 (G)	3	捷克政府第一副总理
尤拉伊·特罗坎 (G)	8ABC	斯洛伐克复兴党成员
马丁·乌察 (G)	8ABC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卡雷尔·乌尔班内克 (G)	5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自 1989 年 12 月 1 日始)
米罗斯拉夫·瓦采克 (G)	7	国防部长, 将军
兹宾内克·沃克鲁利茨基 (G)	1	人权与人道主义合作委员会副主席
撒萨·冯德拉 (O)	1468 AB9C	77 宪章发言人; 地理学家

拉迪斯拉夫·扎克 (G) 58AB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助理

说明： a. G=政府代表； O=反对派代表； M=Most 莫斯特代表。

b. 数字代表其所参加的轮次。第八轮包括两部分，分别用 A 与 B 表示。C 代表会议结束部分

c. CC=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d. 12 月 5 日，迈克尔·可卡(Michael Kocáb)加入反对派谈判团。

附录 3：1989 年 12 月 3 日改组的联邦政府成员名单

拉迪斯拉夫·阿达麦茨 联邦总理(共产党)

副总理

马利安·恰尔法 第一副总理(共产党)

博胡米尔·乌尔班 第一副总理(共产党)

弗朗季谢克·皮特拉 (共产党)

帕维尔·赫里夫纳克 (共产党)

约瑟夫·荷汉玛加 (无党派)

亚罗米尔·扎克 冶金、工程及电子工业部长

(共产党)

部长

莫里斯·卡尔达

弗朗季谢克·平茨	内政部长(共产党)
米罗斯拉夫·瓦采克	国防部长(共产党)
亚罗米尔·约翰内斯	外交部长(共产党)
扬·斯泰斯卡尔	财政部长(共产党)
安德烈·巴尔恰克	外贸部长(共产党)
阿尔弗雷德·谢贝克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共产党)
安东尼·克鲁姆尼柯尔	燃料与能源工业部部长(共产党)
亚罗米尔·阿尔盖尔	粮食与农业部长(共产党)
弗朗季谢克·波德莱纳	运输与交通部部长
科维托斯拉娃·科润科娃	人民管理委员会(无党派)
拉迪斯拉夫·德沃夏克	联邦物价办公室(社会党)
威廉·罗斯	(无党派)
弗朗季谢克·雷赫尔	(人民党)

附录 4：哈尔法的国民谅解政府（成立于 1989 年 12 月 10 日）

马利安·恰尔法	联邦总理（共产党） ⁵⁷
副总理	
瓦特·克马雷克	第一副总理（共产党）
扬·察尔诺古尔斯基	第一副总理（公民反暴力论坛）
弗朗季谢克·皮特拉	（共产党）
空缺	斯洛伐克总理 ⁵⁸
弗朗季谢克·雷赫尔	副总理；科技与投资发展 全国委员会主席(人民党)
弗拉基米尔·德罗西	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约瑟夫·荷汉玛加	（无党派）
奥德里奇·布尔斯基	副总理；粮食与农业部长 （社会党）
部长	
伊日·丁斯特比尔	外交部部长（公民论坛）
米罗斯拉夫·瓦采克	国防部长(共产党)

莫里斯·卡尔达

瓦茨拉夫·克劳斯

财政部长（公民论坛）

彼得·米勒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长

安德烈·巴尔恰克

外贸部长(共产党)

弗朗季谢克·波德莱纳

运输与交通部部长

拉迪斯拉夫·沃德拉日卡

冶金、机械及电子工程部长
(共产党)

弗朗季谢克·平茨

燃料与能源工业部部长

科维托斯拉娃·科润科娃

人民管理委员会(无党派)

拉迪斯拉夫·德沃夏克

联邦物价办公室(社会党)

罗伯特·马丁科

（无党派）

理查·撒彻

（人民党）

注释

我要特别表达我对公民论坛主要谈判者之一、前捷克总理皮特拉的感谢，他在一次特别的访谈里提供了大量关于圆桌谈判的无比珍贵的、深入的第一手材料，皮特拉先生与本章的错漏和无足之处无关

¹ 弗拉基米尔·哈泽尔(Hanzel, Vladimír), 《加速的历史心跳》(Zrychlený tep dějin), 1991年布拉格OK Centrum出版。会议记录者哈泽尔本人在

本书的前言部分指出当时录音记录的质量非常糟糕，有些地方他根本无法搞清楚说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其他一些地方在磁带换面或者更换的时候会错失几秒钟记录。

² 政府方面有 14 个代表参加，都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或者其他国民阵线组织代表（拉迪斯拉夫·阿达麦茨，瓦西尔·莫霍里塔，亨德里克·波利尼克，博胡斯拉夫·库切拉马利安·恰尔法，米洛斯拉娃·涅姆措娃，米罗斯拉夫·斯潘涅，弗拉基米尔·赫尔曼，杨·斯柯达，兹宾内克·沃克鲁利茨基，约瑟夫·梅察，阿列克谢·昂撒库克，奥斯卡·科雷奇，米洛斯拉夫·巴维尔）。公民论坛有 11 个代表参加（瓦茨拉夫·哈维尔，兹代涅克·依琴斯凯，米兰·赫鲁什卡，瓦茨拉夫·克劳斯，撒萨·冯德拉，彼得·西皮克，马丁·梅耶斯提克，瓦茨拉夫·马利，艾达·克里索娃，弗拉基米尔·哈泽尔，米库勒博士）。关于谈判者和他们各自所参加的轮次的详细信息参见附录 2。

³ 事实上当时米洛斯拉夫·斯蒂凡连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有常务委员都已经辞职。

⁴ “屠杀”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描述 11 月 17 日防暴警察在布拉格市区对于游行的干涉，这的确是夸大其词了。起初大家担心有一人伤，结果，那个大家以为被打死了的学生是一个装死的国安密探。大家相信这个小把戏是政权内部某些派系阴谋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推翻和取代雅克什（Jakeš）的领导地位。不消说，后来玩大了。

⁵ 民兵组织起了共产党私人武装的作用。它由最忠诚的共产党员组成，建立于 1948 年 2 月共产党政变期间。他们定期进行射击演习，有力地威慑了其他民众。

⁶ 这个要求意味着在工作场所全面取缔共产党的组织。在旧政权统治下，其他组织（甚至包括其他国民阵线党派）不允许在工作场所设点。

⁷ 此处阿达麦茨显然指国民阵线的党派，而国民阵线在整个共产党统治期间都是作为共产党政权的传动装置存在的。

⁸ 此处提到的其他党派包括复兴团体（Obroda），它由一些在 1968 年后大清洗中被开除出党的前共产党员组成。迟至 1989 年 2 月才成立的复兴组织得到承诺，至少能有一个政府重要职位留给他们的领导者之一切斯米尔·凯撒（Čestmír Císař）。

⁹ 加尔法是联邦政府里专门负责立法事务的部长，他的职权范围包括负责准备即将在 1990 年生效的新宪法的草案。

¹⁰ 这显然是拖延时间的又一个例子，让我联想起其后许多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中，他们用邦议会的“职能”（例如特殊权力）对抗联邦议会权力，这种讨价还价通常都导致延迟甚至陷入僵局。

¹¹ 在第三轮谈判里，捷克政府代表（弗朗季谢克·皮特拉，米罗斯拉夫·托曼，约瑟夫·梅察，杨·卡顿）会见了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哈维尔，皮特拉，伊万·拉赫蒙特，米哈尔·克利马，以及哈泽尔）。

¹² 皮特拉在他 11 月 19 日的电视讲话里给公众的印象是个强硬派，实际上，他在改组的捷克政府里任职到 1990 年 1 月 31 日。2 月 6 日皮察成为他的继任者。

¹³ 在第四轮里联邦总理代表团会见了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哈维尔，皮察，伊日·克里森，可卡，冯德拉，以及哈泽尔）。

¹⁴ 凯撒与门茨尔代表“1968 式”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复兴团体。尽管该团体宣布将忠诚于公民论坛，但它仍单独与阿达麦茨秘密会谈。其他与阿达麦茨进行会谈的政客是社会主义党与人民党的主席。

¹⁵ 在过去 40 年里，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传统有个不成为的规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对等原则。任何时候，如果一个捷克人成为联邦总统，则一个斯洛伐克人就会被委任为联邦总理，反之亦然。所以会有总统哥特瓦尔德

（Gottwald）、扎波多茨基（Zápotocký）和诺沃提尼（Novotný）以西罗基（Široký）和勒纳尔特（Lenárt）为总理，胡萨克以斯特劳加尔（Štrougal）和阿达麦茨（Adamec）为总理，1989 年以后哈维尔以加尔法为总理。有趣

的是，在这一轮讨论时，没有人提名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为联邦议会议长，他不久后会担任这一职务。

¹⁶ 在第五轮谈判里公民论坛协调中心和公民反暴力论坛代表（哈维尔，米勒，皮察，杨·布达，米兰·克纳泽科，哈泽尔，可卡，以及斯坦尼斯拉夫·米洛塔）会见了共产党在11月崩溃后的新领导层（乌尔班内克莫霍里塔，约瑟夫·霍拉，拉迪斯拉夫·扎克）。

¹⁷ 在我对彼得·皮特哈尔特（Petr Pichart）的访谈中，他回忆说乌尔班内克那天只有一个期望，就是和哈维尔一起上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这个愿望被同意了。

¹⁸ 不用说，乌尔班内克的语言充满了陈腐的党内套话。在会谈中，他也表示他知道他的语言风格有多不堪。

¹⁹ 这个说法需要澄清：在胡萨克任内虽然没有像1960年代那样判处异见人士死刑的审判，但是还是有审判，罪名是政治性的。他们迫害的对象首先就是政治异见者，比如哈维尔在监狱里待了四年，但其他一些政治迫害的案子里，罪名是间谍活动或者刑事犯罪，诸如此类。

²⁰ 哈维尔指出，即使在最严酷压制的1950年代，宪法里也没有共产党“领导地位”这一条款，这一条款是在1960年宪法里才有的。一同写进去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这一新的国家名称。

²¹ 第六轮谈判是阿达麦茨参加的最后一轮圆桌谈判。他的代表团成员包括恰尔法，奥斯卡·科雷奇及巴维尔。反对派（公民论坛协调中心和公民反暴力论坛协调委员会）出席者除了哈维尔还包括皮特哈尔特、弗拉迪米尔·昂德鲁斯、米洛斯拉夫·库西、布达、克纳泽科、察尔诺古尔斯基、克里森、可卡、冯德拉及哈泽尔。

²² 在第七轮谈判里联邦国防部代表（米罗斯拉夫·瓦采克、鲁道夫·杜查切克及斯坦尼斯拉夫·波霍诺）与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会谈（哈维尔、伊日·克里森、米洛斯拉夫·马萨克及哈泽尔）。

²³ 瓦采克的论调毫无可信度。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我所知的情况，都没有迹

象反映出任何对于反对派主张的不满情绪。11月17日之后这段时期只做过一个公开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只有10%的调查对象表示反对“政治变革”、57%表示支持，另外33%保持中立（据11月26日数据）。

²⁴ 第八轮谈判第一部分中，各“决定性的政治力量”聚集到了一起。政府方面由国民阵线代表团出席（国民阵线党派与团体的主席库切拉代表社会主义党；瓦西尔·莫霍里塔、昂德里克·塞林格和拉迪斯拉夫·扎克代表共产党；理查·撒彻及博胡米尔·斯沃博达代表人民党；杨·斯柯达代表社会党；尤拉伊·特罗坎及亚历山大·恺撒其代表斯洛伐克复兴党；埃米尔·库查洛维奇代表斯洛伐克自由党；马丁·乌察及布莱德勒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约瑟夫·克雷伊奇代表国民阵线秘书处）。反对派由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团出席（哈维尔、皮特哈尔特、冯德拉、克里森、拉迪姆·巴娄希、里赫茨基、克劳斯、米勒、西蒙·帕尼克、迈克尔·达麦切克、可卡、哈泽尔、拉蒂斯拉夫·坎特和斯坦尼斯拉夫·米洛塔）。反对派这边本轮第一部分没有斯洛伐克代表，他们会在第二部分出席。

²⁵ 皮特哈尔特在此用“内阁”指代联邦总理和副总理们。

²⁶ 莫霍里塔这里似乎指的是弗拉基米尔·德罗西。实际上，德罗西和其他一些著名共产党员（如瓦特·克马雷克）1989年末就脱党，德罗西随后在克劳斯的中右翼政府里担任经济部长。恰尔法后来的脱党也给共产党带来巨大打击。

²⁷ 此处库切拉给新政府造了一个名称，它一直沿用到1990年大选。后来哈维尔总统将大选后的政府叫做全民奉献政府，也暗合这个名字。

²⁸ 如前所述，恰尔法在11月前共产党最后一届政府里任职负责立法的联邦政府部长，他其实也刚入内阁不久。

²⁹ 需要注意的是，哈维尔作为一个捷克人，可能早已对总统职位起了念头。他在三周后成为联邦总统。

³⁰ 如此一来，内阁将有四个共产党人（恰尔法、乌尔班、捷克总理及斯洛伐克总理）和四个非共产党人（一个社会党人，一个人民党代表，克马雷克，及察尔诺古尔斯基）。在这里，公民论坛协调中心相比之前的要求做了重大

让步，他们之前的要求是共产党的那一半应该把国民阵线的所有政党代表都算上，余下一半全部给反对派。要是按这个角度看，现在提议的这个比例是6席归了国民阵线诸党派，而仅留下两席给反对派，而那两席之一的克马雷克还仍是个共产党员。因为目前毫无迹象表明反对派的谈判优势被削弱，人们只能怀疑这样的结果是由于有人同国民阵线政客之间的一些秘密交易，尤其是和那些仍隶属共产党的人。值得一提的是，至少有一个著名的共产党政治人物马利安·哈尔法，他得益于党的恩惠当上联邦总理后旋即脱党。秘密交易能部分解释哈尔法能神奇地作为一个高层人物在政坛存活下来。

³¹ “民族”这个词，给了每个共和邦里占多数的民族以优先地位，明显忽视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存在的大量少数民族。

³² 莫霍里塔这个要求显得比本轮开始的时候强硬。

³³ 反对派多次要求总统胡萨克在12月10日前辞职，是因为在这个日子——联邦人权日——辞职，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而且全国总罢工将在次日举行。

³⁴ 在第八轮谈判的第二部分，国民阵线代表团成员与第一部分一致，但反对派代表发生重大改变。五名新成员加入进来了：察尔诺古尔斯基和库西，两位重要的公民反暴力论坛成员刚从斯洛伐克赶到会场，另外三位新成员是克马雷克、德罗西及克里索娃。有四位第一部分的参会者没有参加晚上的这轮会谈（里赫茨基、米勒、坎特，及米洛塔）。

³⁵ 注意，斯洛伐克取得的这个成果与在布拉格取得的突破性成果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³⁶ 在这份名单里，哈维尔鼎力支持人民党候选人撒彻（任内政部长）和弗朗季谢克·雷赫尔（Frantiek Reichel）（副总理），并增加以下提名人：五个与哈尔法一起组成6人内阁的政府成员——齐奇（斯洛伐克总理），皮特拉（捷克总理），拉迪斯拉夫·德沃夏克代表社会党，克马雷克（负责经济改革），以及察尔诺古尔斯基（负责立法机构，这个至今被内政部控制的“某种政权机器”）。名单里的部长人选为：丁斯特比尔（外交部长）、德罗西（经济部长）、克劳斯（财政部长）、米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米克洛斯·迪雷（少数民族事务）和库西（由公民反暴力论坛特别提出）。公民论坛还支

持提名时任国防部长（即米罗斯拉夫·瓦采克），一个共产党员）。

³⁷ 第九轮谈判里，已被指定的联邦总理人选洽尔法（和他的三个助手）与公民论坛协调中心代表团和公民反暴力论坛协调委员会成员会谈（哈维尔、皮特哈尔特、冯德拉、克里森、巴娄希、察尔诺古尔斯基、克马雷克、亚罗斯拉夫·萨巴塔 Jaroslav Šabata、帕尼克、可卡、哈泽尔及米洛塔）。与他的预言相反，洽尔法不仅作为共产党的第一联邦副总理上升为总理，而且也闯过了 1990 年大选获得留任。

³⁸ 实际上，失业率伴随着改革上升了，特别是在斯洛伐克。

³⁹ 奇怪的并不是由在场的克马雷克本人宣布的。

⁴⁰ 在一次采访里，皮特哈尔特说他钦佩洽尔法对这种诋毁不以为忤、安之若素的态度。有人可能会联想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官员的职业会将他们训练得不那么过度骄傲。

⁴¹ 令人憎恶的 FŮTI 实际上是政府的新闻审查机构，于 1989 年底被关闭，并于 1990 年 1 月被彻底取缔。库西监督了全过程。

⁴² 科润科娃在阿达麦茨 12 月 3 日流产的改组政府已经担任这一部长职位。

见附录 3。

⁴³ 凯撒（生于 1929 年），1968 年前曾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那年春天他成为捷克邦议会议长，并且很受学生示威者欢迎。尽管他对苏联占领采取妥协态度（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懦夫），他仍于 1970 年被共产党开除，蛰伏到共产党统治的最后一个月。有些人对于他直至 1989 年 2 月复兴俱乐部成立前都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感到失望。

⁴⁴ 我认为哈维尔的评价清楚反映出了捷克斯洛伐克整个社会到 1989 年已经超出 1968 年改革模式多远。

⁴⁵ 凯撒将担任派驻欧共体的特使。他 1992 年春天被召回。

⁴⁶ 当时，没有人知道下一次选举会何时举行（选举最终于 1990 年 6 月举行）。鉴于公众普遍激愤要求终止国家安全机构（StB），洽尔法的建议很难说是现实的。取缔国家安全机构（StB）的命令由内政部长撒彻于 1990 年 2 月 1 日发出。

⁴⁷ 不必说，恰尔法此处是在暗示（因而也就是利用？）苏联威胁。

⁴⁸ 这三位政客因此承担着销毁国家安全机构（StB）档案的职责，这在1989年最后几周占据他们大量时间。媒体对此的最初报道出现在12月8日，到了12月12日报纸上甚至发表了焚烧StB档案的讽刺漫画。

⁴⁹ 哈维尔在他12月30日当选总统后次日就任命撒彻为联邦内政部长。

⁵⁰ 克马雷克与德雷西在新旧年交替时退党。恰尔法于1990年1月18日宣布退党，新任斯洛伐克总理齐奇于3月11日宣布退党。出席这轮谈判的前“政府”方代表包括12人（恰尔法、巴维尔、库切拉、莫霍里塔、撒彻、斯沃博达、斯柯达、特罗坎、恺撒其、库查洛维奇、乌察及约瑟夫·克雷伊奇）。公民论坛与公民反暴力论坛方面代表有71人（哈维尔、皮特哈尔特、冯德拉、克里森、巴娄希、察尔诺古尔斯基、克马雷克、萨巴塔、帕尼克、可卡、里赫茨基、哈泽尔、丁斯特比尔、德罗西、克劳斯、库西及米勒）。

⁵¹ 出席这轮谈判的前“政府”方代表包括12人（恰尔法、巴维尔、库切拉、莫霍里塔、撒彻、斯沃博达、斯柯达、特罗坎、恺撒其、库查洛维奇、乌察及约瑟夫·克雷伊奇）。公民论坛与公民反暴力论坛方面代表有71人（哈维尔、皮特哈尔特、冯德拉、克里森、巴娄希、察尔诺古尔斯基、克马雷克、萨巴塔、帕尼克、可卡、里赫茨基、哈泽尔、丁斯特比尔、德罗西、克劳斯、库西及米勒）。

⁵² 如前所述，这个少数民族委员会最终没有建立。

⁵³ 同样的事态发展也出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

⁵⁴ 同样的事态发展也出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每个谈判者参加的轮次信息，见附录2。

⁵⁵ 与会者甚至考虑到有的共产党代表可能会以退党来避免被替换。他们在1989年11月17日以前的党员身份是决定性的。那些退党的新的无党派人士受国民阵线、公民论坛和公民反暴力论坛之间的协定限制（例如，被驱逐）；如果他们真的加入了其他政党，他们的新党派需要对他们在立法机构继续担任代表负责。

⁵⁶ 联邦议会的三院是：民族院的捷克部分与斯洛伐克部分，以及人民院。

莫里斯·卡尔达

⁵⁷ 恰尔法、齐奇、德雷西和克马雷克几周内都退出了共产党，前两人加入了公民反暴力论坛，后两人将加入了公民论坛。

⁵⁸ 几天后，米兰·齐奇(共产党)成为斯洛伐克总理，加入到恰尔法的政府内阁。

第五章 保加利亚的圆桌谈判

罗姆亚娜·科勒拉瓦、迪米特·迪米特洛夫

(Rummyana Kolarava and Dimitr Dimitrov)

引言

在分析 1990 年 1 月到 5 月间保加利亚的圆桌谈判时，需要注意的是，在达成一系列协议的圆桌谈判结束大约 9 个月后，在相对自由和民主的大选举行 6 个月以后，更深化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迫使圆桌谈判主要参与者签署了一个新的协议（在 1991 年 1 月）。虽然圆桌谈判对摧毁四个东欧国家共产党普遍发挥了一个过渡机制的作用，但这种情形并没有在保加利亚发生。1990 年 6 月的保加利亚选举产生了一个社会党总统，一个社会党内阁，一个社会党占多数的国会。因此，前共产党行政和立法部门的支配性地位获得了程序合法性基础。新诞生的国会反对派仅仅在制宪领域获得了否决权。然而，在经历了本地区一个典型的合法性缺陷后，保加利亚社会党不愿意也不能独自承担转型的负担。因而，新的协议既是自我克制、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也是公共舆论和街头抗议的结果。

新选举出来的制宪会议上的讨论是圆桌谈判的某种继续，这或许是因为选举不过是复制了圆桌会议期间政治人物的种种立场。选举不仅强化和加固了圆桌会议期间主要参与者的分歧，而且最后迫使他们签署了一个新的协议。

本章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1. 在何种程度上，目前的保加利亚政治格局，可以被认为是圆桌会议上达成协议和妥协的种种机制——例如强迫或虚假的共识、以机会主义性质的声明来讨价还价、其它类型的利益扭曲，等等——所无意追求的结果，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目前的格局可以被认为是圆桌谈判各主要参与方长期战略的一部分；2. 在何种程度上，1990 年末的国会和政府危机是源于圆桌谈判的两派所同意建立的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和妥协特质，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那一危机源于人们对主要政治行为者——保加利亚社会党和反对派的支持发生了转移。

本文的分析基于圆桌谈判全体会议的速记记录（共 2229 页），同时也基于对圆桌会议期间一些主要谈判者的访谈，还基于当时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

圆桌谈判的前提条件

保加利亚共产政体的一般特征

从 1950 年代早期起，保加利亚无疑是前苏联在东欧一个最亲密

的卫星国，这个共产政体也是这片地区最稳定的。“全面和苏联整合”的教义这一统治党精英所鼓吹的教义，在 1961-62 年政治局层次的讨论中达到巅峰，甚至考虑了可能的政治一体化和保加利亚加入苏联的申请。“保加利亚-苏联”的友谊是一个具有历史、文化、宗教、经济和政治多种重要维度的政治教条。为本文分析的目的，应该强调的是，甚至在 80 末的政治现实里，保加利亚政治的任何动力机制均受到来自莫斯科的种种支持——大量以非直接的形式——所支配。在讨论保加利亚圆桌会议的前提条件时，我们必须注意，苏联支持问题（或者甚至来自苏维埃联盟的激励）是保加利亚政治后极权转型过程中最初的、开启阶段的一个关键因素。

整个 1980 年代，保加利亚共产政体的衰弱不仅是因为苏联政治的相对不稳定，还因为柳德米拉·日夫科娃（Lyudmila Zhivkova）1981 年突然死亡引发了权力继承问题——她是 70 岁的保加利亚共产党（BCP）总书记、政府首脑托多尔·日夫科夫的女儿。专制政体在处理这类特殊问题时通常面临某种不稳定性。到她死之前，柳德米拉·日夫科娃是一名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局成员。作为一个十几年来活跃的政治家，在政治和党组织结构里，她曾得以提拔了一批有自由意识的知识分子。然而，在 1982 至 1985 年间，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解除了职务。在接下来的 4 年里，柳德米拉·日夫科娃的一些合作者和顾问或多或少扮演了“改革异见者”（perestroika-dissidents）的角色，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著名艺术家斯威特林·卢瑟夫（Svetlin Rusev）。其他人，像亚历山大·里洛夫（Alesandr Lilov）——一个被开除的政治局委员，只在日夫科夫离开权力后才作为共产党（后来改名为社会党）领导人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

这个政权的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保加利亚同欧洲西方传统的文化隔离。人文的、科学的、经济的，以及其他和“西方的联系”，被精心地控制和限制着。保加利亚那些侨民群体都相对较小，在他们和保加利亚精英们之间从来没有形成一个重要的接触联络传统。当民主化进程开始之时，缺乏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沟通渠道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变得明显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反对派领导者是在苏联受的教育，他们中只有极少部分人对当代自由民主制度的价值、规范、机制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的进程没有很大地改变这种状况，但是，1984年后，逐步上升的民族冲突使得人们认为有必要更多关注基本人权问题。在那一年，致力于改变突厥族的国家认同的暴力运动浮出水面。那个运动包括改名（从穆斯林名字改为基督徒名字），在家庭以外禁用土耳其语，限制某些宗教活动，禁止某些习俗比如割礼。既然政府同意遵守某些特定的国际人权规范，它面临着持续增长的国际孤立和压力。在国内，一系列恐怖活动让公众感到惊讶，其中一些恐怖活动是非常惊人的。通过相对温和的镇压，冲突仍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导致了一个原本不想要的后果——突厥族社区因此变得更为团结和有凝聚力。在突厥族居住区，一个高度中心化的协调得非常好的非法组织诞生了。今天叫做“权利与自由运动”（Movement for Rights and Freedom, MRF）的一个突厥少数民族反对组织，其最初模子就是当年那个非法组织。在1984年至1989年间，几千个突厥族人被逮捕，不少于1000个被以恐怖主义等各类罪名被判（其中五个被执行死刑），还有10来个死于同警察、军队的冲突中。1989年5月，一个抗议镇压的游行示威在保加利亚东北部

236

的小镇考利诺沃（Kaolinovo）爆发。很快，300个从少数民族人权运动涌现出来的可疑激进分子被驱逐至国外。这开始了一个大规模的、部分是政府强制的突厥族人移民国外的进程。在1989年6月至9月间，超过30万突厥族人（大约占保加利亚农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作为“旅行者”离开了这个国家，因而导致了保加利亚与土耳其及西方民主国家严重的政治冲突。突厥少数民族的逃离产生了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农作物（主要是烟草）被遗弃在地头；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依赖于突厥少数民族雇工，大部分建筑施工停止了。

到那个时候，保加利亚的经济陷入了严重的衰退。自1984年以后，国外负债已经增长了三倍；1990年，国外负债达到了110亿美元。几个特别不幸的投资发生在重工业和过时的电子工业领域。后来，在圆桌谈判最具决定性的阶段，随着苏联和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市场的崩溃，卢卡诺夫政府暂缓偿还外国债务。大多数政客意识到了即将来临的危机，但是突厥少数民族问题和日夫科夫继承人问题，使他们无暇作出反应。这样才有了可能，一群党内改革者，非常清楚正在降临的经济危机及其灾难性政治后果的党内改革者，将圆桌谈判视为与被控制的、虚弱的反对派共同承担责任的合适机制。保加利亚共产党（BCP）的新领导者们担心爆发群众抗议，尽可能延迟这个时刻——民众将感受到经济危机负担的时刻——的到来，不过在1990年晚秋，群众抗议最终还是发生了。

本书这章要阐明的是，保加利亚圆桌谈判是一个保加利亚共产党先发制人的一个举措。这种先发制人的行动之所以可能并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保加利亚缺乏异议和反对派传统。

保加利亚反对派的诞生，1988-89 年

与其他东欧共产国家的政治进程相比，保加利亚的政治令人惊叹地更为稳定。在其最近的历史中，没有发生大规模动荡的事例，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内也没有任何重大的改革变得真正是重要的。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稳定性？有两个可能：（1）随着社会主义政体的建立，原先存在的非社会主义精英被严厉镇压了。在 1944 年至 1945 年的政治审判中，2730 个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被判处死刑，包括此前两届政府的所有内阁成员。在地方层面，有超过 20000 和原政体有隶属关系的人在 1944 年 9 月至 10 月数周的革命骚乱中，不经过审判就被杀害了。（2）保加利亚共产党被紧紧控制在布尔什维克理论家、领导者以及高度隶属于共产国际的官员们手中。自二十世纪早期开始，保加利亚共产党一直在攻击社会民主意识形态和政策。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曾在祖国阵线里（1943 年至 1945 年）有过短暂的政治合作，但合作以社会民主主义者灾难性的命运而告终，他们的组织被禁止，领导者们受到示众审判。共产党与非布尔什维克残留意识形态和党派进行政治对抗的漫长传统，有效防止了党内任何重要改革派的存在。由于这个特殊的原因，保加利亚的持不同政见者们更像苏联那种个体知识分子实施“一个人的抗议”，而不像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组织化行动范例。

在 1947 年禁止反对党后，合法的政治活动只在一个组织内是可能的，即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BANU）内支持共产党的一翼才（农业党的其他两翼被禁止了）。40 年来（直到 1990 年 2 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完全控制了 this 正式的联盟，只给 BANU 的领导人不超

过三个部门——司法、卫生保健和农业。安全机关的政治部门事实上有不受控制的权力，最敏感的领域则由日夫科夫个人监管。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Service）第六部的第六办公室监控着几千名政治精英或者高职位的成员。差不多 30 年来，日夫科夫的政权既没有受到挑战，也没有被公开要求负责。

不存在可替代的政治文化和民主传统中断，其古怪后果之一就是，最早期的抗议群体宣称自己不关心政治，自称他们是“独立”的。这个做法能够追溯到最早的抗议社团：建立于 1988 年 1 月的人权保护独立协会，建立于 1988 年 3 月 8 日的鲁斯市环保独立委员会，建立于 1989 年 4 月 11 日的生态公开独立协会，等等。在 1989 年 12 月宪法修改后，结社自由得到了保障，所有这些组织一分为二。这些组织一半的领导人继续坚持非政治的目标和活动项目，另一半领导人扩大了他们的活动项目以包括清晰的政治目标。

在讨论到保加利亚反对派的兴起时，在统治精英内部的几个异议资源是值得提及的。

精英内部的竞争

在 1987 年，作为对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的响应，特权的实践第一次受到公开的批评（依据那些特权，身居高位的人不仅受益于他们的政治职位，还能把这些“福利”转让给他们的孩子和孙子）。这明显指向了日夫科夫的大家族。批评特权的系列文章遭到公开批判，然后作者乔治·坦彪夫（Georgy Tambuev）也受到攻击，其他几个支持公开行的主流报纸和杂志的总编被开除，例如斯蒂芬·普罗德夫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Stefan Prodev)。

作为解决继承问题的最后尝试，日夫科夫努力提升他的儿子弗拉基米尔（生于 1952 年）做政治局委员，但是他被几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局委员阻止了。加剧内部不满的是，日夫科夫的儿子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这个强加的决定激励了一些前官僚行动起来，成为新成立的反对组织的共同创始人——斯威特林·卢瑟夫（Svetlin Rusev），恰夫达尔·库拉诺夫（Chavdar Kjuranov），克拉斯图·高拉诺夫（Krastju Goranov），索尼亚·巴卡西（Sonia Bakish）。然而，在圆桌谈判开始前，所有这些“异见分子”重新加入了保加利亚共产党。

知识分子的不满

知识分子的不满与两类问题相关——生态环境和基本人权。鲁斯市严重的空气污染导致了自 1940 年末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公众抗议。其中一次抗议被影像记录下来，在这部影片第一次放映中，大约 300 个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个鲁斯环保委员会。一些参与活动的人在受到了威胁后离开了这个委员会；其他一些人被开除出保加利亚共产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核心活动分子建立了生态公开独立协会。

1987 年 11 月，在索菲亚大学的基层党组织会议上，四个教授公开批评日夫科夫的政策。他们中的三个被强制退休，一个被禁止上讲台。一年后，在这个大学，公开和改革俱乐部（the Club for Glasnost and Perestroika）成立了。有一次，一些积极分子被保加利

亚共产党开除，一些受到警察质询。

在 1989 年 5 月，诗人佩塔尔·马诺洛夫宣布了绝食抗议人权侵犯。因为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报道了这次绝食，一场对外国干预的猛烈攻击被组织了起来。与此同时，突厥族少数民族的游行示威发生了。在一个公开声明中，70 位知识分子谴责了军队和火器被用来对付发生在卡斯林诺沃（kaslinovo）的和平抗议。他们在官方组织的集会上受到谴责，被斥之为“叛国者”。

9 月，一个早就计划好的、有关环境议题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签署国官方代表会议在索菲亚召开。生态公开独立联盟在这个城市的中心组织了一次小规模游行示威，试图警告国际社会有关森林毁坏的情况，但是游行被警察打断了。保加利亚又一次受到侵犯人权的指责。

10 月 27 日，外交部长彼得·穆拉德诺夫（Peter Mladenov）给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治局写了一份辞职信，此事被广泛解读为对现政权的抗议。传言他 11 月上旬在去中国的行程中会见了戈尔巴乔夫。

11 月 10 日，10 位政治局委员迫使日夫科夫辞职。后来，他的个人秘书证实，他是在和苏联大使维克多·莎拉波夫（Viktor Sharapov）一周以前两次长时间会见后被迫辞职的。日夫科夫的罢黜后来被视为一次和平政变。

通向圆桌谈判的重要事件和政治变化

日夫科夫刚离职，共产党和反对派就都组织了几次集会。反对派显然很意外，没能积极启动重大调整。第一次公开组织化的、为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公开和改革俱乐部招募新成员的会议，在 11 月 10 日后过了两到三周才举行。同时，在共产党和所有官方组织内，领导成员戏剧化地改变了。10 个政治局委员中的 7 个被替换了。国民议会召开了，刑法典中反异议的规定被废止了。彼得·穆拉德诺夫被选为国家元首（国务委员会主席）。

12 月 8 日，一个反对派组织联盟，民主力量联盟（UDF）成立了。反对派的组织结构由民主力量联盟协调委员会和非常有限的成员构成，协调委员会包括每个成员组织的一个领导人，成员组织各自（自治）的全国理事会。直到圆桌谈判之后的竞选期间（1990 年 4 -5 月），没有地域性的结构存在。这一进程主要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阻碍：1989 年 12 月，所有积极的异见人士都从首都之外搬到了索菲亚，变成了反对派组织的领导人——康斯坦丁·崔恩特切夫（Konstantin Trentchev），留博米尔·索巴扎耶夫（Liubomir Sobadziev），克里斯托弗·萨比夫（Chritofor Sabev），尼克莱·克勒夫（Nikolai Kolev）。

民主力量联盟（UDF）被刻意定位为一个松散的联盟，因为共同发起这个联盟的党派彼此之间有不相容的政纲。但是，因为成员党派处于组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民主力量联盟内部的决策过程受极少数人影响。

1989 年 12 月是民众抗议的扩张时期。举行了要求释放政治犯和修改宪法的集会，几次罢工呼吁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国民议会的立法活动很热闹，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实际上，

议会的每一次立法动议都引起了群众抗议：12月16日，抗议群众几乎挤爆了国民议会大厦；自12月25日开始，穆斯林代表开始在大厦周围设立纠察线；穆斯林抗议受到了1990年1月1日开始的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大规模抗议的反制。在那个阶段，民主力量联盟被证明是唯一可以有效控制群众抗议的政治力量。因为通过惯有的渠道修宪显然被认为没有合法性可言，保加利亚共产党开始相信召开圆桌会议已经势在必行。

东欧变化的影响

每个东欧国家所发生的改变都以不同方式影响了保加利亚的事情。波兰的事例不仅被保加利亚共产党、也被民主力量联盟用来当作一个普遍模式。在民主德国发生的事件，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内成为积极和迅速采取改革行动的最终论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群众集会的开始。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是一个“积极的例子”，它更多地是一个理想而非实际的目标。罗马尼亚的“革命”在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被实况直播，强烈影响了对群众抗议的态度，产生了对暴力和恐怖行为的担忧。罗马尼亚经常被用来作为支持慢速转型的一个案例。

圆桌谈判

最早的接触

反对派工会独立劳工支持联盟呼吁1989年12月24日举行一次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总罢工，这一事件加速了圆桌谈判的到来。这个罢工威胁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那时保加利亚并不存在大规模公民不服从的资源。事实上，独立劳工支持联盟的这种威胁只在罗马尼亚那种政治情景下才看起来是可行的。

在预备谈判开始之前，安德瑞·卢卡诺夫（**Andrei Lukanov**），将日夫科夫从共产党领导职位上和平罢黜的一个关键人物，秘密会见了新成立的民主力量联盟的一些领导人。他还分别会见了一些亲政府组织新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日夫科夫下台以后，所有官方组织领导层都发生了迅速变化，例如，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共青组织，工会，祖国阵线，等等）。

关于这些预备和秘密接触会议的参与者和会议主题，只有很少一部分信息可以获得。一位参加过圆桌谈判共产党专家声称接受我们访谈时称，圆桌谈判的主要发动者是社会学家恰夫达尔·库拉诺夫教授（**Chavdar Kjuránov**），他是保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前官员，但是 1988 年开始变成了一个积极的异议者，也是民主力量联盟的共同创始人之一。1989 年 12 月末，他恢复了其保共党员身份，变成了保共改革派的主要理论家，积极支持新当选的党领导人亚历山大·里洛夫（**Aleksandr Lilov**）。

谈判的预备回合

磋商会议 (1 月 3 -4 日)

预备谈判开始于 1990 年 1 月 3 日，初步磋商在国民议会大厦进行。保共改革派和新当选的全国农业联盟领导人首先分别会见所有

亲政府的官方政治组织领导人，然后，会见新起的反对派组织领导人。国家元首彼得·穆拉德诺夫和总理乔治·阿塔那索夫（两人皆保共党员及其政治局委员）没有参加这些会谈。显然，当时的计划是将圆桌谈判作为当政党派（共产党和全国农业联盟）与所有其他政治组织的一种协商会议。按这种方式组织的圆桌谈判试图实现三个主要目标：（1）达成一个有关新联合政府的协议，新联合政府将包括一些新起的反对派领导人；（2）对宪法的若干修改达成一致意见；（3）尽快确定新选举日期（提议为1990年3月）。保共改革派显然想通过这种方式确保他们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的实权地位。会谈记录显示，这一意图在与亲政府组织的会谈中被公开讨论过。卢卡诺夫主持了所有的会议，设定日程、引导讨论。

正式的圆桌谈判将于1月15日开始，1个月后结束——这些日期在与官方组织领导人的会谈中被提到。谈判组织者试图定期宣布谈判结果，但谈判要闭门进行。少数媒体记者将参加那些谈判。

官方组织领导人坚持与反对派领导人享有平等地位，这是与他们讨论的主要议题。卢卡诺夫和里洛夫都宣称他们中并不想有“多方”参加谈判，但是他们说，关于这个问题的定夺将完全取决于反对派。

在预备谈判中，反对派领导人提出了一个与共产党根本不同的议程。然而，预备阶段的主要议题，是反对派将同意参加谈判的条件。民主力量联盟的领导人宣称，他们将不会同意开始谈判，除非三个条件得到满足：（1）确保参与圆桌谈判的只有两方——政府一方（在政府和议会里代表政府的官方组织）与反对派一方。关于双边还是多边谈判，这个问题与达成决定的程序相关联——反对派坚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持通过共识（consensus）达成决定（多数同意为“共识”——译者）；

（2）政府为反对派提供一栋楼，允许他们出版发行日报；（3）圆桌谈判实时广播。

在一天内，一项协议达成了：所有这些程序上的问题将在圆桌谈判的预备回合讨论。

第一（预备）回合（1月16日-18日）

在这个预备回合，主要谈判者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和民主力量联盟。谈判在两个层级上举行，一个是联络小组会议，一个是全体大会。联络小组的设置使得达成协议更加容易；促进个人间的联系并不如确保有一个双向的沟通渠道或“应急渠道”有效。在民主力量联盟两次离开预备谈判全体会议、等待政府同意反对派的要求时，谈判仍在联络小组会议继续进行。谈判开始时，几个联络小组形成了，每组处理一组特殊的议题——立法，国家安全，经济改革，宗教自由，大众媒体，党产。这种安排使得避免公开讨论两类议题上成为可能：一类是基本上没有多大分歧的议题，另一类是双方都不希望公开讨论的议题。

共产党爽快地同意了反对派要求的所有条件，除了民主力量联盟提议的双边谈判模式。因大多数民主力量联盟的成员组织有一个重叠（孪生）的官方组织，双边谈判模式变成了预备谈判的主要议题。最大的亲政府组织——工会、共青团、祖国阵线——的领导人们不想成为共产党代表团的一部分，提出成为圆桌谈判的第三方。他们使用了威胁和警告，但是没有可信力。工会组织了请愿，共青团

组织发起了集会，但是都没有动员起重要的支持。这些官方组织，因为他们虚弱的谈判地位，对这个阶段谈判的决定没有重要的影响——这些亲政府组织没有参加联络小组会议，仅仅被邀请加入最后的全体会议。它们的声明在被保共拿来作为一个论据时，那个论据明显是苍白无力的。

最后，一个有关两方谈判的“配额”的协议达成了。处于领导地位的双方谈判者——保共和民主力量联盟——每边都有一个 43 人的参与者配额，他们有权邀请他们选择的任何组织的代表来填满这个配额。布拉格韦斯特·森多夫（Blagovest Sendov），临时议会的两个无党派人士之一，是这个谈判阶段的主要协调者；他提出了“配额”公式，赞成民主力量联盟提出的需要一栋办公楼以及出版报纸的权利。

实际谈判

第一组文件

圆桌谈判在 1 月 22 日正式开始，首先宣布了双方按配额产生的参与者名单——政府一边（保加利亚共产党邀请的组织）和反对派一边（民主力量联盟邀请的组织）（详细信息请看附录一。）

从 3 月 12 日签名的一些文件，可以看出第一轮谈判讨论的所有要点（相关细节请看附录 2）。

双方都同意，圆桌谈判应该产生一些文件，由所有参与者签名。首先，他们必须就要讨论的问题的清单达成一致。很明显，他们不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可能在两组议题上达成一致。它们包括反对派在下列事项上的要求：追究保加利亚共产党的罪行，废除它的镇压性机构和政治公安部门。一些保加利亚共产党提起的议题也只能被排除于议程外，重要的有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暂停罢工、一项经济改革的计划。

下列理由被用来支持不签署关于上述问题的文件的决定。民主力量联盟领导人说，他们不打算在选举之前加入权力结构，也不会承担新政府的任何经济政策责任。共产党领导人表示，新政府将负责废除镇压性机构和过去 45 年党的政策，然而，关于党的罪错这个问题应当在党代会上讨论，并在未来的选举中由选民评价。

因此，双方都同意在圆桌谈判上不再讨论这些问题。同时，保共代表大会举行了，会议检讨了党的错误对于政治和经济危机所负的责任。日夫科夫和他的亲密合作者被认为对党的过错负有责任。党代会后，一个由卢卡诺夫领导的新政府立即建立起来。由于全国农业联盟拒绝加入新政府，这是保加利亚历史上第一个纯粹的共产党政府。

2月6日，在圆桌谈判的全体会议上，新任命的内务部长、曾担任保加利亚军队参谋长超过 25 年的阿塔纳斯·塞莫扎耶夫（Atanas Semerdzhiev）将军，做了一个关于解散政治警察、重组国家安全机构的报告。塞莫扎耶夫将军个人做出保证，政治镇压不会再发生。不过，既然他从来没有实质控制过安全机构的核心职能和行动，他并不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做出这样一个承诺。他的这个声明更多的是——也被认为是——一个英雄般的姿态而非一个可靠的保证。塞莫扎耶夫将军后来被选为副总统（1990 年 8 月）也许与他的这个行

动相关。

这样，共产党回应了反对派的要求，使得它们不需要再在圆桌会议上讨论。通过这种方式，共产党以一个负责任的改革者而非仅仅一个谈判者的姿态合法化了其位置，这种态度为它在后来的竞选中建立了巨大的优势。

第一轮圆桌谈判的争议和谈判集中在下列议题上：（1）选举日期；（2）废止共产党在企业、机关、学校、医院等工作场所的基层组织（）；（3）军队、警察、法院和国家行政的去政治化；（4）国家类型（社会主义或非社会主义）。

作为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支持反对派的结果，共产党在第三和第四个议题上做了让步。在这两个议题上，保共的争辩是民粹主义的；共产党代表援引“人民的意志”，争辩说每个人应该有自由做出选择，因而最好由公民投票决定这些问题。对于改革中的共产党以权利为基础提出的这些辩据，民主力量联盟在回应时警告说：所有的反对派组织将开始在种种工作场所建立自己的初级党组织。显然，这可能将大大增加社会紧张度，威胁社会的和平。

2月7日之后，选举日期和解散基层党组织依然是核心的分歧原因。全国农业联盟支持共产党尽快举行选举的要求，而民主力量联盟争辩说，如果那样，结果将仅仅是当下国会的部分更替以给反对派若干席位。布拉格韦斯特·森多夫（Blagovest Sendov）清晰概括了保共与民主力量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呼吁继续谈判和各退一步。但是，双方都需要时间。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民主力量联盟需要时间，也需要得到这样一些保证，即共产党将开始在军队、警察、法院、行政机构去政治化；将对党的财政支持与国家分开；解散政治镇压机关。权力结构上的这些剧烈变化将耗费时间。而且，人们普遍相信，延迟大选将增加民主力量联盟的胜选机会。这个想法是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因为民主力量联盟能够可信地威胁中断谈判——延迟对他们来说无所失。

保加利亚共产党需要时间重组它的基层党组织而又不至于大量流失党员。快速解散这些组织的影响，将可能无异于共产党领导层实施的组织上的自杀。在一个月內，一些被称为职业俱乐部的党的组织建立起来了，以作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替代物。同时，保加利亚共产党急匆匆地确定了一个选举日期：不迟于 1990 年 6 月。因而，这使得共产党更容易受到延迟（谈判）的影响。

因此，2 月 12 日民主力量联盟离开了圆桌谈判全体会议并威胁道，如果保加利亚共产党不解散它在工作场所的基层党组织，反对派将拒绝签署任何文件，离开圆桌谈判。

3 月 12 日，经过联络小组层面的长时间协商和谈判后，以及经过里洛夫和哲里奥·哲勒夫（Zheljo Zhelev，圆桌谈判的联席主席和民主力量联盟的负责人）几次秘密会谈之后，终于签署了第一批文件。从对谈判参与者的访谈中，我知道里洛夫独自参加了大部分这些秘密会谈，而哲勒夫经常由迪米塔尔·卢哲夫（Dimitar Ludzhev）和彼塔尔·斯塔科夫（Petar Staikov）陪同参加。冲突的这种解决机制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因而在接下来的整个圆桌谈判期间保留了下来，甚至在谈判结束以后也是如此。

虽然共产党的让步和反对派组织的群众抗议所起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的报道，但民主力量联盟在选举日期上的让步完全没有公开，在谈判的下一个阶段，民主力量联盟又一次主张推迟选举到 1990 秋天。

在第一轮文件中，最基本的文件是宣布圆桌谈判的地位（这份文件从来没有公开）。一种最高的立法地位被赋予给圆桌谈判参与者签署的这些协议。留给临时国会的角色只是“自动投票”，不能改动圆桌谈判达成协议的宪法修正案和法律文本。其他两份文件只包括对要进行的立法改革的一般性描述（确定第二轮圆桌谈判的日程），以及宣告圆桌谈判参与者的良好意愿。

有一个问题被多次提出来，但从来没有付诸讨论——突厥少数民族代表参与圆桌谈判的问题。事实上，他们都被公开地邀请加入两方，但是“权利和自由运动”（the Movement for Rights and Freedoms）的代表从来没有加入到两方中任何一方的“配额”中（至今我们尚未完全理解其中的某些原因）。会谈中提出了突厥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的民族冲突问题（或者莫若说保加利亚行政当局与突厥人的冲突），但是仅在联络小组会议上讨论过。显然，圆桌谈判的参与者都不希望使民族冲突的讨论公开化。

第二组文件

在签署了首轮文件后，第二轮谈判开始于 3 月 12 日。会谈开始时，民主力量联盟宣布有一些新议题要放入议程中——宪法修正案，新的选举法律，关于政党的特别法律，以及大选的日期。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第二次全体会议（3月15日）主要处理经济改革备忘录，保共、尤其是总理卢卡诺夫想要圆桌谈判的所有参与者签署这份备忘录，可能是为了说服保加利亚的国际债主们重新安排债务的偿付时间。民主力量联盟又一次拒绝分担责任，这被共产党宣传部门说成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反对派甚至被指责为了私人利益和组织利益而背叛了国家利益。在10天里，政府出乎意料地暂停了所有外国债务的偿付，这是没有在圆桌谈判中讨论的一个重大决定。

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冲突的议题得到了概括性表述。

宪法修改——共产党坚持直接选举总统，五到六年一个任期，总统权力至上。民主力量联盟坚持总统由现在的临时议会选举，任期一年，行使有限的、主要是代表性的总统职位权力。

政党法律——共产党坚持禁止所有运动（movements）以及其他非政党组织参加选举。由于几个最活跃的反组织——劳工支持联盟（Podkrepa），生态公开独立联盟，独立学生组织联盟（the Independent Federation of Students Organizations）将会受到这个禁止条款的限制，民主力量联盟反对这个禁令。双方都同意，应该明确禁止那些基于宗教和民族的政党参选。

选举——共产党坚持国民议会选举不迟于1990年6月份，以一种混合选举制为基础（通过单一选区多数票制选出175代表位，按比例选举制在全国性政党中选出75位代表）。民主力量联盟希望盟立宪会议选举不早于1990年9月，采用比例代表制。

共产党声称，所有的议题彼此相关，应该被“打包”解决。这使

得交易和相互让步不可避免。

在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作为相互让步的结果，双方都同意采用按多数制和比例制选出相同数量议员的混合选举制度。因此，当选举开始时（在 1990 年 6 月），每个公民有两张票，一张投给政党，另一张投给单个的选区代表。保加利亚共产党同意选举一个 400 个成员构成的立宪会议，立宪会议的任职期限由它自己决定。这些选举的日期又一次没有公开讨论。

因此，双方争议集中在总统职位和选举日期上。在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保共同意在过渡时期只给总统有限的权力（直到新宪法投票通过）。因而，还剩下两个问题必须达成交易：选举日期和总统选举程序。

交易最根本的部分与新当选总统的合法性相关。双方都知道现在的国家元首彼得·穆拉德诺夫，也就是和平废黜日夫科夫的领导人物，将被选为总统。民意调查显示，他拥有压倒性的群众支持。

共产党主张直接选举总统，因为希望确保给一个共产党总统四或五年的任期。共产党的代表声称，如果圆桌谈判的参与者不能在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上达成一致，总统权力问题将由大选前的全民公投决定。反对派认为，只有制宪会议有合法性决定政府的形式，包括总统的权力。决定性的一步是全国农业联盟迈出的；它的代表们支持民主力量联盟的要求，他们声称，如果总统不由国民议会选出，那么全国农业联盟将坚持保留国务委员会——一个由共产政体引入的极权统治机构。由于全国农业联盟在临时国民议会有众多代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表，这是一个可信的威胁。在这个谈判阶段，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就是民主力量联盟、全国农业联盟和官方工会的地位获得巩固，它们迫使共产党快速做出让步。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在6月10日和17日举行全国大选，由临时议会选举彼得·穆拉德诺夫为总统。

总统权力和选举方式上的分歧，还有一个方面主要是符号性的，就是有关国家元首名称的讨论。共产党提议用“总统”的名号，民主力量联盟提议用“主席”。最后，他们同意用“总统-主席”命名国家元首。

在这些讨论中，共产党和民主力量联盟双方都不断否认他们是在讨价还价，或者做出任何妥协，然而，谈判的结果显然源于保加利亚共产党在选举方式上的让步，以及民主力量联盟在选举日期上的让步。这个不一致是考虑到讨论的公开性：双方的支持者都将讨价还价视为背叛。对民主力量联盟而言，讨价还价意味着对原则妥协；对共产党而言，讨价还价被视为不可接受的虚弱的标志。害怕公开是显然的：当全体讨论禁止社会运动参与选举时，开的是闭门会议。这是圆桌谈判唯一的闭门全体会议——所有的参与者都不敢公开发表涉及“权利与自由运动”（MRF）的言论。

圆桌谈判拥有最高权力，这方面的一个基本证据是，临时国民议会延长了它的会期以等待圆桌谈判的参与者同意宪法修正案文本的最后版本。当这些文件的最后文本被提交给国民议会立法委员会协调时，委员会的专家们只发挥了有限的咨询性职能——另一个细节证实了圆桌谈判的至高权力。

第三组文件

第三轮圆桌谈判处理的是自由和公正选举的保障问题。这轮讨论不同于前两轮。不同之处源于第二轮最后一次会议达成的决定——只在所有议题都在联络小组层次上达成一致后才召开全体会议。作为这个决定的结果，第三轮只召开过一次全体会议。

这次大会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外国选举观察员的地位以及公平和自由选举的保障。在长时间的争论后（第二天早上全体会议才结束），双方都做出了让步，两个议题都达成了协议。在外国观察员问题上，很容易就达成了一个妥协的方案（他们被成为“客人观察员”），但是在防止操纵投票和重复投票的程序上，却很难达成协议。民主力量联盟提议给每个投票者在手上做一个墨水标志（就像当时尼加拉瓜所实施的），然而，保加利亚共产党反对这样做。最后，在会议休会通过联络小组协商后，民主力量联盟同意布拉格韦斯特·森多夫提出的程序——重复投票将通过电脑监控来核查。事实上，这个程序后来被证明是不可靠的；选举过了三年后，的调查议会发现了明确证据证明重复投票确实发生过。

到这个时候（5月14日），突厥族的权利与自由运动（MRF）才在中央选举委员会获得登记，尽管法律禁止基于民族的政党参加选举。布若安克·大卫多夫（Branko Davidov），一个亲共产党的民族主义组织代表，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谁对权利与自由运动议员候选人的登记负责？共产党和民主力量联盟都拒绝承认对这一行为负责，不过，这个问题并没有进行讨论。

长期的目标与双方的战略

保加利亚共产党有两个主要战略：（1）改革要尽可能少而有限；（2）保留尽可能多的财政和组织资源，防止党的分裂、防止没收党产，保持党的官僚群体对地方政府和大型商业企业的某些控制。

下列手段被用来追逐这两个主要战略目标的实现：（1）操控议程——在圆桌谈判上，党产和党的罪错问题从来没有真正获得过讨论，虽然反对派的代表们多次提出了这些问题；经济和行政改革也以类似方式处理。反对派进入地方政府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地方性圆桌谈判的必要性问题，也从来没有获得过讨论；（2）控制达成协议的步伐，控制决定大选日期的所有因素——事实上，谈判的总议题是“哪些让步是保共准备做出的，”因而，一般的情况是，达成让步意味着共产党方面做出大的退让。

共产党的长期战略可以概括为“越快越少”；“尽可能快”实际上意味着改变要尽可能少（有限和受控制的变革）。

共产党在圆桌谈判上的另一个基本战略是尽可能降低公开性。通过拒绝将某些问题纳入议程、做出最快的让步、延长联络小组中的准备性工作等方式，公开讨论被“无形地”控制了。

共产党是做出让步的一方，这个事实产生了一个幻觉：它处于谈判中更弱势的地位。事实上，它是更强势的一方，因为它控制着权力资源和达成协议的步伐。挑出某些议题快速做出让步，是保共战略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民主力量联盟的战略有两个基本要素：（1）作为新生的反对组

组织的联合体，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主力量联盟，以及它的每个成员组织，都需要时间建立有效的组织结构、利用可以利用的资源（民主力量联盟的地方组织结构是在大选期间创建的）；（2）它是一个暂时性的政党联合体，那些政党各有自己的、从社会民主主义到保守主义的不同政纲，它们的联合是基于一个明显短期的政治目标：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地位。缺乏一个共同的、正面的纲领，这一情况一直被共产党不断用来诋毁民主力量，把它称为一个假冒的民主联合体。

在涉及到未来的选举时，在新组织起来的民主力量联盟内部，面对两个相反的需求，一直存在一种紧张状态：一方面，为了能与与组织良好、资金充足的共产党抗衡，必须继续联合起来（加强团结）；另一方面，必须尊重联合体中有着相互矛盾的政纲的各个伙伴组织，保持它们各自的特点和支持群体。当时普遍的预期是，联盟不会持续到大选以后。因此，长期战略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与民主力量联盟在圆桌谈判中的地位不相关。

考虑到民主力量联盟的短期目标，放慢谈判的步伐是其利益所在，但是反对派没有资源设立新的条件、提出新的议题。延迟大选日期的唯一途径是加入联合政府，但是这是与民主力量联盟在圆桌谈判开始时宣布的立场、以及大部分反对组织的长期战略矛盾的。

主要人物

圆桌谈判全体会议由共产党和民主力量联盟代表团领导人共同主持。通常，联合主席是阐述议程中的主要议题、宣布达成协议的人。他们也宣布民主力量联盟或共产党所做出的主要让步。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哲里奥·哲勒夫是所有全体会议上民主力量联盟这边的联合主席，至于共产党那边的联合主席，有几次根本性变动——标志着共产党的目标和策略变动。卢卡诺夫作为党内改革进程的关键人物开启了圆桌谈判，但是在 2 月 6 日被选为总理后，他离开了谈判桌。乔治·皮林斯基（Georgi Pirinski）被新的、更名为“最高党委主席团”的政治局，任命为圆桌谈判联合主席，但是他只做了非常短的一段时间。他很快被新当选的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里洛夫所取代。对这一替换有几种可能的解释。当时，共产党看到延迟谈判是对自己有利的，有助于赢得必要的时间重新将它的普通成员组织起来。皮林斯基临时被任命为圆桌谈判联合主席，就是出于延长争论的特殊使命，因而当真正的谈判再次开始后，需要将他替换掉。或者，仅仅是因为共产党领导层从来没有想要在全体会议上进行真正的谈判，因此任命了一个级别相对低的官员来主持那些会谈。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它是我们采访过的一个谈判参与者提出的，他指出皮林斯基被替换是因为卢卡诺夫（他当初选择皮林斯基取代自己）与里洛夫之间的冲突和误解。不管原因是什么，里洛夫取代了皮林斯基，成为所有达成决定性协议的会谈的联合主席。

圆桌谈判所有关键参与者的发言，都是在会议开始之前精心预备好的，显然不仅是由于大会是直接广播的，还与参与圆桌谈判的几乎所有组织的决策程序有关。共产党的决策主要由最高党委主席团做出，民主力量联盟的决定主要由协调委员会做出，全国农业联盟的决策主要由“常设会议”（Permanent Presence）做出。每一个代表团成员之间的观点没有显示出有基本的不同或矛盾之处。

民主力量联盟这边的主要谈判者并不相互替换，而是同时行动的。从圆桌谈判开始以后，民主力量联盟这边一直有两种类型的参与者：（1）做为一个联合体的民主力量联盟的代表，也就是哲勒夫和彼得科·西蒙诺夫（Petko Simeonov），他们宣布民主力量联盟的决定（每次大会前投票产生，每个政党有一张票）；（2）宣布各自政党（组织）立场的领导人，例如彼塔尔·德特里耶夫（Petar Dertliev）（社会民主党），米兰·德瑞恩切夫（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尼古拉·佩特科夫），康斯坦丁·崔恩特切夫（独立劳工支持联盟）。

在联络小组达成的协议或概括的分歧主要由迪米塔尔·卢哲夫来宣布，他可能是联络小组里最主要的调停者。共产党方面与他在联络小组搭档的是皮林斯基，不过，皮林斯基显然没有扮演调停者的角色。

圆桌谈判其他两个基本角色，是新当选的官方工会领导人，克拉斯特于·皮特科夫（Krastyu Petkov），以及官方的全国农业联盟代表们。他们由共产党邀请作为自己的一方加入，但是两者都尽力争取获得独立的政治行动者地位。为了寻求新的合法性，他们在关键议题上反对共产党的立场，支持民主力量联盟，主张做出让步。

最成功地扮演了调停者角色的人物，是布拉格韦斯特·森多夫——一个大学教授，数学家，他作为议会无党籍议员而加入圆桌谈判（被邀请在共产党一方）。另外一个有相同地位的人，留本·库里谢夫（Liuben Kulishev），积极支持共产党一方，不过，森多夫却成功保持了相对独立的立场。森多夫至少提出了两个关键的妥协方案——参与者配额和防止重复投票的程序。

合法性意识

圆桌谈判开始时，没有任何谈判参与者是由他们声称代表的支持者群体正式委任的，虽然所有组织的领导者都声称他们代表了其成员的利益。由于没有发达的组织结构，民主力量联盟处在一个弱勢的地位。

共产党方面谈判参与者的合法性，来源于他们在党内的改革立场。在 1990 年 2 月份的谈判期间，共产党召开了一次党代会，选出了新的领导人亚历山大·里洛夫，他成为共产党一方谈判的领导者。之前的中央委员会被重新命名为“最高党委”，政治局被重命名为“最高党委主席团”，但党内决策机制保持不变。因为党代会批准了民主化政策，共产党谈判代表的合法性系基于党员的信任投票。此外，还有其他两个组织性行为，它们旨在评估党员的认可——对党的名称的改变举行跨党公投（从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以及重新登记党员身份（一百万保加利亚共产党员中的一半登记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员）。

共产党谈判代表的另一个合法性来源，是的党领导层已经宣布放弃持续了 45 年的权力垄断，确保政治多元主义。还应指出的一点，是保加利亚的共产政体在这些年超乎寻常地稳定。因此从全面控制权力的状态让步，被公众认为是转型和民主化的证据，是一个非常强的合法性因素。所有主要的让步都由党的领导人里洛夫宣布，并获得广泛报道，这一事实也是重要的，在此有必要强调。

共产党解释其种种让步的另一种方式，是其更有份量的合法性

来源：它声明它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利益与社会的和平而做出让步的。利用民主主义情绪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策略，尤其在突厥少数民族定居的地区，那里的保加利亚人在选举中将票投给了共产党。

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是被圆桌谈判中的前共产党所利用的又一个合法性来源。它准备做出的让步总是伴随着专家们的评议；共产党刻意塑造了一种由专业人士领导的形象，这与反对派由被没有政治经验、缺乏对权力机制的了解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由于在保加利亚没有出现重大的权力真空，没有异议行为的历史，民主力量联盟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它坚定的反共立场。那些所谓历史性或复活的政党，严重依赖于人们的记忆和保共在建立政权时对它们历史上的组织实施镇压的证据。然而，这个遗产并不总是对反对派有利，因为它增加了人们对于复仇的恐惧。现代保加利亚历史的短暂时期（1878年至1944年），见证了许多政变和一个真实的复仇传统。在一个八分之一人口是共产党员的国家（也就是说，六分之一的成年人，或高达四分之一的家庭），反共产党立场的合法性并不能因为共产政权镇压的记忆而得以加强。

共产党聪明地利用了反对派圆桌谈判战略的不足，它的手法不仅限于发掘那些历史性政党的可能报复问题，也质疑反对派代表的合法性，这是因为不是所有新成立的非共产党组织都被允许加入民主力量联盟。民主力量联盟被视为阻碍真正的多党反对派的出现及影响多党反对派合法性的一个组织。一系列由受过传统马克思主义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撰写的出版物，将民主力量联盟界定为一个行动类似于极权政党的假冒联盟。

因为反对派的合法性经常受到共产党或亲政府组织的质疑，它使用了两个主要战略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第一个、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是离开谈判并号召群众抗议。在那个时候的保加利亚，也许没有其他政治组织能够发动群众抗议来支持自己的政策主张。反对派的另一个合法性来源，是其他东欧国家的变化，以及西方观察家和外交官们的立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西方民主国家的政界人物，更愿意会见民主力量联盟的领导者们，这个事实是反对派合法性的基本来源。

最后，应该强调，圆桌谈判没能严重侵蚀公众对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支持，所有的舆论调查显示，大部分人把这个党视为公共秩序和稳定唯一可靠的卫士。

公开性及其影响

有两个事实对于理解争论的类型和圆桌谈判中使用的威胁，至关重要：圆桌谈判是公开的，在国家广播电台（白天）和国家电视台（深夜）播放；它们是反对派和共产党获得合法性来源的主要政治行为。事实上，圆桌谈判是这个国家主要的社会事件，因为共产党在 1990 年 1 月至 7 月间成功保持了社会、经济、政治的稳定。在那段时间，反对共产党的群众抗议仅仅因为圆桌谈判的冲突而起。因为是民主力量联盟提出的问题造成了冲突，共产党领导层指责它引发了不必要的震荡和不稳定。相当多数的公众同意这一点。事实

上，群众抗议两极化了公众。

一个有趣的细节可以显示对公开性的意识或担忧，就是关于圆桌谈判地位的协议从来没有出版过（圆桌谈判最早签署的文件之一，附录 2 复制了这份文件）。这个文件的密而不发，至少可以用两个方式解释：（1）双方都害怕向公众宣布他们彼此已经确定是整个保加利亚人唯一合法的代表；（2）共产党害怕被党内强硬派指责太轻易地做出一些不必要的让步，因此促成了反对派的合法化，虽然民主力量联盟顺利而快速的合法化和正当化，符合共产党的利益。

圆桌谈判的结果

下列圆桌谈判的结果对接下来的保加利亚政治革新至关重要。

修改宪法——圆桌谈判的所有立法性行为都被视为暂时的和相对有限合法的。所有的参与者都同意，未来的立宪会议才有合法性决定圆桌谈判所讨论的问题。因此，圆桌谈判的主要作用，是选择对宪法进行最低限度的、为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所绝对不可缺少的修改。使得保加利亚圆桌谈判的决定合法化的不是谈判参与者的权威，而是参与者达成协议的宪法和立法变革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冲突议题上的协议被视为暂时的，妥协方案往往是相当表面的，只是对立双方立场的简单组合。混合选举制度就属于这种情况，国家元首的名称“总统-主席”，外国“观察员/客人”的身份，等等，也如此。

权力的分割或分享——极权主义权力系统的改造是通过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的分离来体现的——同时具有个人化色彩，关于总统职位的争议表明了这一点。因为已经认定穆拉德诺夫将被选为总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统，共产党把总统权力视为一种保障，也就是如果反对派取得选举上的压倒性胜利，它也能参与权力的一种保障。在呼吁实行权力分离时，反对派坚持尽可能限制总统的权力。权力分享问题不可能以达成共识的方式解决，留给了未来立宪会议去决定，立宪会议凭借这个理由获得了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它有最高行政、立法、司法的权力。这个结果有利有弊。一方面，政治制度的改造被大大延迟了；另一方面，权力向一个强势的议会倾斜。

大选日期——大选日期的设定非常早，不符合反对派的利益，是根据共产党的战略做出的选择。因此，当相对自由和民主的选举举行时，保加利亚社会党占据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在新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上赢得了明显多数（400 个席位中的 217 个席位）。这不仅保留了而且合法化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圆桌谈判开始前对权力的完全掌控。然而，这个选举结果没有保证要通过新宪法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

就这样，圆桌谈判和 1990 年 6 月举行的选举，复制了政治人物们在谈判前的位置，因而导致了深刻的合法化危机。

大选后的事件

总统、政府、议会的危机

官方大选结果一宣布（保加利亚社会党获得了 54.25% 的选票，民主力量联盟 36%，权利与自由运动 5.75%，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 4%），¹ 自发的群众抗议就立刻发生了，尤其在几个大城市。在一周之内，所有的高中都被抗议的学生占领，他们要求公开所有的

选举计数单。在指控操纵和舞弊之后，人们要求总统辞职。总统穆拉德诺夫卷入了一个丑闻，一个与他应对一次早期的、发生于 1989 年 12 月 16 日的、自发性群众抗议相关的丑闻。那天，国民议会开始讨论废止当时依然有效的社会主义宪法的第一条（这一条宣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所有的国会议员一致投票同意它的废止，但是修宪程序要求延迟一个月。差不多两万人在国会大厦外面等待结果。群众对宪法修改程序依然不变感到愤怒，准备冲击国会大厦。一群国会议员，包括国家元首穆拉德诺夫，试图对抗议者讲话，但是，抗议者拒绝听。这位紧张的总统被拍到说了一句“让坦克过来”，也许是对国防部长说的。这句臭名远扬的话在罗马尼亚事件中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在竞选的最后一周，反对派在电视里播放了这段录像。在一个专门的声明中，穆拉德诺夫否认说过这么一句话，指责几个反对派激进分子和不明身份的外国特工伪造了这个录像带。由于群众的抗议，一个特别专家组对录像带做了鉴定，证实了它的真实性。穆拉德诺夫辞职了，新总统的选举于是成为紧随立宪会议召开之后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与此同时，群众抗议以“真相之镇”的形式蔓延——在大约 20 个大镇的中心安营扎寨。国会选举总统的投票是在扩散的、和平的群众抗议情景下进行的。国会大厦天天被民众包围，他们要求从反对派中选出一个总统。8 月 1 日，在四轮不成功的投票后（没有那一方能够获得当选新总统所需要的三分之二选票），哲勒夫当选总统，莫扎耶夫将军当选为副总统。新当选的总统试图约束、冷却抗议的浪潮，但是这仅在 8 月 26 日后才成为可能。那一天，一些兴奋的群众攻击了保加利亚共产党/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大厦，在大厦的一部分放了一把火。这是第一起街头暴力，它终止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了民众的街头抗议。

在国会，反对派又一次拒绝加入卢卡诺夫领导的联合政府。1990年9月，第二个纯粹的社会党（前共产党）政府成立了。下一波民众抗议被国会一次严重的冲突点燃，那次冲突源于所有非社会党成员投票反对政府施政计划，尤其是反对卢卡诺夫提出的国家预算。当时的社会条件有利于抗议的扩散，因为加重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变得明显了——通货膨胀的强预期导致食品供应出现严重的短缺。社会党在议会的政策使得所有其他代表团结起来（民主力量联盟、全国农业联盟及穆斯林权利和自由运动的代表们）。团结的、反社会党的反对派威胁退出国会。工会（既有前亲政府的成员也包括反对派成员）宣布举行一次全国性罢工来要求卢卡诺夫辞职。罢工四天后，卢卡诺夫辞职，这导致了一次政府危机。

新一轮谈判

在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迫使之下，社会党要求达成一个新协议，类似于圆桌谈判所签署的协议的新协议。新协议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权利与自由运动在协议文件上签了字。另一个重要的不同是，这些讨论没有公开。协议内容包括：（1）新选举的日期——地区选举在1991年3月举行，大选在5月举行；（2）组成一个正式（联合）政府；（3）立宪会议立法日程，经济改革立法优先。

这个协议既没有在议会讨论，也没有经过议会投票，因而这使得它不可能对将来的议会决定有约束力。不出一个月，签署的这份协议就作废失效了。显然，超越议会的协议不再是社会党战略的一

部分。凭借它在立宪会议的多数地位，这些前共产党人决定行使他们的权力、通过支配新宪法制定程序重获合法性。这样，社会党就把它在立宪会议上的战略当作圆桌谈判时所使用的战略的直接延续。短期和战略性目标仍然是一个没有变化——在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和全国大选中确保对自己有利的选举结果，以及尽可能多地保留党的资源。唯一的不同在于，这一次，尽可能延迟选举符合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利益。

附录 1：参与者名单

组织

保加利亚共产党/社会党（BCP/BSP）；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BANU）。

民主力量联盟（UDF），包括社会民主党（SDP），生态公开独立协会（Eco-Glasnost Independent Association），公民首创运动（Citizen' Initiative Movement），独立学生社团联盟（FISS），保加利亚激进民主党（BRDP），独立劳工支持联盟（Independent Federation of Labor Podkrepa），保加利亚人权保障独立协会（ISPHR），绿党（Green Party），宗教权利、良知自由和精神价值保障委员会（CPRRFCSV），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尼古拉·皮特科夫（BANU Nikola Petkov），被非法镇压者（1945 年以来）俱乐部（CIRS），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公开性和民主俱乐部联盟（FCGD）。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代表团成员

保加利亚共产党/社会党一方：亚历山大·里洛夫（党首），安德瑞·卢卡诺夫，亚历山大·爱安科夫，瓦萨尔·穆拉切科夫，宝寇·迪米特诺夫，乔治·皮林斯基），亚历山大·牟切夫。

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一方：维克托·瓦尔科夫（党首），斯威特拉·达斯卡罗瓦，斯威托斯拉夫·莎瓦诺夫，艾瓦·格拉切科夫，拉切扎·托多诺夫，艾瓦·格罗泽夫（，亚历山大·迪米特诺夫。

民主力量联盟一方：哲里奥·哲勒夫（党首），乔治·斯巴索夫（民主力量联盟发言人），皮塔尔·贝罗恩（民主力量联盟秘书长）；康斯坦丁·崔恩特切夫（劳工支持联盟党首），普拉门·达拉克恰耶夫和留博米尔·帕夫洛夫（劳工支持联盟委员会委员）；乔治·艾瓦拉莫夫（生态公开独立联盟秘书长）和德安·奎拉诺夫（生态公开独立联盟主席委员会委员）；留博米尔·索巴扎耶夫（公民首创运动主席），和瑞斯托·皮夫和埃米尔·斯达慕波夫（公民首创运动成员）；埃米尔·科施路科夫（独立学生社团联盟主席），阿塔纳斯·科切夫和瓦塞尔·皮特罗夫（独立学生社团联盟的学生）；艾卡·康斯坦丁诺瓦（保加利亚激进民主党党首），米海尔·内德尔切夫和亚历山大·艾奥达诺夫（保加利亚激进民主党发言人）；若门·沃德尼查诺夫（保加利亚人权保障独立协会主席），科斯塔丁·乔治耶夫和德拉戈米尔·特切科夫（保加利亚人权保障独立协会协调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卡拉卡切诺夫（绿党党首），菲利普·迪米特洛夫（绿党副主席），留博米尔·艾瓦诺夫（绿党全国委员）；彼塔尔·德特里耶夫（社会民主党党首），米海尔·皮特科夫和艾安科·艾安科夫（社会民主党党员）；克里

斯托弗·萨贝夫（宗教权利、良知自由和精神价值保障委员会主席），皮塔尔·卡勒夫（和托尼·拉德科夫（宗教权利、良知自由和精神价值保障委员会秘书长）；米兰·德仑切夫（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尼古拉皮特科夫党首），克罗姆·奈福洛柯斯基和米海尔·米海洛夫（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尼古拉皮特科夫成员）；迪米塔尔·巴塔洛夫（被非法镇压者（1945年以来）俱乐部），艾瓦恩·奈福洛柯斯基和瓦萨尔·吉奥勒（被非法镇压者（1945年以来）俱乐部）；博瑞斯·卡尤科切耶夫（民主党主席）和斯戴凡·斯多安诺夫（民主党副主席）；艾维罗·库托夫（民主党党员），彼得科·西蒙诺夫（公开性和民主俱乐部联盟主席），迪米特尔·路得哲夫（公开和民主俱乐部联盟主席委员会委员）。

保加利亚社会党（原共产党），在其配额部分，邀请了下列一些人和组织作为自己一方的一部分加入讨论：布拉格韦斯特·森多夫（无党派人士），留本·库利舍夫（无党派），吉尼奥·甘勒夫（无党派），塔尼奥·塔勒夫（保加利亚反法西斯和资本主义战士委员会和反法西斯力量联盟（DCYU）代表，罗森·卡拉蒂莫夫（迪米特洛夫斯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一秘书长），康斯坦丁·特拉洛夫（人权委员会代表），克拉斯特于·皮特科夫（独立保加利亚工会主席），科斯塔·安德瑞夫和克拉斯米尔·迪米特诺夫（独立保加利亚工会成员），民绰·门切夫（保卫国家利益全国委员会主席），可瑞尔·哈拉米耶夫（保卫国家利益全国委员会成员），纪维克·纪维克夫（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艾安卡·布瑞泽夫斯卡和瓦萨尔·艾瓦诺夫（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成员），诺拉·阿纳尼瓦，艾瑞纳·波克瓦和艾米利亚·玛斯拉洛娃（妇女民主联盟预备委员会联合主席），留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本·季诺夫（保加利亚记者联盟主席），迪米塔尔·古勒夫（保加利亚作家联盟主席），斯蒂芬·科特夫（保加利亚艺术家联盟主席），潘卡·巴布科娃（保加利亚教师联盟主席），乔治·斯托安诺夫，安吉尔·维根斯坦和艾瓦洛·泽讷珀尔斯基（保加利亚电影人联盟），艾维安·耶里诺夫（保加利亚律师联盟主席），拉扎·拉扎洛夫（科技协会联盟主席）。

民主力量联盟，在其配额部分，邀请了下列一些人和组织作为自己一方的一部分加入讨论：米海尔·艾瓦诺夫，法尼·哈吉米勒娃和斯巴塔克·嘎瓦佐夫（全国协调委员会发言人）。

每一方配额包括 43 个成员。这个特别的数字是预备协议的一部分。一小部分没有特定数额限制的专家参加了讨论，每边的总数至少两打（24 个）。专家们轮流出场，视议题而定。每个组织在配额范围内有自己的代表团。

双方配额中的代表团类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称的。每一方都包括一个青年类组织，一个农业类组织，一个工会类组织，一个“人权战士”类组织。民主力量联盟代表团努力以对议会和其他权力结构的参与（代表）为基础，来划分配额组织代表团类型。

官方或亲政府的组织有两个选项——要么确认效忠于保加利亚社会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青年组织迪米特洛夫斯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他们的领导人在独立性问题上制造了大量的杂音，但是事实上加入了国会只是因为社会党的“宽容”以及在其选区上没有竞争者），要么切断与执政党进一步的联系，寻求拿出独立的形象和政策。保

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和工会成功地采用后面这个方式。

反对派一方配额的组织之间假装它们具有同等重要性。因为保加利亚反对活动的历史非常短暂缺乏传统、实际上中断了 40 年，民主力量联盟的成员组织经常发表介绍性、身份表白性陈述，或者纯粹的言辞性声明。民主力量联盟里的大部分面孔并不为大众所熟悉，他们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大众媒体（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些曾在新闻媒体中出现的话，通常是因为专业性的原因，或者在专业性的场合）。在圆桌谈判的初始阶段，民主力量联盟内部的分歧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正如很多分析人士预测的，后来证明，分歧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在后面的阶段，这个联合体逐步转型为一种由至少 17 个成员组织（运动，俱乐部）构成的“伞状组织”，其中仅有 7 到 8 个组织声称自己是全国性政党，从绿党、替代的社会民主党到实际上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到预备谈判开始时，民主力量联盟的成员组织不仅仅是那些把委员会设在索菲亚而在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分支的组织。因为谈判被报刊、电视、电台节目广泛报道（包括电台直播了至少 80% 的全体大会），许多组织的领导人把圆桌谈判当作公众演讲的机会。圆桌谈判反对派一方的构成可以被认为是彼此异质性（heterogeneous）的、只有微弱的垂直领导结构，而谈判的另一方代表的是具有强烈而重要的等级联系的大众性组织。一个有说服力的事实是，至少一半的反对派代表团成员（23 人，不包括数目不明的专家）后来进入了国会，而另一方只有 15 个（保加利亚社会党 6 个，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 4 个，外围支持性的组织 5 个）。

附录 2：圆桌谈判签署的文件

出席圆桌谈判的政党、组织、运动、和个人签署了 10 份文件，其中 8 个是协议，两个是公告。另外，还有一个文件发布了但没有签署，就是《竞选伦理准则》,及其附加的补充件《关于防止重复投票的措施》。

下面几页简要回顾这些文件，然后对每份文件的核心观念做点评论。应该指出的是，共有三组文件，每组文件是打包签署的。

第一组文件 (1990 年 3 月 12 日)

《关于全国圆桌谈判的角色和地位的公告》。

下面的协议是以一种有点抽象的语言宣布的：

“出席全国圆桌会谈的是这个国家实际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他们的目标是实行从极权制到民主社会制度的和平转型。”

“全国圆桌会谈是东欧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既是一个象征也是一个实际的政治手段。”

“全国圆桌会谈的缘起于一种以下共同理解，即：在目前情况下，国民议会……，政府，以及其他国家机构，只有在不同社会力量取得全国性协议和共识的条件下，才能充分履行其职能。全国圆桌会谈……表达保加利亚人民的意愿。”

全国圆桌会谈的目的，是“达成这样的具体协议，也就是作为解决基本的政治立法、社会、经济问题不可或缺的政治前提的协议。”

协议“将会考虑‘去极权化’的方法、步骤以及日程，通过讨论基本的理念、立法项目以及其他规范性法令的原则。”

“参与者承诺利用他们在立法和行政机构的代表性，对公众发挥影响力，以保证在共识基础上达成的协议的实施。”

参与者被定义为“实际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不给没有参与的人留下空间。然而，当“权利和自由运动”（MRF）（受突厥少数民族领导和支持）兴起时，两方都非常小心，没有在各自己的配额中给它一个位置，害怕受到民族主义者的宣传攻击。“权利和自由运动”被摒弃在圆桌会议之外，于是利用自己的独立地位参加大选，获得了差不多 6% 的支持。这是保加利亚历史上，少数民族第一次独立出现在国会里。

全国圆桌会议被界定为一种立法预备机制，以及作为使那个机制发挥作用的技术条件（障碍）的“共识”。

《关于向民主政治制度转型的和平推进过程的全国协议》（概要）

参与圆桌谈判的政党、运动、组织宣布，在即将到来选前竞争中，它们：

1. 将永远不使用暴力，并且，将采取行动防止任何形式的暴力；
2. 将践行宽容，并且，将追求共识和建设性的对话；
3. 将确保相互不干预任何一方的政治行为，包括公开会议和集会；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4. 将防止使用报刊和大众媒体进行政治挑衅和呼吁暴力；
5. 将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对自己成员和支持者的违法行为负责；
6. 将尽最大努力实现必不可少的规范和冷静的选前竞争以及基于机会平等的民主选举。
7. 将防止滥用任何国家机构权力偏袒任何政党；
8. 将要求法律和秩序机构做到：
 - a. 支持法律和公共秩序与正在进行的宪法和法律上的民主变革相符；
 - b. 坚决防止任何对政治领导人和公民施加身体、道义、精神上的压力和恐吓的行为；
 - c. 如果偏袒任何政党，将被追究责任；
 - d. 没收非法武器；
 - e. 确保给予所有合法党派的办公场所以平等的安全保障。

在心理学的层面上，这个文本可以被视为对罗马尼亚新近发生的系列（当时还）不明朗的事件的一个反应。那些事件前所未有地持续 3-4 天在罗马尼亚电视节目里重播，给公众造成了震撼。结果，在后来的竞选中，“暴力还是非暴力转型”是一个被利用最多的话题。值得强调的是，整个 1990 年，军方多布瑞·丢诺夫将军（自 1965 年来一直担任国防部长）在民意调查中持续得到了最高的评价。暴力/非暴力话题极大地便利了当政的政党。一个和平的政党是值得信任

的——这类政党广告被证明是有效的。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个协议的文本，也是有启发的。在讨论行政权力机制的文本部分，所用的语言要抽象得多，大部分内容仅仅指向双方的良好意愿。其中一些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切实际的，可以把它们和一种意愿性的想法或机动性的策略联系起来。

《全国圆桌会议关于政治制度的协议》

这份文件包括四个部分，下面是简要的介绍：

1. 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 a. 转型期应该是和平的；
- b. 政治制度应该基于人权、自由、社会正义和团结的国际标准；
- c. 必须在经济制度问题、国家安全基础、外交政策基本原则和国际承诺上达成全国性共识；
- d. 自由和民主的选举是解决经济、政治、文化危机的前提条件；
- e. 应该在 1990 年上半年末举行自由选举。

2. 民主和人道政治体制的基本因素：

- a. 最高权力应该属于自由和竞争性选举产生的国会；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 b. 地方自治政府应该由选举建立；
- c. 权力分离应该遵循议会民主制标准；
- d. 民主和多元政治体系应该通过多党来运转；宪法保障每个政党的存在、正常运转、党产、接触运用国家控制的媒体；
- e. 政治决定应该由多数做出，少数者权利应该受到保障；
- f. 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应该受到宪法保障；
- g. 财产权、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的平等待遇应该受到宪法保障。

3. 必不可少的立法改革：

- a. 宪法修正案应该纳入上面第 2 条所述的基本元素；
- b. 政党法应该允许简单注册，给予所有政党、运动、专业的政党俱乐部平等机会；应该禁止工作场所的基层党组织，以及基于民族和宗教标准的党组织；军队、法院、警察、大众媒体、学校、医院、大学、宗教组织、专业协会应该去政治化；
- c. 国家电台和电视台应该置于国会一个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国家媒体的法规，以及顶层管理职位的申请者，应该获圆桌会议的推荐。

4. 必不可少的行政（政府）行为：

- a. 党产和政治领导人应该受到检查、向公众公开
- b. 关于安全机构的法律草案应该在 4 月中旬前提交到圆桌会议讨论；草案应该包括公民查阅存储于安全部门的个人信息权利，以及对警察机构目前改组情况的评审；
- c. 关于即将到来的选举，应该制定一系列法律为所有政党提供平等的选前竞争机会，包括财政、纸张供应、办公楼以及其他需要。

国家观察员应该被邀请作为“保加利亚国家的客人，他们可以来自于苏联、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大不列颠、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等各国国会”以及国际机构。

圆桌谈判的参与者宣布，无论选举结果怎样，他们将不会反对任何政党的正常运作、党产、媒体；不得有基于政治原因的歧视行为。

选举日期大致定在不迟于 6 月 30 日的时间。因为保共在工作场所的基层组织被正式禁止了，逐级的职业俱乐部组织被允许建立。事实上，俱乐部已经在工厂外建立了，但是在“大门边”，一般由同一些政党活动分子组成。国家行政机构去政治化了（军队、警察、法院也是），但是因为政府依然在共产党控制之下，来自外面的任何制约都是不可能的。在最敏感的领域——安全部门——仅仅要求公众有权检视当下重构和转型进程的信息，制约机制甚至没有提到。

第二组文件 (1990 年 3 月 29 日-30 日)

包括三个文件，涉及宪法修改、政党法和选举法。扼要评述书如下——

《关于宪法修改的基本理念和原则的协议》

这个文件叙述了 6 组修改。

1. 关于政治制度的总体原则：应该制定彻底和完全“去意识形态化”的宪法文本；国家应该保持统一；保加利亚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政治体系是多元的、民主的、人道的。

2. 关于经济制度：宪法文本应该同等对待各种形式的产权（私人所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国民经济应该建立在自由企业和竞争的基础之上。

3. 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应该依据国际上接受的标准保障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

4. 关于向议会民主制转型期间的国家机构：在一年半内，选举产生的大国民会议（Grand National Assembly）应该举行一次公投。关于国家元首权力的宪法文本直到那天才能修改。大国民会议由 400 名代表构成。圆桌谈判参与者同意，国务委员会代理首脑将被选为国家元首。国家元首的职能和权力被列举为 10 点。国家元首不得担任任何政党的领导职位。

5. 关于政府的地位：只用了一句空泛的话说明有必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内阁。

6. 关于地方政府：不迟于 1990 年 12 月举行地方选举。

文件的最后一段定义混合型的选举制度。200 名代表由单一选区制度产生，另一半产生于政党名单。每个投票者投两张票。

值得指出的是，与协议要求不同，地方选举和批准宪法的全民公投从来没有举行过。

《关于政党法基本理念和原则的协议》

这一文件描述了 8 组条款：

1. 结社自由应得到保障；
2. 界定了一个自由、快速但集中的政党登记程序。政党应在索菲亚地区法院登记，全部登记程序应该在 7 天内完成；
3. 所有政党应该有平等的渠道接触利用财政支持、全国性电子媒体，有权出版报纸期刊、书籍等等。
4. 为确保和平民主转型，政党法应该包括下列禁令：
 - a. 任何政党不得寻求用暴力改变宪法秩序，鼓动种族、国族、民族或宗教仇恨；
 - b. 任何政党不得基于民族或宗教而建立；
 - c. 任何政党不得拥有地下或军队组织；
 - d. 任何政党不得有青年组织（16 岁以下的孩童）；
 - e. 任何政党不得干预军队、警察、法院、国有企业等组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织；

f. 禁止政党和参与竞选的政党、工会、其他运动和组织在工作场所设立组织。

5. 法律应该严格界定财政资助来源和政党能够从事经济活动的条件。

6. 国外资金支持限制个人捐助不超过 500 美元、其他捐助来源不超过 2000 美元，不能匿名捐助。国有和其他经济企业不能资助政党。

7. 最高法院有权解散不遵从政党法的政党。

《关于立宪会议选举法基本原则的协议》

协议包含 31 点，具体说明了所有与选举过程相关的法律和技术性问题，从候选人登记到行使投票权的程序都涉及到了。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保悬而未决：保障公正选举的措施还有待达成协议。

第三组文件（1990 年 5 月 14 日）

《关于保障公正和自由选举的协议》

一个由 21 位圆桌谈判参与代表组成的公开委员会成立了。成员由圆桌谈判的两位联合主席个人任命。地方公共委员会也可能组建，他们批准客人（外国观察员）观察投票站的投票。

客人由外交部在任何谈判参加者提出动议时出面邀请。

一半的财政资助应该提前付给已登记的政党和候选人；剩下的一半应只留给成功的竞选人使用。

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尼古拉·皮特科夫）代表签署了这份文件，但附加了一条“二等”意见，要求选举延迟到 1990 年 9 月举行。

《关于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基本原则的协议》

一个由 8 名代表和 7 位著名公众人物的委员会建立了。委员会被授权运营国家媒体事务，通过任命主管、控制节目日程，等等。委员会提交年度报告给国会。在竞选期间，新增了三个保加利亚社会党、民主力量联盟和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的代表作为委员会常务委员；决定以共识方式做出。

《关于在国家电台和电视台竞选的协议》

每周两次、每次 45 分钟的讨论在电视台举行。保加利亚社会党、民主力量联盟、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平等参与那些讨论。保加利亚社会党和民主力量联盟可以用每周三次、每次 20 分钟的电视时间宣传他们的政策主张，然而，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仅被给了 15 分钟。所有其他政党和组织被给了 10 分钟；时间的分配以政党候选人登记人数比例为依据。相同的原则也被应用于电台选前竞选节目中。

《声明》

所有的侨民被邀请回国参与即将到来的大国民会议选举投票。这个声明应该是一个防止被起诉的保障措施。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附件 防止重复投票措施的竞选伦理准则》

大选后，重复投票是一个最热的话题。结果表明，使用身份证号码是不可靠的，因为管理过程失去了控制。

附录 3：圆桌谈判全体会议日程

预备谈判

（在国民议会大厦举行）

协商

1990年1月3日	9:30 - 11:30	保加利亚共产党，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和官方组织
	15:00 - 17:30	
1990年1月3日	11:40 - 14:10	保加利亚共产党，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和民主力量联盟
	17:00 - 18:35	
1990年1月4日	15:00 - 17:30	保加利亚共产党，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和民主力量联盟

预备谈判

1990年1月16日	14:00	保加利亚共产党，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和民主力量联盟
------------	-------	---------------------------

第五章 保加利亚的圆桌谈判

1990年1月18日 10:00-11:55	保加利亚共产党，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和民主力量联盟
1990年1月18日 14:30-17:00	保加利亚共产党，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官方组织和民主力量联盟

正式圆桌谈判全体会议

（在国家文化宫举行）

第一轮

1990年1月22日	18:00 - 19:30
1990年1月23日	10:00 - 14:00 10:00 - 14:00
1990年1月29日	10:00 - 14:00
1990年2月6日	10:00 - 14:00
1990年2月7日	9:00 - 11:30
1990年2月1日	9:00 - 11:30

第2轮²

1990年3月12日	15:15 -
1990年3月15日	10:00 - 15:20
1990年3月19日	15:10 -
1990年3月26日	9:36 - 22:10
1990年3月27日	17:10 - 22:02

科勒拉瓦、迪米特洛夫

1990年3月29日 13:14 - 22:25

1990年3月30日 12:05 - 18:55

第三轮

1990年5月14日-15日 18:13 - 1:45

注释

¹ 本文写于 1991 年 9 月。我们感谢埃莉娜·丢尔吉洛娃对这篇文章最初草稿的评论。对保加利亚政治后来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综合描述，参见，比方说，《东欧宪法评论》（the Eastern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的报告，或者 R·克拉洛瓦（R Kolarova），《保加利亚民主转型中的默认协议》（Tacit Agreements in Bulgarian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圆桌论坛》杂志（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Round Table）。

400 个席位中，保加利亚社会党获得了 217 席，包括 6 位从属于保加利亚社会党的独立代表；民主力量联盟 144 席，包括 1 位独立但从属于民主力量联盟的成员；穆斯林权利和自由运动 23 席；保加利亚全国农业联盟 16 席。

²没有 3 月 12 日和 19 日会议结束时间的信息可用。

第六章 天安门的悲剧

历史视角下的国家-社会关系、选择以及机制

邹谠 (Tang Tsou)

【本章摘录自邹谠的同名文章，此文汇编于布兰特里·沃玛可 (Brantly Womack) 的书《历史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剑桥大学, 1991年)。在这篇文章中，邹教授提供了一个分析中国政治的一般性理论视角。这篇文章有几个特色值得强调。首先，共产党“赢者通吃”的传统阻止了领导者们寻求一个明显的妥协。第二，赵紫阳总书记在某种程度上努力提出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妥协，但是学生们沿袭了他们与之抗争的那个政权的习性，这一倾向妨碍了他们接受赵的妥协。第三 (与第二点非常相关)，缺乏一个自治的公民社会阻碍了负责任的反对派组织 (类似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组织) 的形成，这必然导致天然激进的群众运动。最后，即使假定这个政权和反对派都愿意达成一个妥协，党内及党和社会之间的沟通结构，也会造成这个政权既不能使它做出的承诺可信 (比如，将不会报复反对派)，也不能使它发

邹 谥

出的威胁可信（比如，军队将会镇压反对派）。

被拒绝的选择和无法达到的选项

1989年4月17日，也就是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两天后，北京的学生走上了街头，天安门广场的游行示威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学生们的行动是完全自发和没有组织的，¹ 尽管他们的行为有迹可循：共产党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的衰落，政治控制的放松，公共空间的开放，众多自由化思想小网络的兴起，知识分子对民主和自由口号的普遍接受，共产党自信的下降。学生是一个正在形成、努力浮出水面的公民社会的先行者。许多学生，工人，以及一些自由主义者的小型网络，原本计划在1919年“五四运动”70周年庆祝日采取某种行动。胡的去世提供了一个提前行动的理由。学生大量走上街头，个人和小群体使用手势、眼神以及简短的评论相互交流。各个校园缺乏能够更好协调各个事件的学生组织，并不是偶然的。之前建立秘密组织以推动学生运动和领导示威行动的尝试，都被当局迅速发现、打碎了。只有没有正式联系和协调的个人和小型团体留存下来领导学生，如果说有任何领导的话。在人数上他们找到了安全性，每天参加示威的人数都在增长，年轻的本科生走出了第一步，政治上更老道和更现实的研究生在幕后指导他们的同伴。刚开始，学生和其他市民一样正面回应缅怀胡的标语——胡是政治解压和可能的自由化的一个象征，到后来，他们呼吁民主和自由。小部分人组成的一些小圈子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他们对共产党的强烈不满，要求更多政治上和公共空间的开放，除了这可能算一个阴谋外，没有其他阴谋。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共产党的改革派煽动了学生的运动。在赵紫阳4月23日去朝鲜(这个行程是早先就规划好的)之前的那段时间，在邓小平的默许下，赵负责处理学生运动。刚开始，赵对学生示威是什么样的态度，这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² 一个观点是，那时他大体上反对学生运动。另一个观点是，警察和公共安全人员的克制可以作为赵同情学生的一个标志，也是一个对学生发出的信号。不过，还有第三种观点是，领导者们本以为，如果这个政权表现出克制，学生示威将逐渐消退。或者因为凑巧，或者也许因为学生与当局之间的微妙信号，学生的示威是相对有序的，保持在一定的限制内。学生们提出的具体要求是温和的，最有意义的要求是他们要求自由的出版自己的报纸。学生运动可能对赵来说是一个政治上及时的利好。在胡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有谣言说赵可能因这个政权的经济政策——尤其价格改革的失败被归因于他，而将被迫下台。幕后的老人们正推李鹏取代赵，然而，改革派希望看到胡耀邦回归到一个更有实权的位置，作为赵丧失一些影响力、甚至被迫出局的一个补救。但胡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一些中国改革派这时认为，学生运动将挽救赵。赵比老同志们对学生更有同情心，看起来是可能的。在1990年5月18日电视播出的与芭芭拉·沃尔特(Barbara Walter)一次访谈中，新总书记江泽民说，党内分裂妨碍了这个政权采用更强硬的措施，比如在学生动乱之初就禁止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那种措施将使得政权没有必要在后来利用携带致命武器的军队去镇压。江不指名地指责赵该为此负责。

学生们发现，参与人数足够多带来了安全，他们初尝了街头力量的滋味，收获了欢呼和来自有同情心的北京市民的实际称赞，吸引了全世界新闻媒体的注意力，因而，学生们接着就开始组织起来，首先

组成单个校园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很快他们组建全市范围的协调委员会，宣布罢课。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开始易手到那些鼓动这样或那样的激进行动的人手中。学生组织的建立趋向于赋予那些在示威中发挥了最显著作用的人更大的权力。类似的，罢课的呼吁促进了激进者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温和派靠边站。学生们把和政府直接对话作为他们返回校园、结束罢课的一个条件。但附着于这一要求之下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当局承认他们的自治联合会的合法性、出版自己报刊的权利，以及享有宪法正式保证的种种自由。

在4月23至4月29日这段时间，赵在国外，常委会由李鹏领导，他代理赵处理学生运动。根据北京上层官员的报告，看起来李鹏说服了邓——政府不应该满足学生们的要求，而应该采用更强硬的立场。一个社论被起草了出来，把学生运动视为一个“有计划的阴谋”和“动乱”，其本质是“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社论特别提到，建立大学和学院“非法组织”是向官方的学生组织夺权；它们中的一些已经占领了大学和学院的官方广播站。社论文本据说发给了正在朝鲜的赵，他通过电报的形式向党中央通告了他的认可。³

4月25日，下级政府和其他公共单位被传达告知了社论的要点，以及作为社论基础的、邓在4月24日的强硬谈话。⁴4月26日，社论公开发表了。邓划定了后来发生对抗的一条线。不仅中国，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们的反映也非常迅速。无论是密谋与否，如此快速的反应让人设想，学生们已经能够建立一个现代化装备的有效通讯体系。学生们组织起来反对邓的讲话和4月26日的社论，15万学生和积极分子于4月27日到天安门广场抗议。示威持续了14个小时，超过一

百万人在人行道上围观。随后，示威被所有的学生活动分子欢呼为一个历史性的事件。1989年的民主运动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和最重要的示威，因为它的巨大规模以及它激发的大众反映，如果不考虑其他方面的话。

赵在4月30日返回北京后，显然重新评估了情况，所依据的是示威情况和他信任的建议者的简报——那些人此前在导向“4.26社论”的官方内部圈子决策时被排除在外。赵做了一个勇敢的尝试以改变政府政策。他有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说服邓改变主意，调整或者甚至否定“4.26社论”。据国家主席杨尚昆说，赵在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提出，4月26日的社论对学生运动做了不正确的定性，对学生的指控过于严重，社论是错误的。⁵如果赵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一个轻微和理性的让步可能马上会改变接下来几周的事件进程。如果接着采取其他步骤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这个让步甚至也有可能变成自由化新进程的第一步。

但是赵显然一点成功的机会都没有，在我们看来一个小的和理性的让步，对于邓的意义却非常不同。邓是一个经济上的实用主义者，但在政治上，他是一个“纪律严明者”，⁶他看重政治正统的维持。拒绝学生的要求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偏好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体系里，一旦最高统治者，集体领导的核心人物做了一个决策，这个决策不能轻易被推翻，尤其如果他已经公开行使了他的权威并为之担保。推翻决策将意味着承认领导人或者整个党的权威丧失，或者，几乎同样坏的是，意味着由两个派别的争议导致党的分裂，接着发生其他对抗而导致一派完全胜利另一派完全失败。

最重要的是，承认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合法地位将意味着国家-社会关系的基本改变，改变中国共产主义体制——只有官方认可的社团才能管理社会单位中某些具体事务，并且必须在党的严格指导下。它还将被党的忠诚的长期成员、共青团等官方认可的组织视为背叛。虽然那些组织已经有一些时间不能有效发挥它们以前那种对学生的领导作用，但它们依然在为党执行许多例行的工作，包括监督其他学生。因为所有这些人事和体制上的理由，即使对学生做出一个轻微的、自由化方向的让步，也是不可能被容忍的，除非邓有睿智和洞见看到：现制度的根本性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对他和他的党来说，最好支持、引导、塑造那种改变，并期待党在新的政治制度中甚至继续掌权。

但是邓有过一段时间的拖延。据说，他为深入思考即将到来的与戈尔巴乔夫的高峰会谈而离开了北京。看起来更可能的是，他让赵和李自行斗争解决问题。也许同样可能的是，他想等等看，赵的调和的态度和李的强硬的姿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结合是否能让学生回到校园。无论如何，他看起来一直很自信，一旦他做了一个决定并说出来，事情就定了。

赵的第二个选项是，找到一个学生可接受的立场而又无需公开否定“4.26社论”。在5月4日亚洲开发银行代表大会上的调和性讲话中，他基本上正是这么做的。他的讲话稿由他的秘书鲍彤所写。⁷ 据李鹏说，常委会并不清楚这个讲话稿，或者，讲话稿没有交与常委会的任何一位常委看过。⁸ 据其他人说，赵去了北戴河见邓，据说，邓对赵说过“你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稳定局势……如果局势在控制之中，你可以实施你的计划，如果它们是可行的，不要管我说了什么。”⁹ 也

许赵确实跟邓谈过。在对亚洲开发银行的讲话中，以及在他所有公开的评论里，他从来没有公开否定“4.26社论”，虽然他实质上改变了它的着重点。特别是，他说，学生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表达了他的信念：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性、克制、以及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适当程序。

走出这一步冒了巨大的风险，赵非常清楚这一点。对一个党的领导人而言，在没有提前征得常委会的同意、甚至没有咨询党委的情况下，公开支持党外社会力量，违反了游戏规则甚至党的纪律。在这点上，我们应该提醒我们自己，党的官员必须遵循“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纪律，尤其在公众场合。为达到党内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个规则是必需的。这个规则也用来防止领袖个人绕开党组织本身获得公众的支持、获得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发展下去将导致党内派系和党内分裂，或恶化既有的分歧。官方的沟通体系是这个规则的众多体现之一。事实上，李鹏总理是强硬派的前台人物，也是赵的主要竞争对手，他后来指控说，从赵亚行讲话以后——或者更早，每个人都能看到党内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他指责赵导致了党内分裂，并让它公开化了。¹⁰ 在6月30日提交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官方报告中，北京市长陈希同宣称“有的人说：‘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¹¹ “与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是控制党的重要官方行动和公告的一个强大的机制，尤其在处理与公众有关的事务时。据国家主席杨尚昆说，邓后来私下告诉赵，赵的讲话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学生激起了更多的麻烦。

¹² 因此，对一个党的领导而言，这是一个由党内意见分歧转向每个人

可观察到的公开分裂的一个转折点。最后的对决必将导致一边全胜且保有所有的决策权力、另一边全输的局面，这种局面正沿着以往党内斗争的相同路径而成形。但是，甚至在这个阶段，看起来仍有可能推迟最后的对决，或者，如果最后对决确实发生了，赵并不必然输得那么快和那么彻底，或者，至少这次争斗不应该以 20 世纪中国国内事件中最具灾难性的一天而达到高潮。

但是，赵违反党的规定和准则，并不是没有潜在的政治收益。他的讲话在学生中的反响非常不错。无论是否巧合，在“五四运动”70 周年庆典上，据估计有 25 万其他市民加入了超过约 5 万名学生的游行队伍中，抗议政府拒绝与学生对话。第二天，除了北京大学（北大）和北京师范大学以外，所有大学和学院的学生停止了罢课。通过采取一个相比“4.26 社论”而显出和解性的立场，赵的讲话在效果上，提供了一个与学生和知识分子心照不宣的联盟。赵能够开采利用自 1978 以来建立起来的巨大政治资源，部分缘于党的改革派的直接努力，部分缘于改革产生的社会条件。但是，这些资源有多大的价值？正是因他使用这些资源而导致了其下台吗？

由于党的控制机制，强硬派并不是没有资源。学生和知识分子普遍相信，李鹏在 5 月 5 日说，赵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讲话只是代表他个人的观点，邓在 4 月 24 日的讲话才传达了党中央的基本政策。¹³ 依据另一个信息来源，李说，赵的讲话是有意给外国人消费的。

在这点上，让我们站得稍远一点看这些急剧发展的事件，问我们自己，为了预测采取另一种行动选项以获得完全不同的结果的可能性，政治学家们对这种情况将不得不说些什么。通过大大地简化三位政治

学家的结论，¹⁴ 我们能够说，在下述条件下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能够取得成功：首先，改革者必须与社会中的温和要素和社会力量建立一个有效的同盟。其次，在武装力量内部或在安全力量内部或在两者的内部，必须存在一个分裂。放到中国的情况中，要成功改革这个极权政体并保留赵的权力，这些似乎只是最低限度的条件。第二个条件从来没有达到过。诚然，在人民解放军内部，存在抵触情绪不愿向手无寸铁的公民使用武力，以及有顾虑不愿意成为第一个向民众开枪的人。在一些数量不确定的事例中，有些人拒绝执行移防军队到指定地点的命令。但是，对这些可理解的抗拒行动的报告，必须放在军队纪律的根本强度和军队领导人必须齐心协力执行党的指示的语境中。所有有关在6月3日和4日左右解放军分裂的印象都是基于纯粹的期待、一厢情愿、误报或者误导。它们被当时的一些美国专家给排除掉了。

但党的改革派，知识—活动分子，以及学生，依然可以采取另一种行动路线。他们本可以制定出涉及到撤退、迂回的战略和战术，接受暂时的失守，承认失败以避免和军队直接对抗，保留力量追寻长期目标。这本是简单的常识。回过头看，这种行动方向看起来将是最好的选项，无论以今后几年还是几十年的结果来看都是如此。通过采用这个战略，改革派、知识分子和学生能够得以保留，谋划更长远的建设——基于前十年的解压中他们艰难赢得的收获：新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动能，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各种自由行动主义的小网络，半合法化的组织，特别是，还有多种多样专业的和半专业的实体——简而言之，一个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不像东欧国家，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民主，也没有长期的自由民主的思想传统，在前40年也没有我们

所称的一个强大的、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在中国能建立一个保障自由和权利的民主制度之前，必须先建立一个由强大的、有韧性的社会团体和机构构成的传统——其深深的根底在于它们能管理社会不同层面中的自己的事务，能够有助于定义他们自己的自由和责任的空间，能够与国家开展持续的对话和建立制度化的关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对自由和权利的纸面上的保障才不至于变成一堆空话。

对那些成功地追寻这种长期战略目标的改革者来说，有两个条件将是必需的。第一，一个相对温和的学生和活动分子群体必须在社会运动的领导层中成为支配性的力量。第二，改革派和学生将必须能够持续地相互协商和公开地协调他们的基本观点、总战略和短期战术。第二个条件被共产党政治的规则和规范给排除了。确实，那些规则和规范限制了党改革派的能力：让公众甚至参与民主运动的普通学生和民主运动知晓党内的争议和冲突。¹⁵ 改革派努力依据实际权力状况做出行动，然而，学生们的行动有时是对他们的小圈子信息和国外的新闻媒体信息做出的响应，有时，他们看起来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冲动和群体情绪而行动。

第一个条件没有达到是因为共产党从来不允许自治的、独立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兴起并逐步发展出稳定的领导机制，形成从经验和历史中学习、基于现实做出调整的传统。虽然学生一度想借用“团结”一词作为他们的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名字，但中国从来没有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组织——有争取劳工改革的历史和政治抗争的经验，也没有类似波兰天主教那样的角色——有几个世纪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的智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旦党组织的限制被打破，即使最初发动学生的

毛，也不能控制红卫兵，直到他派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去校园管理大学和中学。在 1989 年，赵没有这个权威、手段或者经验以类似的方式控制学生。讽刺的是，学生的革命行为很快显示出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反映了社会的失序行为源于党国的极权控制。无论怎样，党国体制依然塑造了公民社会，虽然公民社会努力摆脱它的控制。

学生运动的激进化和中国的极化

在上一节，我简化了三个政治学家的见解以考虑反事实的情况，展示某些假设性的选项，粗略地陈述了那些选项能够成立或者可达成的条件。在这节，我将提到某些关键事件，在那些事件里，我们可以依稀看到那些难以达成的选项。用非学术性的术语更坦率地说，那些事件暗示某些机会是存在的，如果学生抓住了机会，他们本可以避免那个悲剧的结局——那个结局不仅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悲剧性的，而且对知识分子、对北京市民、对中国本身都是悲剧。

事后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出：赵紫阳对学生运动的部分支持、或可视之为与学生建立一个心照不宣的同盟的尝试，注定要失败，除非他能够通过对学生做出一些让步以及担保，而说服学生对学生自己的行动做一个限制；除非学生能够被引向与他合作，找到一个不那么彻底和明确地否认“4.26 社论”、因而不需要否认邓和共产党的威信的解决办法。但是，学生运动的潮起潮落，示威人数的增加和减少，很快带来了反对现政权行动的又一次升级，在运动领导层，新推上台的学生领袖甚至比他们的前任更加激进。¹⁶ 当一个激进的学生领袖在一个具体的时机采取一个相对温和的立场时，这个领袖很快就会被更激进

邹 谏

的领袖所取代，再到后来，当被罢黜的前领袖再次采取一个激进的立场时，他或她将再次被欢呼和承认为一个领袖，这种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否认“4.26社论”的立场以及不从广场撤退的决心，被用来衡量一个人的激进程度。

正是这部分激进的学生不仅决定了学生运动的命运，也决定了赵紫阳这些党内改革派的命运，他们的选择和行动仍将继续影响中国接下来几年的命运。离开大学校园走向街头示威的成功为他们赢得了领导地位以及示威者的称赞，这也使得那些提倡谨慎的人不再受到信任。开始于4月23日的罢课让更多更激进的学生加入了学生领导层，甚至在“4.26”社论发布前，一个全城范围的协调委员会就建立起来。4月28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选出了知名的激进的吾尔开希作为主席，取代了相对温和的、协调委员会的周勇军作为所有学生组织的领导人。承认这些高校联合会组织，这是有待当局和学生进行对话和谈判去解决的基本问题。正如前面提到的，赵在5月4日的讲话看起来缓和了学生的情绪。5月5日，除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以外的所有大学和学院恢复了上课，学生运动看起来正在退潮。如果学生逐渐安定下来，恢复他们正常的生活，赵在党和国家的地位将得到大大的加强。虽然学生没有获得对他们组织的合法承认，但这些组织将实际上存在下来，继续在大学和社会发挥作用。但是，5月13日绝食抗议开始了，天安门广场上超过两千名学生参与了绝食。这个表达行动给了学生运动一个焦点，北京市民无论老少、贫富、受过教育的还是半文盲，他们前所未有的同情心倾泻而来。它把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战术的角度看，它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从战略的角度看，它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它意味着，在赵已经冒着严重的

296

政治风险提出了一些必须被认为是有意义的让步后，学生和政府的冲突不仅没有逐步下降反而逐步增加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回过头来看，学生错过了他们回应赵的温和声明的第一个好机会，接受可被视为赵战术性提出的与他结盟的建议。此外，他们的行动在效果上给政府的反应设置了一个时间限制，因为中国人相信，无论正确还是错误，绝食者在七天后将会面临生命危险，因为他们仅仅喝的是水而不是牛奶。一边是赵，另一边是老同志，必须在5月20日前找到某种解决方案。

我们不确信，绝食的发动是否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就是增加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数量，给示威者一个振奋，在5月15日¹⁷ 戈尔巴乔夫到来之前鼓舞士气。但是，毫无疑问，它把学生的讨价还价能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政权，尤其是改革派，加大了劝说学生离开广场的努力，以便像往常一样能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根据一些报道，在5月14日晚上，赵紫阳开始感觉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不应该再拖下去了。他做了一些准备，打算在5月15日访问广场上的学生，对他们讲话，甚至已经让他的官方车队准备出发了。但是李鹏制止了他成行，警告他，如果他去了，他将“分裂党中央。”¹⁸ 共产党的潜规则起效了。赵没有对学生讲话，仅仅尝试让他的车环广场转了两圈而表达了一个姿态。对被指控为分裂党的恐惧是支持那个规则的一种强大控制机制：个人必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5月16日，来源于香港报道说，前几天，一位改革派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统战部长阎明复，告诉人民政协的一位香港委员，虽然他拒绝承认由学生选举出来的自治组织，但他同意和学生举行对话，

他把学生的示威行动视为一个现代社会里有效表达公共意见的渠道。据这个报道，他承诺，在学生运动退潮以后，政府将不会报复学生（也就是，不会使用常用的“秋后算账”手段）。¹⁹ 5月14日，学生代表和阎明复之间对话在统战部的大楼举行。

据5月15日人民大学的大字报，“在对话开始后不久，从天安门广场回来的绝食团代表要求，他们应该被允许宣读一份他们写给他们父母的‘最后的话’。‘最后的话’的宣读让各方沉浸在哭泣声中。”²⁰ 据对话代表团的领袖项小吉说，一群学生包围了统战部大楼。项承认，看到那愤怒的群体，在他的生命中，他从来没有像那一晚那么恐惧过。他不得不几次走出去，说服学生冷静下来，以便里面和政府领导人的对话能够继续下去。每次，他都不得不鼓足勇气才能让自己走出去。他评论道，“这些学生有可能咆哮着冲向我，把我打倒，把我当做一个学贼。”²¹ 在这个对话里，阎明复对代表团说，“如果你们认为在党中央有一部分改革派，那么请给他们一些时间和一个机会。”²² 项小吉经过深思熟虑后判断，一部分激进学生已经毁掉了这个机会。

回顾起来，甚至吾尔开希也认为，作为整体的运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5月13-14日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之前，学生是庄严和勇敢的，充满了悲伤和愤怒。在这之后，他们变得傲慢自大。正是这种自大的力量冲入统战部的会议现场。从那时起，运动日益变得激进，并不可避免走向失败。²³ 5月14日的插曲显示了绝食如何把学生运动激进化了。依靠北京人民同情的浪潮，绝食团从更温和的对话代表团那里获得了学生运动的领导权。

另一个对话在5月16日早上举行，²⁴ 当时邓正在和戈尔巴乔夫

进行一场影响要少很多的高峰会谈。随后，在一些年轻学者的陪同下，阎明复甚至走到广场，努力劝说学生停止绝食和撤离广场。他是去那里的第一个高层官员。根胡平说，或者在5月14日或者在16日，阎向学生解释，政府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他对学生做出保证，不会有“秋后算账”。²⁵ 不过，学生们投票了，反对撤退。

通过让两位高层官员——一位党的和另一位政府的，和学生开展对话，²⁶ 这个政权通过模糊放弃“4.26社论”的方式，事实上承认了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至少没有尝试镇压他们。但是谈判失败了，因为邓已经在“4.26社论”上划定一条底线，学生也划定了一条否认它的底线。

知识分子比学生更冷静，更明智。5月14日，戈尔巴乔夫到达的前一天，在政府和学生对话的大气氛下，12个知识分子领袖——他们中大部分是温和派，发表了一份七周危机以来最值得注意的声明。他们肯定自己的信念——通过民主程序由大多数学生自己选举出来的学生组织是“合法组织”，应该被政府承认。他们要求，党中央应该公开的宣布学潮是爱国的、民主的运动；还要求，在分歧没有解决之前政府不应该对学生采取行动。他们表达了自己反对任何对学生使用暴力的立场。但是，他们明智地请求学生暂时从广场撤退，以便中苏高峰会谈能够顺利举行。最后，他们宣示了自己的决心：和学生一道实现这三个要求。²⁷ 我们不知道这个声明所包含的战略思想。无论如何，学生们拒绝接受这个建议，或许因为他们不情愿放弃他们此时战术性的优势，或许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道义立场如此自以为是，以至于他们不能屈尊去考虑长期战略之类的琐事。戈尔巴乔夫到达的那一

邹 谥

天，超过一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转来转去。欢迎仪式不得不改为在飞机场举行。中国丢了脸。一片食物从邓颤抖的手握住的筷子间滑落，邓的紧张不安显示给了全世界，而坐在他身旁的戈尔巴乔夫熟练地使用筷子。

如果说在学生运动的早期学生要求真诚对话时，中共因自己的拒绝而失去了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机会，那么现在可以说，学生此时错失了最好的机会来巩固他们在影响力和权力上的收获，来进一步推进改革派提议的战略联盟，因而达到学生、知识分子、改革派能够长期继续和老同志讨价还价和谈判——时间在他们这一边。如果没有别的意外，他们本已经避免降临到自己、知识分子、改革派头上的灾难。坚持继续占领广场，学生使得知识分子和改革派难以保住自己的位置。²⁸ 三天以后，改革派彻底失去了权力，党内分裂以一方全胜另一方全败而告终。中国将很快极化。

中国的领袖们以及主要的活跃知识分子充分意识到了危险所在。5月17日，他们做了一个孤注一掷的最后尝试努力说服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在5月17日的凌晨几个小时里，赵紫阳发表了一个声明（《书面谈话》），不仅代表自己，也代表政治局常委会其他委员：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赵说，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采取了认可的态度对待学生们关于民主、法制和改革的要求，但是他们希望学生应该结束绝食。他也说，在学生“回去”后（返回校园），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将继续听取学生的意见。他直接向他们保证，党和政府不会过后报复学生。²⁹

至少有一个活跃知识分子，努力传达了一个信息给激进的、此刻

的行动对整个局势有决定性影响的学生，对此，作家张朗朗有一个作为目击者的生动记述。³⁰ 5月17日早上，一个主要的活跃知识分子，《光明日报》的特派记者戴晴，³¹ 给张打电话，请他代表她传达一个口信给天安门广场广播站的学生领袖。口信是，有一个“下述流程”：首先，赵在早上的谈话（也就是他的书面声明）可以被认为是政府一方的初步态度表达，清楚地确认不会有“秋后算账”。其次，最高层政府官员将来天安门广场和学生进行一次对话，对话将“实时直播”。然后，多少有些不清晰的是，口信内容还有“下午两点，工人、农民、士兵将会有个游行。”此后，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将会“凯旋返回校园”。在穿过几条由学生纠察队设置的安全线后，张最后到达一位学生领袖那里，传达了口信。这位学生领袖郑重地回复张道，学生尊敬作为作家的戴晴，但是作为传话者的戴晴将会损害她的形象。这个学生领袖说“我们不同意这样做，因为它太普通了”，他还说，如果政府和党的领导人想和学生谈话，他们应该直接这么做，不要通过一个传话者。这个插曲不仅说明了广场的几个领导者所拥有的、影响着中国命运的重大权力，还生动地揭示了学生们激进的、严格划分两个阵营（“我们”，“他们”）的极不妥协的观念，以及他们拒绝和改革派有良好联系的一些不太激进的活跃知识分子的建议时的专横。张是戴的老朋友，张认为戴是一个情感用事的人，她的热情有时会超过深思熟虑的判断。在张告知戴学生对她的口信的回答以后，张说了自己的想法，他想知道这些人是如何相互沟通的，甚至戴对此都一定感到诧异。有可能许多激进的学生组织和那些老同志一样，有一样的等级，一样的安全体系，一样的二元论世界观，一样的固步自封，一样的不能和“他们”沟通，一样的革命理想主义？也许他们两个是相互镜像：

邹 诤

一个有新革命理想，另一个有革命的记忆；一个有新的人民权力的获得感，另一个有陈年积习。

当然，学生对中共“秋后算账”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他们继续相信，只有中共否定“4.26 社论”，党明白地宣布学生运动是“一个爱国民主运动”，才能让他们放心。因为某种理由，他们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李鹏的“挑衅”上，而非放在赵紫阳和阎明复的保证上。他们更多地强调口头宣告而非战略计算。对他们来说，从中共那里得到一个公开宣告看起来比保存和加强党内改革派的影响力更重要。也许，诸如此类的都是重要的。最激进的一些学生仅仅想在这个很兴奋的、释放的学生运动世界里多活一天，多活一个小时，想像梦想将能变成现实。

当赵紫阳准备那个力劝学生保持头脑冷静、理性和智慧、行动有节制、遵守程序、顾全大局、保持和保卫稳定与统一的声明时，他一定已经知道他完全不可能说服邓小平废除“4.26 社论”，他也不可能说服学生撤退。此后，5月16日中国新闻社发出了又一个重要的稿件，报道了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那个报道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邓在所有重要事务上做最后决定的至高权威。赵告诉戈尔巴乔夫，根据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正式但未公开的决定（此时邓辞去了常委会和政治局的所有职务），“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也就是其他中国领导人）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³²

杨尚昆在后来的5月22日内部讲话里，并没有质疑这一决定的事实内容和此时重申邓的至高权威的得体性，但是杨指出，放出去的新闻由这些片段信息作为开头，他指责说，以这种方式报道这个新闻，是想要把责任推给邓，把邓推向前台，说邓在处理学生运动中是所有

错误的根源。³³ 这个指控的政治暗示是，赵努力想要让邓成为学生和知识分子攻击的靶子，同时暗示赵自己不同意“4.26社论”。有猜测说，赵的最亲密的一些顾问们起草了播出的新闻稿，赵批准了那个稿件。在共产党的官方通讯体系下，大部分时候即使最高官员也不得不在各种重要问题上装聋作哑，或者求助于陈词滥调和官方公式，除了他们被授权说话，或者他们愿意冒政治风险。就本文的目标而言，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党内分裂不再仅是表现在实质性的政策上的分歧，也变得依赖于对个人责任的质问，以及依赖于有关权威结构和政治决策过程的信息如何及何时传达给公众了。

5月17日，党终于行动了，邓明确地再次重申他的决定，撤回“4.26社论”是不可能的。正如李鹏后来解释的，更多的退让将意味着把中国交给学生。³⁴ 换句话说，李认为，在多天“忍耐”之后，在这个时点上后撤将最终导致一边全胜而另一边全败的结果。人事的和代际继承的问题可能对这样一个观念产生了影响：僵持会有持久的影响。在其他老同志强烈的催促下，本人也是老同志的邓，站在了杨尚昆和李鹏一边，批准了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的通告。³⁵ 赵说，他不能执行这个决定，于是提出辞职。党于是分裂为两部分。在面对选择赵还是选择党中央时，少数赵的顶层同事支持赵，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只是在内心和意识上同意他。赵从来没有一个组织化的个人追随团队。他努力用他的思想和方案来领导，那些思想和方案来自他的长期工作经验或者来自他的建议者。

即使在邓做了宣布戒严令的决策后，5月18日李鹏总理同学生举行了最后一次正式对话，请求他们结束绝食，从广场撤退。正如戴

晴通知学生的口信所说，这次会谈是电视直播的。这次会谈或许可以被看作为对各种学生自发协会的实际认可，这次是被这个政府的最高官员——一个据称对学生采取最强硬态度的人，一个说服邓采用“4.26 社论”的人。激进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并没有报以甚至最少限度的公民姿态，他参加这次会见，好像一个胜利者来给失败者上一堂课。就本文的目的，有两点是重要的：首先，他说，学生已经听到或读到了赵 5 月 17 日的声明，他们拒绝离开广场，因为他们感觉，声明并没有做出足够的让步。其次，他傲慢地告诉总理，如果 99.9% 的学生投票选择离开广场，但只要 0.1% 的决定留下来，所有学生将站在后者那一边。³⁶ 一致同意原则被用来加强激进者的运动领导地位，或者说，至少它的发言人受激进运动的驱使采用了这个原则。暂不说它的不切实际，也不论它多么伪善地被吾尔开希利用，在这种场合公开宣布这个原则，这个事实说明了这场学生运动有多么不成熟、多么幼稚、也许还有多么狂热的理想主义。5 月 19 日子夜过后，赵紫阳，这个在不可阻挡的力量（激进学生）和不可移动的障碍（邓）之间被挤压的牺牲品，走入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他向学生致歉，说“我们来晚了”。他请求他们结束绝食抗议，他用中医的发现——七天的绝食将危及生命，而支持他的恳求。最后他说，他老了，已经无所谓了，但是十九二十岁的年轻人不应该轻易牺牲他们的生命。他告诉他们，局势非常严重，他恳求他们冷静地想想后果。学生挥泪告别他后，他自己也告别了政治舞台。此后，他再也没有公开出现过。在 5 月 19 日的傍晚，在一个由党、政、军官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当局宣布了实施戒严的决定，但赵拒绝参加那个会议。党的分裂让所有人都看到了。赵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是对他的又一项指控。六个星期以后的 6 月

24日，他被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正式解除所有党内职务。官方对他的指控是“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最终，控制机制正式被启用。

这一系列事件让人想起，中国政治从来不是简单和直接的。完全有可能的是，邓正在玩一局异常复杂的游戏，平衡赵和李，把他们当作他的两个备选的棋子直到最后一刻：如果赵5月17日的书面声明成功地说服学生从广场撤退，邓将更进一步不采取激烈手段解决他面对的这个最紧急的问题。如果赵的协调手段失败了，邓将宣布，他把学生运动视为“动乱”的定性从来就是正确的。他将实施他的第二个选项：实施戒严，用军队力量镇压。我们也可以设想，在邓对“4.26社论”划线后，无论是赵还是李赢，无论是改革派还是强硬派赢，取决于学生从广场撤离还是继续对抗的决定。如果以后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这个猜测并非完全不正确，那么，天安门悲剧就将像历史上许多被看作不可避免的结局一样被记住，其实存在着许多机会避免那个看上去似乎不可避免的结局。

与此同时，这个国家也开始分裂了。如果5月16日的新闻稿宣称的——所有重要事务的最后决定都由邓做出——是一个有意的信号，人们几乎立刻感受到了它的影响。5月17日，35个知名的活跃知识分子在一个措辞尽可能激烈的声明上签名谴责邓。声明说，虽然清朝早在76年前灭亡，但中国到现在还是被一个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个年老昏庸的独裁者所控制。在提到赵的5月16日的声明（所有重要决定都必须经过那个年迈的独裁者）后，声明号召大家起来推翻个人独裁，结束老人政治，呼吁这个独裁者辞职。此声明提到，学

生们已经用他们的行动宣告，学潮是一场最终埋葬独裁统治、结束君主体制的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份声明不仅仅是份反邓声明，还是份革命宣言。³⁷ 两天以后，两个最重要的研究机关和另外两个组织一道，公开责备中共不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他们呼吁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和党代会和来处理目前的局面。

在戒严令宣布以后，较温和的活跃知识分子还多次尝试引导激进的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5月22日，北京四通集团公司主席万润南在一个有几乎一百个学生领导人出席的会议上向他们建议“不要失去撤离广场的良机，而是应该采取主动回到校园继续坚持斗争。”³⁸ 但万说，有一些问题和要求应伴随着撤离：第一，“部队应该撤回原地”；第二，应该取消戒严令；第三，李鹏应该下台，邓、杨和其他“老人”应该“依照手续”荣誉退休；最后，据万说，最重要的是赵应该获得支持。对照万在5月22日的讲话与5月14日12个知识分子的书面声明可知，身为活跃知识分子、与改革派关系紧密的万，把学生运动明确地、断然地连接到一个新的目标：支持赵，反对李鹏以及“邓、杨和其他人”。这个半公开的动向是一系列事件的逻辑的高潮：5月16日的新闻报道，赵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5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宣布戒严的决定，赵提出辞职和同一天35个知识分子发表的声明，以及赵拒绝参加5月19日的公开会议。万设法在学生和改革派间建立一个联盟。许多改革派可能一直有这个想法，但党的规章制度一定对中国改革施加了很强的限制，以至他们不能在一开始时公开或半公开地支持这个战略。他们也不能直接公开和学生联系，不能使双方在具体要求上协调策略，协调进退，不能在和强硬派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所有重要问题的时间点上协同行动。自赵在权力斗争中于5月17日确

定性地失败后，改革派和知识分子的活动才变得公开些，但依然处于政治战略的半公开状态。然而，在万提出这个建议时，学生运动已彻底地激进化了。

此外，在部分学生中还广为流传的一个观点说，他们的运动从一开始就被改革派利用作为党内斗争的工具，所以他们担心，一旦明确支持一派或另一派，或者如果和党内改革派协调步骤，学生运动就会失去其独立性。这个观点可能是一个相当机会主义的表达：改革派正在丢掉阵地，或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学生们应该和改革派保持距离，拯救学生运动。或者，他们的观点可以被视为对极权政府的一个错乱的过度反应，也可以作为缺乏自信心的一个表现，也是在这样一个民间社会里缺乏较强的个人和群体认同的表现，即由于党国改革派的解压政策刚从极权控制下产生的民间社会里。不管怎么说，它是政治制度所产生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学生对万的提议的可能反应也可以从另一个怪异的插曲中看到。无论是被万润南说服了，或是害怕即将到来的军事镇压，或是纯粹的巧合，吾尔开希作为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的主席，在没有同其他学生领导商量的情况下，于5月22日要求学生退出广场。他被撤销职务，一个学生集体领导层建立起来了。

在那个关键时刻，香港的一个电视台突然播放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李鹏被迫下台的新闻。根据当时在北京的五位香港记者的事后分析，“北京部分学生和市民从香港新闻中得知了李鹏下台和其它一些在香港流传的新闻。他们对整个政治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他们陶醉在‘胜利’的气氛中，顽固地、不理性地坚持不撤离广场。”³⁹

那时，大家普遍相信人民解放军不会把枪口对准人民。现在不可

邹 谥

能知道谁最早开始传这个观点，也不知道这个观点为何被普遍接受了。但确实，许多学生和北京市民相信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将不会执行伤害人民的命令。他们力图对士兵友善，那样做实际上是把党的宣传工具用来对付党。许多报道称，拒绝执行戒严令的武装单位和准备执行命令的武装单位已经发生了冲突。也有人说，两个仅存的老师和几个军队上层人物劝说政府不要对学生动用武力。无论这些消息的源头是什么，也无论它们是否准确，人们相信它们，这种信念肯定被用作不时反对撤离的一个好论据。后来还有一些关于军队移动和重新部署的报道，它们暗示内战迫在眉睫。这些消息以及其他一些信息，误报、误导的信息将长期让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着迷。

我提及那些插曲不是为了设定一个研究议程，而是为了强调有关沟通系统中的缺陷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关注这个政权的失败，它未能通过它的新闻媒体和其它形式通讯完成下述任何一个目标：第一，说服学生出于政治和道义的原因撤离，让他们确信这个政权许诺的将来不报复、不“秋后算账”的诚意；第二，让人相信这个政权将使用武力的威胁——戒严令的宣布意味着使用武力。如果这个政权有足够的可信度，学生和北京居民就会觉得武力的使用近在眼前、势不可挡，那将让撤离成为一个自然的反应。相反的是，一些学生依据来源和真实性都不清晰的消息而行动。事实上，他们没有费多大劲就认定了这些事。⁴⁰ 许多人相信党控制不了军队，它的威胁是不可信的，这个事实本身明显地揭示了党的权威的下降。

宣布戒严前后，许多代表工人、各界知识分子和其它市民的社团建立起来了。在此，有两个组织值得一提。第一个是以王丹为召集人的、由 40 几个人组成的“首都各界联席会议”。据一个官方来源称，

这个组织由知识分子社团，北京地区学生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敢死队，北京工人纠察队，北京居民敢死队等构成。⁴¹ 北京第一次有了完全不受这个政权支持和控制的组织，相反的，它们都是由以某种方式反对现政权的组织和个人建立的。第二个是著名的“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在以后的 11 天里它掌握着学生运动的命运。它选择柴玲作为总指挥，柴玲曾发表过动员学生参加绝食的动人演讲，曾在 5 月 15 日站出来“维持秩序”——在吾尔开希建议绝食者和学生腾出广场的一部分以便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能够在那里举行之后。⁴² 秩序是被维持了，但学生却没有移动。

5 月 27 日，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北京高自联、工自联、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的领导人召开了一个联合记者招待会，柴玲、王丹和吾尔开希作为会议的主要召集人和发言人宣布，5 月 30 日，在一次世界范围的胜利游行之后，所有学生将撤离广场。然而，这个建议在两天内被取消了。据报道，学生们想等到 6 月 20 日人大常委会的例行会议之后才撤退。据香港的消息提供者说，柴玲和其他领导人主要受到近些天刚刚抵达广场、渴望看到一些行动的学生的支持。如果广场空了，这些人在北京便没地方待了，不得不回家。天安门广场指挥部自身不是个组织化很好的实体。柴在一个点上说她累了；她离开了总指挥职位，请学生们支持恰好是她丈夫的副总指挥。6 月 1 日，柴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指控另外一个学生——绝食示威的六个发起人中的一个，试图绑架她。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有关捐给学生的钱应该如何在学生领导人之间分配，以及在预料中的军事镇压后谁可以用它来逃跑和救他们自己的命。但是，这些混乱和可悲的局面是可以理解的：学生运动激进化的步伐已把温

邹 谏

和的因素，有责任感和有战略战术感的人，推开到了一边。正如中国的这个案例所展示的，运动最后几天里，广场领导人们的激进主义反映了一个刚刚破茧而出的公民社会所面临的难以克服的种种艰难。

显然，学生领导人无法控制他们的跟随者。但同样正确的是，一些领导人，主要是柴玲以及她的建议者和支持者，没有尝试去抑制最激进的学生和北京居民。相反，他们情绪激昂的演讲和浮夸的行动还试图激怒大众的情绪。当然，很难把责任都归到具体的领导人身上，但这并不是说他们谁都没有责任。⁴³

6月3和4日，军队在预料之中攻入了北京的中心。坦克、装甲车、军车的突击，强行军中的士兵射出的子弹把中国分裂成两半：一半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权力金字塔，另一半是一个压缩了的社会。世界震惊了，不敢相信地注视着中国，此时中国人在灵魂深处无声地哭泣。在十年缓慢的、伴随了几次波动的解压以后，中国在一个7个星期的事件里经历了一场动员，极端化，对立化，两天的血腥对抗，再加压地循环。随后的通缉令、恐惧与不确定的气氛驱使一些中国最好的精英逃亡海外，另外一些人或在监狱里或在他们家里，沉默了。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关键节点，当它需要这个世界能够给予的所有帮助的时候，天安门悲剧在中国和世界舆论之间留下了一道深深的隔阂。这块昨日的好土地，这块近日的黄土地，何去何从？

注释

1989年5月，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赵紫阳总书记对他“分裂党”的指控做了辩护，辩护全文现在刊登在1994

年7月的《信报财经月刊》(香港),第208期。这个辩护更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所有主要结论,同时也增加了一些重要的细节。他的讲话所揭示的新信息,被加在了下面的注释里。我想保留我的最初分析和解释的完整性。赵的自我辩护实际上加强了这些分析和解释。

¹ 学生行动的自发性质,可以通过仔细阅读赵紫阳的讲话得以确认。他说,很难满意地解释这个现象:几万人的行动受一小撮人的操控。在那时以及其他一些官方场合,他巧妙地谈及,学潮或者可能是“自发的”,或者是“逆反心理的”(赵,《信报财经月刊》,130页)。

² 在他自己的辩护中,赵宣称,他从来不赞成不遵循合法程序的学生上街示威,甚至更强烈地反对绝食抗议。据他说,他多次尝试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问题。他在那时说,大学的领导人和那里的党组织领导人应该积极劝阻学生不要上街示威,示威已经被法律批准时,领导们也应该引导学生通过常规渠道表达他们的意见。但是,赵也表达了自己的信念:赞同学生提出的支持宪法、增进民主、反对腐败方面的口号是与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一致的。他观察到,学生示威得到了大众的支持,要让局势平静下来,中共应该聚焦于大多数人,确保主流;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容易处理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坏份子。从一开始,他就敦促,无论发生什么都应该避免发生流血事件(赵,《信报财经月刊》,129-30)。

简而言之,赵同情学生的目标,但从来不赞同示威游行。他的最大目标是和平解决学生问题,避免流血冲突。

³ 赵否认,社论草稿全文被传真给了正在朝鲜访问的他。他收到的仅是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学生示威问题以及邓的评论的一个总结报告,他把邓的决定的“总体精神”理解为——无论是否理解正确,保持稳定和避免“动乱”(Zhao, 131)。但他承认,他为公开发布的“4.26社论”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因

为他在从朝鲜发出的电报里已经签名支持邓的决定（132）。

⁴ 邓的讲话文本，见“华侨日报，（*China daily news*）（New York），6月7日，1989，5。”

⁵ “华侨日报，6月14日，1989，4。”甚至宣布戒严令的决定在5月17日做出后，赵打电话给杨尚昆，表达他希望杨跟邓再谈一次，说服邓承认社论是错的。

⁶ 邹谏（Tang Tsou），“历史变迁的方向与过去的延续性”（*The historical Change in Direction and Continuity with the Past*），《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June 1989，345。

⁷ 见发表于1989年6月30日的陈希同的正式报告，人民日报（海外版），7月7日，1989，4。 陈是北京市长。

⁸ 华侨日报，6月14日，1989，4。

⁹ 罗维·迪特米尔（Lowell Dittmer）从《南华早报》和《明报》摘录了这句话（“天安门屠杀”载于《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September 7，1989，7）。

¹⁰ 华侨日报，6月14日，1989，4。在5月25日军委紧急会议上，杨尚昆主席强调党的分裂是学生运动的“根”。（华侨日报，5月30日，1989，9。）

¹¹ 陈的官方报告；见注释4。

¹² 华侨日报，6月14日，1989，4。

¹³ 见Mu Wang的文章，华侨日报，6月14日，1989，4。

¹⁴ 我几乎完全依赖于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吉勒莫·奥多纳（Guillermo O’Donnell），以及菲利普·斯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的工作。但是我知道，我正在处理不同的问题。见亚当·普热沃斯基，“民主转型如何、何地陷入停滞”？（*How Do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Get Stuck and Where?*）（写于1988年9月未公开发表的论文）。更全的版本和分析，见他后来的书，《转型与改革：东和南，第二章》（*Transitions and Reforms: East and South, Chap. 2.*）吉勒莫·奥多纳和菲利普·斯密特的《从威权统治转型：试探性结论和不确定的民主体》（*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Baltimore: 312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也是一本开创性的书。

¹⁵ 在这份 5 月 19 日由“三个研究所，一个协会”发出的著名声明中，诸多要求中的一个，是要求公开最高层领导人的决策内幕和意见分歧。这四个组织是，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业研究中心的农业发展研究所，中国国际贸易和投资公司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家协会。他们构成了赵的智库，是他最忠诚的支持者。

¹⁶ 在这个案例中，“激进的”一词被用于描述一个理想主义者——当实现可欲目标的机会降低时，他（她）愿意冒更大的风险。这些激进分子受良心伦理驱动，完全不顾责任伦理。他们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绝对自由的梦幻世界里。通过他们的行动，他们感觉到解放了，其他什么都不顾。他们更愿意显示他们对理想的奉献，而非实现政治上成功。然而，值得赞扬的是，他们不鼓吹使用暴力：当执行命令的战士或出于恐惧的反应，或出于对没有危害性的挑衅的反应，系统地、毫无必要的残忍地、有时非理性地使用武器射击时，他们只是零星地、防卫性地使用暴力。在 6 月 4 日的悲剧中，死者中的大部分是普通北京市民，而非学生。

¹⁷ 北京市长认为下述评论是最著名的学生领导之一王丹说的，在 13 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人民日报，7 月 7 日，1989，4）。

¹⁸ 见华侨日报，7 月 14 日，1989，8。

¹⁹ 见华侨日报，5 月 14 日，1989，1。

²⁰ 《记流产的 5 月 14 日对话》（“Record of the Aborted ‘May 14 Dialogue’”）（人民大学大字报，5 月 15，1989），载于韩明珠（音译，Han Minzhu），《呼唤民主》（Cries for Democrac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204-6）。

²¹ 见钱枫关于胡平（《中国之春》的编辑）、项小吉和吾尔开希讨论 1989 年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报道。（《中国之春》，第 86 期[1990]: 7）。我在翻译“学贼”时做了一些变通，把它翻译为“student scab。”

²² 见注释 8。

²³ 见注释 9-10。

²⁴ 华侨日报，5月16日，1989。

²⁵ 胡平，“八九民运的反思”，《中国之春》，第5期[1990]：10。胡平的文章以及更早在的在第4期上的文章，毫无疑问是我读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中最好的文章。

²⁶ 另外一个官员是教委主任李铁映。

²⁷ 中文文本见华侨日报，5月15日，1989，2。这份声明的签名者名单见，韩，《呼唤民主》，209页。声明的最初版本见严家祺，《改变世界的40天》，中央日报（国际版），6月4日，1990。

²⁸ 在学生5月13日开始绝食后，基于他们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以及5月14-15日谈判失败的背景，赵在政治局常委会5月16日的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修改社论，他的观点遭到李鹏的反对，李鹏摆出来的意见是，学生游行示威的定性是由邓本人做出的，邓的话不可更改。因此，这个议题在李和赵之间纠结，它必须由邓来解决。

第二天，政治局常委会在邓家里召开。在这次有邓出席的会议上，李鹏和姚依林（一名政治局常委）严厉批评赵，要赵对他的亚洲开发银行上的讲话促发了学生示威的升级而负责。显然，邓站在李鹏这边。正是这次重大的会议做出了派遣军队进入北京城和宣布戒严的决定。

但是，赵当场被说服不要辞职，因为如果即使是他的辞职想法被公众知道，也将会激化大众的情绪。因此，赵的命运戏剧性地多持续了三天，中国政治的复杂性由此可见。

²⁹ 中文文本见华侨日报，5月17日，1989，1。此文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³⁰ 张朗朗，《到天安门捎个口信》，九十年代（香港），第233期（6月1989）：14-15。

³¹ 戴晴在5月14日召集12个知识分子紧急声援学生的签名中也发挥了领导作用。她于1990年5月9日被释放。

³² 华侨日报，5月17日，1989，1。

³³ 1989年5月22日，杨做此评论。摘录发表于华侨日报，6月14日，1989，4。

³⁴ 同上。

³⁵ 见注释28。

³⁶ 对话的部分文本见华侨日报，5月19日，1989，4。

³⁷ 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1989-1990年的民主中国联合阵线主席严家祺，现在说，在他注意到那天公众的情绪转到反对邓后，他在愤慨中一个人起草了这份文件。因他的这份声明，一些无辜的人受到了审讯和被逮捕入狱，他已经表达了他的悲伤。（《改变世界的40天》）。戴晴对严家祺以及与他类似的人的鲁莽和稀里糊涂的行为提出了批评，见戴晴的《我的入狱》，世界日报，5月20日，1990年，32。

³⁸ 人民日报，8月7日，1989，重刊于新华月报，第9期（1989）：59。

³⁹ 路永雄等（音译，Lu Yongxiong et al.），《香港记者辉煌成就中的污点》（“The Dirty Spots in the Brilliant Achievement of the Hong Kong Journalists”），载于《人民不会忘记》（*Renmin bu hui wangji*），64位香港记者编6（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orrespondents, 1989），332。

⁴⁰ 对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随后的插曲是令人震惊的。当时有大量传闻说，学生运动已到了最后的日子。柴玲和他丈夫封从德，成功摆脱了中国警察，逃亡西方。据封从德说，他在6月4日凌晨做了尝试说服学生离开广场。故事发生了。柴玲对他说，赵紫阳和阎明复送信给他们，请求他们“坚持到黎明”。这个说法出现在中央日报（国际版），1990年5月11日的一个报道中。

《中国之春》的编辑胡平评论那则报道说，这则消息有多准确是很难说的。严家祺表达了他对赵和阎明复发过那条消息的怀疑。无论柴的说法将被证实是真的或错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以说，一个人若有她这样的朋友，是不再需要敌人的。在《纽约时报》1990年6月20日发表的一篇对她的访谈中，柴玲援引佛教说，她已经“重生”了。让我们都祝福她化身成佛。

⁴¹ 新华月报，第9期（1989）：58。

⁴²李佩尔（音译，Li Peier），《动情的总指挥柴玲》（“The Passionate Commander-in-Chief Chai Ling”），载于《人民不会忘记》（Renmin bu hui wangji），216..

⁴³ 在这个案例里，不难找到柴玲的责任。柴玲期待或者预测将血流成河，中国政府将“最后无赖至极”屠杀那些决定坚持占领天安门广场的人。基于PBS电视台播放的一个纪录片，Patrick E. Tyler在《纽约时报》1995年4月30日的第八页，报道了如下事件：

在军队攻击的5天前……柴女士告诉一个美国记者菲利普·康宁汉（Philip Cunningham，汉名“金培力”）：“我怎么能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政府准备无耻地屠杀人民的那一刻？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

提及那些想要努力避免暴力的人，她说“他们努力在政府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

柴女士还说，她自己不准备呆在广场。

“我不打算被这个政府残害。”她在访谈中说，“我想活下来，无论如何，我就这样想，我不在乎人们是否说我自私。”

柴女士说，她现在大概记得做过这样的表述，但她认为，这些表述应该被放在已经和政府对抗了6周这个情境下去理解。

在5月11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信中，柴玲为自己辩护，她指出，被翻译成“hoping for”的中文词“期待”也能够被翻译为“to wait for, to expect and to anticipate,”（等待，预见）暗示后者的翻译更准确地表达了她的观点。她否认学生有过如泰勒（Tyler）所暗示的“隐蔽战略”。但是她在最初的一个中文文章里的一句话中揭露了她的内心想法：“对我来说，很难告诉我的同学们，我们必须用我们的血唤醒人民。”在联合杂志编 316

辑的《天安门1989》（台北，台湾：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9，重版于1989年8月）第264-69页中，可以找到柴玲在5月末电传谈话的文本。这句话在266页。其他来源证实，这句话在5月28日被电传记录。

无论柴玲是否有过“隐蔽战略”，或者无论她内心的想法是什么，这里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道义和政治责任问题。当一个尽力保持住控制权力的运动领导人“期待”或“预测”到将有军事镇压和血流成河时，她，作为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确实有道义和政治责任给她的同伴或“队伍”一个更高的安全优先级，或者，也可以通知她在民主运动的追随者她的“期待”或“预测”，给他们必要的信息去决定是否继续占领还是暂时性撤退以避免流血。据柴玲说，“在5月26日的投票中，学生代表压倒性地支持继续留在广场”，但是他们忽略了他们的领导者内心的想法——无论为了什么目标，有必要“用他们的血”“唤醒人民”。如果柴玲已经告诉了他们她的预期或预测或内心想法，他们还会如此决定吗？显然，柴玲至今依然没有意识到，民主运动中的领导者应该和她的同伴们分享最关键的信息，以便他们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语义含混的一句话里，柴玲为她拒绝从广场撤退辩护道，她确信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还没有被推翻的那些人，将会（最终？）在一次打击中被彻底清除掉。这个想法完全合乎中国的“赢者通吃”的游戏模式。她的行为和内心想法只能被一场最终胜利的革命证明是合理的，如果革命真能成功的话。在这章做出这个结论的结论部分，我对类似柴玲的那个想法的暗示做出以下规范性的评判：

“可能有观点认为，即使没有任何战略的和长期的政治的考量，这些激进的学生也已经创造了一个态势，在这个态势里，这个政权将比我们假设的另一种情况——如果学生们及时从广场撤退以及军队镇压没有发生，更快地

被打倒。不能测定这个观点的有效性，正如我们不能证实或证伪与之相对的一个观点：如果学生已经撤退了，这个制度将更快经历更基本的变革。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学生们让他们自己、知识分子、党内改革派、其他中国人、以及中国本身遭受的成本实在太高了。第一个观点实际上假定，另一场革命将会在中国发生，它将证实这些成本以及其他仍待遭受的苦难是值得的。” 选自《天安门的悲剧：国家-社会关系》（“The Tiananmen Tragedy: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in Brantly Womack, ed., 《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政治》（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318。

作者简介

莫里斯·卡尔达 (Moliš Calda) 是布拉格查尔斯大学英美研究教授。他有大量关于捷克斯洛伐克转型的作品，同时也是东欧宪法研究中心的记者。

迪米特·迪米特洛夫 (Dimitr Dimitrov) 是索菲亚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他发表了许多关于选举法和选举程序的著作，并负责了一系列选前竞争调查。自 1994 年起，他是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正式任命成员。

热奈·艾斯特 (Jon Elster) 是哥伦比亚大学罗伯特·K·莫顿社会科学教授。他是 12 本书的作者，其中最近的是《地方正义》(Local Justice)；还主编有 8 本书，最近的一本是《时间的选择》(Choices over Time) (与 G. Loewenstein 合编)。

罗姆亚娜·科勒拉瓦 (Rumyana Kolarava) 是索菲亚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助理教授。她撰写过大量关于共产政府政治崩溃、后共产党时代法律转型的著作，同时担任东欧宪法研究中心的记者。

维克托·欧塞梯恩斯基 (Wiktor Osiatynski) 是中欧大学索罗斯大学教授和东欧宪法研究中心的共同主任。自 1990 年以来，他多次担任波兰议会宪法委员会的顾问。他是 15 本波兰语著作和一本英语著作的作者，即《对比：苏联和美国思想家论未来》(Contrasts:Soviet and American Thinkers Discuss the Future) (1984)。

乌尔里希·K·普罗伊斯 (Ulrich K. Preuss) 是布莱梅大学法学教授。他有关于德国统一的法律和经济问题的广泛著述。

安德拉斯·赛约 (Andras Sajo) 是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的法律教授，曾担任匈牙利总统顾问。他有若干本用匈牙利语写的、关于社会和法律变革的著作，并发表了许多关于宪法文章。

邹说 (Tang Tsou) 是芝加哥大学荷马·J·烈文斯顿政治学与东亚语言、文明 (荣休) 教授。他是数本著作的作者，其中包括《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61)，《文化大革命与后毛时代的改革：一种历史视角》(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 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他也是《危机中的中国》(China in Crisis) 一书共同主编。所有这些书都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最近的著作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政治：宏观史和微观机制的分析》(香港牛津大学，1994)。